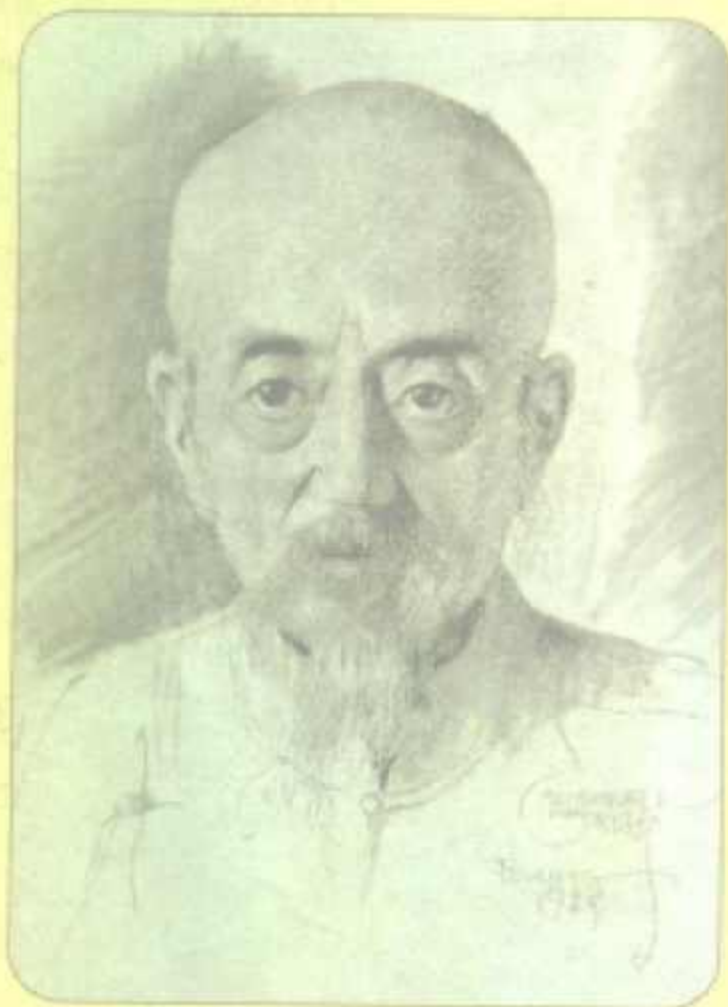


GU HONG MING WEN JI

# 辜鸿铭文集

上

黄兴涛 等 / 译



海南出版社

0142451

GU HONG MING WEN JI

# 辜鸿铭文集

上

黄兴涛 等/译



海南出版社



印 S1043687

## 出版前言

辜鸿铭在清末民初算得上是大名鼎鼎的了。人们要么津津乐道于他那非同一般的外文造诣和对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熟，要么念念不忘他对纳妾、留辫、缠足等陋俗的曲辩。他的奇闻逸事流传极广，尤其是他那亦庄亦谐嘻笑怒骂、如排炮一般的犀利妙语，令人绝倒，但他因此也被人视为狂目为怪，甚至被人径呼为“辜疯子”。因为辜氏多以英文写作，虽然在西方名噪一时，但国人无从寓目，也就谈不到理解其思想言论了。

在近代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中，辜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他既有别于清季的洋务派、国粹派，也不同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他因为早年留学于西方，深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归国后又服膺于孔孟之道，凭藉这种渊源，他力图以现代性批评传统、以传统批评现代性。他将当时中西文化冲突还原为现代性与西方古典文明的冲突，以促进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应当说，这一文化策略是可取的，这一点由他在西方享有的盛名可知。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一个误区，这就是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救亡，使人们忽视了民智的启蒙，忽视了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评，误以为现代化就是全能的拯救力，可是成功的现代化恰恰需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思考。辜氏熟知

近代西方文明，了解其弊端，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趋向现代化，急切不得扭转，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只能以嘻笑怒骂辛辣伤时来传达了。

辜鸿铭曾经关注过两个问题——对现代化的反思和人类社会的道德建设——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世纪末的今天，人们当不会因人废言，应能从辜氏的字里字外引发更深层的思考。

我们在出版这部文集之前，出版了辜氏的《中国人的精神》中译本，得到了各界的热烈反应，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辜氏的思想言论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希望我们出版的这部《辜鸿铭文集》，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有关现代化、道德重建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想素材。

海南出版社

1996年7月

## 序

黄兴涛同志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并在同学、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辜鸿铭文集》的编译，交付出版。这部文集的出版，对于了解、研究辜鸿铭，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是有意义的。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的名人，“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以“古怪”著称于世。他的轶闻趣事、奇谈怪论，在他活着时就广为流传，死后则更加扑朔迷离，平添几分神秘色彩。凡是认识他的人，听说过他的人，不论知深知浅，或臧或否，无不以“古怪”目之。林语堂誉之为“怪杰”，胡适称他是“怪物”，周作人则说“北大顶古怪的人，恐怕众口一词地要推辜鸿铭了”。

辜鸿铭的确是“怪”。他 1857 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祖籍福建同安。名汤生，以字行世，自号汉滨读易者。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东西南北人。13 岁到英国留学，20 岁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继而又到德、法、意等国游学，取得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学文凭。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国外度过，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邃于西学西政，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然而，辜鸿铭归国后入张之洞幕府，即倾心于儒学文化，并且日趋保守，以至清朝覆亡后仍拖着一条辫子，对人们公认的“国渣”，如小脚、辫子、纳妾、八股文等都不同程度加以赞赏或辩护，令人不可思议！因为留给世人这

样一种印象，似乎要举出近代中国最顽固落后的文化人，也就非辜鸿铭莫属。其实这是片面的，不是辜鸿铭这个历史人物的全貌。辜鸿铭的著作作用中文写作的只有《张文襄幕府纪闻》和《读易草堂文集》两种，大多是以外文撰写、发表，这也难免限制了人们对他的了解。

辜鸿铭虽然思想保守，但从他的著述的内容看，并没有顽固到对中国的一切都加以维护的程度；也不是对西方的一切都予以拒绝，盲目排斥。他对被认为“讨厌西方文明”，是“排外思想家”，感到懊恼。晚年在日本讲演时，他曾一再申明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讨厌西方文明，我在这里公开申明一下，我讨厌的东西不是现代西方文明，而是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文明利器这点。”又说：“因为我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清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的确，辜鸿铭并不简单笼统地排斥西方文明，他不仅赞赏古希腊文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至18世纪理性时代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等，也不反对对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成果加以一定限度的吸收。他赞赏中国传统文化，但主要是孔孟的儒学，对宋明理学则大加批评。他认为，“中国自宋朝以来，那些可以称作孔教禁欲主义者的宋代理学家们把孔教弄窄了，使其变得狭隘和僵化。而在这一思维途径下，孔教精神，中国文明的精神，被庸俗化了。”他一方面讥嘲那些前倨后恭的崇洋媚外者，另一方面又讽刺那些盲目自大、不了解外国文明的冬烘先生。如果我们不对辜氏的著述进行广泛的阅读和全面的了解，就难以认识他的思想全貌。

辜鸿铭英译儒家的《论语》、《中庸》等经典，向西方传扬中国文化，是值得称道的。他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和民族歧视，进行了不懈的抨击，以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即使他那保守的文化思想，也不是没有蕴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或有价值的见解。

探讨中西文化的特点和关系，是辜鸿铭著作中关注的一个主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的、心灵的，比西方近代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优越、成熟。这一认识未必正确。但他关于中西文化的具体比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尖锐批评，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某些特点的揭示，却时有创见或闪烁思想火花。比如，他认为儒教不是宗教，但却具有宗教的功能的观点，关于中国文化早熟的观点，关于汉语优长的观点，对西方社会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谴责等，都有自身的思想史价值。

关于中西民族性格的有关看法，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就作了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这样的概括、比较，不一定都准确，但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人们进一步思考有启发意义。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既要冷静、客观地认识其缺点，又要以同样的态度认识其优长，避免盲目否定，或盲目自我陶醉。

辜鸿铭在阐发民族文化的优长时，有一种明显的自大和虚骄心态，甚至为一些封建糟粕和陋习辩护。他在《中国人的精神》这部书中，所阐述的最基本的精神，是孔子的“春秋名分大义，或简称春秋大义。孔子的这部传授忠诚之道的著作，就

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它使全中国人民和整个国家绝对地效忠于皇帝”。也就是宣扬封建的三纲思想，甚至说如果“抛弃了忠君之道，即孔子国教中的名分大义，……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清末民初，辜鸿铭是一位驰名海外的人物。俄国托尔斯泰曾与他通信，讨论抵御近代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破坏力量的办法，交流东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经验。英国作家毛姆到中国后，费尽周折去拜访他，承认他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法国的罗曼·罗兰、瑞典的勃兰克斯、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等，也都对辜氏有过好评。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声誉甚隆。以哥廷根大学奈尔逊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哲学界“新康德学派”人士，对他十分推崇。德国的一些大学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和“辜鸿铭俱乐部”。在日本，辜鸿铭也有相当影响。1924年至1927年，他应邀在日本讲学，并有日文讲演集问世。40年代初，日本还曾掀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一个中国文化人在国外能有如此影响，原因虽然复杂，但他的著作和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当无疑问。

黄兴涛同志是我多年的学生。还在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他就对辜鸿铭“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现象发生兴趣，并开始搜集辜氏的外文著作。后来，他又跟我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辜鸿铭及其文化思想作了深入研讨。在这过程中，我一直希望他能一边研究，一边将辜氏的外文著作翻译出来，不懂的外文请人帮助。这样，从1987年开始，他就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到他以辜鸿铭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时（1991年），便已完成了绝大部分译稿。我读了译稿后，觉得还较粗疏，嘱咐他务必加以认真校改，保证质量。而今转眼又过了几年，这一工作终于



有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这部文集所收，包括辜鸿铭的中外文著作、论文和译著。仅就外文著作而言，它包括了辜氏早年所写、为现在中国人研究西方中国学开篇之作的《中国学》一文；长江教案期间抨击西方在华传教而引起西方舆论关注的《为吾国吾民争辩》一文；义和团运动时期谴责西方政治侵略和民族歧视，驳斥“黄祸论”，以及为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和义和团运动辩护的系列论文（1901年底合成《尊王篇》一书出版）；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近代文化运动所作的阐释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1910年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又名《春秋大义》，1915年出版）；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进行批评，集中阐发对孔教的研究心得，以德文保存下来的《呐喊》一书（1917年结集送往德国，1920年译成德文出版）；五四时期公开反对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两文；晚年赴日讲学，并以日文保存下来的《辜鸿铭讲演集》和《辜鸿铭论集》两书（内容有较多重复）；等等。此外，还翻译了一些序文和有关参考资料，作为附录。

编译《辜鸿铭文集》并不容易。首先遇到的，是资料难找，特别是发表在各种英文报刊上的文章，查找起来有如大海捞针。此外，还受到这些报刊在国内收藏残缺不全等条件的限制。其次，是涉及外语文种多，仅以辜氏的英文著作而言，其中就夹杂着拉丁、德、法等文字，希腊文、意大利文、日文也偶而有之，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加之又是零星分散，请人帮助也颇为不便。黄兴涛同志仅为此就花费了不少精力。尽管如此，在文

献的收录和译文等方面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将来弥补。愿兴涛同志能继续发扬勤奋严谨的治学学风。

龚书铎

1996年6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 辜鸿铭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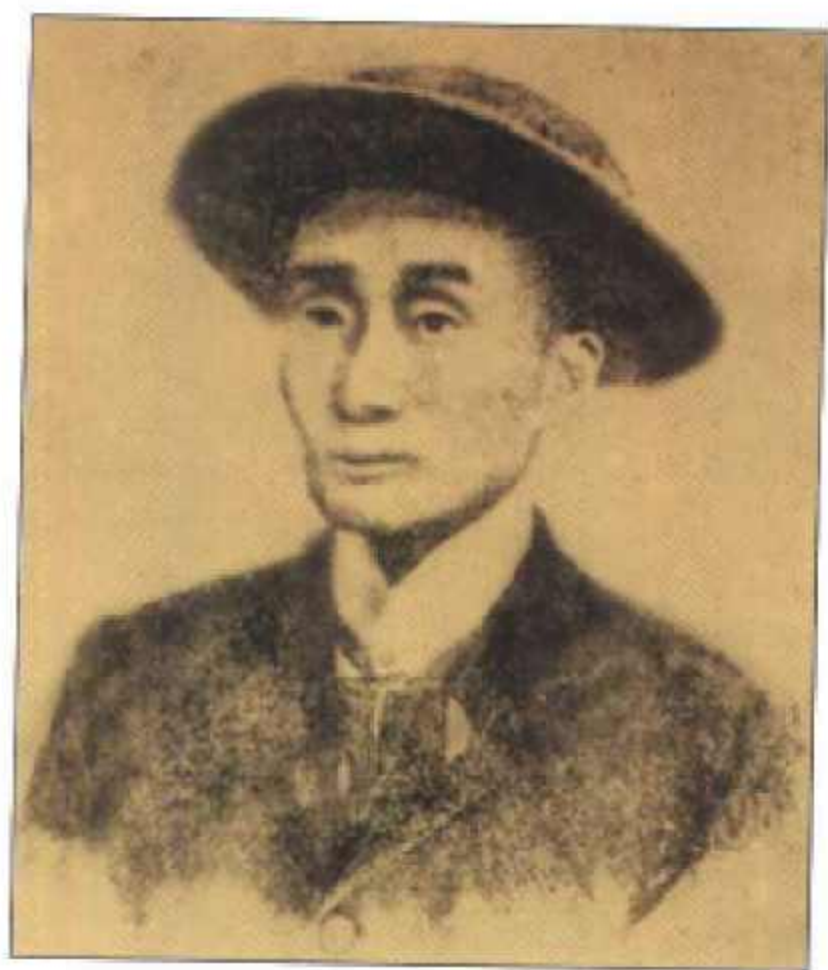
上卷



辜鴻銘中年時期像



索鴻銘在日本講學留影



李鸿铭青年时期像



李鸿铭与泰戈尔1924年在北京的合影

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風  
流乃為真豪傑  
不愛財不愛酒不愛夫  
人是個老頭駝  
空齋手一似天

嘉祥 鴻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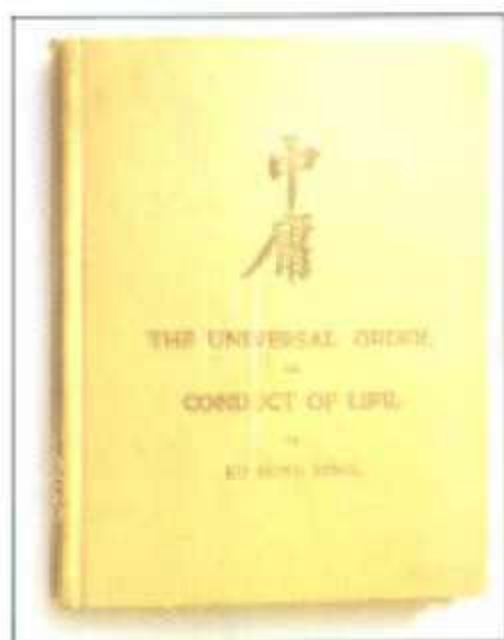
毅

行不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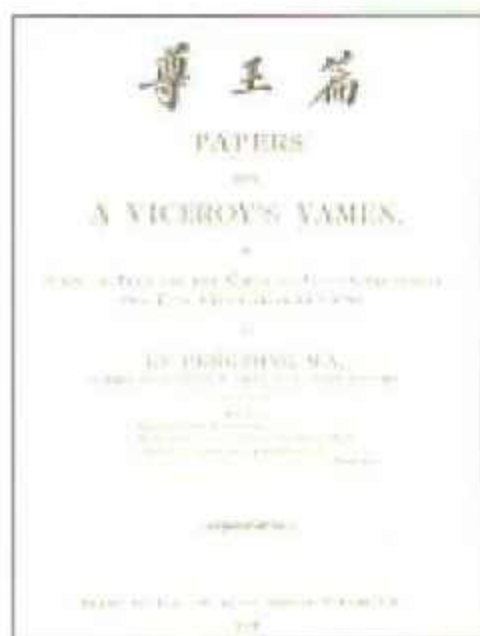
辜鴻銘

辜鴻銘贈日本友人薩摩維次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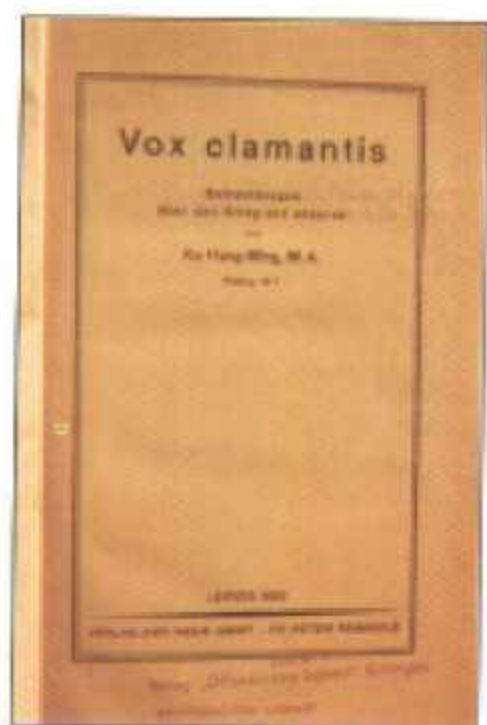
《中庸》英译本  
(1906年版)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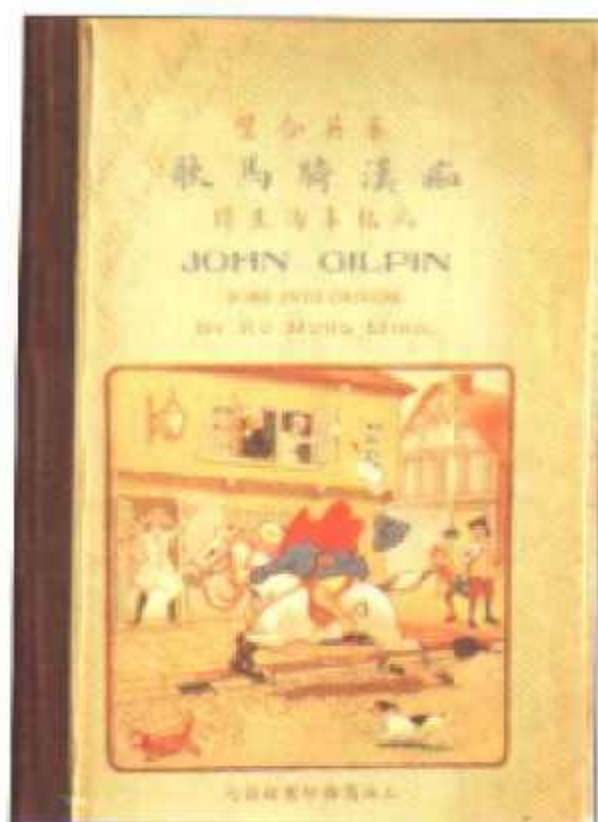
《尊王篇》英文本  
(1901年版)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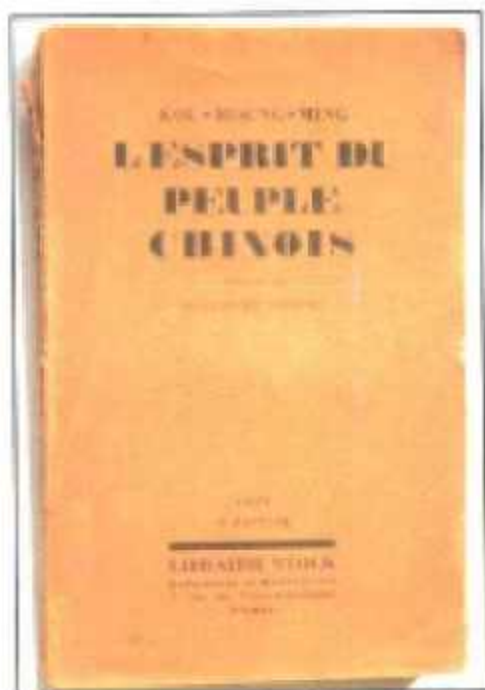
右为辜鸿铭，左为辜氏之妻淑姑，中为辜氏如夫人吉田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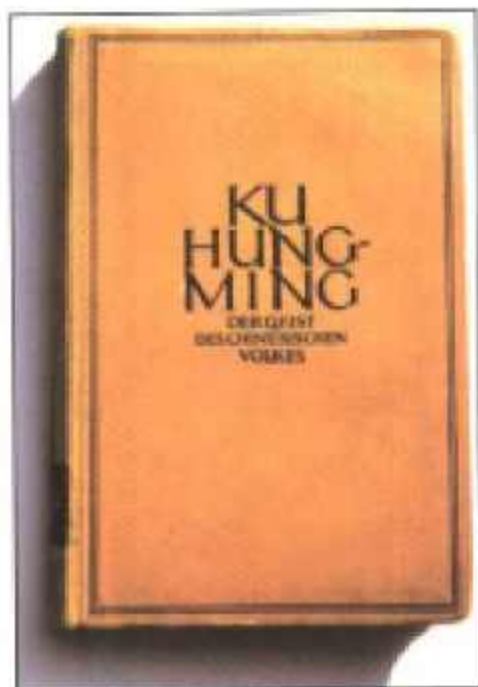
《呐喊》德译本  
(1920年版) 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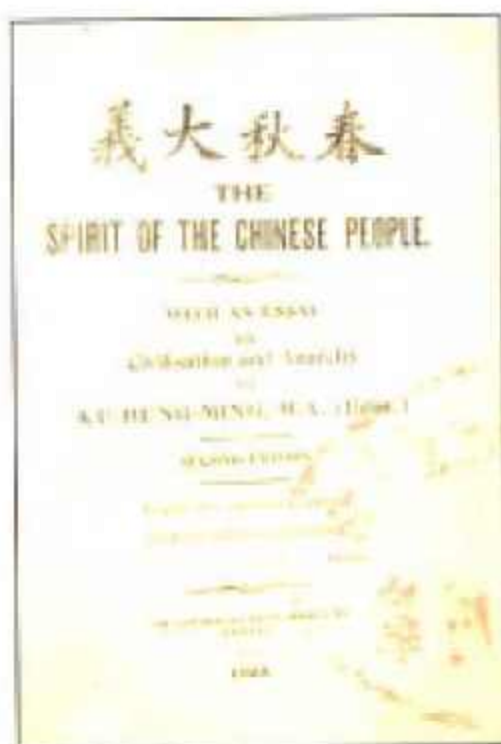
《痴汉骑马歌》  
(1905—1910年上海商务版) 书影



《中国人的精神》法译本  
(1927年版) 书影



《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  
(1924年版) 书影



《中国人的精神》英译本  
(1922年第二版) 扉页



《中国人的精神》日译本  
(1941年版) 内封

## 目 录

序 .....	龚书铎 1
---------	-------

### 上 卷

尊王篇（总督衙门论文集） .....	1
扉页附诗：怀念赫尔曼·布德勒 .....	3
序言 .....	7
一、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 对于皇太后本人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 .....	19
二、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 ..	41
三、为了中国的良治 .....	52
四、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统治与文明状态的考察	
之一：一般情形 .....	75
之二：在英国 .....	88
之三：在德国 .....	100
之四：在法国 .....	122
之五：在美国 .....	143
五、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的道德难题 .....	169
附录 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致辜鸿铭的信 .....	185

致一家英文报刊主编的信 .....	187
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 .....	195
致汪康年书 .....	233
给托尔斯泰的祝寿文 .....	234
雅俗辨 .....	236
痴汉骑马歌 .....	239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	273
卷首引语 .....	275
再版记言 .....	276
自    序 .....	277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	284
导    论 .....	294
第一章  满人当权 .....	298
第二章  中产阶级的崛起 .....	307
第三章  满人重新掌权 .....	328
第四章  一个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	367
尾    声 .....	384
附录  已故皇太后 .....	391
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 .....	397
张文襄幕府纪闻 .....	409
弁言 .....	411
卷上	
南京衙门 .....	412
不排满 .....	412
虎门轶事 .....	413

曹参代萧何	414
大臣远略	415
上流人物	416
书生大言	417
五霸罪人	417
清流党	418
孔子教	419
新算学	420
孟子改良	421
践迹	422
务外	423
生子	424
为人	425
公利私利	425
权	426
廉吏不可为	427
爱国歌	428
半部论语	428
理财	429
王顾左右而言他	430
官官商商	430
爱官	431
亡八蛋	432
禁嫖赌	432
倒马桶	433
贱种	434

贵 族	435
翩翩佳公子	436
庸言庸行	437
不吹牛炭	438
颂 词	439
马 路	439
大人有三待	440
不问民	441
卷下	
真御史	442
西洋议院考略	443
国会请愿书	444
马拉马夫	445
夷狄之有君	446
烂报纸	447
读书人	448
督抚学堂	449
女子改良	449
高等人	450
费 解	450
不 解	451
狗屁不通	451
看 画	452
华 侨	453
照 像	453
发财票	454

卖 穷	455
不枉受穷	455
叶君传	456
英将戈登事略	458
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462
士 说	463
在德不在辨	464
自 大	465
依样葫芦	466
学 术	467
风 俗	468
政 体	469
看招牌	470
爱 才	471
不自贵重	472
不拜客	473
自强不息	474
犹 龙	474
附录 辜鸿铭挽张之洞联	475
关于时局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	477
呐喊	485
译者（奈尔逊教授）前言	487
辜鸿铭自序	491
一 基督教会与战争	493
二 现代教育与战争	497
三 民主与战争	501



四	现代报纸与战争	507
五	日本的辩解	513
六	是义还是利?	520
七	美国人的心态	527
八	孔教研究之一	534
九	孔教研究之二	539
十	孔教研究之三	548
十一	孔教研究之四	552
十二	孔教研究之五	555
附录	对恩達利尔的答复：致《京报》的一封信	561
	君子之道：致《京报》出版商的一封信	569
	在北京庆祝俾斯麦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573

## 下 卷

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	1
再版说明	3
序言	5
导论	19
中国人的精神	27
中国妇女	70
中国语言	90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99
一个大汉学家	107

中国学（一） .....	115
中国学（二） .....	125
附录 群氓崇拜教 或 战争与战争的出路 .....	131
《中国人的精神》各国译本序 .....	147
反对中国文学革命 .....	165
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 .....	171
宪政主义与中国 .....	175
所有受过英语教育的中国人应读之文 .....	193
读易草堂文集 .....	209
罗振玉序 .....	211
内篇	
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 .....	213
上湖广总督张书（丙申） .....	220
《尊王篇》释疑解祸论 .....	222
义利辨 .....	227
广学解 .....	231
《蒙学弦歌》序 .....	235
《正气集》序 .....	236
外篇	
西洋礼教考略 .....	238
西洋官制考略 .....	240
西洋议院考略（存目）	
意大利国贤妃传（译意大利古文） .....	241
英将戈登事略（存目）	
辜鸿铭讲演集 .....	245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247
纲常名教定国论·····	262
<b>辜鸿铭论集</b> ·····	267
日译者序及说明·····	269
一、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274
二、何谓文化教养·····	283
三、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	294
四、东西文明异同论·····	302
五、什么是民主·····	311
六、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	321
七、中国古典的精髓·····	328
附录 追忆辜鸿铭先生····· 萨摩雄次	332
《论语》英译·····	343
《中庸》英译·····	507
<b>附 录</b>	
国学辜汤生传····· 赵凤昌	577
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罗振玉	583
记辜鸿铭····· 马伯援	586
辜鸿铭先生····· 温源宁	588
辜鸿铭在德国····· 嗣銮	590
辜鸿铭访问记····· 毛姆	593
托尔斯泰与辜鸿铭书·····	603
辜鸿铭论····· 勃兰兑斯	608
辜鸿铭著译年表·····	619
后 记·····	629

# 尊王篇

(总督衙门论文集)

一个

中国人为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作的辩护

此书是辜鸿铭的英文代表作之一。1901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1923年曾由日本人办的《北华正报》社重版再印。主要是辜鸿铭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庚子议和前后公开发表的英文文章的合集。此时他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当幕僚，故称“总督衙门论文集”。封面题有“尊王篇”三个汉字，乃赵凤昌手笔。

## 怀念

赫尔曼·布德勒 (Hermann Budler)<sup>①</sup>

(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

—

红红白白的野李花  
在寒空中开放，  
阳光照射下的丛林  
一片美丽的橙黄。

二

珍珠般的河水清澈透亮，  
静静地流向大海。  
那灵魂的骚动纯粹只为了  
自己能够自由自在。

---

<sup>①</sup> 此诗题在原书扉页上。

三

爱、鲜花和音乐往日都是你的，  
但爱对于你  
是一种摧折，就像盐海之水  
那般辛酸苦涩。

四

你诚笃的灵魂渴望着  
实现更高贵的计划：  
梦想高尚时代能够重来，  
唉！这只能是梦想。

五

年复一年地住在河谷之上，  
它成为你这个流放异族者的家乡。  
的确，你形同流放，因为  
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六

我们坐着谈论新式的信条  
和古老的学说，  
还有那现代的主义，从古至今  
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

七

你渴望的是  
最优和最优者的结合，  
要打破那  
东方与西方的畛域。

八

啊，朋友，尽管我们种族不同，  
你那高贵的面孔，  
那过于苍白的面容，  
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九

虽然你心胸博大，  
但仍容不下世事的悲哀，  
当我们还在工作和等待，  
你却已撒手离开。

十

别了！我为你伤心地吟唱，  
让快帆将它带到  
你那遥远的西方，  
直到你安息。

辜鸿铭

原注：此诗做于和发表于布德勒先生去世之时，他 1893 年在广东走完了人生旅途。

## 序 言

下列论文，最初都曾在横滨出版的《日本邮报》上发表过。只有一篇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的文章，最早发表于上海，时值扬子江骚乱<sup>①</sup>期间。现在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是为了把它们提供给更多的读者。我本来还是想按它们初次发表时那样，不署上作者名字的，但这些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篇的性质及其写作的特殊背景，使得我不得不署名。此外，我公开自己的身分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是据传闻，正如一个英国人贪恋勋爵之位一样，一个在华外国人也贪恋总督之位。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辜氏将“土”这一历来解释不一的字译成“位”。——译者）。因此，当人们得知这些文章不是某个总督所写，而是出自一个总督幕僚的手笔时，这样一些论调会不攻自破。

鉴于此，这次我把这些论文提交给世界的时候，署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戈登<sup>②</sup>谈到埃及时所说的下列话，也同样

① 扬子江骚乱：指1891年长江教案。

②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侵占天津北京。1863年统“常胜军”，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次年“常胜军”攻下常州后解散。清廷升戈登为提督并赏穿黄马褂。1864年回国。后任苏丹殖民总督。1885年被苏丹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辜鸿铭对戈登的为人行事很敬佩，曾作《英将戈登事略》。

适应于中国：“外国人统治埃及多久，埃及人民的声音被压抑多久，那么埃及作为最劣等王国的时间，就必定有多久。”

我在这些论文中所要阐述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目前关于中国的议和是虚假的。中国的事态以去年的事变为标志，恶化到了极点。在此，我丝毫无意于说这全是外国人的错，而承认错在双方，正如中国皇太后陛下在她的谕旨中所表示的那样——“彼此办理不善”。这就是皇太后陛下请求文明开化的欧美列强解决问题的基础。作为答复，文明开化的列强却要求——砍头！在局势最为紧张、恐怖气氛最浓和最为冲动的时刻，叫嚣惩罚乃至复仇，都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联军已经占领北京并成为局势的实际控制者的时候，一些责任重大的政治家们仍然提出冷酷无情的、固执的砍头要求，我必须指出，这是一种道德上甘于堕落和玩世不恭的行为，对于当今的文明国家来说，它甚至比外国军队在北部中国的野蛮行径还要耻辱。我实在为那些对中国王公大臣的自尽负有责任的人感到可怜。至于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据报道，她已说过人生无非一死。她为人行事的原则——正如丹东<sup>①</sup>所言，是“*Tout est perdu fors l'honneur!*”（除了荣誉，一切都可抛弃）

牛津大学的外交学权威教授蒙塔古·伯纳德（Montague Bernard）先生指出：“一个和平的条约，必须包括由双方裁决、以期消除战争爆发根源的必要条款，调节不平，平息怨气，防止它们再度复活，这是谈判者必须做到的基本之事。如果这一点没有明确有效地做好，那么和议就是虚假的。”眼下，北京的

<sup>①</sup> 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1794）：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外国使臣们非但不努力去消除中国目前事态的根源，甚至连根源何在也全不了解。他们试图消除的是吴淞炮台！这里，我冒昧地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大胆地预言，除非中国的传教士炮台得到应有的关注，要不了多久，外国人甚至连在中国谋生也不可能——恐怕只好抢！

我在这些论文中要阐明的第二个观点如下：目前，要想使中国公平合理的贸易能够繁荣兴旺，最明显不过的一点，是该国必须首先具备一种良治秩序<sup>①</sup>，然而，如果不允许北京的帝国政府有充分的自由，去做它认为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秩序的正确和最为合宜的事情，那么良治秩序便无从谈起。在此，我可以指出，如今列强在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即支持各省所谓进步的总督反对那被指称为极端保守反动的中央政府——反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所选定的顾问的政策——可能是一种蓄意毁灭中华帝国，或起码将它抛入这样一种无序和混乱状态的政策。这一政策最终也将毁掉欧美——或者肯定毁掉欧洲。现在列强要做的事情是，在中国恢复原有的秩序。

鉴于目前外国人对中国事态所具有的荒谬、不当和虚假的知识，列强们应该采取的、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列强应带头采取并以道义或其他方法强制别的列强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政策，不是“门户开放”，而是“让中国人独立”。除此之外，如果在中国废除治外法权时机还不成熟，那么列强，或者我所说的一个领头的

<sup>①</sup> 辜鸿铭在此使用的是“good government”，有人译作“好政府”，我认为不妥。在《尊王篇》全书乃在其他书文之中，辜氏常使用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种良治，即政治清明、社会井然有序，人民循规蹈矩、遵纪守法。

列强，便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和坚决主张其他列强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在华外国人自身的良治秩序。在此，我要指出一个关系到大不列颠声誉的事实，即英国为了保证在中国各地的外国人自身的良治秩序所做的仅仅一丝努力，是在上海建立了英国高等法院。公正地说，如今受命在中国通商口岸担任领事的那些英国毛头小伙子，也常想努力去做一个英国佬所希望做的事情——尽责。但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现在却不被鼓励去发展他们的脊梁骨。有个英国领事在同总督的一个属员谈起某件明显的、不义之事时，曾说：“我实在抱歉，我不能去考虑事情的正义，因为我身不由己。”另一个在华的英国佬曾写信给我：“我必须仰仗你的友情，不要把我写给你的关于这次冲突（传教士问题）的话告诉任何人，以免给我招惹麻烦，因为这样将对我极为不利。”可怜的海盗之子，现在甚至于害怕——惹麻烦！

还是回过来谈论列强在中国的正确政策问题。要想推行我所说的政策，列强们应首先选送较好和较有能力的代理人到中国来，这是极为必要的。爱默生<sup>①</sup>说：“政府总是很晚才懂得，任用不诚实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就像对于个人一样有害。”现在，一个真正诚实而有能力的驻京外国使臣，用不着我教，就能懂得他在中国的任务不是引导或帮助其国民通过出卖主义信条、假药、铁路股票，或后膛装弹的新式枪械去做生意或谋生。他的任务是要照管好本国在华侨民遵纪守法，使自己的商业活动符合有法度的文明国家的政令、礼仪和良治秩序。已故新加坡殖民总督英

---

<sup>①</sup>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大师，也是19世纪世界文坛的巨人。他批判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弊端的思想，对辜鸿铭影响颇大。辜氏经常引用他的言论。

国人麦克唐纳(Richard MacDonald)爵士,曾为改善种植园中中国苦力的境况做过一些事情。当一个英国代表团来访问并对他的上述作为大肆议论、指手划脚时,他说道:“别忘了,你们这些种马铃薯的家伙,我是女王派来统治你们的总督。”然而,如今的公职人员,从公使、舰队司令到可怜的舰长与巡警官,他们所寻求的只不过是参加宴会,和对他人高谈阔论、指手划脚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竟还奇怪中国义和团的兴起和欧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简而言之,列强在中国要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政策,是“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外国人,使他们在规规矩矩,安居乐业。”那么,还要不要“门户开放”呢?要的,只要你们拥有一个公正的法官或起码有一个像麦克唐纳爵士那样的人来看管出入中国门户的那些人,使他们规规矩矩,大门是务必要尽一切办法打开的。“是吗!”廉洁的外国人对我说:“外国人在中国怎么不规矩了?”这个问题现在听来,就仿佛像诙谐的庞提乌斯·皮雷特(Pontius Pilate)在问“何为真理”一样。去年夏天,在北京和天津,外国平民、传教士甚至于还有官员公然无耻地抢劫财物,连上海出版的那份并不很严正的《字林西报》<sup>①</sup>也为此感到羞愧,并不得不在社论中大声疾呼:“难道在中国和本国都没有政府或当局了吗?谁能够制止眼下正在北京持续的这种无耻局面呢?”正好一

---

<sup>①</sup>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又称《字林报》。英国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以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的情况为主要旨志,是近代关于中国的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1864年创刊,1951年停刊。

年以后，赫德<sup>①</sup>爵士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在他那部苦心经营的文学作品中，他竟然向国际世界平静地说：“的确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抢劫。”因此，显而易见，如果让庞提乌斯·皮雷特来做判官，让像赫德爵士这种头脑中具有随机应变的双重道德价值标准的人充当辩护人，要回答最近由玛丽·菲奇(Mary Fitch)太太提出的问题、那个曾就在华外国人净化灵魂问题写过文章的上海传教士夫人所提出的“究竟谁是魔鬼？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是不容易的。

下面，我想谈谈我这些论文要说明的最后一个观点。在题为“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的系列文章中，我已努力对此做出过说明。有人告诉我，许多外国人读了这些札记后感到极不愉快——特别是英国人。我这些札记，就是专门针对那“玩公正游戏”的现代英国腔调而做的。不过我很明白，这种腔调对于英国人来说，当它被一个中国佬操之于舌的时候，是讨厌去听的，因为现代英国人相信或试图相信他们自己是“海盗(Vikings)唯一的儿子”，正如一个英国佬最近在上海对我说：

---

<sup>①</sup> 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英国人，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来华。1863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对晚清中国的内政外交发生过重要影响，清廷曾授予他太子少保的头衔。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以英文写了一本题为《这些从秦国来：中国论集》的书(先是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报刊上)。书中谈到中国的民族性，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永远屈服于外国列强之下，列强应该赶紧废除治外法权等。但同时又极力为外国列强出谋划策，剥夺中国的权益。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不偏不倚，实际上归根结蒂却是站在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的立场上。他的言论颇受各国重视。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赫德自承文学修养不足，说此书不是“文学之作”。下文里，辜鸿铭故意以反讽的文字，说此书乃赫德“苦心经营的文学作品”。

“你们中国人非常聪明并有奇妙的记忆力，但尽管如此，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当这个英国佬对我讲此话之时，我没有告诉他只有死海类人猿没有记忆，而是想起了曾国藩侯爵的劝告（见本书第54页），我和蔼地微笑着，装作傻乎乎的，似乎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在英国人所有令人讨厌的民族特性中，最糟糕的甚至还不是他们那麻木迟钝、呆头呆脑的傲慢，这种傲慢有时表现为“一种冷酷的英国式逼视”，试图把你吓呆，最糟糕的是现代英国人装模作样的虚伪恶习。而在所有这种恶习中，最荒唐可笑和令人难以容忍的又在于——他们俨然是海盗唯一的儿子。现在，要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拥有真诚的信仰，即便这种信仰有一部分是真诚的，我也毫不怀疑它有时确实是那样，都实在是太晚了。此种情形，不过表明可怜的现代英国人不幸忽视了他的教养。因为现代欧洲文化，如果它还承认一点东西的话，总该承认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的真理。总之，我要严肃地奉劝现代英国人，奉劝那些一般说来都懂得自身利益所在的现代英国人，要公平合理地参与竞争并净化其虚伪的灵魂；如果他实在愿意傲慢无礼，那么请他在傲慢无礼中至少要贯之以真诚。

言归正传。我在札记中要说明的是：今日世界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在中国——尽管中国人正遭受它所带来的苦难——而是在欧美。无政府状态的标志或检验尺度，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或多或少地出现无序或管理不善状况。“无政府状态”（Anarchy）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是“无王”。“无王”或无政府状态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个民族中缺少真正有能力的君主。第二阶段，是人们公然或隐然不相信君主政体的统治。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坏的阶段，是人们不仅不相信君主



政体的统治，甚至连“君主政体”也不相信——事实上丧失了辨识“君主政体”、人本身的道德价值或尊严之所在的能力。在我看来，现在欧美正迅速地接近无政府状态的这一最后和最坏的阶段。歌德在上世纪末以诗的语言写到：

Frankreich's traurig Geschick, die Grossen mögen's bedenken;

Aber bedenken fürwahr sollen es Kleine noch mehr.

Grosse gingen zu Grunde; doch wer beschützte die Menge

Gegen die Menge? Da war Menge der Menge Tyrann.

译成英文：

Dreadful is France's misfortune, the "classes" should truly bethink them;

But still more, of a truth, the "Masses" should lay it to heart.

"Classes" were smashed up; well, then, who will protect now the "Masses"

'Gainst the "Masses"? The "Masses" against the "Masses" did rage.

法兰西的不幸实在可怕，“在上者”真该好好反省一下；

但更为必要的，还是“在下者”应该认真考虑它。

若“在上者”被打倒，那么谁来保护彼此争斗

的“在下者”？“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

目前在欧美，当权者乃至好人们出于绝望，都对群氓放任自流——“在上者”也变成了群氓一伙。现在当权者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以爱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去愚弄群氓。兹

以中国的情形为例。英国政治家们知道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个巨大困局，因此他们现在通过“中国协会”，来愚弄上海那些最希望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群氓——手段是拆除吴淞炮台！然而，当权者们应当诚实一些。我所谓的诚实，不仅是指在钱财方面，而且指理智方面。要老实承认错误，老实面对困局。伏尔泰<sup>①</sup>说：“C'est le malheur des gens honnêtes qu'ils sont des lâches, ——胆怯乃是好人的不幸。”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就是我所谓理智的诚实或诚实的理智。最后，歌德平静地说：

Sage, thun wir nicht recht? Wir müssen den Pöbel betrügen;  
Sieh nur, Wie ungeschickt, sieh nur wie wild er sich zeigt!  
Ungeschickt und wild sind alle rohen Betroggen;  
Seid nur redlich und so führt ihn zum Menschlichen an.

译成英文：

Aren't we just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e mob, we can only  
befool them;  
See, now, how shiftless! and look now how wild! such is the  
mob.  
Shiftless and wild all sons of Adam are when you befool  
them;  
Be but honest and true. Thus you will make human, them  
all.

---

<sup>①</sup> 伏尔泰：法国18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十分推崇中国文化。他的著作对辜鸿铭的思想发生过影响。

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群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你瞧，他们多么懒惰无能！看上去多么野蛮！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的时候都是无能和野蛮，唯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事态即便是现在，也不能说成是一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或无王状态。去年夏天当两宫外逃，整个政府机构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时候，中国的民众却依然忠实地服从于他们法定的当局，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民族能做到这一点。一句话，在中国，眼下的无政府状态只是一种功能失调，而欧美的无政府状态才真正是器官组织不健全。

下面，我想从我的一本写于四年前，准备压缩后以《中国的治体和公职服务》为书名出版的书中摘录一段话，来说明中国目前的统治状况：

“在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者看来，中国今日的弊端实在不是‘误治’，而更多的是‘无治’。我所谓的‘误治’，是指任意的没有限制的滥用权利，公然背信弃义，残酷无情、专横无理地践踏人民的利益和感情，乃至腐败，也就是盗用和挪用公款。目前中国的腐败尚没有外国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但不幸的是这种事情确实存在。不过我必须指出，此种腐败情形主要存在于诸如兵工厂、购舰、外国机器、战争物资等有关‘洋务’的那些部门。像甲午中日战争前天津<sup>①</sup>的情形就是如此。这样一种事物状态称之为‘误治’是恰当的，并且它已经成为中国公职

---

① 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集团。

服务中道德败坏的最大根源之一。至于各省的公务部门，其弊端正如我所说过的，‘误治’远不如‘无治’情形严重。所谓‘无治’，就是完全忽视官员自身、地方利益和人民的福利。

“在中国，这种‘无治’状态的原因不难找到。为应付外国人到来所引发的危机，也就是为了那称之为‘帝国的目标’的东西，国家被弄得财力枯竭。与此同时，各省或地方人民的利益也不得不被忽略。当政府全力关注帝国的问题的时候，高官们，诸如各省总督，或应准确地称之为‘制军’大人，他们的职责所在是关注整个帝国的问题和利益，因而权利实际上被无限扩大，超越了他们应有的职权范围，不仅享有花公款的特权，而且拥有官员的任免权。至于那些本该对各省或地方利益负责的巡抚们，则什么权利也没有。不仅如此，在公职服务中还存在一个寡头政治集团或派系，他们伪装‘进步’，以博得外国人的垂青，当帝国政府的政策合外国人的意时，他们便被起用管理‘洋务’——这些人在差事上捞尽油水，得以暴富，与此同时，其他老实本分的官员，那些对地方利益负有责任的人，则被留下来与饥民一道挨饿。”

在此，我想将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进一步概括如下：

1. 目前在中国的议和是十分虚假的。因为列强没有老老实实努力去弄清中国眼下事态出现的根源。

2. 列强在中国唯一正确的政策，是“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安居乐业。”

3. 今日世界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在中国，而在欧美。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件事，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有损于我自尊的事。如果说谁有权利抱怨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我就有这个权利。我已为陛下的政府服务了 18 年，但至今仍然停

留在刚入职的位置上始终没有得到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爵士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我承认这种非常有损于自尊的事，与其说是要证明我写这些东西的正直无私，不如说是要让人们铭记这样一个教训，即在列强目前的对华政策之下，像我这样只关心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文明的人，绝不会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能升任到一个最能为国家尽力的位置上，而其他那些喜爱李提摩太那一套进步与文明的“欺骗”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那套秘密“满洲”政策的人——这样一些身在中国衙门，却受洋人操纵被推上高位的人，终将使国家蒙受耻辱并使之走向毁灭。因此，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善的。不然的话，目前的作者在这一时刻就会站在皇太后一边给她出谋划策，如果必要，为之献出生命——而不是在这儿写这本书，在国际世界面前维护她的荣誉和祖国的尊严了。

辜鸿铭

武昌，1901年11月18日

## 总督衙门论文集

一个中国人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想法

### 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 箴言

“请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的军队。”

——戈登发自毛里求斯的信

中国的事态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有奉行“先强权后公理”的信条，非诉诸武力不可。然而，我

却毋宁倾向于赞同索尔兹伯理<sup>①</sup>侯爵的意见：即他在克里丹危机之后所表达的、支持舰队司令反对外交官们以应付那个困难时期的看法。同样，在中国这儿，自这场危机爆发以来，列强们所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也是联合舰队司令所发布的那封重要的通知。正是这个适时而发的通知，使得中国南方各省的督抚们，能够使辖内之民得以避免正在北方漫延的那种恐怖。

然而此时此刻，所有有头脑和责任心的人们要问的问题是：“公理还靠得住吗？”对此，长江流域的总督们已经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如果公理仍然可靠，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办？为了有助于回答这第二个问题，我通过公共报刊媒介提出下列建议：

首先，列强应尽快同意充分而清楚地说明此次联军进兵中国北方的目的，以及他们关于中国未来的打算；并应指派专人，授与其足够的权力代表他们，去公开地、权威性地向中国人宣布这一消息。

其次，除非列强决定承担管辖和统治中国人民的责任，他们应首先立即公开地、严肃地保证在对待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时，与对待皇帝陛下一样，不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力、地位和名誉。

为此，我进一步作如下说明：

其一，总督、巡抚以及所有现在直接间接地对中国的良治和秩序负有责任的人，都绝对不同情上海的外国报刊所谈到的

---

<sup>①</sup> 索尔兹伯理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Marquis of Salisbury, 1830--1903)：英国首相 (1885--1886, 1886--1892, 1895--1902)。保守党首领。曾反对 1867 年英国国会改革和爱尔兰自治法案；对外标榜“光荣孤立政策”，以操纵“欧洲均势”；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发动英布战争。

所谓“改革党”。

其二，所谓“改革党”在国内散布的，上海外国报刊又加以附和的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及其法定权威之感情的断言，绝对虚妄，毫无事实根据。

其三，中国最根本的国法，基于孩子绝对服从于父母（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治体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得到绝对的认可而毫无疑义的。

其四，所谓“改革党”在国内的党徒和上海外国报刊所散布的种种谣言，连同那些被用来诋毁皇太后陛下的品德、动机和所谓反动政策的毫无根据的报道，以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很大程度上为导致目前的这场灾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些谣言，助长了在外国使臣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间制造猜疑，破坏彼此之间良好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于皇太后陛下以自由、自信和坚定沉着的态度，去处理帝国政府目前所面临的许多新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我接受委托要加以声明的内容。完成这一任务后，我想进一步对这些声明所包括的一些观点提供几点意见，它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些观点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改革党”。外国人偏爱并支持该党，因为这些“改革者”声称他们拥护进步以及西方文明的事业，是外国人的朋友。然而，用不着讨论这些观点拙劣和知识贫乏的年轻狂徒对“进步与文明”的滑稽模仿，只需好好问一问这些头脑发热的狂徒为什么要盼望中国进步和强大就足够了。人们可以从康有为最近发表的一篇直抒胸臆的文字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此文翻译和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那些所谓的改革者不知不觉地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



目。

公正地说，人们对“改革”运动的支持被夸大其辞了。运动初起之时，它的确得到了好人和热心公益的人们的支持，因为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感到了极大的耻辱。但是，同所有政治运动一样，在这次改革运动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政见，并引起了国民的不满。所有这些政见持有者可以归结为两派：一派由热心公益、富有经验，有判断力和辨别力的人组成，他们想要改革和进步，即凡是西方文明中同我国国情与“长治久安的良治事业”和谐一致的东西，他们都要尽可能加以采纳。另一派可以称之为“过激派”，它由那些聪明的、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组成。这些人自称是爱国主义者，其实浮躁、贪图名利，野心勃勃，既没有治事经验，又缺乏判别能力。他们要求连根带枝一块的改革和飞速的进步，毫不顾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甚至于连毁灭帝国也在所不惜。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和野心。他们愚蠢地想象，由此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至西方民族那般的富强和繁荣。这就是康有为及其党徒的那一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居然能从外国人那儿得到如此多的同情和支持。这些人所以叫嚷“改革和进步”，因为他们尽管渴望和羡慕外国人的富强和繁荣，却憎恨外国人，仅是这种羡慕和渴望本身，便能导致一种极度的憎恨。他们也恨皇太后陛下，因为他们认为皇太后太过于稳健了。

在我看来，外国报纸上关于皇太后陛下所谓的反动政策、及其对中国国计民生的恶劣影响的断言，是愚蠢、放肆、鲁莽和毫无道理的。要证明事实与此截然相反，是世上最为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皇太后陛下的政策不仅不反动，而且事实上中国能有今日，正应归功于她的稳健和随机应变的政策——这是

一个久经磨炼，有四十年统治经验的国家元首深思熟虑的政策——此时此刻，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影响，乃是中华帝国稳定与统一的唯一保证。

为了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想没有必要提供任何精心准备的论据，下面这几个众所周知的简单明了的事实，便可以给我提供证明。

事实一：翟理斯<sup>①</sup>博士在他的《古今名人谱》一书中（第799页），关于皇太后陛下的生平一条是这样记述的：“生于1835年。西太后；同治皇帝之母；咸丰皇帝的妃子〔可在她的儿子登基后，被提升到与正宫娘娘同等的地位〕；她还是光绪皇帝的姨母〔？养母〕。1861年，当咸丰皇帝崩于热河行宫，八个极端排外的王公大臣被指定为小皇帝的辅政之臣时，她支持了恭亲王的事业。当时，恭亲王在醇亲王的帮助下，正在北京与英国和法国议和。反动的八个大臣被他们抓了起来，有的被处死，有的勒令自杀。”云云。

翟理斯博士不带偏见的历史记述中那最后两句所提供的证明，可以完全彻底地推翻对于皇太后昔日排外或反动的指控。人们甚至可以反过来问，如果当时皇太后陛下真的排外并站在反动的王公大臣们一边，那么现在的中国将会是一种什么景象？

事实二：无论人们可以找到什么借口，都难以否认，总理衙门大臣们坚持除了与驻京各国使臣进行官方交往外，同其他

<sup>①</sup> 翟理斯 (H. A. Giles, 1845—1935)：英国驻华领事，著名汉学家。1897年出任剑桥大学汉文教授。曾著有《中国文学史》、《华英字典》、《中国名人谱》、《中国绘画史导论》、《中国概要》、《中国的文明》、《雁山笔记》等几十种汉学著作。此外还是《聊斋志异》、《佛国记》、《庄子》和中国诗歌最有影响的早期英译者。

一切都保持隔绝的态度，从某种程度说，对于造成中外双方彼此之间这种不信任和猜疑的困境，并进而引发目前北京的这场灾变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在北京的当权人物中，皇太后陛下是唯一一个尽管身居高位，却有勇气与外国公使馆夫人交心，并邀请她们进入自己家中的人。<sup>①</sup>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伤和悲哀的证据，能表明皇太后陛下渴望自己及其臣民与外国人和平友好地相处呢？不错，那些敏锐的新闻政客们，从这一切当中只能见到深藏的虚伪，然而，任何人都会同意，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帝国国母对待外国客人的这种礼貌好客的榜样，岂不是会对臣民产生事与愿违的极坏影响？除此之外，人们还应

---

① 我在这里附录一段摘自〔1900年〕9月12日《字林周报》（即《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副刊，原称《北华捷报》——译者）的文字——它在时间上比我最初写作此文的要晚（辜氏此文写于1900年7月27日——译者）。该文写道：

的确，皇太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妇人。我们从《伦敦与中国邮报》（London and China Express）上月3日所发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见这位昔日女仆之品性的另一面：

皇太后的真实品性是一个无关紧要而又难以弄清的问题。她的形象已被描绘得五光十色，不过阴暗仍是其主调。人们在美国出版的一册书信中，可以找到对她的气质极尽赞美的观点。这册书信，出自一位美国驻华公使的妻子康格夫人之手，康格夫人同其他公使夫人一道，曾拜见过皇太后。她被那位肯定极力取悦于她们的女主人给迷住了。无论内心深处多么憎恶这些“外国魔鬼”，皇太后在表面上或言辞上都没有丝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康格夫人说，“她的脸上充满了善意，见不到一丝残酷的踪影。她简单地讲了几句欢迎我们的话，但其举止自然而热情。她站起来向我们问好。然后向每一位夫人伸出双手，并极为诚挚地说道，‘我们彼此是一家’。她非常亲切，当我们接过递上来的茶时，她上前一步，向我们频频举杯。她呷了一口茶，接着换了一边再呷一口，又说道：‘我们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不过，最近几月所发生的事变，可能会使康格夫人对皇太后的真诚及其以‘一家人’相待的方法之信任，发生几许动摇。——原注

记住，可能是出于对臣子们指望不上的绝望心理，皇太后陛下甚至还一度让她的儿子光绪皇帝学习英语！

事实三：我们现在在长江流域享有和平，公认应归功于南京刘（坤一）总督的智慧、仁慈和政治家风范。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sup>①</sup>，我不便敷陈张（之洞）总督阁下的功劳。在目前这个危急存亡关头，幸亏有“老成硕望”的刘坤一坐镇南京。本来他曾屡次请退，之所以至今仍膺两江重寄，完全归功于仁厚的帝国女主人的再四慰留。因此，如果还存在逻辑联系这种事实的话，我们中国人，还有外国人，乃至包括那些正以一种愚昧的狂热在上海报纸上尖声叫喊，对皇太后加以诋毁和怀有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能有幸拥有和平和安全，归根溯源，当归功于皇太后陛下的明智和远见。可至今为止，人们竟然还在一个劲地指责她排外和反动。

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兹举以下一事，足可见到一斑。1861年，当皇太后陛下与已故的东宫太后陛下一道（众所周知，后者没怎么分担实际的治国工作），辅佐已故的同治皇帝陛下，垂帘听政的时候，帝国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个省份惨遭叛军蹂躏。但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sup>②</sup>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她这个可怜无助

① 辜鸿铭为张之洞的幕僚，不便为主人邀功。

② 比如文祥：“美国外交通讯”中曾提到他，可参见。原注

的拖着幼主的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绅士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奋起翊戴，他们以其炽热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sup>①</sup>：“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最终，她得以消灭可怕的叛乱，使国家逐渐恢复到往日的太平状态。

我已经谈到过“改革运动”的兴起。我曾说过，这一运动起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士大夫和统治阶层因忧心国是而产生的极度的耻辱感和绝望感。在运动刚刚兴起和突然急剧滥泛的时候，正如我曾指出的，它包涵着许许多多的倾向和形形色色的观点。在中国统治阶层中，一度还存在过不同派系之间互相攻袭，几乎导致政府崩溃、帝国瓦解的急迫危险。说也奇怪，正如在所有国家政治的危急关头经常发生的那样，在中国，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偏执顽固的极端保守派或称法利赛派<sup>②</sup>，出于彻底的绝望，加入到，或更确切地说，任用了肆无忌惮的过激派或称无赖与收税人派。后者把精密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管理搞得混乱不堪。皇太后陛下闻知此事后，不得不放弃多年渴望且极其需要的休养退隐，出来帮助皇帝陛下掌管国政。现在人们都看到了她是如何应付时局的。她以其天生而老练的政治家的明晰和敏锐的洞察力，一眼就发现，在所有的政治危机中，两派对于国家最大的危险，在于那些极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动手给两种走极端的人——极端保守派和过激派的首领以迅速、严厉而果断的打击。她摘掉了帝师翁同龢的一切头

---

① 这是真的——已故湘吏彭玉麟收到皇太后陛下赏赐的礼物时，经常滚在地板上，号啕大哭。——原注

② 法利赛人是古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墨守传统礼仪，基督教《圣经》称其为泥于形式的、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衍，不过对其所作的处置还算宽大，这与其说是她仔细思虑的结果，不如说是出于侧隐之心。她将其开缺回籍，申明永不叙用。至于年轻的、肆无忌惮的过激派康有为及其门徒，一般舆论，甚至是士大夫阶层，也没有吁请给予宽恕。因此，她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人中最劣迹昭彰者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因为他们在中日战争后，企图利用国民的不满，假借进步观念施行诡计和欺骗，夺取国家政权。事实上，正如众所周知的，皇太后要将康有为及其党徒变成报纸上所谓的殉难者。她将能够抓到的那些党徒开刀问斩，并通令全国追捕在逃犯。这样，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她就控制了局势，使国家渡过了危机。

自从我所努力描述过的这场危机过去之后，皇太后陛下已经避免了一切极端，明智并始终如一地坚持稳健和通权达变的执中之道。作为政府的最高首脑，她懂得自己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所以无论她个人可能同情哪一方，她都宣布不结党。她既不排除也不亲外，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如果归根结蒂，我倒倾向于认为她向进步的一方有所倾斜。这一点，可以从各省高级官员的任何一种分类名单上推断出来。在选用官员方面，她按照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材施教。因此，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总督阁下与巡抚袁世凯这样的人，和帝国大臣徐桐、李秉衡，刚毅<sup>①</sup>、赵舒翹这样的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倾向截然相反，但都能人尽其材，各得其所。仅此一点，便表明她的统治是多么机智，心胸是多么宽广，用人行政是多么精明和老练！

然而，她之所以成为帝国稳定的保证，不仅在于其自身的

<sup>①</sup> 后来李鸿铭将此稿节译成汉文时，删掉了此人。

能力和政治家的才干。她的实际影响要远为深刻。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迭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而所有这一切，如今都存留在朝野士庶的记忆之中，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爱戴。她在中国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原因应在于此。在我看来，这也是康有为及其党徒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标志。因为所有这一切，事实证明——对于他们这些本该懂得过去四十年间本国历史的士人来说——并未有助于他们减轻在憎恨和辱骂皇太后陛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粗鄙下流、感情用事和凶恶刻毒的程度。

在此，我忍不住要指出，对于上海的外国报纸自以为是地、不正当地非难和不合宜地诽谤皇太后个人品格的运动，留待我这个中国人来首先提出抗议，这对于在华外国侨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在这里，如此多背井离乡的外国人得以安家落户。且不提她高贵的身分和崇高的地位，作为帝国国母，外国人在她的国家里实际上过着客人的生活。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唯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但伯克（Burke）那句不朽的名言说得好：“在欧洲，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我来谈谈我要谈的问题中最难的部分。它难，并不意味着我对所谈问题的缘由在理解上有什么危险或偏见，而是因为激起目前事变（我指的是义和团运动）的那种强烈的情绪。

如同在改革运动中一样，这里事实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而对此，外国人没能加以区别。一种可以称作为防御性运动，它是相当于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逊 fyrd（民兵）或德国战时后备军这样一种特殊的古代民兵制度的复兴。这种旨在共同防御的村社之结社或者结盟风俗，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完全合法的。每逢国内动乱，帝国当局就经常鼓励这种结社。这样一种村社防御制度，过去一般称之为“保甲”，现代则称之为“团练”。“义”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善良的、诚实的或正直的（法语中的“brave”字）。它规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善良和忠实可靠的好人，乱臣或贼子是不准加入的。“和”字的字面意思是和睦和谐，它意味着社团是一个友好的整体，也含有“mutual”（彼此共有）字的意思。“团”字指的是一个集合或社团。

“义和团”是最初那些拳社的合法称谓，它可以被译成“善良和忠实可靠之人的友好社团”或“旨在共同防御的正直之人的社团”。为了贯彻结社的宗旨，即在他们的家乡保卫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些社团的成员必须习“拳”，和进行其他一些体育训练。此后，这些社团所训练和传授的“高尚的自卫艺术”，还包括艺术和科学的其他内容。并非是社团本身称之为“义和拳”。

这，我认为就是所谓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它完全是一种合法的村社防御制度；其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

运动的另外一个倾向，或者毋宁说开展，其产生无疑应归于特殊的地方局势，它脱离了原有的运动轨道，变成了一种更



富于攻击性的、好战且完全失去控制的狂热，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对于敌人，都构成一种灾害。至于这种狂热是如何在这场灾变中达到顶峰的，我将留待以后再做公正评判。只有当这场事变的全部事实被调查清楚、真相大白之后，才有可能宣判它的发生究竟是由于皇太后陛下的邪恶、软弱、判断错误或误信庸臣，还是由于外国使臣的干涉和压力所强化了了的“地方困难”，这种干预和施压，妨碍了皇太后陛下始终如一、镇定从容和坚定果断地去应付困局。在“地方困难”中，我要特别提出“传教方式”，和陌生的外国技师麀集中国内地两点加以强调。这些来自希腊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洋技师们，带着那种现代欧洲文明“l'homme sensuel moyen”（耽于肉欲的庸俗之辈）的行为举止（即使不是品行问题），一下子出现在贫困、古朴、宁静而孤弱的中国妇女和穿长袍的中国男人中间，导致了内地民情不安。

同时，在事实真相还没有探明之前，我请求欧美人民不要忘记公正的首要原则；不要先下宣判，得到证据以后，再作宣判不迟。

在此，我打算专门就指控皇太后一开始便拒绝剿杀义和团运动的观点，提出辩驳。说皇太后一开始就绝对拒绝这么做，是不符合事实的。她所拒绝的，只是不加区别的一概剿杀。对于义和团运动中那富于攻击性、好战的真正骚乱分子，她命令官员加以剿灭；而对那些善良的成分，那防御性的而非攻击性的运动，那她的人民为了自卫而做出的努力，她却不同意加以剿杀。为什么要这样？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驳斥那种指控她阴谋利用拳民驱逐洋人的说法。这后一种指控，不用说，一看就荒谬可笑。不过我相信，这种无耻的指控，也是有由来的。

中日战争之后，皇太后陛下准确无误地发现，乱世就要降临在她的臣民头上。这不仅鉴于直接来自外国的侵略，也是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神州各地可能会产生一种无法无天的危机状态。事实上，她预见到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经受一场大险的考验，用卡莱尔<sup>①</sup>的话来说，要陷入一种“混乱再减去一个警察”的可怕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臣民的爱护和关怀，她感到有责任鼓励他们做好准备，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有哪一个正直的人，揆诸哪一条正义的原则，能够谴责她这样做呢？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心肝的、能理解中国文字之下那种情感力量的人，只要读一读她最近的许多谕旨，那些强调总督和巡抚们有必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委托给他们每一个人的神圣领土的谕旨，以及她的人民有必要复兴旨在共同防御的古代村社组织制度的谕旨，就会感到她的话中充满了无限的怜悯之情和悲怆之感，仿佛是慈母对于爱子伤心的临终告诫，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我的孩子，你们生不逢时，赶上多事之秋，我饱受痛苦和悲伤的折磨，已经照顾你们多年。现在我老了。不久以后我就要离你们而去。勇敢些，孩子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好自己的家园。那个时候一旦来临，我将不能再与你们一道捍卫帝国并照顾你们了。”

在上述文字中，如果我多少还成功地表达和传达了一点中国人民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的情感，那么外国人就应该理解，何

---

<sup>①</sup> 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19世纪英国杰出的思想家、预言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浪漫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他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和文明缺陷，是对辜鸿铭思想影响最大的西方人之一。据说辜氏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时，卡莱尔正是他的导师。

以那些十三、四岁的中国男孩，能够“傻不愣登、昏头昏脑、不顾一切”地向现代欧洲人的枪口冲锋。无论欧洲现代崇尚科学的人们何时遇到他们不能解释的人类灵魂的特别现象，他们都称之为狂热。但是，何为狂热？所谓狂热，就是能够驱使人们去从事那些需要勇气和英雄主义、能为之献身的特殊行动的唯一冲动，它是被一种渴望，一种要保卫他们心中赞赏、热爱和崇敬的事物和渴望所激发的冲动。当这种赞赏、热爱和崇敬变得无限度和超常时，那种勇气和英雄主义也随之变得无限度和超常——这就是狂热。

那么，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所热爱和崇敬的是什么呢？在个人生活中，中国人热爱和崇敬其父母，这种感情，被其所有少年时代和家庭的记忆所缠绕并被证实为神圣。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现在热爱和崇敬其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王朝命运为之系赖的皇太后的意志指定的后嗣和继承人皇帝陛下。该王朝的统治已经惠泽中国人民 250 多年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义和团小伙子的狂热已经充分的证明了——狂热，正如我所说过的，是一种无限的和超常的勇气冲动，它驱使人们去保卫他们心中无限和超常热爱与崇敬的东西。现在，从迄今为止在总督衙门所接收的所有信息来看，对导致北京灾变这场危机的骤然决裂一事还无法做出清楚解释。不过，我最近刚刚得到的一个非官方的可靠消息，可以马上说明以前那个不太清楚的问题。据这一消息，那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用一句熟悉的话来说，是一个谣言。这个谣言，正好赶在总理衙门召开的那场预定会议之前，它像电击一样传遍京城。那就是外国使臣打算逼中国接受的四项条件之一，即，让皇太后陛下归政。正是这一谣言，一下子使得帝国军队和民众“群”起

加入义和团，从而导致了以大沽口不幸而可悲的陷落为顶点的那场危机。

因此，很清楚，真正的“Causa belli”（宣战原因），促使中国人民无论南北都想与洋人开战的实实在在的的情绪性冲动，乃是他们确信列强要冒犯或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及其自由行动一事。可以说，它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政府的战争，事实上，它毋宁说置政府于不顾。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那些称之为文明战争的严格规则没有得到认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现在，我不知道欧美那些或多或少民主化的人民，那些目前极为热衷于“爱国主义”的人民，是否能够或愿意记得，在他们过去的历史中，有一个比现代爱国主义更为神圣的字眼，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拉丁词努力加以揭示了，它就是“Loyalty”（忠），仆人对于主人之忠，孩子献给父母之忠，妻子对于丈夫之忠，总括言之，人民对于君王之忠！如果欧美人民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何以中国人民——而不是政府——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全世界抗争。在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音高喊着：“Moriatur Pro Rege, 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全文该结束了。我说过，在中国目前的事态中“公理是否还靠得住”的问题，长江流域的总督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现在，我能够用几句话回答这一问题了。

首先，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列强已经采取措施，或打算采取措施反对皇太后陛下本人及其自由行事。

其次，列强的“宣战原因”，在于北京公使馆被围，急待救援。

显而易见，在双方有希望达成和解之前，这两个基本的“宣战原因”必须首先加以消除。如今，北京帝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强方面的“宣战原因”，我敢肯定，外国使臣一定能被安全地带至天津。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看列强方面是否愿意消除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了。我大胆地补充一点，为了对那些正竭尽全力维持和平的总督和其他人公平起见，列强们应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赶快做出决定。每一次拖延，不仅使维持和平更加困难，甚至削弱了获至和平的希望。

又及：孔子本国的国君（指哀公——译者）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回答说：“捍卫正义的事业，镇压不义之事，人民就会服从；而捍卫不义之事，镇压正义的事业，人民就不会服从。”<sup>①</sup>

前文发表在《日本邮报》上，那是一份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当时附有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先生：在请求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我要说明的是，我这样做，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文章写作和准备发表的时间是（1900年）7月27日。当时：（张之洞）总督阁下刚刚发出那封与南京刘（坤一）总督联署的致英国政府的长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作为“授权的声明”，本文所述，乃是以英文对那份电报旨意的自由翻译。剩余部分，则是我自己为了使

<sup>①</sup> 此句是辜鸿铭对《论语·为政》中一段话的翻译。这段话原文是：“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此句翻译历来有争议。杨伯峻先生译为：“提拔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若是提拔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

这些声明便于理解和清楚起见，所做的评论。

我先是受张之洞总督委托，准备一份关于他那封电报主旨的英文翻译，以供发表。后来在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写成了一篇关于那封电报的长文章，总督阁下得知此事后，只好收回成命。我没有事先将全文呈送给总督阁下，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能尽快见到文章的效力。因为要将这篇东西译成适当的汉文形式，要花费我不少时间。而在局势极度痛苦的时期，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因为我打算以这篇文章来拯救北京和那儿的公使馆。后来我相信——几乎至今还相信——如果我能够成功地阻止或减轻几分目前反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的部分外国人自然而生的愤激情绪，那么，双方的惊恐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将会有所缓解，从而便于当权的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局势，在避免不必要流血的前提下，解决问题。

于是，我设法让文章能够递到索尔兹伯理勋爵手里。我相信索尔兹伯理勋爵即便不出于慷慨，起码也出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那种对于公平竞争的热爱，会对我的意见做出积极反应。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此文究竟是否真的送到勋爵府上。不管它被送到与否，我都没有发现它对英国以及其他列强的在华政策发生我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影响。因此现在，我以自己的名义将此文发表给文明世界。

由于我打算另做一文，专就目前列强的在华政策进行充分的批评，所以在这里，关于列强还没有采取能够解决目前中国问题的政策方面，我将不再多说。

同时，在本文已经包涵的建议之外，我再冒昧地补充三条：

（一）英国王后陛下，作为世界王后之首，应尽快谦和感人地直接拍给中国皇太后陛下一封公开电报——不用官方语言，

而用心灵的质朴语言——对中国的皇太后，她的儿子，以及她多灾多难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厄中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

(二) 外国使臣，尤其是英国使臣，应当制定一个条例，对于中国通商口岸出版的那些外文或中文报纸，有发表侮辱或不尊重中国皇太后和皇帝陛下言论的，要给以处罚。

(三) 赫德先生应当指派上海的海关人员，出版一份《中华帝国报》(Imperial Gazette of China)，除了定期发表《京报》<sup>①</sup>的准确译文之外，还登载一些关于中国国家大事的官方消息，有时可能还有必要对报纸上所散布的有害谣言加以驳斥。

上述建议中的前两条，可能看上去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将借用那句绝妙的法文短语“la politesse du cœur”，——以不容置疑的常识性的实践理性，来证明这一“politique du cœur”（心灵的政治）的必要。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其文明的基础决定了他们更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因此，如果外国列强或他们在中国的高级代理人真渴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他们运用真实、智慧和道德的力量越早越好。目前，最为亟需的，是要使中国人民相信欧美人真的不是“魔鬼”，而是像他们一样有心肝的人类。

外国报纸——特别是上海的外国报纸——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常识。然而，如果那些在华管事的外国人也丧失他们的常识，那将成为一种可怕的灾祸。正是求助于这种常识，我为中国人

---

<sup>①</sup> 《京报》：清代民间“报房”商人抄录邸报（封建王朝出版的政府官报），翻印出版的报纸。因其封面多用黄纸，俗称“黄皮京报”。日出一小册。每册约七、八页。内容以报道官吏任免消息和皇帝谕旨为主。

民辩护——甚至为处在拳祸中的保定府和太原府的恐怖辩护。当英国地方当局动用其全部警察机器，也控制不了群氓们的暴力行为、无法制止他们捣毁斯特德（Stead）先生及其朋友们的集会<sup>①</sup>的时候，尊敬的贝尔福<sup>②</sup>先生以其令人钦佩的英国人的机智对此加以评论时，所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常识性论据。在那个场合，贝尔福先生说，人们不必过于指望人性这种东西。中国人的人性与伦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种人性的中国人，当他们得到一种可怕印象，感到有人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活下去的时候，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与之对抗。而且，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

目前中国的整个局势，是一种可怕的彼此恐惧状况。中国人为亡国灭种而恐惧；欧美人则为他们在华同胞的生命财产而恐惧。我遗憾地看到，赫德爵士用他的文章，帮助强化了欧洲方面的恐惧。

我不像赫德爵士那样悲观。因此我认为，我通过减轻这种可怕的彼此恐惧，正在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甚至为在华外国人做有益之事。

以我目前在这里的职位，对于中国政府现状的了解，和我在中国三个最大的衙门——两广、湖广和两江总督衙门任职16年的经验，我强调指出，目前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防

① 这种集会称“Pro-Broer”。

② 贝尔福（Arther James Balfour, 1848—1930）：英国首相（1902—1905）和外交大臣（1916—1919），保守党首领之一。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和1904年《英法协约》的策划者。1917年发布《贝尔福宣言》，表示英国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



止一场并非不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国内战争，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无序和无政府状态，也等于说是一切外国人和中国人真实与合法利益的灾害——她就是皇太后陛下，如果她得到道义上、智识上强有力支持的话。

因此，我提出了那个常识性建议，直接求助于皇太后陛下的心灵，使她确信外国人、甚至于那些在华外国人也不是“魔鬼”，而是有心肝的人类。如果说我的上述第二个建议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公，那么，我将把它归咎于在华外国人允许上海外国报纸所捏造的那一恶毒指控，即指控皇太后陛下试图毒死她的儿子皇帝陛下。只有当我设想在华外国人都处在一种可怕的恐惧之中时，我才能原谅他们的这种行为。人们不会忘记，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 Antoinette）也曾遭受到同样恶毒的指控，她替自己简单地辩护道：

“我求助于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

我认为提及这一恶毒的指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目前局势的一个严重危险，在于皇帝陛下那众所周知的健康状况；他身体虚弱至极，而目前中国合法政府有确定继承权的人，是端王的儿子。

北京的外国使臣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已将被告中国置于 *hors de débats*（辩护之外）的地位，即，不听被告声辩，就宣判并通过判决——这是文明的欧洲仅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采取过的审判程序。现在，我请求在远东的所有渴望和平的外国人，即便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应该支持我找出某种办法来，制止外国使臣实施对于中国所作出的判决——尤其是对端王和在目前的灾祸中被指称为罪犯的那些人的判决，直到他们读到我为了解决目前的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系列论文为

止。

多年以前，在长江暴乱<sup>①</sup>期间，承蒙《字林西报》允许，我大胆地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的文章。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它的一篇社论中，认为它不可能出自一个中国佬的手笔，如果是的话，“所用语言将没有那种极其高贵的镇静。”

现在，作为一个不著名的中国人首次以自己的名义、自行负责地出来公开对世界发言，我想文明世界有权问问我这一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的资格。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说一说，现在的作者是一个花了十年时间在欧洲学习其语言、文学、历史和制度，又花了二十年时间研究本国事物的中国人。关于他的品行，我只能说：尽管现在的作者不能自夸是一个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无可指摘、无所畏惧的骑士），然而我想，那些在华外国人，无论与我有私人交往、深知我为人的人，还是以任何关系同我有过接触的人，当我说，现在的作者从没有做任何卑鄙无耻之事，以取悦和讨好在华外国人，或者应该遭到他们的冷遇和唾弃，他们都会给予证实。

末了，我冒昧地公开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请他将我所写的东西毕恭毕敬地呈送给俄皇陛下过目。承蒙陛下记得，多年以前，他访问汉口的时候，我曾有幸做过他和张之洞总督阁下之间的翻译。

我还冒昧地请求德国驻日本公使阁下，请他毕恭毕敬地把我的这篇东西呈交给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殿下，他访问武昌期间，我曾荣幸地得到他馈赠的特别礼物。

<sup>①</sup> 指 1891 年长江教案。

如此冒昧公开地利用他们高贵的名字，我希望俄国皇帝陛下和海因里希亲王殿下能够谅解。因为我迫不得已这样做，不仅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文明。我知道并且相信，他们都是世界文明与和平最热心的维护者，我曾听到他们亲口这样承诺过。

武昌

辜鸿铭 文学硕士（爱丁堡大学）

又及：我极为悲痛地说，正当我写完上述文字的时候，却传来英国王后奥古斯特夫人不幸去世的消息，因此，按现有的形式实行我的第一个建议已不可能。我原打算通过上述提议，以她的尊荣，来帮助解决中国问题并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其漫长一生中最辉煌的顶峰，这也能给她赢来更多的荣誉。但伤心的是，奥古斯特夫人刚刚离开人世，这一点已经无法实现了。

因此，我现在对我的上述建议略作修改，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毕恭毕敬地把我的提议呈送给俄国皇太后陛下，我认为，她是最有资格代替奥古斯特夫人，将这一提议付诸实行的。

辜鸿铭

## 为吾国吾民争辩<sup>①</sup>

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教案）关系论

### 箴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卷 15

鉴于最近民众屡次掀起反对传教士的暴乱，我打算在这里对外国在华传教事业的实际活动及其目的予以检查，在进行这样一个检查之后，看看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为了中外双方的共同利益，请求外国政府采取措施，如果不将其全部撤走、至少也应该对目前中国业已存在的整个传教系统做出某些修改和调整。

眼下传教士们公开声言的传教目的，我将提出来加以检查的，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I、——提高民德
- II、——开启民智

---

<sup>①</sup> 此文原作于 1891 年长江教案时期。最初发表在《字林西报》上。

## ■、——慈善工作

### I、提高民德

这是中国政府最初被请求接受在华传播基督教真正合理合法的目的。按其最初的设想，它无疑应得到全方位的支持。任何能够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和更高贵之人的计划，都值得花费一切纯粹世俗的钱财。因此，如果能够证明现代传教士以他们目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方式，将或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些微希望，那么，我赞成让他们得到保护，如果必要，可以用枪炮和战舰来镇压民众。但是能够证明吗？如果只是接受现代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形式便能有助于人们提高道德水平，使其变得更好和更高尚，那么人们一定会想到该民族中的那些最优秀分子——不可否认，在中国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之人——将是最愿意被吸收入教者。但事情果真如此吗？我请求每一个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和最有教养者心思的外国人说，是否这些人能够被吸收入教？是否他们民族信仰的基础能够容忍像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形式这样一种上层建筑？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只有中国人中那些最糟糕、软弱无知、贫困堕落之徒，已经或能够说皈依了基督教，除了这些人之外，传教士们还吸收了谁？如果有人认为我这种说法过于武断绝对，那么我要求他给我证明，传教士所吸收的中国教民作为一个阶层，不要说道德水准较高，即便像那些没有皈依的中国公民那样受过教育、像他们一样好和一样有用也行；我请求他给我证明，这些皈依者，这些丢弃了他们先辈的信仰，听从外国老师吩咐，如果不蔑视、起码也不同情他们自己以往历史的传统或记忆的人，这些孤立地生活

着，为本民族及其人民所不容的弃民，一旦那纯粹的金钱利益的希望破灭和其他外在的影响消除之后，结果不变成比目前中国最坏之人还要坏的恶棍。如果还有任何人怀疑我在此所言的事实，那么我将请他去读一读中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它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入了基督教会的本国弃民之叛乱”。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识上，太平天国叛乱者都属于那种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的一种典型。

因此，我请求在中国的每一个有评判机会的外国人，也包括那些传教士自己扪心自问，他们是否完成了传教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即通过传播基督教使中国人道德水平更高、变得更好和更高尚，是否这方面的活动还没被证明已惨遭失败？我请问他，那些新教传教士，是不是这种惨痛的失败促使其转向了他称之为科学之教和慈善工作的方面？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传教的目的。

### I：开启民智

无疑，这也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说易于腐烂的商品交易必要而有价值，那么民族之间不朽的思想交流则更为必要和更有价值。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一种智识运动，传教士为以前只有黑暗的地方带来了光明，也就可以说，他们通过连结较高层次的思想潮流，使东西方之间变得更加亲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希望他们得到所有好人的支持。但我又要问，能够证明吗？无疑，新教传教士最近带来了大量他称之为科学和科学之教的东西，他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当地的学生：清朝官员愚蠢到对月食大惊小怪；但在下一次祈祷时他不会告诉同样的学生，太阳和月亮仍然听命于犹太耶稣会长约书亚而停滞不动吗？不会告诉同样的学生，那本记录

了其真实情况的书，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圣书吗？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心中怀有智识启蒙目的的人说，是不是还有比这更反科学的东西——用一个不太刺耳的名词可称之为“智识把戏”。传教士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只能证明其毒害的微妙和巨大。因此，我认为，无论新教传教士能够带入多少纯科学信息的东西，他们同时也带入了一个害虫，这个害虫最终必将葬送中国启蒙智识的全部希望。因为不正是为反对与之同样的智识把戏，欧洲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解放者已经战斗过和直到今天还在战斗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这种为了智识启蒙而斗争历史的人来说，这些在欧洲焚烧和残害科学家的教中人，却在中国这儿把自己装扮成为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中国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任何不厌其烦地浏览过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昧的东西，就很容易相信正是这些愚昧的东西，使得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实在看不起外国人。而当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随着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经由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时，他们便不得不憎恨外国人。这不是一般的憎恨，而是只有那些看到他们作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民族国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法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能有的憎恨。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恶外国人的根源。

因此，我认为，如果就传教士传播福音这一合理合法的目的本身而言，鉴于人们仍可以抛开其纯粹的基督教外在形式而相信其精神，所以它对中国人来说还有某种好处，起码没什么

害处。而他们以反科学的把戏来传播科学的这种伪装，肯定连这样一点好处也谈不上。如果我曾指出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已彻底失败，那么我必定认为，某些传教士最近关于科学和科学器械能够使中国强盛的叫嚷（无疑，它带有反对其祖国的终极目的）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欺骗，便是一种幻想。

### ■、慈善工作

这，尽管肯定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事，但必须承认，一个世俗的工作，本身必须以纯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如果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是、并且只是一个纯粹的慈善计划，那么我请求证明作为一种慈善，它值当它的花费。无疑，新教医院和天主教孤儿院对于单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行善的手段，但是能够证明甚至于这种所行之善在数量上值当它所花费的钱吗？且不提其他项费用，仅就其本国政府为传教士在中国所提供的特别保护与补偿费用而言值吗？我认为所有这样被花费掉的钱，与其被用于期望传教机构去行善，还不如代之以纯粹的医生和护士去行同样的善更为值当（如果你们欧洲人愿意的话），后者的收益不知要大到多少倍，而且也更能胜任。如果人们还要认为基督教传教是为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行的慈善的话，那么让我再问，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是否值当他们叫嚷每年都的确确用在中国人民福利上的那样一笔庞大的钱款呢？在欧美人民为支持传教所捐助的数以百万元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他们修建漂亮的住房和疗养院，用于他们长篇的信笺和邮票的费用，用于支撑他们的讨论会和一时冲动的兴会呢？因此，我请问，这种被当作为纯粹的慈善计划的东西，难道不是每个在中国的公正无私的外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秘



密吗？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难道不只是一个为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提供福利的巨大的慈善计划吗？

对于这种慈善的问题，谁也不愿意如此来谈论，但我认为一旦发现真理就应该毫无保留。不仅如此，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的人们开口说点什么。这些本来受雇而来要带给这个国家和平与亲善的人们，此时却正对该国政府极尽侮辱和叫嚣报复之能事，而这个政府尽管焦头烂额、困难重重，仍然在忠实地设法保护他们；这些口口声声对这里的人民念着仁慈和慈爱的人们，如今却只是为了那些愚昧之举——甚至于在最近这些骚乱中，即使那些受难最深的合法起诉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证明这些举动并不比可以理解的无知更坏——便以炮弹和葡萄弹威胁他们。事实上，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之人要说的是，当人们对上述这些人仅以真理相告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资格要求人们嘴上留情。

不过，我在这里对传教士们讲逆耳的老实话的目的，并非只是图自己一时快乐。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说明了他们传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败；我还证明了他们那所谓的传播科学和进行智识启蒙不是一种欺骗、便是一种幻想。进而，我还证明了那被认为是纯粹的慈善计划的整个在华传教事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失业的专职人员而设计的巨大慈善计划，像这样一种东西是不值当它的花费的，即便仅以供养他们的钱款而论，也不合算。我之所以要证明这些的目的，是要请求每一个明达智慧、公正无私的外国人说，如果他发现我所表明的（他可以加以补充和修改）确实可信，那么我请求他说说看，这种巨大而不值得的慈善计划还该不该让它继续为害——此时此刻，它所威胁到的比已经危害的要多得多——不仅威胁到四万万中国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威胁到欧美各国人民在中国巨大的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使之危若累卵、面临倾覆之险。因此我认为，不难说明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个危害。

下面，我将证明，目前外国政府支持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伤害。我之所以说它对中华民族是一种侮辱，是因为中国的高级官员，那些正雇佣着大批有技术有教养的外国专家的高级官员，当他们看到连他们所雇佣的这些人也不相信传教士的鬼话，而外国政府却偏要坚持将其作为宗教导师送到中国来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时，他们所想到的必然是什么呢？我说它对中国人民是一种侮辱，还因为当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的时候，那些在他们的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却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那些层次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

然而，它还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一种导致了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在华传教的侮辱。我已经提到过，它对于欧美人民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花费、一笔经由他们的政府为传教士及其财产提供专门保障而不得不支付的浪费。此外，在所有这些骚乱中，外国公众只能听取传教士——有偏见的一方的一面之辞，而人民的声音却听不到。现在，代表那些人民，我以为提出下列意见，每个正直无私的外国人都将认为是合理的。

一般人都承认，对于一切错误行为，只有两种途径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那就是法律和公众舆论。但中国这儿的传教士，那些允许带着一个 *comitatus*（我称之为中国社会弃民）四处游荡的人，他们的眼中却没有法律，因为他们的领事远在天边，而中国人对之又没有裁判权。同时，他们也不害怕公众舆论，因

为他们只同那些中国弃民，他们的皈依者们接触，很少有例外。因此，我以为在那些中国人甚至于目前的那些骚乱者受到谴责之前，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缺少我所谓一般人都必需的两种基本约束力的传教士们，是能够无恶不作的。他们出于对那些中国弃民、也就是他们的皈依者之自然的偏心，出于他们自己对于圣洁的高见，能够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蛮横、放肆、到处插手和施展小小的暴虐。如果有人怀疑就其主体而言，传教士们会做出这些事情来，那么请他去看一看并记下这些人不仅在有关中国人的问题上，而且在只与外国人有关的问题上，无论何时涉及到传教士自身的事情与私利时，他们在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那共同的腔调和精神。因此，我说，在中国人受到外国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之前，请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骚乱不是日积月累的侮辱和伤害所激起的愤慨的爆发。至于那些关于婴儿及其眼珠的传闻，其实不过是点燃这场随时可燃的烈焰的导火索罢了（见1879年爆发的福州乌石山教案）。

这，我以为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存在于中国的真正强烈不满的原因。我称之为来自欧美的失业的专职人员这一阶层，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皈依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事、无所约束，除了他们纯粹的圣职之外，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这样的事实让我在此强调指出，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它与我在本文第二节（“智识启蒙”部分）谈到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恨外国人的根源有所不同。这样，传教士就对中国人憎恨外人仅有的两个深层原因，都负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督教在华传教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一个丑恶凶暴的事实中概而见之。这个事实就是我称之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团中之中国弃民叛乱”的太平天国暴动。正是这一暴乱，

改变了我们曾经喜爱并自豪地称之为“花国”(Flowery Land)<sup>①</sup>的本来面目，就像将一个如花似玉、面带微笑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妇人一样。

下面，我长话短说，简单地谈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对于外国的利益也是一种危害。在此，我只需请求所有明智的外国人想一想一个老资格的外国驻华领事曾对我说过的话：“对于中国人持久的伤害，最终也要伤害到外国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不是行善、而实在是伤害中国人的说明有可信之处，那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对外国人的伤害了。我曾说过，传教士又实在对中国人憎恶外国人负有责任。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憎恨对于外国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面对今日中国的这种危急状况，我坚持认为，此种憎恨，使外国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面临着大大受损的威胁。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当制止，但那种归根结蒂是正义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和葡萄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和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现在，传教士们正叫嚷要以炮舰镇压，并引导外国公众相信，那些请求外国人在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舰相威胁的官员们不过纯粹是自私而已。但我想，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应当告诉外国公众，外国炮舰为传教事业所发出的第一炮，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中国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为止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sup>①</sup> 外国人也有将中国称之为花园的，如美国北长老会教士克伦存 1857 年所写的关于中国华北宗教和迷信的名著就称之为《花园的蒙昧》(Darkness in the Flowery Land)。

传教士们已经大声在以“鸦片战争”相恐吓，但他们应称之为“传教战争”，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场战争，除非公正无私的外国人有足够的常识，有正气感，要阻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凭藉这种常识和正气感，我要说，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请求外国政府着手解决中国的传教问题，即便不将其完全撤离，起码也应该对它作某些修改，这样一种时机是否还没有到来？对于此种传教计划，我已经证明，它不过是救济来自欧美失了业的专职人员的一种毫无价值的慈善计划罢了。

现在，我讲出了多年来反复沉思的话，这些话鉴于个人和其他更深的考虑，我一直犹豫未曾出口，不过现在都讲出来了。So hilf mir Gott; ich kann nicht anders. ①

一个中国人

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活动等量齐观，并为一谈。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 (le Comte d'Hérisson) 所著《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一书中的这个“片断”，我将有失公正，也不便于人们了解真相的由来。这个狂热的爱国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个统帅法军、与英国人一道进占北京的法国将军的译员和机要秘书。这位大伯爵说：

“如果在此不提请人们注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基督教传教士起了多么大的协助作用，那么我就缺乏正义感，也不符合实际。耶稣会士所呈献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的事件，无论是关于我们将必须经过的那些省份的资源

① 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原注

的情报，还是关于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队人数的情况，都是通过耶稣会士获得的，而他们也得通过为他们效劳的中国人来得到这些情报。秘密报告不仅要求对人和事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要求提供报告者有真正的勇气，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报告就会使他们受到中国人的可怕报复。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sup>①</sup>

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外国人说说看——无论他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人民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 l'infâme*（消灭邪恶者），猛烈地撞击怀有这样一种 *patriotisme ardent*（爱国主义狂热）的人，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否有什么不对？

<sup>①</sup> 原文为法文。由于太长，故不付注。

## 为了中国的良治<sup>①</sup>

实践的结论

### 箴言

当我们在黑暗之中摸索时，正如我们必须要在东方所做的那样，最好的道路就是公正行事。

——戈登将军

我认为，现在对列强在中国的现行政策加以检查，不仅有必要，而且时机也已经成熟。我在这里只想反复申明，我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并愿单独对自己的观点负责。

---

<sup>①</sup> 此文曾以《中国问题的最近札记》为题，于1901年由《香港日报》社出版过单行本，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

### 精神和态度

目前，要想使中国问题有望得到满意的解决，首要的前提是，列强必须根本改变他们对中国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策的精神与态度。有位名叫豪斯（E. H. House）的先生，在《日本邮报》上发表文章谈到西方各国对于日本的以往政策时，这样写道：“外人炮制了一种说法，即认定日本的政策，乃是一个虚饰和欺骗的迷宫。对于日本的任何行动，外人都无法理解，因而认为它必然是其深藏不露、无所不包的欺骗计划的一部分。这实在是荒谬透顶。但多年以来这种猜忌却构成了欧洲外交的基础。”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也是以往外国列强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发生灾祸的根源（fons et origo）。正是这种到处扩散的猜疑精神，感染了每一个外国使臣特别是英国使臣，从而滋生了一种黄疸性偏见，使他在中国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是黄的。

我写这些东西，并非只是为中国人辩护，而是为了真理。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绝对缺乏坦率的说法。其理由将是人所共知的。俄国前驻华公使喀西尼<sup>①</sup>伯爵最近指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而英国人和德国人，一般说来则不太懂得礼貌。”实际的情况是，在中国的一般外国人，他们往往蛮不讲理、急躁易怒，而一般中国人则彬彬有礼，具有涵养。当你向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中国人提出一个无理要求时，

---

<sup>①</sup> 喀西尼（Arthur Pavlovitch Cassini, 1835—?）：俄国外交官。1891—1897年任驻华公使。与李鸿章往来甚密。1905年和威特代表沙俄与日本签订日俄和约。



他不可能说：“不行”。他天生的礼貌将促使他用婉转的敷衍，给你一个有条件的“可以”。已故的曾国藩侯爵，1860年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洋务尺牘）中说：“若你碰到外国人当着你的面蛮横无礼地大放厥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憨笑装傻，仿佛你不懂他在说什么。”赫德爵士曾经对伊藤（博文）<sup>①</sup>侯爵谈到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原则是“宁弯毋折”。因此，在对付外国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有教养的中国人通常使用不失礼貌的敷衍和搪塞的办法，而对付外国人蛮横的暴力行为，则有时使用这样一种武器，在汉语里它称之为“羈縻”，翟理斯博士译作“to halter”（给……套上笼套）<sup>②</sup>。事实上，当你遇上一头狂暴发疯的公牛时，同它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笼套把它套起来！

窦纳乐<sup>③</sup>爵士将为我们解释中国“羈縻”二字的含义。1900年9月20日，他在致索尔兹伯理勋爵的电报中说道：“为了设法推迟或延缓进攻，我们让中国人沉溺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中，即让他们感到，我们有机会将自身置于他们的仁慈与恩惠之下，其途径是：中国人护送我们到天津。……我们所做的，原则上是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而是提出更多的具体要求来为日后的最终决议做好准备，以此赢得时间。”

窦纳乐爵士在谴责中国人不守信用、背信弃义的同时，似

---

①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政治家，1885年起曾四任日本首相。在日本进行欧化改革。任内曾发动侵华的甲午中日战争，1898年曾来华游历。

② 外国人通常译作“to humbug”（哄骗）——原注

③ 窦纳乐（Diarde Maxwell MacDonald, 1852—1915）：英国外交官，陆军出身。1896—1900年任驻华公使。义和团运动发生后，窦氏被外交团推为使馆区司令。后调任驻日公使。

乎没有意识到他对中国人所施行的诡计和地地道道的背信弃义行为中，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过失，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或许应该说，正是中国人的行为，将窦纳乐爵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得他不得不像他做过的那样行事。然而毫无疑问，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事情的说法正好可以反过来。而且逼迫中国人不得不像他们所做过的那样行事的力量，甚至更为强大。

下面，我们退一步，看看外国人对于中国人行事方法的猜忌，是否有某种恰当的理由。在此，我想有必要强调指出，就与目前这场灾祸有关联的北京帝国政府而言——从我在总督衙门的便利位置所得到的有关电报和国书消息来看，没有一星半点事实或根据，可以指责它失信和背信弃义。这里，我想再引用豪斯先生谈及过去的日本外交关系时所说的话，它用在这儿是很合适的。外人声明说，鉴于目前的困境，应该做出大的让步，还说外国公使们的猜忌并非不合情理。针对这一声明，豪斯先生诘问道：“外国人对于那种困境、那种日本人痛苦焦灼的忧虑和频繁严重的危机，曾做过任何让步吗？……江户的官员们具备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能具备的坦率和正直。他们几乎像孩子一样的天真和率直。他们再三地、毫无遮掩地将麻烦摆在对方面前，对敌手绝无防范之心。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傲慢无理的拒绝，并继而遭受新的苦难和侮辱。”

在此，如果将日本人换成中国人，江户换成北京，人们将认为豪斯所写的正是去年夏天发生在中国的事变，而不是40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事情。的确，任何公正无私的人，只要仔细阅读一下中华帝国的谕令和其他国家公文，<sup>①</sup>就会感到豪斯先生

<sup>①</sup> 它发表在日本人佐原笃介编辑的《拳匪纪事》一书中。——原注

所作的评论是多么恰当。

下面，我们且举一例，以见中华帝国政府毋庸置疑的绝对坦率之一斑。在6月3日拍给中国驻外使臣的谕令中，帝国政府指示他们，要将政府的困难毫无保留地向列强陈述，谕令说：“我们此刻仍严令驻军统领一如既往地保护使馆，惟力是视。”可见，帝国政府并没有想要对外国政府隐瞒公使馆的危险。它甚至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已经命令保护使馆”，而是明示这种保护乃是绝对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事实上，它以一种毋庸置疑的绝对的坦率说明，这是一种尽可能的保护。<sup>①</sup>

### 关键的问题

以上，我们谈到外国列强对待中国的精神和态度。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中国难题中的主要和关键的问题，这一关键问题是：当外国列强要求中国尽一个独立的君主国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在对待中国时，丝毫也没有努力去承认和尊重该国政府能够独自尽其义务、履行独立统治之责的权利与前提。

赫德爵士以其慷慨的爱尔兰风度，建议取消治外法权。从原则上讲，他这一见解——对于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来说——都是无可置喙的。但在此应坦率地承认，在目前的情势下，要废除治外法权是不现实的。歌德说：“世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

---

<sup>①</sup> 人们反复指称中华帝国政府发布过一个灭绝洋人的政令。然而绝不存在这样一个政令。5月24日的政令，只是一份宣战书。戳穿西洋镜是有益的，

公道与常识 (es giebt zwei friedliche Gewalten; das Recht u. die Schicklichkeit)。”赫德爵士的提议是公道的，但缺乏常识。

然而，如果现在废除治外法权还不现实，那么，只有千方百计将它的恶劣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才是公正的。治外法权是一个畸形怪胎——它已经在道德效果上，对中国的良治事业产生了危害。但是，外国政府不仅没有设法去减轻这一怪胎的恶劣影响，还允许他们的在华代理人引入一个更坏的怪胎，名之曰治内法权 (in-territoriality)。他们不满足于中华帝国政府对外国人没有裁判权，还允许其代理人否认帝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国民具有裁判权。人们公正地谴责传教士干涉了诉讼、因而侵犯了中国地方官对于国民的裁判权。但当英国公使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四川总督的职务时，他也正在干涉中国的诉讼，并且仅仅只是出于一种极度恐惧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侵犯了地方官对中国臣民的裁判权，而且侵犯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君权，那种天子对于臣下的权威。当然，一个总督对外国人做错了事是可以惩罚的。但这种惩罚，必须经由皇上的权威，依照帝国自身的法律来进行。

这一原则，从最近的惩罚问题（指惩办祸首——译者）中，能够得到最好的说明。美国国务卿是唯一一个似乎对此有所认识的人。下面，请允许我完全用外国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去年夏天，北京的帝国军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便围攻了使馆，于是严重地违犯了文明的国际法。中华帝国政府不是适时地抛弃其代理人的行为，而是对列强宣战。由于中国和列强之间事实上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所以，当中国紧接着求和的时候，列强便有理由加以拒绝，因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还没有

得到满意的补偿。这种不公正待遇，就是使馆遭到围攻。列强要求中华帝国政府绝对地抛弃其代理人围攻使馆的行为，并将此作为议和的前提条件，这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下面，我要谈的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一原则。

一场战争行动是要惩罚一个国家，而不是惩罚个人。如果帝国政府中的某些代理人，被认为犯有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那么，列强的行动就是正当的。假若他们认为合适，可以行使现代战争中所用的报复权利，即，抓住那些犯罪的代理人，就地处罚。<sup>①</sup>不过这样一种处罚，是一种战争行为，而不是一种司法上的处罚。

若是由中华帝国政府来处置罪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列强来说，目前的问题是，在发生了围攻使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是否还愿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如果列强决定对中国政府的存在不予承认，那么显然，其责任便是立即接管中国。但如果列强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正如他们明显做过的那样，那么他们就该约束自己，去尊重中华帝国政府对中国国民唯一的、绝对的裁判权。

现在，一旦战争局面形成，争执的正确与错误就立刻合二为一，它不是某个中国人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争执，而是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争斗。就与对立方列强有关的惩罚而言，战争及其结果本身，便是一种惩罚。中华帝国政府对于列强所应该做的，只是绝对地否定围攻使馆的行动，一旦帝国政府做到

---

<sup>①</sup> 比如对保定府那个司库的处罚，就假定他真是像所指控的那样为罪犯。但在这一事件中，联军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动机是不友好的，因此，中国人将这种处罚看成是一种背信弃义行为。刘（坤一）总督对此感到“哀愤”。——原注

这一点，那么，所有对这一围攻负有责任的人就成了罪犯——不是对立方列强的罪犯——而是冒犯君主权威、危害帝国和平与安全的罪犯；所有这些都容易给予处罚。但是，只要中国还被承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君主国，对于中国国民，上至国家大臣下至平头百姓的惩罚，便只能由君主唯一的权威并依照帝国的法律来执行。<sup>①</sup>

以上，是我完全按照外国人的观点特意假定的情形，即，错误完全在于中国方面。但实际上，围攻公使馆只不过是使馆卫兵与北京民众之间一场吵闹（fracas）的结果，其中，有中国士兵参与进来助威。这场事变的可悲之处在于，外国使臣、以及那些无辜者、无依无靠的妇女和儿童也被卷入进来。事实上，这就是中华帝国政府方面最终所持的观点。7月14日，当彼此一旦可以沟通，中国大臣就郑重其事地看望了外国使臣们，并建议“将他们、他们的家属及所有属员转移到总理衙门，不准带一个卫兵。”这一动议的目的，中国大臣说，是保护自始至终并未受到损害的友好关系。那场吵闹，实在是闹得太严重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救出外国使臣、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将他们与吵闹中实际的闹事者分别开来。然而，窦纳乐爵士在这一建议中，却只能见到背信弃义和玩世不恭！

实际上，如果平心静气、公正中允地给去年夏天的事变作一定论，我以为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先是外国使臣丧失了常识；

---

<sup>①</sup> 实际上，皇太后陛下将审判特大政治犯的事宜，委托给公认的最高法庭来执行。这一法庭称之为“三法司”，它由相当于上议院的大理寺卿，都察院（相当于下议院）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组成。在目前这个案件中，因为罪犯里有亲王，所以内务府总管取代大理寺卿。——原注

接着是中国人发脾气；最后是，欧美的人民和政府发脾气并丧失常识。

海军将军们，由于攻占了大沽口而受到责备。这一责备是不公平的。对大沽口的进攻无疑可悲可叹——因为在此之后，中华帝国政府要维护它的自尊，除了宣战之外别无选择。但海军将军们是军人，他们对于外交官们所给予的局势的评判，只能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考虑。事实上，他们参与进来，是由外国使臣的所做所为造成的。然而，在整个危机之中，真正的大错误，却在于向驻中国公使馆派送卫兵。连具有最起码常识的人都会说：如果你要炫耀和诉诸武力，就请拿出足够的武力来，现在，不仅整个北京的民众，而且整个华北的民众都群情激愤——要紧的不是正确或者错误，而是反对洋人，反对那些送入这些民众当中的一小撮洋面孔、洋装扮、说洋话的人，以及那些狂妄自大的洋兵，不仅如此，他们还没有统一的指挥，而是成群结队地按照各种不同的命令行事！因此，我认为，用丧失了常识来描述外国使臣的所做所为，还是非常轻微的。

严格地说，对于外国使臣的保护，是他们自己所持的信任书，正如在战争中，对于一个军事谈判代表的保护是他的停战白旗一样。当外国使臣带来使馆卫兵的时候，他们的信任书严格说来已经失去了价值——不错，中国政府是同意过他们这么做，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政府减轻了对他们的保护之责，因为外国使臣们已经选择了不依靠中华帝国政府的保护措施。

事实上，整个中国问题的关键，在此已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说明。列强们义愤填膺、惊魂未定。索尔兹伯理勋爵谴责中国人围攻使馆是蛮横无耻的行径——因为中国应该说是已经侵

犯了使节的神圣性 (Sanctitas legatorum) 法则。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国使臣首先也无耻地侵犯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国际法——中国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权，他们竟然把兵派到中华帝国的首都来。现在，经历了这样一种政策所导致的灾祸之后，列强们一面郑重保证要维持中华帝国的完整，一面却又要建立一个俯瞰皇宫的堡垒。正如我们说过的，如果你要诉诸武力，就请拿出足够的武力来。假若列强想用暴力使中国就范，那么请便，但他们起码应该保持一种有效的控制，否则，中华帝国就要分崩离析。

的确，自从经历了去年的那次灾祸之后，列强并没有反思他们过去的政策并承认所犯的错误，似乎不仅要继续坚持下去，甚至还要加重这种错误。首先，他们没有立即派出具有新头脑的新人，给局势的缓和带至新的希望，以求得一个满意的解决结果。绝大多数列强都固执地使用那些导致这一局势的旧人，那些神经已经错乱、感情已经愤激的人——来指导和议。其结果，自然是那十二条不可更改的条款。

(一) 外国使臣反对总理衙门<sup>①</sup>的设置，其实他们应当以更大的力度，去反对目前的外国使臣共同议定的机构。如没有一

---

<sup>①</sup> 总理衙门是一个专门商讨对外事务的委员会，就像美国的外国事务委员会一样。它是一个审议和协商机构。其最大缺点，无疑是没有一个主事人。但目前的设置是有理由的。首先，在北京的各部衙门实际上都是审议和协商机构。唯一的执行机构是军机处或内阁（被误称为最高议事会）。其次，因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立宪政府，即，必须仰赖知识阶层清议支持的政府。因此，在各大都市的政府部门中，设立一个由所有知名人士参加的对外事务协商委员会，还是必要的。然而，外国使臣不努力去了解总理衙门存在的理由，却反对它的名称，仿佛玫瑰换了别的名字，闻起来就不香了似的！——原注



个公认的负责的领导，要想使和议迅速而满意地取得确切结果，是不可能的。

(二)在赢了战争之后，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的条款一般要限定在对于当前和以往错误的直接补偿、和军事行动状态的范围之内。就对于未来的保证而言，不可更改条款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即外国使臣自以为比帝国政府更懂得如何防止将来民众反对外国人的暴动，而这，正是导致了目前这场灾难的政策。就对于未来的保证而言，请求帝国政府陈述她将以什么来担保未来，这不会有任何害处。

(三)事实上，12条中的绝大多数条款，不符合给了强盗钱就不给强盗命的原则，而是既要你的钱，又要你的命。要执行这些条款，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能再有良治。我已经讲到过惩罚问题，执行这一款，对于帝国的稳固是最为严重的祸害，幸赖皇太后陛下个人的影响力，才使条款得以履行，并没有导致帝国的分裂。接下来，是在首都的心脏建立一座堡垒问题，我也已经说过了。下面，我再谈谈停考<sup>①</sup>。撇开问题本身是否公正不谈，我想在此指出，在中国，举行考试，并不是像在欧洲给予人民选举权那样多的一种特权。它毋宁说是一种职能，一种中国政府遵循门户开放原则的极其重要的职能。现在，你要求一个机械师能保持机器正常运转，同时又命令他堵塞机械中一个最重要的管道，我想，这将被认为是惊人的无理。然而列强们要求帝国政府停考的做法，就是如此。

我以为我所讲的，已足以表明，外国列强在中国不仅行使

---

<sup>①</sup> 《议和大纲》规定：“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各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

着治外法权，而且行使着治内法权。目前，这种情况似乎已变本加厉。一个中国官员任命到一个重要位置，必须首先从外国官员那里接受一个半官方的许可证书（*exequatur*）。其结果，我可以在此提及，湖北省因为过去8个月的事情，已经罢免了一个巡抚。湖广总督不得不忙于帝国的国家问题和保护传教士。省内实际的民政管理正面临着越来越糟的危险！外国人干涉中国官员任命的另一个后果是，那些最无德行和名望，最没有教养和能力，只是一味奉迎巴结，如果没有实际贿赂、至少也给外国官员和有权有势的外国人带来好处的人，能够官运亨通。最近的例子是中国驻日本大臣<sup>①</sup>的任命。我冒昧地提醒外国驻日本官员注意此事，以便能够调查一下，看日本驻中国的官员究竟是否干预了这项任命。正是外国官员和外国人对中国的此等不肖之辈所显示出的偏爱和支持，使得中华民族的一些最优秀分子，不可能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表现出友好态度。

另外，还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外国政府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公开干涉其教徒与不信教的中国民众之间的诉讼案件。新教传教士不仅干预诉讼，还在外国报纸上和通过国内报纸公然鼓动造反。最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的唯一生意，就是参与从事所有通岸仍在继续的一切声名狼藉的商业活动。

鉴于以上所述，我想任何一个尽力了解事实的人都必能看到，中华帝国政府要想在中国保持良治，实在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而且中国，就其治理而言，又是一个没有警察机器的国家。和平与秩序，是通过民众的常识和亲善友好来维持的，当民众的

<sup>①</sup> 前任上海道台。——原注

义与礼的常识遭到践踏时,就会发生地方当局没法加以镇压的暴乱。暴乱之后,人民则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一种过于高昂的代价——正如可以从最近送到省府衙门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清单,对了,还有新教传教士的清单上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所有那些地方上的、特定的伤害,都无法与外国使臣行使治内法权所造成的伤害之总和相比。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享受良治之益。比康兹菲尔德<sup>①</sup>勋爵说过:“除非一国的现存政府,有绝对的权利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该国的良治便无从谈起。”现在,列强在中国既不取代统治中国之责,又不允许帝国政府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它们实际上做的是,要使中央政府瘫痪。一旦中央政府瘫痪,帝国的各省政府及其官员也将随之陷入混乱。在此,我想说,最近和目前的改革叫嚷,确实存在很多理由。国家的实际管理正变得越来越糟。然而,要改善中国现存的统治状况,却不应由此入手。我将另外撰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只有当帝国政府的中央当局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帝国的法律至少对于所有中国国民还具有唯一和绝对的效力时,改革方才成为可能。简而言之,只有当每个总督和巡抚,以及所有在职的高级官员,都用脑袋对皇太后和皇上负责,不只是为了保护洋人,更不是为了讨得外国政府的欢心,而是为了良治,即,为了每个下属的品德、行为和生计,为了托付给他们的人民的幸福与长治久安

---

<sup>①</sup> 比康兹菲尔德(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近代英国保守党的主要缔造者,所谓托利民主政治的奠基人。1868年受命组阁。从1874-1880年几度出任首相期间,与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人进行了激烈斗争。1876年被授予伯爵称号。

时，在中国，才有可能存在真正的良治。

概括起来说，中国难题中主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外国列强必须清楚地、毫不含糊地决定，究竟是要代行统治中国之责，还是要将此一责任留给中华帝国政府？如果列强决定代行统治中国之责：那么请便。但如果列强要求中华帝国政府负起良治之责，那么它们的简单义务，就是绝对地承认和尊重中华帝国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利——在目前，只有裁判外国侨民除外。

### 对外国人的管理

然而，在中国，治外法权的行使，使列强对于其侨民循规蹈矩、保持良治状态负有了责任。任何人，只要认真去读一读上世纪前三十年英国的蓝皮书和国会文件，就会清楚地看到，英国之所以要派一个国王代理人到中国来，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对于英国侨民的良治负责。在广东，英国侨民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已经恶化到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向中国派驻英国大臣的主要和最初的目的——不是推进贸易，而是照看英国侨民，使其规规矩矩，保持良治秩序。

现在，人们大谈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公正无私的统治——一种既不用害怕谁，又无需讨好谁，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对于国家的良治有益的事情的统治。然而现在，要想让一个英国大臣公正无私是困难的。现在的英国大臣不是为了祖国的荣誉去对国王负责，而是对坐在众议院的那六百个不固定的小国王负责。英国国会最初是一个智囊，一个智者的会议，现在却只是一个私虑重重者的会议。

我实在想知道，英国统治阶层的人们是否从未想到，如此多地并如此高声地谈论英国利益，至少可以说是相当自私的。英国绅士所以鄙视纯粹的“职业作风”，就是因为，后者要求关心并且只是关心利益，也就是钱。无论怎么说，那些建立大英帝国的人们并不谈利，而是谈责任。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像塞纳乐爵士一样，是个军人，曾做过马六甲海峡殖民总督，他对新加坡的一个英国同胞代表团说过：“我是女王派到这儿来统治你们的，你们这些种植马铃薯的家伙。”在英国殖民地，那些有中国移民的地方，英国政府尚有常识指令一个官员去做中国人的保护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他们更应该像在殖民地一样，很好地指派一个同样的官员来，保护那些雇不起律师充当恶霸的、可怜的中国人的利益，使他们免于那些粗暴无赖、肆无忌惮的英国侨民的欺凌。至于说到贸易，用不着派一个商务专员来教英国商人如何经商，或者招徕他们去影响进步的中国官员，恐怕组成一个由像麦克唐纳这样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指令他们来华调查贸易情况，要更为有益。他们的任务是要调查何为合法贸易，即那些既有益于英国民族也有益于中国人的贸易；何为不合法贸易？即那仅有利于英国那些个体的利益，而伤害了上面所提到的既有利于英国民族、又有利于中国人的那种合法贸易的贸易。因此，正如已故威妥玛<sup>①</sup>爵士所说的：“持久地伤

<sup>①</sup> 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 - 1895)：英国外交官，汉学家。陆军出身。参加过侵华的鸦片战争。退伍后开始了在华外交官的生涯。1871 - 1882 年任驻华公使。曾与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归国后于 1888 年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他编有英汉字典，著有《语言白话集》等书。所创汉字罗马拼音方法，至今仍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所用。但他对中国态度非常傲慢，并不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友好。

害中国人，最终必定也要伤害外国人，甚至那些在华外国人。”

总而言之，外国列强首要的责任，是当他们行使治外法权的时候，要采取严格的、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来保证他们每个可敬的国民都遵纪守法，形成良治秩序。必须承认，要在外国侨民中保持良治秩序是不易的，因为治外法权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怪胎。但仿佛上述问题还不够困难似的，如今，列强又试图增加它的困难，竟然愚蠢地要求每个国家在每个通商口岸都要有一个独立的租界。于是，每个通商口岸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小国林立的巴尔干半岛，每个小鲑鱼都有可能引爆它。在此，应当指出，欧洲列强要求拥有一个独立的租界，却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英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个错误，即，它把主要的权力授给了所有的英国殖民者，不仅授予英国领事，而且授予由大多数人组成的市政当局，甚至还将其授予到英国商人的每场官司上。对于一个外国列强来说，要使其国民服从于市政当局，尽管英国官员的市政管理已然糟透，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但若指望一个外国列强使其臣民服从于英国商人的权威，那就太过分了。事实上，正如已故的弗劳德先生<sup>①</sup>曾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社会中，要实行代议制政治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必须实行君主统治。带有强烈的种族与民族偏见的人们，是决不可能成功地通过选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的。为了废除那愚蠢的独立租界，这也是维持外国人

<sup>①</sup> 见其《尤利西斯之弓》。原注。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卡莱尔的友人和思想的信徒，也是卡莱尔遗嘱指定的处理其文学遗著者之一。曾发表卡莱尔的《回忆》，著有《信仰的因果》、《托马斯·卡莱尔——他的一生的前四十年》等。因为卡莱尔的缘故，辜鸿铭也常看弗劳德的书。

良治秩序的需要，外国殖民者的机构应当接受调查，并加以改革。

### 真正的困难

但是我恐怕，在中国问题中，真正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列强之间的和谐一致：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一致，而不是实际上的一致。事实上，华北上次所发生的那场事变已经清楚地表明，就像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因为不同的政府派别之间害怕争斗，所以他们允许各种各样的暴行竞相登场。同样，在中国，因为列强们害怕彼此开战，他们宁愿让中国人民惨遭各种暴行的蹂躏。然而，列强们逃避责任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负有责任，而且对于文明事业负有责任。列强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同意绝对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君主国的完整，否则他们就必须开战。至于和平瓜分的其他选择，根本行不通，尊敬的布罗醉克（Brodrick）就说过：“对大不列颠来说，企图管理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都将是发疯。”

中国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三个列强：英国，俄国和日本。像西摩尔<sup>①</sup>将军那样的英国人，乐于唤起世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为西方民族打开了中国门户，却从不考虑对这一行为后果所负的责任。实际上，英国仍然是当今在中国的头号列强。这

---

<sup>①</sup> 西摩尔（Edward H. Seymour，1840—1929）：英国海军将军。曾参加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2年又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1900年任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率队进攻北京，在廊坊附近曾为义和团和清军挫败。

件事本身好坏参半。由于我最近的文章已经招致了许多英国人的厌恶，但愿我下面的话，不致于被怀疑又在有意讨好他们。这里，我要说的是，在影响中国的外来因素中，英国因素至今仍然是最好的。比如，英国领事馆就不仅只是一个有条有理的行政机构，其中还收罗了一些最为出色的在华外国人。不过，在说英国是今日中国的头号列强时，我也毫不犹豫地要说，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形成，它应受到更多的责备。中国事态之所以陷入到如此困局，是因为英国政治家在中国没有政策，甚至那错误的政策，“押错赌注”的政策，也没能始终贯彻！我能够听到英国政治家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愿意对中国公正行事，但你看其他人不愿意；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照顾好自身的利益，如果我们正直诚实，但是——”现在，正是英国的这种“但是”政策，带来了眼下这场可怜而又鄙的悲剧性混乱。然而，如果英国政治家丧失了责任感，只是考虑自身的利益，再加上又奉行一个“但是”和“如果”政策，那么，英国将无法保住它在中国的头号列强地位。英国应奉行的政策，即便是从它自身的利益来考虑，也在于我在本文开头作为箴言所引用的那段戈登的话中。不过英国要想坚持这项政策，就必须准备战斗。因为愿意战斗，最终还可能免除必要的战争。

至于说俄国，如果她成为了中国的头号列强，那将不是她的本愿。只是英国报纸及其英国民主政体的不受约束，将迫使俄国违背她的心愿，去加强在远东的力量，从而成为在中国的头号列强。

中国问题有赖于解决的最后一个列强，是日本。就日本的利益和日本人民的福利来说，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将比联合行动中的其他任何列强都具有更大的风险。鉴于她目前



的军队有自由行动的权利，所以日本在对待中国问题时，可以采取一个左右列强的政策。一旦日本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了正确清晰的认识，它恐怕就会成为远东文明的 Mark-graf（边疆镇守使）。

### 一个文明问题

外国人对我说：“你所有的意见都很动听和正确，但为什么不唤醒中国起来战斗呢？现在的世界不认公理，只认强权和物质力量。”对此，我将指出，“拳民”应当使世界相信，中国人并非不愿战斗。赫德爵士的同胞认为他在预言“义和团运动”的前景时，丧失了理智。但在此，我将从中国历史上举出两件事，来证明赫德爵士毕竟错得还不是太远。

（一）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华民族已经发现，文明，正如罗斯金<sup>①</sup>先生所说的，意味着培养文明的人。但其结果，却遗忘了战争艺术。因此，当汉人面对来自北方的蒙古游牧民族的入侵时，他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1260年，蒙古头人忽必烈汗实际上登上了中国的皇位，并用暴力压服了汉人。1361年，正好——百年后，我们汉人重新学会了战争艺术，在明朝开国皇帝的领导下，中国武士再度崛起，将蒙古游牧民族赶出中国，回

---

<sup>①</sup> 罗斯金（Ruskin, 1819 - 1900）：近代英国著名政治家、文艺评论家、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代表。他谴责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和罪恶，痛恨资本主义文明的事务主义、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精神，具有浓烈的复古意识。他还将其乌托邦的复古计划付诸实践。其思想对辜鸿铭影响颇大。

到自己的家园。至少，这部分野蛮的入侵者还没有耽于中国文明、变成文弱之人。

(二) 当 1850 年太平天国叛乱在广东刚刚爆发之时<sup>①</sup>，作为统治阶层的“文人学士”，也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但大约 10 年以后，“文人学士”们脱掉了他们的长袍，掌握了一套战争艺术，结果于 1864 年扑灭了这场叛乱。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否必须起来战斗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文明事业的异常重大的问题。在一场公平的战斗之中，我不为中国人担心什么。但是，文明的危险甚至在于，在中国人准备战斗之前，外国列强的现行政策，可能会迫使中国人失去理智，“乱砍乱杀”。人类为了防止这样一种“乱砍乱杀”，能够做到的一切都应该尽力去做，如果不是为了人类的缘故，起码也应当为物质利益着想。欧美人民还不了解中国人眼下的痛苦状态。在如今的中国，甚至中产阶级，且不说更低下的阶层，都正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而外国的外交家们竟天真地以为，中国人民会平静地饿死——不仅付出实际破坏的代价，而且还会给现代殖民政治以荣誉，为它燃放炮竹。此外，如果西方民族想要抢劫中国人民，那就请公然地、明目张胆地来抢好了，就像最近在北部中国所干的那样。但是看在上帝和人类之爱的份上，千万不要将中国人民交到那些称之为金融家和资本家的现代欧洲高利贷者手中，任凭他们虐待。在此，我想指出，中国人民，甚至现在，为了和平的缘故，仍能牺牲一笔合情合理的赔款。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央政府必须有绝对

---

<sup>①</sup> 这种说法严格说来不确切。太平天国起义，一般认为从 1851 年 11 月 11 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开始，地点是在广西金田，而不是广东。

的行动自由，比如，有命令每个总督和巡抚如实上交公款、否则提头来见的绝对权利。

我说过，中国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文明难题。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召开了威斯特发里亚会议，讨论像中国目前事变这样的、与文明利益攸关的问题。现在，我冒昧地请求，在现有的最后和约批准以前，也应当将它提交到这样一个会议来讨论，不仅要修改它，如果有必要，还应彻底改变整个条约。

国际法和外交学教授齐克尔（Bernard Chichele）先生在谈起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时说道：<sup>①</sup>

“威斯特发里亚会议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如果你细加分析，一个和约，一般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它有外交家们称之为的一般性条款——宣告和平已经恢复并实行大赦。其次，它有消除战争起因、调节彼此抱怨的不平、并防止它们死灰复燃的必要条款。这是实质性条款，谈判者必须做好，如果没有清晰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和约就是虚假的和不完满的。第三，它有交战中的强方所要求的赔款或补偿条款，以弥补强方长期受到的伤害和战争费用。最后，它还包括有关实施前述各项规定所必须预备的一些条款。”

上文最初发表在《日本邮报》上，当时附带如下评介：我曾经表示过，要对列强在华的现行政策做一篇详尽的批评，现在，我所以失诺，主要鉴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因为我得知英国驻华当局，对我所写的东西感到不

<sup>①</sup> 见其《有关外交的四篇演讲》，伦敦，1868年。——原注

满，并已正式抱怨总督（张之洞——译者）阁下。自然，我也  
要有所收敛，免得总督阁下感到难堪。我不知道英国驻华当局  
的行为是否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但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在  
此公开提醒索尔兹伯理勋爵注意，去年夏天，我曾经给他的府  
邸拍过一个密码电报。

去年夏天形势最为严重的时期，上海报纸上刊登的电文说，  
（张之洞）总督正在汉口的外国租界操练军队。而来自上海衙门  
的电报则一致报告：英国舰队司令西摩尔在长江上已有图谋。果  
不其然，西摩尔司令正领军到沪。有个英国军官也在武昌周围  
窥探。这时候，一个外国领事馆派代表向我反复说明，让我提  
醒总督，防范英国的阴谋。我直言不讳地告诉那个代表他的领  
事有点丧失理智。我把鲁特（Reuter）的电报拿给他看，其中，  
尊敬的布罗醉克先生说，试图管理中国领地的任何部分都是发  
疯。末了，南京的刘（坤一）总督发来一个电报，深信我们正  
在“坐以待毙”。于是，彼此的恐惧加剧，大祸即将临头。我束  
手无策，感到绝望，因为我无法使我们的人民相信那些关于英  
国阴谋的报告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也不知道这些有害的电  
报是否已到索尔兹伯理勋爵那里。

正在这一危急关头，索尔兹伯理勋爵发来一个电报，主动  
提出要为总督打端王！！我立即发现一个消除紧张气氛的机会。  
总督当时正需要钱。我大胆地劝总督向索尔兹伯理勋爵要求一  
笔借款。那就是我的密电内容。我的目的，是要叫索尔兹伯理  
勋爵信任我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我知道在索尔兹伯理勋爵  
的担保下，香港和上海银行将欣然接受此项业务。我盼望这笔  
借款的成功会成为恢复彼此信任的手段。我有理由相信它能起  
到此种作用。遗憾的是，索尔兹伯理勋爵并未充分了解我那封

密电的意图，还是把军队派到上海来了。我更遗憾地得知，通过半官方渠道获悉，索尔兹伯理勋爵感到失望，因为英国政府通过这笔借款，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我总以为长江流域的和平是值50万两的，何况只是这样一笔数目的借款呢？

实在很抱歉，我在此介入了个人的因素。但鉴于英国在华当局的行为损害了我与总督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此，让索尔兹伯理勋爵及其英国人民，了解到我个人为维护长江流域的和平所做过的事，还是必要的。

我不再写关于时局评论的其他原因在于，我感到自己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在随意地给自己找不自在。同时，我还认为，以我在政府机关的卑微之职，去评论议和的细节，使正在进行和议的帝国高级官员感到为难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当事情可以说还在审议之中的时候。

##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之一

(首次发表于 1900 年 12 月 22 日)

### 箴言

有些人认为我在讽刺诗中太尖刻了，并使这一诗体超出了可以允许的限度。<sup>①</sup>

上期《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分裂的征兆》的文章。该刊的编辑及其友人们自然是兴高采烈。但我认为，在华外国

---

① 原文为拉丁文：Sunt quibus in satira videor nimis

acer et ultra legem tendere opus.

这是贺拉斯（Horace）讽刺诗第二集第一首中的一句。在这首长诗中，贺拉斯说明了他写讽刺诗的原因，他说他有一种“不能抑止的内在冲动”。

人还没有发现“强健的端王<sup>①</sup>之最后同谋”。

“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许多王冠将要被砸烂”。

## 二

列强正在大肆进行着分裂中国的活动，即通过支持中国的党人，达到 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的目的。波兰就是这样被瓜分的。扬子江流域的总督们现正处在与上海的茶店同样的境地，那些茶店打着“洋货”的招牌，告诉人们他们正受到无耻洋人的保护。

## 三

腓特烈大帝<sup>②</sup>谈到玛利亚·特丽萨 (Maria Theresa) 时，说她总是一面标榜一面偷盗。英国人，我指的是那些尚保持着英国人良知的英国市民——也总是一边抗议着偷盗，一边又去偷

---

① 端王，即载漪（1856—1922），爱新觉罗氏。1894年封端郡王。其妻为慈禧太后侄女。1900年慈禧曾立其子溥儀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中，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利用义和团排外，以达“废立”目的，并力主围攻东交民巷各使馆，坚持处死反对宣战者。后随慈禧西逃。庚子议和时，被指为“首祸”，发往新疆监禁。

②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1740—1786）。

盜。在非洲，張伯倫<sup>①</sup>先生大肆偷盜，當他被逮住時，卻又加以抵賴；爾後壓迫布爾人發出使傲慢無頭腦的索爾茲伯理勳爵大為光火的最后通牒，而今——德蘭士瓦<sup>②</sup>城已被吞併了。

#### 四

我寧要德國人的公開搶劫法，而不要張伯倫先生的偷竊法。德國人的法子看上去就像古時北歐海盜的辦法，張伯倫先生的法子則酷似猶大<sup>③</sup>的辦法。

#### 五

強盜巴拿巴和猶大現在已經聯合起來捍衛中國的尊嚴了！猶大的把戲再明白不過，他要偷盜，如果被抓住，他可以巴拿巴喊來替他撐腰。

---

① 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英國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倡導者。初為自由黨急進派，後成為保守黨右翼。1895年任英國殖民大臣，推行擴張政策，力圖加強控制各自治領的經濟，宣揚保護關稅，倡議實行帝國特惠制。任職期間，曾挑起與非洲布爾共和國的戰爭。

② 德蘭士瓦：原為布爾共和國的城市，現為阿扎尼亞省名。

③ 猶大：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出賣耶穌者。這裡指偽裝親善的叛賣者。



## 六

是揭穿“门户开放”政策的骗局的的时候了。英国人——我指的是英国犹太而不是英国国民——之所以发明“门户开放”政策，是因为他们想要赖掉对于可怜的皇太后及其臣子治理中国所应承担的费用和责任，而同时却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好处。正面我赢，反面你输，（反正不吃亏）。那英国的犹太也知道，当他拥有“鸦片专卖权”并有个赫德先生在北京的时候，他比巴拿巴或任何其他人的日子都好过些，Voilà tout（就是这么回事）！

## 七

在我看来，皇太后对此竟“无动于衷”简直是个奇迹。我实在看不出做一个“敞开门户”的一家之主有何乐趣可言。让所有流氓无赖、搬弄是非之人和爱管闲事之徒不受限制地任意出入、胡作非为，结果我的家失火了，没有人给我赔偿，相反我却必须向事端的制造者道歉并赔偿损失！此乃“门户开放”政策十足的庸俗实利之处。

## 八

大不列颠和美国派来他们所有失业的搬弄是非者和爱管闲事之辈，专横跋扈地干涉上至皇太后，下至那些可怜妇人的小脚。德国派来所有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来诈骗中国的达官并使之堕落。法国送来了全部的“黑龙骑兵”保护流氓和无赖。当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失火——世人竟还感到奇怪！

## 九

一个可怜的寡妇最近家里来了一些客人，这些客人不让她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家务，并有意无意地纵火焚毁她的家。尔后这位老太太在满怀忧伤和怨愤之时，仍然千方百计地派臣仆去救援他们，这些客人竟堵上门并朝仆人们开枪。你要那位老太太如何是好呢？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会说，打发这些蛮不讲理的客人，让他们管好自己，并尽可能按照她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家。那就是公元1900年在北京发生的围攻使馆的可叹悲剧。

## 十

在你家里的真正客人是态度友好、不带武器、孤单无援的

人，他完全信任你能够保护他，使他免于伤害。他对你越信任，他就越像一个真正的客人，而你保护他的责任也就越发庄严神圣。但一个对你不友好的客人，他当你面说不信任你，在你的家里不仅武装起来防范你，而且在你面前挥舞手枪，这样一种人不是客人，而是一个入侵来犯者，如果你愿意，完全有权把他击毙。我不知道为何国际法专家们要讲拉丁语，而不用浅显明了的英语告诉人们神圣的使节意味着什么。

## 十一

当所有列强都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猜想皇太后将不得不赔——赔——赔！但如果我是太后，我将拒绝赔——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sup>①</sup>——除非列强答应将来不再派来三种东西——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法国的）黑龙骑兵和（英美的）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

## 十二

罗斯金曾说，所有主教都应被绞死。我甚至连在华的传教士们也不愿意绞死。现在一般人都试图把目前的灾难完全归咎于传教士。然而正直的 Injin！假如我必须在日耳曼犹太狗和主教之间进行选择，我宁愿选择主教。

---

<sup>①</sup> 此地曾因禁过拿破仑。

### 十三

尽管如此，我认为，曾经一度同日耳曼犹太狗合作、现在又参与向中国人嚎叫的所有在华主教和传教士——这类传教士应该像那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主的犹大一样立即被绞死。至于其余的人，则应受到鞭笞，因为他们像彼得一样不认其主，没有挺身出来为那反对强者的弱者辩护，为抗击八国联军的端王辩护。讲求实际的人现今不信上帝或恶魔，他们只相信物质利益。那么是什么利益驱使着那些讲求实利的人们，仍然乐于给主教们掏钱的呢？恐怕是由于主教们宣讲的知道面包的哪一面涂上了黄油<sup>①</sup>的现代福音，对讲求实惠的人们有用的缘故吧。

### 十四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那些总是（得意地）搓着手，赞同你的意见，在一切问题上总站在可敬民众一边的温和而又受人尊崇的在位者，正是这种人残忍地破坏了人类追求美德、荣誉、勇敢的情感和意识。”<sup>②</sup>

① 指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② 未查到相应的原文，故直译。

## 十五

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个人在人群中高声叫喊：“Je demande l'arrestation des lâches des coquins”（我要求把乱臣贼子们抓起来）。上帝作证，对中国目前的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人不是端王和义和团小伙子。真正的罪犯甚至不是日耳曼犹太狗和传教士，而是乱臣和贼子。没有乱臣和贼子，就不会存在日耳曼犹太狗，传教士也不会为害中国——甚至还可能为中国做好事。

## 十六

在古犹太人生活的时代，贼子被称作 Scribe（法律学家），乱臣则被称为 pharisee（法利赛人）。假如你想看看现代贼子们的彻头彻尾的粗俗下贱，你只需去读读上海的那些报纸，瞅瞅他们是怎样谈论皇太后的就行了。的确，当看到《字林西报》的一个撰稿人每次提到皇太后的名字时，是如何重复着使用“奴婢”一词，试图以此来显示他的卑鄙恶毒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实在是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之至。

## 十七

在目前的灾祸降临前夕，《字林西报》的另一个主要撰稿人

曾认为，皇太后贪婪地存了很多钱，以便在动乱时期逃到陕西去尽情享受。但这个撰稿人根本没有想到，具有贵族血统的中华帝国的太后，是绝不可能像赫德先生手下的海关税务司那样回老家去享福的。那些贼子们生活中唯一而经常的担忧，是无东西可供糊口。

## 十八

两千年以前，中国的一个集权皇帝曾活埋了四百个称之为“儒士”的乱臣<sup>①</sup>，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和平。这些儒士都是编辑蛊惑人心之书的老手。现在欧洲的霸主企图通过海牙会议给世界带来和平，却以失败告终了。下一个想要继位的欧洲霸主，看来必须采用中国古代集权皇帝的办法不可。

## 十九

驻巴黎的中国使臣向世界公众揭露，西方同中国目前的和谈只是装模作样。这一点本来无人不晓。因为当乱臣和贼子还在猖獗的时候，中国或世界是没有和平可言的，除非欧洲某个正直而有头脑的霸主起而召集所有正人君子，向乱臣和贼子们开刀，到那时才有和平的可能——才会有真正高雅、令人兴奋和愉悦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目前被联军追杀、蒙受耻辱的义

<sup>①</sup> 指秦始皇“坑儒”。

和团员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被追杀的义和团员唯一感到兴奋的事情是抢劫。

## 二十

然而，我想唤起世人——唤起一切愿意听我意见的强有力而又正直的沙皇、恺撒<sup>①</sup>、总统、皇帝、国王、政治家们注意的是：乱臣和贼子已经狼狈为奸，合伙为害世界了。大不列颠的乱臣被认为是市井平民，其正式称谓是帝国主义者。从谱系上看，他是犹太的真正传人。德国的贼子是日耳曼犹太狗，其正式称谓是殖民政策，从谱系上看，他是强盗巴拿巴的后裔。

## 二十一

这四个月来，我一直相信索尔兹伯理勋爵身上那种不列颠贵族和英国绅士之传统和情感，能使他在对待中国时，不会站在乱臣、英国的市井平民——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者一边。我也一直相信德国皇帝陛下身上的那种霍亨索伦王族和普鲁士军官的传统和情感，会使他反对贼子，反对日尔曼犹太走狗即反对德国的“殖民政策”。既然我大失所望，那么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保护文明，皇太后、端王和义和团小伙就

---

<sup>①</sup> 本是古罗马的独裁者，后成为西方帝王习用的头衔。这里用的是后一种意思。

不得不起而保护它。

## 二十二

康有为先生的朋友们现在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无法改造中国和皇太后。当他们最终发现非但康有为先生未能改造中国和皇太后，反倒是端王和义和团小伙要改变欧美的面貌时，他们将会更加悲哀。

## 二十三

皇太后、端王和义和团小伙并非是欧洲人及其自1789年巴黎兴起“大拳匪”<sup>①</sup>以来一直试图实现的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后者真正的朋友。因为皇太后、端王和他的义和团小伙子，正奋起反对欧洲和全世界的真正文明的敌人——那些正合伙欺骗、榨取、威胁、谋害和抢劫世界、并最终要毁灭世界所有文明的人。

<sup>①</sup> 辜鸿铭这里指的是法国大革命。



## 二十四

末了，我请求你们，编辑先生<sup>①</sup>，召集所有的正人君子和我们一道，首先挫败并永远消弭乱臣贼子的新联盟，继而发动和开展一场彻底根除两类人——乱臣和贼子的永无休止、不屈不挠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发现他们。

## 二十五

今天正好是皇太后陛下的 66 岁生日，借此机会，我请求编辑先生和所有读过我这些札记的正人君子们，在今年的这个圣诞，不论何时相遇，请同我今天一样，干它一大杯，恭祝与端王的名字及其勇敢、出色、强健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皇太后：健康、幸福，长寿——万寿无疆。

正是端王告诫议约的巨头们说：

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许多王冠将要被打破；

尔后每个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

让他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伙。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

<sup>①</sup> 本文最初是写给《日本邮报》编辑的信。——原注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端王备了马，他骑马上了路，  
他们喊叫回来，他们播响战鼓；  
但李鸿章（奸客者）却说：“哦！为了使先生们愉快，  
我们将尽力摆脱端王那个恶魔。”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  
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sup>①</sup>  
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  
“干得好啊强健的端王及其同谋。”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

① “张们”：指张之洞这样的人，“刘们”：指刘坤一这样的人。他们当时一为湖广总督，一为两江总督，是“东南互保”的中方盟主，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且当时都有备战措施。

##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 之二

(首次发表于1901年1月5日)

#### 箴言

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民。<sup>①</sup>

“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这就是孔子对当今一种英国人的描述，罗斯伯里<sup>②</sup>勋爵是这种人最突出的代表。

---

① 原文为拉丁文：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② 罗斯伯里 (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Rosebery, 1847--?)，英国政治家。

## 二

孔子又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这就是对当今另一类英国人的写照，索尔兹伯理勋爵是这类人的最好代表。

## 三

英国贵族是非常傲慢的，有时简直到了专横的地步。因为他们最初是1066年来到英国的征服者。这就是他们傲慢的根源。直到今天，英国军队还是有别于欧陆体制，不是保卫领土和人民的国家军队，而是像中国的八旗军一样属于皇家军队，是维护女王及其统治阶级的人身安全与荣誉的一种占领军。

## 四

爱默生说：“在英格兰，这样的事让我感到无法容忍，人们普遍认定显赫的声名取决于财富与门第。一个有学问的人，不管他取得多大的成就都不被上流社会所接纳，除非他是社交界的明星和喜欢卖弄之辈。”

## 五

正因为如此，上个世纪当英国处在革命的阵痛中时，没有一个真正的能人出来帮助贵族或统治阶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智者托马斯·卡莱尔，当时正过着单调刻板的生活，并在一个苏格兰的泥沼里糟践性情。就在英国贵族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并不出色的犹太小伙子，幸好这个犹太青年被证明只是一个好空想的平庸之辈，后来他变成比康兹菲尔德勋爵。

## 六

比康兹菲尔德勋爵说，当他发现所谓的自由党实在不过是一个寡头政治集团——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或伦敦佬阶层时，他才第一次明白了大不列颠政府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比康兹菲尔德勋爵带领一伙群氓去帮助绅士们推翻伦敦佬、摧毁寡头政治集团。在毁灭寡头集团之后，他见群氓无法管治，于是又宣布实行帝国主义。

## 七

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晚年时曾指出：“我不知道君权神授论是

否还站得住脚，但我相信，除非一国的现政府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治国安邦便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比康兹菲尔德的帝国主义，意味着政府绝对有权，既无顾虑也不偏袒，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实际上意味着公平之治。

## 八

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死后，英国贵族又变得束手无策，他们的首领索尔兹伯理勋爵遇到了一个具有伦敦佬智识的伯明翰青年。这位伯明翰青年照搬比康兹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旗帜，并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自以为是摇旗呐喊，以此谄媚于傲慢的英国贵族。

## 九

实际上，那些优雅旧式英国贵族，在一个挥舞着自以为是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旗帜之微不足道的伯明翰青年领导下，现在是既缺钱花，又无理想且思想贫乏。其境况虽然还不至那么悲惨，但却像苏格兰那些“身无分文，徒有往日门第的女佣”一样滑稽。

十

最近，有人叫一个水上学校的男生给罗马公民权下定义，他这样回答说：“所谓罗马公民权，就是罗马人出去‘免费捕鱼’时乘坐的一艘大船。”

我很想知道索尔兹伯里勋爵和真正的英国国民是否了解，在那群卑鄙贪婪的伦敦佬阶层中，究竟有多少英国人打着冒牌的帝国主义旗帜，抱着“免费捕鱼”的目的从“敞开的大门”进入中国。

十一

但我并不责怪这些旅居中国的穷困潦倒的伦敦佬，我只是有时讨厌看到这些家伙。他们虽然无以维生，但正如我最近所见到的，却变得恬不知耻、招摇撞骗，试图在老实巴交的中国苦力面前抖威风，并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达官们的腐败。可怜的恶魔！这些旅居中国的卑鄙饥饿的伦敦佬此时的唯一念头，就是得到像从京津两地“劫来之物”那样的一笔横财。Non ragionam di lor（别跟他们讲道理）。

## 十二

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也。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 十三

然而，对英国伦敦佬在中国“免费捕鱼”真正负有责任的是“乱臣贼子们”，他们使大不列颠的假冒帝国主义之公职服务百孔千疮。举一例为证。窦纳乐爵士真心实意地试图清除中国公职服务系统中的腐败现象，多么可怜的窦纳乐爵士！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必须指出，他的任务是完不成的。授权于他的特殊使命不是捍卫女王的荣誉和英国人的好名声；也不是捍卫公理，而是维护“利益”，英国商人的利益——甚至于为了英国商人的实际利益去参与在北京的抢劫活动。我曾发现，他将其自身的军人本能与绅士本能、乃至他所要完成的使命谐调起来的困难，最近几乎要把他逼疯。

## 十四

我记得看到过窦纳乐爵士在香港所作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次演说，他谈到“要捍卫先辈们以鲜血换来的在华权益”云云。也



就是说要捍卫和坚守那些在中国公然抢劫的“牲畜与动产”。当然，那种苏格兰高地的老法子虽无所谓体面不体面，但要知道这是在捍卫和坚守偷盗的权利！平心而论，尽管公开抢劫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算不上耻辱，然而偷盗，我以为永远是可耻的。

## 十五

确实，在我看来，卡莱尔和罗斯金毕生反对的那种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走狗”人生观，竟然能使窦纳乐爵士这样一个军人加绅士之苏格兰人的花岗岩脑瓜开窍，是可悲可叹的，然而就我所知，事实的确如此。如若没有那些“走狗”理论、以及那种潜滋暗长、污浊不堪、令人窒息的有害空气的毒害（旅华外国人已经受到影响），窦纳乐爵士本该觉察出，目前中国与我国列强签订的条约，乃是他的先辈们称之为“法定的不义”（Iniquity decreed into a Law）的东西！

## 十六

我摘录下列文字，对那位此时恐怕还在中国的真正的英国军人和绅士将会是有益的。罗斯金在致伍尔维兹军校学员的信中指出：“现代制度的致命错误，在于剥夺了本民族中最精华的元气和力量，剥夺了勇敢、不计回报、藐视痛苦和忠实的一切灵魂之物；只是将其冶炼成钢，锻铸成一把无声无意志的利剑；同时保留下民族最糟糕的东西，诸如怯懦、贪婪、耽于声色和

背信弃义——并给予它们这种声援，这种威权，这种最大的特权。其中，思想的能力被削弱到最低限度。实际上，履行你保卫英国的誓言决不意味就要去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商店门口保护店员在里面骗人钱，那你就决不是一个真正的卫兵。”

## 十七

言归正传。在上一篇札记中我说过，对于中国目前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犯是乱臣和贼子。在此，我想进一步指出，中国乃至全世界目前罪恶的根源甚至不是乱臣贼子，而是英国国民、英国贵族、索尔兹伯理勋爵身上的那种“傲慢的恶魔”。面临这种“傲慢的恶魔”毁灭性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大英帝国。

## 十八

马太·阿诺德<sup>①</sup>曾经评论道，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国民过于自私和不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统治阶层不够友善，才使得

---

<sup>①</sup> 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 19 世纪著名诗人、社会批评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他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十分厌恶，认为社会各阶层都丧失了文化教养，对希腊、罗马的文物制度流露出向往之情。他的思想对辜鸿铭产生了较大影响，辜氏经常引用他的言论。

“爱尔兰创伤”一直没有愈合并将永远无法愈合。

## 十九

最近，正是索尔兹伯理勋爵的那种傲慢、那种粗野和肆无忌惮的傲慢，使得张伯伦先生及其伦敦佬阶层有效地发布“命令”（Majuba），打开了非洲的监狱。在布尔人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索尔兹伯理勋爵的演讲确如雄狮怒吼，但这不是自私的怒吼，而是傲慢的怒吼。

## 二十

总之，索尔兹伯理勋爵身上的这一“傲慢的恶魔”成了真正的罪犯，它导致了张伯伦先生的出笼以及在非洲的流血事件，导致了冒牌的帝国主义，导致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导致了称之为“中国联盟”（China League）的伦敦佬寡头政治集团及其在北京的掠夺比赛——简而言之，导致了中国目前这场可怜而又可鄙、可悲而又可叹的混乱。

## 二十一

在谴责英国贵族给予拿破仑荣誉时，爱默生评论说：“如何采取措施、哪怕是可恶的措施来防止国家一连串的危机呢？政

府总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正直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就如同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 二十二

一伙人使用暴力在一个一直守寡的老太太家里进行抢劫比赛，在激烈的比赛中致使房子失了火。这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乱臣说：“把这个老太婆赶出家门去。”贼子说：“让她赔偿我们的损失，然后继续为我们看管房子。”但正人君子的奉劝是：“先生们，如果你们实在没有诚意或本钱去赔偿老太太的损失，至少也应该有君子风度向她表示歉意。最起码，有一件事你们应该做到，那就是以后要规矩一些。”

## 二十三

事实上，我已经得出了结论：要和平解决目前的中国问题，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于改革，但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欧洲的改革，是大英帝国的迫切改革。中国的改革不难，因为在中国，那种共同的理性意识和道义感，也就是“道理”<sup>①</sup>这两个汉字所表达的东西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于它很容易就能得到普遍理解。正是这种“意识”而不是懦弱，使得这六个月里避免了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

<sup>①</sup> 洋泾浜英语称之为“Savey”。——原注

## 二十四

欧洲的改革，大英帝国的改革是困难的，因为正如罗斯金所说，现代欧洲教育的一般倾向所造成的唯一结果，是使得人们对于生活中所有可能的重要问题都有着错误的认识。但是改革欧洲，迫切改革英国，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可以防止文明的彻底毁灭。

## 二十五

现在，要想使改革成为可能，英国国民的首要任务是要从民族中，从贵族中赶走“傲慢的恶魔”。当这种恶魔被赶走以后，那些堵住了公职服务（宦途）“开放的门户”（open door）的乱臣贼子们就将得到清除。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了这种“门户开放”，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唱道：“管他这一套那一套”。也正是为了这种“门户开放”，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当这种“门户开放”原则得到人们充分的认可和贯彻的时候，一种海涅所谓的新 Staatsdienst Adel（公职贵族）就会出现。这种新兴的贵族将保留旧式贵族那种高尚的情感与优雅的气质，并将其与现代真正自由主义的那些成熟的文化结合起来。以这种新式贵族为基础，就能建构起真正的帝国主义大厦，一种可能比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大厦还要坚固耐久、漂亮优美的大厦。因为这种新式帝国主义拥有古罗马帝国主义不曾有过、或远为

逊色的强烈的基督教色彩。英国的这种新式帝国主义，不再只是通过枪炮政策来确立盎格鲁—撒克逊恶霸的声望，而将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卫世界文明。——*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们）。

## 二十六

我之所以十分激动地对英国人民写下这些措辞强烈的文字，是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和平解决的。我的这种信念和希望，基于此次事变之前路透社报道的索尔兹伯理勋爵的那场演讲。在那场演讲中，这位高贵的勋爵说他确信四万万勇敢的中国人不会灭亡，也不可能灭亡。在我听来，这几句电文就好像是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勇敢、雄壮乃至声嘶力竭的欢呼，它们仿佛出自真正的英国人民的灵魂深处，并得到了现存的英国贵族首领的声援。*Ultime Romanorum! Se tu segui tua stella!*（你这最后一个罗马人！如果你能追随你的星宿那该多好！）

##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 之三

(首次发表于1901年1月12日)

#### 箴言

对一切事物，特别是对爱和友谊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导原则和人生准则。因此后来，我在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调皮唐突的话：“如果我爱你，那与你有何相干呢？”这就是我心灵的剖白。<sup>①</sup>

——歌德

---

罗斯金曾说：德国人的优点中甚至也含有自私成分。他说

---

<sup>①</sup> 原文为德文：uneigennützig zu sein in allem, am uneigennützigsten in Liebe u. Freundschaft war meine höchste Lust, meine Maxime, meine Ausübung so dass jenes freche spätere Wort: W“enn ich dich liebe, was geht’s dich an?” mir recht aus der Seele gesprochen ist. (Aus Goethe’s Dichtung u. Wahrheit). 辜氏在页末做有英文译注，此略。歌德，德国大文豪，辜氏最为推崇的欧人之一。

此话时想到的是宰相俾斯麦<sup>①</sup>，而不是毛奇<sup>②</sup>和歌德那两个已成正果的 Zucht u. Ordnung（秩序与风纪）的化身。

## 二

瓦里柴夫斯基 (M. Waliszewski) 在他的《风流女皇》一书中，谈到具有德国血统的俄国皇帝叶卡捷林娜二世时说：我们曾听说，有一个现今还在维也纳担任要职的德国人宣称，就性情而言，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喜欢所有的民族，唯有他的本民族德国例外，因为这个民族尽管有许多长处，却有一个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令他厌恶的缺点，那就是：它不懂得怎样才是慷慨大方。

## 三

事实上，就我所知，中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是世上三大最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简单。在苏格兰和北部德国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活条件艰难。而在中国，早婚和必婚的

---

① 俾斯麦 (Bismarck, 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 (1862-1890) 和德意志帝国宰相 (1871-1890)。推行“铁血政策”，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② 毛奇 (Moltke, 1800-1891)，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曾担任普鲁士和德意志军队的参谋总长。策划和指挥过普法战争等。著有军事著作多种，其军事思想在德国军人中有很大影响。



社会风习，加之人民酷爱和平，人口急增，以致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异常困难。

#### 四

时至今日，德国人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马丁·路德首次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标准语言。但马丁·路德同英国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一样，只不过为德国人民接受今日的现代文明，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基础。

#### 五

正如克伦威尔成为维护约翰·诺克斯工作进展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腓特烈大帝也成为了维护路德工作的帝国主义者。卡莱尔以其敏锐而冷峻的眼光，透过腓特烈那爱挖苦人和怀疑一切的哲人表象，洞察到其清教徒的本质。七年战争，实际上是普鲁士清教徒和奥地利骑士之间的争斗。

#### 六

腓特烈之后，德国成为普鲁士。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苏格兰。普鲁士是苏格兰低地人，他们因生活在平原地区而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普鲁士，气候比苏格兰还要恶劣得多。因此普鲁

士人除了想象力贫乏之外，还有惊人的胃口。俾斯麦宰相曾说：“在我们的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些能吃能喝的大肚子（lauter starke Esser）。如果人人都有我们这样的胃口（Kapazität!），国家还怎么能够存在！那时我们将不能不移民。”

## 七

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不仅具有杰出的才华，还有着法国人的文化教养、精神，有着灵敏的头脑和法国文化的明智。在腓特烈之后，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清教徒无法继续行使对于德意志的保护权。于是，拿破仑不得不由在耶拿的光荣复辟回到德意志。

## 八

华兹华斯在与爱默生谈起歌德的《威廉·梅斯特》（Wilhelm Meister）时，曾尽情地痛骂说：“它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私通行为，就像苍蝇群在空中杂交。”其实，《威廉·梅斯特》正是伟大的歌德对拿破仑复辟时期德国状况的真实、清晰和冷静的描述，正如莎士比亚作品对英国社会的描摹一样。

九

同英国的情况相似，富于理智的德国人对拿破仑复辟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时候，那个普鲁士清教徒只好咬牙切齿，退隐山林，到女人们的美好心灵（Schöne Seele）中去寻求慰藉。

十

爱默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岛上的不是他在战场的失败，而是其自身的粗鄙、平庸和俗气。当他带来法国革命的伟大自由思想时，欧洲所有有教养的绅士都热烈欢迎他。而当他们发觉这个科西嘉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想建立一个王朝时，则对他普遍感到憎恶。于是，那个身穿‘前进’（Vorwärts）元帅制服的普鲁士清教徒闻风而动，与欧洲的绅士们一道，去追捕这个科西嘉的资产阶级分子。”

十一

海涅对那个身穿“前进”元帅服、训练有素的普鲁士清教徒的描绘，对那个冷酷无情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苏格兰低地人的描绘，实在令人心酸，但至今仍真实生动，并不过时：

这个单调刻板的民族  
习惯于循规蹈矩，  
他们那阴沉沉的脸上  
永远是冰冷兮兮。  
走起路来身子僵硬，  
穿上衣时死板笔挺，  
就仿佛吞下了那根  
从前他们挨揍的棍子。<sup>①</sup>

## 十二

我不理解列强怎么会选择一个德国陆军元帅<sup>②</sup>，一个既是毛奇的信徒，更是俾斯麦“铁血政策”信徒的人来担任驻华联军

① 原文为德文：

Noch immer das hölzern pedantische Volk,  
Noch immer ein rechter Winkel  
In jeder Bewegung U. im Gesicht  
Der eingefrorene Dunkel.  
Sie stelzen noch immer So steif herum  
So kerzengrade geschniegelt,  
Als hatten sie verschluckt den Stock,  
Womit man sie einst geprügelt.

② 指瓦德西 (Walderssee, 1832—1904)：德国军官。1888—1891年任陆军参谋总长，是毛奇大将的继任人。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推为联军统帅，曾著《回忆录》一书，谈到侵华情形。此书有王光祈的中文节译本，名为《庚子联军统帅瓦德西拳乱笔记》。

总司令。当叶卡捷林娜二世任命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fski)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帕提奥姆金(Patiomkine)向这位沙皇写信说:

“您从您的武库中搬出了一门最古老的大炮,您指向哪里他肯定就会朝哪里发炮,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心它要给陛下的名字蒙上血污。”

### 十三

还是言归正传。当“前进”元帅将拿破仑赶出德国时,他想连法国革命的伟大自由思想也一并赶出。因此,所有富于理智的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那就是“Kultur Kampf”(文化斗争)的发端。

### 十四

法国革命真正伟大的自由思想是要求“门户开放”,表现在政治上,是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 (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表现在宗教上,则是“扩展”(expansion)<sup>①</sup>“前进”元帅身上的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倾向,使他讨厌“门户开

---

<sup>①</sup> “expansion”一词颇难译,它有“扩展”,“开阔”,“宽弘”之意。辜鸿铭多次使用,主要意思是开阔心胸,即心灵意义上的扩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宽容。

放”，而普鲁士清教徒想象力的缺乏，又妨碍了他理解宗教上“扩展”的含义。

## 十五

威廉皇帝做普鲁士国王的时候，第一次与俾斯麦交谈所显现出的 Schöne Seele（美好心灵）实在美得让人感动。他表示他反感某人，因为那人是一个虔敬派<sup>①</sup>信徒。“何为虔敬派信徒？”俾斯麦问道。国王答曰：“就是那种以宗教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这不是那个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用法，”俾斯麦说，“所谓虔敬派信徒，指的是刻板地相信耶稣基督乃是献生为我们赎罪的唯一圣子的人”，云云。“什么？”国王叫了起来，“真有人被上帝如此遗弃、竟然会不相信有这回事？”俾斯麦只好说：“当心，陛下，如果人们听您这么说，他们会把您当成一个虔敬派信徒的。”

<sup>①</sup> 虔敬派：一译“虔诚派”。德国路德宗教会中的一派。认为宗教的要点不在于持守死板的信条形式，而在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内心的虔诚”。提倡精读《圣经》，反对跳舞、看戏等“世俗化娱乐”。主张路德宗应作两大改革：讲道的重点不应放在教义上而应放在道德上；只有在生活上作虔诚表率的人，才可担任路德宗的牧师。17世纪70年代后曾在德国盛极一时；18世纪30年代以来，渐成为少数狂热者的宗教社团。

## 十六

海涅知道普鲁士清教徒威廉所指的“虔敬派信徒”是什么。他说：

我熟悉这支曲子，我晓得它的歌词，  
我还认识它的作者。  
我知道，他饮过家乡的美酒  
以及那布道时的圣水。

实际上，“虔敬派信徒”利用了威廉缺乏想象的特点，不仅使他那 Schöne Seele（美好心灵）面临被扼死的危险，而且还威胁到德国人的生命安全。“前进”元帅与伟大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 1848 年欧洲危机的爆发。

## 十七

1848 年，所有德国人都起来反对“前进”元帅及其被保护者“虔敬派信徒”，并使德国的“王权”以及一切秩序与风纪遭致被毁灭的威胁。正比如康兹菲尔德勋爵带领群氓帮助英国的绅士一样，在德国，俾斯麦宰相听到柏林的骚乱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波美拉尼亚的 Bauer（农民）召集起来，问他们是否愿意随他出征，去挽救“王权”，即他所谓的普鲁士王朝。

## 十八

比康兹菲尔德勋爵与宰相俾斯麦所试图建立的，都是一种真正的帝国主义，即，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政府，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不计利害的政府。正因为如此，这位大首相的“铁血”制度才得以在德国建立起来。它是要保护 *Zucht u. Ordnung*——秩序与风纪，使其免遭群氓暴力的毁灭——*la force attendant le 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 十九

在比康兹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和俾斯麦宰相的“铁血”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首先，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东方人”，相反，俾斯麦宰相则不过是一个有教养的苏格兰低地人。他缺乏想象力，有自私倾向和波美拉尼亚大食客的可怕胃口！不过这两种制度的根本差别还在于：比康兹菲尔德的帝国主义试图成为一种宪政帝国主义，而俾斯麦宰相的帝国主义则完全是一种军事帝国主义。

## 二十

有人问孔子：“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无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因此，那种 *Voluntas regis, suprema lex*（君王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的说法，孔子是不赞成的。

## 二十一

纯粹的军事独裁令人可怕的失败是：那用以镇压群氓暴乱的军人刺刀，在和平时期面对资产阶级、庸鄙之人、市侩们的狡诈与自私时，却完全无能为力。

## 二十二

那德国的市侩同他的兄弟布里特·哈特（Bret Harte）的阿新（Ah sin）一样，原本是其宗族中最受爱戴的人。他是一个单纯、质朴、坚韧、勤奋、温良顺从的“米歇尔”（Michel）。他很少有自私自利之心，但对家庭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此外，他还具有那种难以言传的德国人的 *Gemüth*（好性情？），并且心中装着音乐和民歌（*Volkslieder*）。

## 二十三

这个性情温厚的德国人“米歇尔”，在“前进”元帅刻板而

严厉的对待下变成了一个乱臣，其名字改成“市侩”。俾斯麦“铁血”政策的自私与苛刻，又使这个“市侩”变成一个追名逐利之徒，一个可怕的乱臣。那本《俾斯麦伯爵及其属下》(Craf Bismark U. Seine leute)一书的作者柏希(Bursch)博士，就是一个满嘴花言巧语而又足以骇人听闻的可怕乱臣之典型。

## 二十四

1870年，基督教绅士威廉皇帝、普鲁士绅士俾斯麦宰相和现代绅士毛奇伯爵，一道进入法兰西去消灭那个蛮横无礼的资产阶级分子或庸人路易·拿破仑<sup>①</sup>，消灭他对其伟大的伯父那种虽不纯粹但却宏大自负的帝国主义貌合神离、“华而不实”的模仿。

## 二十五

当俾斯麦从法国远征归来时，有个老妪福尔克(Falk)博士，就像歌德《童话集》(Marchen)中所描述的那样，用一个大“鬼”的故事去恐吓他，并说服他向那被称为“教皇极权主义”的恶“鬼”开战。当俾斯麦与此“鬼”作战之时，耶拿的海克

---

<sup>①</sup> 即拿破仑三世，又称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之侄，1852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在位时四处发动和参与侵略战争。普法战争中在色当战役失败被俘。巴黎革命时被废。

尔<sup>①</sup>教授却正竭尽全力，把那已变成追名逐利之徒和可怕乱臣的德国人“米歇尔”变成一个食肉动物。

## 二十六

我还记得俾斯麦宰相关于殖民政策 (Kolonial Politik) 的精彩演讲。他说他本人并不信仰这种东西，但公众舆论之潮大得难以抗拒。俾斯麦宰相内在的绅士气质使他憎恶“殖民政策”，而他身上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毛病和那吓人的胃口，又把他引上殖民政策的道路。

## 二十七

德国的市侩，现已变成追名逐利之徒和可怕乱臣的那些人由此“官运亨通”，做官之后便成了贼子。后来又乔装打扮来到中国，奉承天津的李鸿章，被诱留在天津，成为蒂万特 (Diwaeter) 先生那样著名的德国犹太走狗！

---

<sup>①</sup> 海克尔 (Haeckel, 1834—1919)：德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学说的著名支持者。著有《人类的进化》等。

## 二十八

去年，一个巴伐利亚教授来向我要有关中国的前洪积层动物骨架的资料。我希望这位教授能帮我描绘一下现代的“怪异巨兽”（Deinotherion），那殖民政策的可怕野兽。我两眼紧紧盯着他，眼前浮现出臃肿肥胖、浑身油腻、爱吹牛皮、四处晃荡、卖友求荣、卑鄙无耻的苏格兰低地人形象。他不像英国伦敦佬乱臣那样狡诈，与其说是一个乱臣，还不如说是个贼子，但他掌握了苏格兰低地人的“讥讪”技术，必要的时候，还会借助于海克尔教授的食肉动物之科学智能，以及波美拉尼亚<sup>①</sup>大食客惊人的大胃口，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

## 二十九

德皇的“黄祸”之梦，实在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梦魇。这个庞大的吃人恶魔，这个称之为“殖民政策”的现代怪异巨兽，正是今日世界可怕的现实。此时此刻，它正在咀嚼柏林小孩的骨头！*Seht zu! Völker Europas! Wahret eure heiligsten Güter!*（请注意！欧洲各民族！要保护你们神圣的精神财富！）

---

<sup>①</sup> 波美拉尼亚：旧时普鲁士北部一省。

### 三十

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基督教从前是制服苏格兰低地人之自私与波美拉尼亚大食客可怕胃口的力量。但如今在德国，基督教就像渡渡鸟一样死绝了，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建立的昂塞(Anser)主教的基督教，那胶州盛传的基督教，或是那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与政治牧师(Political Parson)的基督教，这位政治牧师在上一期《未来》(Zukunft)杂志上，撰文评论德皇“不要宽恕”的讲演时写道：“我们俘虏五万名中国佬干什么？养活他们都很困难，如果我们遇上五万条毛毛虫，我们会怎么做？把它们统统碾死。”真令人恶心！但实在无可救药。假若耶稣不是生活在和平年代，而是生活在战争岁月，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依这位政治牧师之见，耶稣基督也会变成食肉动物的！

### 三十一

这位德国政治牧师的“毛毛虫”使我想起了卡莱尔对某座教堂的描述：“它大约建于18世纪以前，里面现在居住的尽是甲虫和各式各样肮脏的生物！”的确，我喜欢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魏玛，一想起拥有“美好心灵”的德国人民本该保存卡莱尔所提到的那个教堂的圣火，我就无限留恋、悲从中来。我不知道那个祭坛的圣火是否会因魏玛公爵的最近去世而立刻熄灭！

### 三十二

普鲁士的海因里希 (Heinrich) 亲王也许会看管好那个祭坛的圣火。可现在他们让海因里希亲王变成了一个工程学博士！继承了祖先美好心灵的海因里希亲王，竟然成为火神伏尔甘<sup>①</sup>和杀人犯该隐<sup>②</sup>之子的崇拜者！哎！du lieber Himmel（还是天堂好！）当法兰西学院提名大名鼎鼎的萨克瑟 (Marechal de Saxe)、那个甚至连拼写也不会的人为院士时，他回信写道：“Cela me convient comme un bague à un chat；你们无异于在给猫爪戴戒指！”

### 三十三

还是回来讨论怎样消除那个畸形可怕的现代德国巨兽问题。德国人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那“自私的恶魔”。而要做到这一点，德国人民、德国贵族、德国军官团和皇帝的心胸必须开阔。普鲁士清教徒绝不能再做 hölzern pedantisches Volk（刻板迂腐之人）。事实上，正如对英国的 Erlösungs-Wort（拯救之言）是“门户开放”一样，对德国的拯救之言则是“扩展”。

① 伏尔甘 (Vulcan)；或译武尔坎，古罗马的火和锻冶之神。

② 该隐 (Cain)；基督教《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曾杀害他的弟弟。

### 三十四

地妖对浮士德<sup>①</sup>喊道：Du gleichst dem Geist, den du begreifst! (当你与妖怪一样的时候，你才能理解妖怪!) 这就是伟大的歌德为使德国人摆脱附体的普鲁士清教主义魔鬼而念的咒语。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得更明白些：“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道，而不是你有什么样的道，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无私和仁慈——那么不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不论你是商人、传教士、军人、外交官还是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么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贼子、庸人、异教徒、夷、蛮子和残忍的野兽。

### 三十五

“人类必须经过多么漫长的阶段才能懂得如何仁慈地对待他人，体谅地对待违法者，甚至人道地对待野蛮行为。事实上，

---

① 浮士德：歌德名著《浮士德》里的主人公。

正是那些圣人们最先教诲这一点，并为了将此种可能变作现实、推进它的实践而献出了生命。”<sup>①</sup> 这就是歌德的信念，他的基督教概念、进步概念和文明概念。欧美在对待中国问题时，是否将采纳歌德的文明概念，以取代那拥有蒸汽压路机、想把耶稣基督变作食肉动物的德国政治牧师的文明概念，人们将拭目以待！

### 三十六

我对德国人民激动地写了这么多，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和平解决的。我的希望和信心，基于德皇陛下那坚强的、尽管固执但并不狭隘吝啬的品性。从德皇陛下拍给克鲁格（Kruger）议长的著名电报中，我看到了他的骑士性格。他那封电报并不是对真正的英国国民的侮辱，而不过表达了这位绅士、这位普鲁士官员对张伯伦先生及其伦敦佬阶层的憎恶。德皇陛下那篇主张“诉诸武力”的演讲，我也能够理解。他就像一名优异的基督教骑士一样，以丁尼生的话简洁明了地告诫其兄弟亨利（Henry）亲王：

“打倒蛮夷，尊崇基督！”

<sup>①</sup> 此段文字原正文为德文：Welchen Weg musste nicht die Menschheit machen, bis sie dahin gelangte, auch gegen Schuldige gelind, gegen Verbrecher schonend, gegen auch Unmenschliche menschlich zu sein. Gewiss waren es Männer göttlicher Natur, die dies zuerst lehrten, die ihr Leben damit zubrachten die Ausübung möglich zu machen, u. zu beschleunigen. 后面，辜鸿铭在括号内加以英文翻译。



### 三十七

但中国人并不是蛮夷。当今世界真正的蛮夷是那乱臣、贼子、伦敦佬、资产阶级分子、市侩、追名逐利之徒、殖民政客、以及想把耶稣基督变成一个食肉动物的政客！海涅的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中国人的宗教：

我们愿在世间享福，  
而不是忍受贫苦；  
懒惰的肚皮不该挥霍  
那勤劳的双手得来的硕果。  
为了全人类的孩子们  
需要备下充足的面包，  
玫瑰与桃金娘，美丽和快活，  
还有同样多的甜豌豆。  
豌豆一种，  
人人享用！  
留给苍天一份

天使麻雀与供。<sup>①</sup>

### 三十八

最后，我希望能请求海因里希亲王，把下面这些话转达给他的皇兄与国主：

你对他说，  
应该尊重自己年轻时的理想，  
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就不要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将死之徒  
敞开心灵的大门。  
即使智慧与激情化归乌有，

① 原诗为德文：

Wir wollen auf Erden glücklich sein;  
Und wollen nicht mehr darben;  
Verschlemmen soll nicht der faule Bauch,  
Was fleissige Hände erwarben.  
Es wächst hienieden Brot genug  
Für alle Menschen Kinder,  
Auch Rosen u. Myrten, Schönheit u. Lust,  
Und Zuckererbsen nicht minder.  
Und Zuckererbsen für Jedermann,  
Sobald die Schoten platzen!  
Den himmel überlassen wir  
Den Engeln und den Spatzen.

即使天女遭到褻渎，  
也不应丧失理智，头脑发昏！<sup>①</sup>

### 三十九

在上世纪中叶，一个东方人、一个拯救了英国贵族和英国人民的犹太人成为了比康兹菲尔德勋爵。出于同一种族（指犹太人——译者）的另一个人海涅，试图拯救德国民族，但作为回报他被逐出德国，成为巴黎的“流浪儿”，最后精疲力尽，死在街头。海涅自称是一个 Ritter in dem Menschheit-Befreiung's kriege：为人类精神解放而战的骑士：

看着我，我的孩子，

---

① 原诗为德文：

Sagen Sie

Ihm, dass er für die träume seiner Jugend  
Soll Achtung tragen, wenn er Mann sein wird;  
Nicht öffnen soll dem tödtenden Insekte  
Gerühmter besserer Vernunft das Herz  
Der zarten Götterblume—dass er nicht  
Soll irre werden, wenn des Staubes Weisheit,  
Begeisterung, die Himmelstochter lästert!

吻我并勇敢地正视我；  
因为我就是这种  
神圣精神的骑士。<sup>①</sup>

---

① 原诗为德文：

Nun so schau mich an, mein kindchen,  
Küsse mich und schaue dreist;  
Denn ich selber bin ein solcher  
Ritter von dem heil'gen Geist.

##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 之四

(首次发表于1901年3月16日)

#### 箴言

胆怯乃是好人的不幸。<sup>①</sup>

——伏尔泰

孔子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

<sup>①</sup> 原文为法文：C'est le malheur des gens honnêtes qu'ils sont des lâches. 辜鸿铭在页末有英文译文。

二

如果说德国人是欧洲最为自私的人，那么法国人则肯定是欧洲最不自私的人。“无可挑剔和无所畏惧的勇士”<sup>①</sup>贝阿德；奥尔良少女贞德；那瓦尔的亨利、那个伟大的康迪（condé）；革命前的共和主义者夏洛特·科岱（Charlotte Corday），这些人都是法国人品格的象征。

三

德国是欧陆的苏格兰，法国是欧陆的爱尔兰。但英国的真正贵族都是法国人——法国的诺曼底人。那个“贵族与骑士的统帅”，亲手给临死的士兵递上水杯的普力浦·锡德尼爵士便有法国血统。莎士比亚在心底深处，在骨子里也是法国人。他嘲笑英国的伦敦佬，那些“无所不偷，将偷来之物说成是买来的”巴多夫（Bardolph），尼姆（Nym）和皮斯多尔（Pistol）——他们是吉卜林先生笔下汤米·阿德金斯（Tommy Atkins）的原型，是苏格兰低地人杰米（Jamy）船长的原型。

<sup>①</sup> 原文为法文“le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 四

如果说法国是欧洲最无私的民族，那么目前他们的处境之可怜，也是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所无法比拟的——也许葡萄牙人例外，他们刚刚与英国人结成了同盟！

#### 五

上海《字林西报》记者对巴黎市政当局上次举办的大型招待会，作过这样的描述：“大会要求客人们身着晚礼服出席——但见一个风姿尚佳的女士步履凝重地穿过金壁辉煌的大厅，她下穿呢绒黑裙，上套台面呢的羊驼毛罩衫，头戴绿绒无沿帽，帽上的羽饰已然变黑；一个年轻的男士此时也镇定自若地踱过大厅，他身穿棕色外衣，系着彩色领带，戴着黄色手套。当他们打开餐柜的时候，都大吃了一惊。除非去与人大吵一架，否则甭想吃到任何东西。偷走食物是某些客人的另一种癖好，他们的商业本能驱使他们总是尽可能将其不得不上交的税金捞回！”

#### 六

俾斯麦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西可以分成两个民族：巴黎人和外省人——后者乃是前者心甘情愿的苦役（freiwillige

Heloten)。现在的问题是解放问题，即把法兰西从巴黎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农民们不愿意再受巴黎人的残酷压迫了。”

## 七

但法国农民现在无能为力，成不了气候，因为他们缺少一个领头之人。法兰西民族现在甚至连一个“挂名国王”（roid'Yvetot）都没有，而是让一个良民卢贝（Loubet）、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典型的暴君”（modèle des potentats）去做总统，因为他懂得如何保持沉默。法兰西民族最后一个真正的、尽管不是完美无缺的领袖，已经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了。

## 八

比缺乏领袖还要糟糕的是，法兰西现在已没有公认的贵族。在当今法国，名义上的贵族是巴黎人，那“身穿棕色外衣、系着彩色领带，戴着黄色羊皮手套的年轻男士”。但巴黎人并不是绅士，他们是些资产阶级分子。福楼拜曾说：“我把资产阶级分子称之为思想卑鄙的人。”<sup>①</sup>

<sup>①</sup> 原文为法文：“J'appelle bourgeois tout homme qui pense bassement.”



## 九

俾斯麥對法蘭西民族下述的傲慢評論，無疑符合巴黎人的實際情況：“他們是一群無足輕重的人（eine nation von Nullen），是些不折不扣的群氓。他們有錢和漂亮的外表，但除了烏合之外，沒有個性，沒有獨立人格（Kein individueües Sellestgefühl）。”

## 十

偉大的拿破侖對梅特涅<sup>①</sup>說：“在法國，能人到處都是。但不過是些能人而已。它與品德毫不相干，甚至連原則也不講。人人都追求喝采，並不管喝采是來自上面還是下面；他們一心只想引人注目、嘩眾取寵。”

## 十一

既無德性，又不講原則，何來貴族？現在的法國已沒有貴族，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法國的農民、老百姓為了祖國甚至願意獻出生命，但那些官氣十足的法國官僚們、如果沒有報酬却

---

<sup>①</sup> 梅特涅（Metternich, 1773 - 1859）：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和首相、公爵。敵視自由主義和革命運動，與拿破侖有接觸，1848年革命爆發時被迫下台，亡命英國。

不愿为法兰西做任何事。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薪水。如果做官的法国人只满足于薪水，而不去贪婪地伸手捞巴拿马股票和其他油水，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 十二

保罗·波尔 (Paul Boel) 先生悲愤地说：“le gendarme fait la fête avec les voleurs：国家召唤警察，而警察们却与小偷打得火热。”从最近的一封电报中，我得知马赛当局已经没收了 40 件从北京为弗雷 (Frey) 将军抢来的“战利品”。

## 十三

法国的病源还在更深之处。马太·阿诺德先生曾就法国人崇拜淫荡女神“阿奢莱西娅”(Aselgeia) 讲过许多。但法兰西的真正弊根尚不在此。正如在寒冷的北方人们暴饮暴食一样，在气候温暖的南方，人们放纵肉欲达到“淫荡”的地步。附在法国人身上的真正“恶鬼”，那不仅在吞噬法国人肉体而且在吞噬法国人灵魂的真正“恶鬼”，是比淫荡女神阿奢莱西娅还要邪恶得多的女巫。

#### 十四

恶人啊，你们来自何方？  
我们来自地下；  
一半狐来一半狼，  
我们的准则如迷一般深藏。  
我们都是罗耀拉的子孙，  
你们知道我们为何惨遭流放，  
当我们归来之时，将把你们的嘴巴堵上！  
你们的后人会从我这儿吸取教训  
我们要生养  
不断地生养  
可爱的宝贝，可爱的儿郎。<sup>①</sup>

---

① 原文为法文：

Hommes noirs d'où sortez vous?  
Nous sortons de dessous terre;  
Moitié renards, moitié loups,  
Notre règle est un mystère.  
Nous sommes fils de Loyola,  
Vous savez pourquoi l'on nous exila.  
Nous rentrons, songez à vous taire!  
Et que vos enfants suivent nos leçons,  
C'est nous qui faisons  
Et qui refaisons  
Les jolis, petits, les jolis-garçons.

## 十五

两千多年以前，恺撒带着追随他的一群罗马人试图开化北欧人。但罗马人像今日的英国人一样傲慢，讲求实际而不爱思想。他们对实际的讲求已近乎迂腐，结果非但没有开化北欧人，反而威胁要把试图开化的民族统统毁灭。不仅如此，紧随其后的“伦敦佬”，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如果说没有给罗马人试图开化的那些民族带去“陷阱与鸦片”，起码带去了杂种劣质文明所具有的一切摧残生命的缺陷。

## 十六

于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上天不得不取消赋予讲求实际的罗马人的“天命”。再派一个谦恭温顺的仙女下凡，把开化北欧蛮人的“天命”托付给她。这位谦顺的仙女，便成为著名的“中世纪罗马天主教”。

## 十七

在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那位谦恭的仙女一心一意地养育并改造了欧洲那些未开化的、赤身露体的、蓬头垢面、浑身是毛的野蛮人。下面这首诗，就是对她所作所为的描绘：

我看见年轻的哈里头戴海狸皮帽出征，  
他双股套甲，全副武装，威风凛凛，  
像有羽翼的墨丘利<sup>①</sup>神从地面腾身而现，  
轻松自如地跃上马鞍，  
仿佛天使降自云天，  
掉转马头，让暴烈的柏伽索斯<sup>②</sup>略事喘息，  
以杰出的骑术感服天下，速化人间。

## 十八

完成了她的使命之后，这位谦恭温柔的仙女的灵魂便回到了天国。接着进入她依旧美丽、但已了无生气的躯体之内的，是一个傲慢、残忍、贪婪的邪恶女巫的灵魂。德国的马丁·路德最先对这个邪恶女巫的真正本质敲响了警钟。德语国家为了将这个邪恶女巫赶出国门，曾经苦战了三十年。

## 十九

在法国，那瓦尔的亨利，那个伟大的康迪及其胡格诺派教

---

① 墨丘利 (Mercury)：罗马神，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事务。

② 柏伽索斯 (Pegasus)：希腊神，有双翼的飞马。被其马蹄踩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

徒<sup>①</sup>，也开始斩杀邪恶女巫。但亨利心中那法国人的宽宏使他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当邪恶女巫承诺今后弃恶从善之后，他便与之达成了和解。

## 二十

然法兰西民族不得不为那瓦尔亨利的软弱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他竟然软弱到宽恕邪恶女巫的地步，从而使得法兰西民族只好去经受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谁要想了解邪恶女巫对法国旧式贵族或统治阶层的灵魂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可以去读菲力浦·埃格利特(Philip Egalité)和卡迪那尔·诺安(Cardinal Rohan)的回忆录，以及《钻石项链》(Diamond Necklace)的故事。

## 二十一

在拿破仑一世扑灭了革命并成为法兰西的主宰之后，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让新生的年轻的法兰西与重新光顾的老朽巫婆成亲。他蠢到同那瓦尔的亨利一样的程度，正如贝朗杰所唱：

竟然与其父就耶稣基督  
达成了荒唐可笑的和解！

<sup>①</sup> 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16至17世纪法国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

从那一刻开始，拿破仑的灵魂就变得粗俗卑鄙起来，并且不得不死在圣赫勒拿岛上。

一个罗马教皇为之加冕的人  
竟会死在那样一个地方。

## 二十二

煊赫一时的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也是邪恶女巫的魔杖支撑起来的迷人大厦。其必然结果，是它的最终坍塌及令人恐怖的巴黎公社的出现。

## 二十三

直截了当地说，此刻正吞噬法兰西民族的灵魂、吞噬法国受过教育阶层及其所有好人灵魂的东西，不是放纵肉欲或淫荡，而是耶稣会教义<sup>①</sup>。

## 二十四

有一天，一个中国男孩带了一大捆书回家。他的母亲对他

---

<sup>①</sup> 耶稣会教义 (Jesuitism)：这里指虚伪，阴险，狡诈，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精神。耶稣会，1534年成立，天主教会之一，反对宗教改革运动。

说：“我很高兴，你打算读这些书，而不再是成天去玩。”“不，娘，我可不想读这些东西，我是要让父亲去读，以便他能考取功名，好做大官。我自己并不想做高官，我只想做大官的儿子！”

## 二十五

令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中，竟然虔诚地希望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奇迹般的传播，并认为这样中华民族就可以变“乖”(Kwai)；成为友好列强的挚友，从而使欧洲摆脱“黄祸”。

## 二十六

赫德爵士虔诚的愿望所暴露的天真可笑与厚颜无耻，实在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要中国人都变成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教徒，随时准备把脸伸过去让人搨，戴上他们的斗篷，穿上他们的外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赫德爵士能够继续加倍地给他的海关官员发放薪水，不致中断其上海的海关职员们的周末舞会。而与此同时，陕西正在出售人肉！

## 二十七

我大惑不解的是，赫德爵士怎么没有想到把欧洲人从“黄



祸”中拯救出来，“鸦片”与基督教一样是最好的麻醉剂。无论怎么说，“鸦片瘾”的广泛传播比基督教的传播要简便易行、容易接受得多。

## 二十八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赫德爵士对中国人怀有好意，他在中国人当中生活了40年。正因为此，赫德爵士竟浑然不觉其虔诚愿望中令人发指的卑鄙和厚颜无耻，才越发使人感到奇怪。罗瓦利斯（Novalis）说：“当我们梦见做梦的时候，我们就快要醒了。”

## 二十九

赫德爵士曾提出两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一种是实行强硬的军国主义瓜分，一种是在中国奇迹般地传播基督教。我冒昧地提出第三种方案：公正合理！

## 三十

欧洲的富有阶层——被卡莱尔骂之为“养尊处优之辈”（Pampered unit）的人们——害怕正视正义的威严面孔——仿佛

正义就像美杜莎<sup>①</sup>之头，一旦被其目光触及，便会化为石头。英格兰人的“傲慢”，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自私”，使他们不去正视美杜莎威严的面孔。而法国人、爱尔兰人及所有像法国人一样宽宏的民族——一旦瞥见正义的威严面孔，就会想方设法以什么奇迹般地传播基督教的虔诚愿望来藏头盖脸。

### 三十一

英国主教巴特勒（Butler）说：“所谓事物就是它们的现存状态，其结果就是它们曾经有过的状态：我们为何要自欺欺人呢？”

### 三十二

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辜氏将“谄”翻作“盲目拜祭”——译者），见义不为，无勇也。”中国的“谄”字，字面意思是“谄媚”。孔子把“盲目拜祭”解释成受卑鄙动机驱使所行的拜祭。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谈起佛教徒时，仍说他们“媚佛”，即向佛献殷勤，阿谀奉承或巴结谄媚。

---

<sup>①</sup> 美杜莎（Medusa）：希腊女神，或译墨杜萨，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 三十三

真正的基督徒之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本性如此，是因为他热爱神圣的东西和基督教中一切可爱的东西。就像艺术家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真正的基督徒是为了基督教而爱基督教。乱臣基督徒之所以要入基督教，是因为他害怕地狱炼火。贼子基督徒之所以要入基督教，是因为他渴望进入天堂与天使们一道饮茶和吟唱圣歌。如今，真正的耶稣会士不太相信天堂、天使或地狱炼火，但却希望别人去相信这些东西——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而入基督教！这就是耶稣会士。

### 三十四

罗斯金说：“我不仅相信有地狱这样一个地方，我还知道它在何处；当人们认为离开了对地狱的恐惧、美德便无从谈起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入了地狱。”

### 三十五

在我看来，现代欧洲人的头脑可以分成两个隔离间，中间装有一个“滑动阀门”。当你在中国告诉一个英国佬生龙致雨时，那扇阀门便自动开启，他会当面嘲笑你。而当主教告诉他这是

贝拉姆<sup>①</sup>的驴子所说时——滑动阀门便会立即关闭，他会对此深信不疑。起初，人们还只是习惯于将这种阀门用于智力活动，现在已逐渐将其运用到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进行是非评判的道德方面。而且，将这扇方便的滑动阀门用于日常事务中的刺激和动力要强大得多——那就是利益的刺激、私利的驱动。

### 三十六

罗伯特·L. 史蒂文森 (Stevenson) 先生在他的奇妙小说《两面人》(Dr. Jekyll and Mr. Hyde) 里，对现代欧洲知识分子中的耶稣会士性格作过绝妙的描绘。

### 三十七

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者幸而免。”耶稣会教义对于人性的摧残及其必然结果，正如卡莱尔所言：“是广泛的苦难、叛乱和疯狂；是无套裤汉<sup>②</sup>暴动的狂热，和复辟暴政的冷酷；是千百万人沦为禽兽，和各式各样团体受到纵容的轻薄无聊之举；是不义之君以法律裁决不义的可怕景象！”

---

① 贝拉姆 (Balaam)；或译“巴兰”，基督教《圣经》中遭驴子责备的先知。

② 无套裤汉 (Sansculotte)；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阶级对激进的共和主义者的蔑称。

### 三十八

我之所以在这些札记中反复谈论耶稣会教义问题，是因为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灵魂正被其所吞噬，而且它就像麻疯病一样四处漫延，使当今世界的所有民族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英国的虚假帝国主义和吃人的德国殖民政策，不过是耶稣会教义与虚假民主杂交的产物。我把德国殖民政策称之为“怪异的巨兽”，一种可怕的野兽。现在，法国民族的这种耶稣会教义，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粘滑而使人麻木的、带有巨毒的吸血之蛇或爬行之虫。

### 三十九

在此，我确定中国目前事态的发端日期，乃是美国公使田贝<sup>①</sup>上校在北堂<sup>②</sup>开放之时用法文发表“一流”演说的那一天。田贝上校以及驻京的整个公使团都完全清楚，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目前的地位，是基于一条厚颜无耻的伪造条款——1860年

---

① 田贝 (Charles Denby, 1830—1904)：美国外交官，1885—1898年任驻华公使。陆军出身。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

② 北堂：北京著名的天主教堂。

《中法北京条约》中的一条伪造条款之上<sup>①</sup>。当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乞求圣灵保佑这一厚颜无耻的赝品时，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是向公使馆开枪射击！

昨日，头戴圣冠的  
主教大人  
对着圣灵如是说：  
“圣灵！请下来吧，”  
“不，”将要下来的圣灵道，  
“我不下来。”<sup>②</sup>

#### 四十

正如英国的犹太人比康兹菲尔德勋爵和德国犹太人海涅发现了他们本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什么一样，在法国，也是

---

① 在《中法北京条约》（又称《中法续增条约》——译者）的中文文本中有一条规定“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字样。但在法文文本中，这条连影子也看不到！此款乃是担任译员的天主教主教伪造的。——原注

② 原诗为法文：

Hier Monseigneur, le front Ceint

De sa mitre épiscopale

En ces mots a l'Esprit Saint

Parlait dans sa cathédrale;

\* \* \*

“Saint-Esprit! descends jusqu'en bas,”

“Non,” dit l'Esprit-Saint descends, “je ne descends pas.”

一个名叫甘必大<sup>①</sup>的犹太人发现了法兰西真正的弊病，他将其称之为“教权主义”(Clericalism)。如果甘必大活得更长一些，今日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 四十一

当路易·拿破仑派法国军队去保卫罗马的教皇宫殿时，法国的教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自甘必大时代以来，教权主义在法国的影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很强的势力。因为法国那些社会活动家们认为：“反教权主义与商品出口不相干。”<sup>②</sup>因此，尽管法国的军队没有再被派去保卫教皇，但法国人民却不得不缴纳税金，以便派人到中国去参与保护教皇的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战争。

为要给他的皇冠再次镀金，

我们又须缴纳沉重的税银！<sup>③</sup>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教权主义利用其国外布道团、作为进行投机买卖以维护自身在法兰西的

---

① 甘必大 (Leon Gambetta, 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曾领导共和派反对保皇派恢复帝制的阴谋，捍卫了第三共和国。1879—1881年任众议院议长。1881—1882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推行殖民政策，主张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

② 原文为法文：“l'anti-clericalism n'est pas un article d'exportation”。

③ 原文为法文：

Pour redorer son tiare

On nous surchargerait d'impôts!

特权之基础。耶稣会士们谈起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团时确实可以说：

四处奔走的传教士们，

乃是我们做生意的“旅行推销员”。<sup>①</sup>

法国政府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一下，看这些“旅行推销员”的生意做到何种程度，不用说其他肮脏生意，仅他们所从事的土地投机买卖一项，就已火红得了不得。除此之外，在中国，每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发一笔横财。因为每遭受一两银子的财产损失，他们就要中国政府赔偿白银 50 至 100 两。我不知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

## 四十二

我说过法国现在没有公认的贵族。但法国、现代法国还是有一种贵族。在现代法国，真正的贵族是那样一些文坛巨匠，从发誓要“消除无耻”的伏尔泰，到坦承“我忏悔”的左拉都是。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胆怯乃是好人的不幸！”今日法国需要有像伟大的丹东这样的人去呼喊：“勇敢！勇敢！再勇敢！”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法国出现了

① 原文为法文：

Les missionnaires sont tous.

Commis voyageurs trafficant pour nous.



未来的晨曦！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勇往直前吧，高卢和法兰西！<sup>①</sup>

---

① 原诗为法文：

Gai! gai! Serrons nos rangs,  
Espérance  
Ds la France!  
Gai! gai! Serrons nos rangs,  
En avant, Gaulois et France!

##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 之五

(首次发表于1901年5月25日)

#### 箴言

爱默生说：“我的英国朋友问我是否存在真正的美国人？那种具有美国思想的美国人？面对这种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我所想到的既不是各政党会议，也不是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内阁大臣，不是这样一些想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些具有最质朴最纯洁心灵的人们。我说：‘是的，肯定存在’，于是我谈开了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理。我说，确实，我从没有在哪个国家见到过人们有足够的勇气坚持这一真理，我非常清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勇气更能赢得我的尊重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滑膛枪崇拜者——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毫无疑问，不能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sup>①</sup>先生最近在离开上海回国之前说道：“我不担心中国人还会发动同样的暴乱。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这不是一个美国大臣、一个爱默生的同胞应该说的话。这是一个卑鄙的孤儿院女总监所说的话。她长期惨无人道地虐待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而当孩子们反抗时，又毫无人性地加以残酷的痛打，然后坐下来喝茶，并说什么：“这下小家伙们绝不敢再造次了。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

二

罗斯金说：“粗俗的本质在于麻木。”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的粗俗，不过是身心缺乏训练和未经开发的迟钝；而在真正的与生俱来的粗俗中，身心有如死一般的麻木，臻于极至，就变得残暴成性，无恶不作。

---

<sup>①</sup> 康格 (Conger, 1843—1907)：1898年继田贝为驻华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被围于东交民巷，使馆解围后奉召回国，以后的交涉由柔克义主持。《辛丑条约》签订后，又来华复任。1905年辞职回美。

### 三

但一般说来，美国人，还有俄国人，最不易陷入这种身心死一般的麻木之中。俄罗斯人——俄国的下层及士兵是残暴的——“你惹了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碰上了一个鞑靼人。”俄国军队最近在中国北方的暴行无疑骇人听闻。但这种残暴仍然是那种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的残暴。因此，俄罗斯人的残暴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德国人形象地称之为“Rohheit”（字面意思是：纯粹的粗鄙）的那一种残暴——那种“人面兽”<sup>①</sup>的阴森呆滞、庸俗粗野、冷酷无情、兽性十足和刻毒粗暴。

### 四

与俄罗斯人被认为残暴一样，美国人被认为粗俗。但美国人——美国受过糟糕教育的阶层明显的粗俗，一般说来，正是罗斯金所言的、身心未经训练与开发的迟钝那样一种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者的粗俗。相反，英国伦敦佬或欧洲资产阶级的粗俗，才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粗俗。

---

<sup>①</sup> “人面兽”(Yahoos)：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形兽，指人面兽心之人。

## 五

去年夏天，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向我解释了美国文明的简单结构。他说：“在美国，无论我们何时规划一座城镇，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所学校，一座教堂和一个法院。”学校代表人；教堂代表上帝；法院连同绞刑架代表魔鬼。人首先被送往学校看看是块什么料，如果可堪造就，就送往教堂使之成圣。如果不堪教化，就送到法院、送到绞刑架——交给魔鬼。

## 六

这就是质朴的美国小木屋文明。但现代美国人已经“进步”了。除了修建学校之外，他们还创办了报纸；除了建筑教堂之外，他们又发明了小型展览和称之为世界博览会的大型展览；除了法院之外，他们还建立了银行。因此，那些本该送往学校受教育的人，现在在阅读报纸、受其迷惑丧失了原有的教养。那些本该送往教堂虔诚修行、接受高尚教诲的人，现在却到大大小小的博览会去卑鄙地享乐、庸俗地消遣。最后，许许多多本该送往法庭，送往绞刑架下被绞死的人，现在却坐四轮马车到银行去提取利息和存款。

## 七

与此同时，那本该教年轻一代知书识礼的美国学校和学院，现在已变成地道的锻工车间，在那里，学生们被教以如何挣钱或人们常说的如何谋生的方法。其途径是掌握那些被称为现代技工艺术的粗俗不堪的手头把戏或被称为法律和神学的精巧的大脑把戏。在许多美国大学里，牙科学、手足病治疗或指甲修剪科学，被置于同柏拉图和维吉尔<sup>①</sup>一样的地位。

## 八

与此同时，美国的基督教会也变成了盗贼和懒汉们的救济所。募集和分发救济品原本是基督教会的真正职能之一。但现代美国教会募集救济品，不是为了发放而是留着自己享用。如果人们真遭到不幸，那么接受救济当然没有什么不义或不光彩之处。然而，如果人们实在没有遭受不幸，只是“敏锐”地发现吃救济乃是一条舒适简便的谋生之道，那么其不义之恶不言自明，由此他将陷入真正的不幸之中，当人们耻于接受施舍而不以盗用施舍物为耻之时，那么接受施舍岂不更加臭不可闻？！但必须公正地指出，今日欧美的基督教会并没有什么耻于为之之事，它甚至不以“传教士抢劫”为耻。假若现代美国教会真

<sup>①</sup> 维吉尔 (Virgil)：古罗马著名诗人。

有羞耻之念，它就不会振振有辞地写公开信给“异教徒”——日本的佛教徒，证明它有权向中国的饥民索取赔偿，在这些饥民家中，基督教会的代理人们帮着纵火，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以为食，以致陕西已经在出售人肉。这些赔偿和“劫来之物”自然不是用在教会或传教士本人身上，而是留给其可亲可爱的中国的皈依者们。他如此标榜，并不意味着他就真就关心那些穷人，而是因为他乃是一个小偷并且已经赃物满袋。

## 九

最后，在美国，那代表绞刑架的法庭，那本该把正出入银行的那些人送进去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避难所，一个为那些不成功的、内心坦然的人们准备的避难所。正如当代的罗斯金所言，这个避难所是为那些聪明绝顶、地位卑微、敏感有情、富于想象、仁至义尽、公正虔诚的人们准备的；比如像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en Poe) 或我曾在旅途中遇到过的那些只买得起散席船票，在珠江汽轮的甲板上抽着鸦片、能说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食不果腹的美国艺术家那样的人。简而言之，美国的法庭是专门为那些弱者和不幸者、为各大城市的街头妓女们准备的：

当爱神的热切祈祷消失之后，  
她那颗女性之心便不再存留。  
连天国的基督也宽恕的罪过，  
男人们却在诅咒不休！

十

在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Macbeth”）一剧中，麦克杜（Macduff）太太的儿子问她：何为奸贼？

麦克杜太太：噢，奸贼就是那种起假誓说假话的人。

儿子：所有这么做的人都是奸贼么？

麦克杜太太：凡是这么做的人都是奸贼，都该被绞死。

儿子：谁来绞死他们？

麦克杜太太：噢，那些诚实的人们。

儿子：如此看来，那些起誓说假话的人都是些傻瓜，他们人多势众，为何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诚实的人并把他们统统绞死呢？

然而现代美国的奸贼，那些说假话起假誓的人却并不是傻瓜。因此，按照宪法人人获得选举权的结果是：美国所有诚实善良的人都已被绞死或正面临被绞死的危险。

十一

在我看来，现代美国人实际上已经不配他们的先辈为其所制定的制度。正如中国人所言，“有治人，无治法”。无论如何，现代美国人在盲崇和迷信宪法条文的同时，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先辈、那些真正的、早期美国人的精神。对于此种精神，美国诗人写道：



这些养育我们的移民们，  
他们沐浴着阳光漂洋过海而来，  
为我发现了这块处女地，  
并恩赐给我们自由的土壤。

## 十二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美国人的本意，即“自由”的真正含义。它迥然有别于现代伦敦佬或坦慕尼协会<sup>①</sup>的自由概念。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中国人要说某个国家里没有自由的时候，他们便说“国无道”。这里表示“自由”的“道”字，字面意思是指“道路”，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定义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率性之谓道<sup>②</sup>。那个表示我们本性法则的“性”字（字面意思指本性），被定义为上天的命令或意志——天命之谓性。因此，表示“自由”的那个汉字，是指自由地去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即按上帝的意志办事。那些头沐阳光、飘洋过海、离开旧家园寻求新天地的移民们所缺少的自由，恰恰正是他们所表达的照上帝意志办事的自由。事实上，早期美国人希望留给他们后人自由土壤的那种自由，并非像坦

① 坦慕尼协会 (Tammany)：纽约市有实力的民主党组织。

② 语出《中庸》，或译为《“永恒秩序”之经》 (The Book of “Eternal Order”) ——原注

慕尼协会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由地追求庸俗，进行诈骗，无心无肝，残忍粗暴，而是像中国人所说的：率性以尽天命——“我自由地漫步，因为我追寻您的旨意。”

### 十三

但“自由”一词如今在美国，被另一个伟大的美国词“平等”夺去了光彩。的确，现代美国的“平等”概念，使得“自由”一词的真正含义无从得见。“自由”的真正意义是“你必须率性”，而现代美国的“平等”概念，意味着把人的头或脑抹平（抹煞智愚之别）。在一个国家，傻瓜和非傻瓜都是如此之多，现代美国的“平等”概念竟要求将非傻瓜的头脑与傻瓜扯平，以免傻瓜们的权利——他们的“平等”权利——那种与总统在白宫握手的权利被人剥夺！<sup>①</sup>

### 十四

不过，美国人和欧洲的法国人如此固执于“平等”一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反对“特权”的平等，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人在第一次大革命

---

<sup>①</sup> 我遗憾地看到有些日本兄弟已经沉醉于这种抹煞智愚差别的美国观念，他们希望废除或限制使用中文书法，因为在日本有人学不会中文书法和日文书法！——原注

期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不是指将国中最好之人变成与最坏之人一样糟的现代美国抹煞智愚差别的概念；也不是“士兵应当指挥将军，马应当驾驭车伕”<sup>①</sup>的法国人那种目无君上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是指敞开大门——开放门户。最正确意义上的平等意味着“扩展”(Expansion)。孔子说：“在真正有教养的人之中不存在种族之别。”<sup>②</sup>这就是“扩展”的真正含义。

## 十五

自由、平等和最深刻意义上的“扩展”——博爱，就是基督教的内涵或如中国人所说：一视同仁。因为心中拥有“博爱”一词，法国人德穆兰<sup>③</sup>在临上断头台之前仍诙谐地将自己比作“优秀的长套裤汉”耶稣。向康格夫人和其他公使夫人们说“中外一家，天下一家”的中国皇太后陛下，也是要告诉她们基督教的真实含义——那种最深刻意义上的“扩展”，对此，康格夫人及其丈夫知之甚少。正因为皇太后的呼吁于事无补，成为徒劳，中国的优秀长套裤汉“义和团民”才不得不奋而起事，同他们的法国兄弟在1789年所做的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淋淋的呼吁，呼吁应当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应当将其视为同一人类

① 原文为法文：les chevaux doivent mener le cocher。

② 有教无类，语出《论语》第15章。——原注

③ 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 1760—1794)：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新闻记者。后参加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专政时期，与丹东一起公开反对实行革命恐怖和普遍限价政策。1794年4月被处死。

中亲如一家的兄弟。

## 十六

现代民主和现代自由主义的伟大实践观念，那有别于现时代可以称之为欧洲文明观念，构成了美国制度的基础。这种观念就是爱默生所谓“美国思想”。人们曾问歌德什么样的统治方式他认为最好，他回答说：“那种使所有统治方式都成为多余的方式”。现代欧洲的统治观念，怎样使人民、使“民众”就身秩序的观念，是动用警察手中的警棍和军人手中的刺刀。而独特的美国统治观念，是借助学校和教会，使民众就身于秩序，从而免除“皮鞭”、警棍和刺刀。

## 十七

但美国人最初犯下一个错误，他们不知美国文明是基于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建立在美国宪法的基础之上。美国人坚持按照他们早期小木屋宪法的模子来建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借助学校之光去阅读宪法，其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是目前美国学校和教会的可怕状态。

## 十八

美国人如此迷恋他们的宪法，实在让人怜惜。斯特恩 (Sterne) 小说中的下士说，“在这个世界上，他绝不会继续前进，不会再给阁下带来荣誉。”托比 (Toby) 大叔说：“老天爷作证，他会继续前进的。”面对困惑，山姆大叔向律师求援。但一般说来，律师不宣告天理或上帝正义的法律，而只宣告依据于宪法的法律。人民、普通百姓当然不懂依据于宪法的深奥法律，于是，律师们便得以恣意妄为。简而言之，律师们根据宪法制订和解释深奥的法律，以使他们自己和任何能够付得起他们钱的人中意。

## 十九

由于对法律和宪法名目的尊重已经深深植根于其宗族的心灵，美国人民，美国普通民众曾一度对这种依据于宪法的深奥法律保持沉默。然而，尽管美国的平民百姓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很是糟糕，但仍然有人对其心中上帝正义的法律有所了解。因此他们时常发现，那依据于宪法的法律与上帝正义的简单法律正相违反。

于是，平民百姓只好动用“私刑”。但动用私刑是违反宪法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召来持有刺刀和警棍的军警，不得不增加军警的人数，以对付与日俱增的私刑律师。

## 二十

这样，起初从“美国思想”出发依赖学校和教堂的美国人，现在则仰仗警棍和刺刀，被迫采用欧洲思想，陷于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中，结果，美国只能变成另一个欧洲。

## 二十一

随后，美国的“律师”被送往国外去做外交官。他们在对待菲律宾人和与中国签订条约时，不是遵照上帝正义的法律行动，而是根据宪法的条文办事。这种宪法，他们出国之后加以扩充并称之为进步与文明的法则。然而拥有自己独特“救世主”的中国人发现，那种依据于宪法的法律、进步和文明意味着抢劫。而抢劫，尽管是富人抢穷人，强者抢弱者，但都明显违反了上帝正义的法律。正因此，中国人纷纷起来参加“义和团”并动用“私刑”——由此人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眼下这场可怜而又可叹的悲剧中所起到的恶劣作用，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支持、援助并最终采纳了其欧洲同伙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的情景。

## 二十二

于是我们发现，现代“律师”是产生现代“警察”的真正和直接的原因，是现代欧洲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的代表。现代“律师”乃是假教士，正如现代警察乃是假军人一样。事实上，最初正是这种假教士，首先带来了欧洲的军国主义或滑膛枪崇拜。在中世纪的欧洲，拥有虔诚、正直教士的真正教会毋需武装人员便能使国内百姓安居乐业。那武装人员、真正的军人，则被用于保卫英格兰和苏格兰（或威尔士）的边境，以防止游牧民族即蛮夷的入侵，事实上，也就是制服夷人的野蛮。而当教会变成假教会，教士变成不诚实的教士时，国内的人民、那平民百姓就再也无法保持秩序了。因此，另一种被称之为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人员——古斯塔夫（Gustavus），克伦威尔，腓特烈——不得不出来维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等待那些名副其实的教士的到来——公理通行之前，只好依靠强权。

## 二十三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真正的教士，而是律师。他们一来就开始建立称之为“宪法”的新教会。这些律师不是减轻武装人员维持和平与秩序的任务，以减轻人民为养活这些武装人员所承受的负担，而是宣告需要更多的武装人员，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并捍卫宪法

——这种宪法意味着财产权，意味着律师以及为律师付酬的富人的财产权。于是，武装人员发展成为现代“警察”，这种警察不是勇士，骑士或真正意义上的武士，而是“士兵”，一个佣工和雇佣者，一个战斗者，一种原始意义上的武士，即律师、富人、外交官及资本家豢养的走狗。他们被雇佣来不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是保护财产、保护铁路旁轨辛迪加<sup>①</sup>和鸦片仓库。这就是冒牌帝国主义或殖民政策的根源，是欧洲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的最新发展。

#### 二十四

剑或相当于剑的刺刀并非是粗俗或卑鄙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男子气概至上至圣的象征。武装人员或佩剑之人非但不粗俗卑鄙，而且是一切真正的高雅、礼貌、有教养——即文明真正含义的本源——在欧洲是这样，在所有国家也莫不如此。但那些可怜的漫不经心的现代乞丐，那些土黄色机关里带有巧克力糖盒和机械枪的人们已经变得粗俗卑鄙了，他们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他们有些乞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领薪水的警察。那佩戴肩章的现代庞大的自动机器，也已经变得粗俗卑鄙起来，因为他像自己唯一崇拜的东西——机械枪一样，成为一个既无道德感情又无道德责任的自动机器。正是这样的人进驻到北京指手划脚，侮辱中国的皇太后，让其同胞、那些可怜的传教士，在饥饿或抢劫之间做出残酷的选择。

<sup>①</sup> 辛迪加：一种企业联合组织。



## 二十五

的确，任何认识到现代欧洲的“军人”实在已变成地地道道的“警察”的人，都不会对八国联军在中国华北的所作所为感到奇怪。法国人马蒙太尔（Marmontel）说：普通士兵常受低劣战利品的诱惑，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为了糊口会冒死亡之险。然而一旦让他们领取固定工资，他们就成了奴隶。其实，荣誉就意味着利益，因为荣誉、称号、声望这类东西就等于是薪水；谁够资格，就应给予谁——这就是一切军人道德（武士道）的基础<sup>①</sup>。

## 二十六

那些真想改革英国军队的装模作样的英国政治家，首先应该使英国官员“非职业化”，将其塑造成君子，而不是变成“德国造的”纯粹冒牌的自动机器。英国“绅士”即便是在体育比赛中，也往往不愿承认自己是“职业选手”，在那可怕的战争竞赛中就更是如此了。

---

<sup>①</sup> 语出马蒙太尔的小说《Béliasaire》。在这里，我冒昧地建议懂法语的日本王储陛下应该读此书，有可能的话，令人将其译成日文。——原注

## 二十七

在中世纪的法国那个产生过欧洲最纯粹军人的国度里，一个人要想得到晋升或荣获骑士称号，必须通过下列严格的考核：考官会问他：“你进骑士团图什么？如果图的是财富、安逸和荣耀而不是为骑士这个称号增添光彩，那么你就不配享有这个称号。把这个称号授与你，与授与高级教士团中的那些盗卖圣职的神职人员（假教士、律师、书记员或为了谋生而甘当这类角色的人）完全没有两样。”如果考试合格，那个考官，他的上司会对他说：“我以上帝的名誉，以圣·马歇尔和圣·乔治的名义，授予你骑士称号：希望你勇敢、坚毅和忠诚！”

## 二十八

这就是武士道，骑士品质或欧洲真正的尚武精神，它与那现代自动机器，警察或庸俗卑鄙的滑膛枪崇拜迥然不同。事实上，不论在欧洲、日本、还是中国，一切军人道德或武士道的基础，一切真正的尚武精神的基础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消灭蛮夷及其野蛮作风，崇尚高贵与真正的君王风度，扫除人类自

身的卑鄙与低级趣味，用汉语说，就是“尊王攘夷”<sup>①</sup>，丁尼生<sup>②</sup>用欧洲语言解释了这几个汉字的意思，他让亚瑟王的全体圆桌骑士们宣誓：

敬国王仿佛国王是其良心  
良心就是其国王  
打倒异教徒，捍卫救世主！

## 二十九

美国人现在不相信“君王风度”，他们信仰自由与无君；法国人现在信仰自由、无君和无基督。但中国人相信没有君主便没有自由。中国人的君主观念是——英雄崇拜（尊贤）。汉语里孔子所用的相当于卡莱尔所谓“英雄”一词的那个词，理雅各<sup>③</sup>

---

① “尊王攘夷”：这里的“夷”（heathen）字，在条约中已被禁止使用。它一般被错误地译成“barbarian”。“尊王攘夷”四字，1860年曾被日本爱国者用作他们的口号。这些日本爱国者被那些进步的无可挑剔的外交官们称之为“夷”（Jo-i's），并被当作“反动分子”受到追捕。1900年“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扶助清朝、打倒洋人），是这四个字的意译。——原注

②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1850年发表诗集《悼念》，得到女王赏识，被封为“桂冠诗人”，作品格律严谨，声调和谐，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③ 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1839年启程来华，1840年到马六甲，出任英华书院院长。奠定他汉学地位的，是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系列，在25年内陆续出齐。这些翻译以严谨著称，不少至今仍受到推崇。1875年，牛津大学特别为他设汉文讲座，一直任教至死。除翻译中国经典外，他的著作还有《孔子的生平及其学说》、《孟子的生平及其学说》、《中国的宗教》等。

译作“Superior man”（君子），字面意思是一个小君或小王——“koen-tzu”（现代官话拼成 Chüntzu），如同德语里的“koen-ig”，英语中的“king”。

### 三十

现代美国人信仰无王之政，这比法国人现在相信没有基督更不足为奇。当今全欧洲，恐怕除了俄国之外，实在已没有君主。海涅指出：“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实在是对贯彻现代自由观念的专政。”在除俄国之外的欧美所有其他国家，“君王”纯粹成为律师的宪政的廉价点缀，正如“基督”已完全变成基督教教士供奉在教堂的“偶像”一样。

### 三十一

现代基督教教士发现，如今许多人已经不在乎他的“偶像”或冒牌基督了。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谋生计，改行当了律师或新闻记者，事实上成为了政客。来到中国的典型的基督教教士，他们对国内的某些人谈“偶像”以得到捐赠；而对另一些人则谈“爱国主义和祖国的荣誉”，以得到那些鼓吹侵略主义的报刊的支持而不是受到责难。可到中国之后，他们又对中国的达官们大谈什么“进步与文明”，认为这样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里为中国人谋福利，其途径是当上某些总督的法律顾问，乃至于是接替罗伯特·赫德先生！

### 三十二

另一方面，“律师”将“君主”与宪政卫兵之类粘合物粘在一起，或者迎合人们的口味处置其君，就像面包师在他的圣诞面包上装饰人物头像一样。如果人们喜欢一个“君主”，律师就把的圣诞蛋糕称之为“有限君主（制）”或“立宪君主（制）”，如果人们对这种装饰并不在乎，他就径直将其称为“共和制”。但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其结果都一样，吃蛋糕的都是律师和付给他酬金的富人。

### 三十三

然而在我看来，显而易见，那最终将吞噬欧美的教士、律师、宪法、教会及上述蛋糕之类的东西，是那既无道德情感又无道德责任，而只是病态地渴望报上扬名、臭名昭著，对痛楚和灾难麻木不仁，对昂贵的机械枪却贪得无厌的现代庞大的自动机器。事实上，正是这个威胁道要将欧洲的律师及其蛋糕一并吞掉的庞大机器，驱使着现在国内那些精神错乱的律师，为供养这个怪物，将其庸俗卑鄙的滑膛枪崇拜带到国外，并称之为帝国主义或殖民政策。

### 三十四

正是这部新式自动机器毁灭了古罗马帝国。正是这种携之国外，被称为帝国主义的庸俗卑鄙的武器崇拜，导致了古罗马人灵魂与肉体死一般的麻木，使他们变得残暴成性，无恶不作，并最终招致了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在现代罗马人中，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这种毁灭帝国的恶疾，这种灵魂和肉体死一般麻木的极其严重的症状已经显露出来，这种症状首先表现为漫不经心，然后表现为，在所有精神运动面前缺乏思想能力，极度的无能与束手无策。加之上层和较上层人士傲慢的、绝弃生命的愚蠢举动，以及下层对于消遣、娱乐和下流刺激所表现出的令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狂热情欲。

### 三十五

假如我是美国人，即使有人将大清帝国，将整个亚洲大陆，包括菲律宾在内作为免费礼物赠送给我，我也不会要。哪怕整个大陆均由黄金构成，要是接受这样一个礼物又无法把它带走，那就比我的同胞染上欧洲瘟疫、染上我在本文一开篇就提到过的那种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不易感染上的、肉体与灵魂死一般麻木的恶疾还要糟。因为常言说得好：“如果他得到了整个世界而丧失了自我，那么他还是毫无所得”，这句话对于民族国家也同样适用。

### 三十六

总而言之，现代欧洲的尚武精神如今已成为虚假的尚武精神，因为“军人”在欧洲已变成警察。之所以说警察是一个假军人，是因为他作为武装人员的目的只是为了谋生，因而成为领工资或被雇佣的奴仆，成为一名不仅拿固定薪水，而且离不开薪水的“专职人员”，而不是一名不取酬报的绅士，无论这种报酬是金钱、声望还是新闻臭名，形式不限。其次，警察之所以成为假军人，是因为他不是被雇佣来保护和高扬人的高贵品德，控制和压服人的卑下之念，铲除和消灭粗野之气，而是用来保护财产权。最后，警察之所以变成可怕的假军人，乃是由于他已像他的机械枪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的自动机器，他“并未给骑士称号增添光彩”，仅仅是练就了一付“敲诈勒索他人的本领”，实际上他只崇拜他的机械枪！

### 三十七

产生现代警察的真正的和直接的原因，是现代律师。正如警察乃是一名假军人一样，律师则是一位假教士。当古罗马天主教神父不再宣讲上帝的法律，而是宣讲其教会的法律时，他便成了一名假神父。当后来的新教牧师不再宣讲上帝的法律，而是宣讲其《圣经》的法律并声言他对《圣经》的解释绝对正确时，他就成了一个假牧师。现代律师之所以是假教士，是因为

他制定和颁布的不是上帝正义的法律，而是依据于其自身宪法的法律。

### 三十八

真正的教会如今并不是基督教教士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如今是、而且始终是宣讲上帝真正的法律或意志的教会。真正的国家或政体如今并不是现代律师的宪政，真正的国家如今是、而且始终是制定和颁布真正的上帝正义法律的国家。但何为上帝真正的法律？何为上帝正义的真正法律？中国人说“天命之谓性”（上帝的命令或意志是我们本性的法则），因此“性”（我们本性的法则）便是上帝唯一真正的法律。然而这“性”，并不是指一般市井小民之“性”，或是卑鄙下流者之“性”。这里的“性”，正如爱默生所言，是世上“至纯至朴者”之“性”。它如今是而且始终是上帝唯一真正的法律。那代表至纯至朴者的教士或律师，才是真正的教士、真正的律师或政治家。那愿意并能够接受世界各国至纯至朴者的智慧、愿望和抱负的影响与指导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简而言之，真正的教会，今日那真正实在的天主教教会，尽管还没有正式成立，但它必将由世界各民族中所有最有教养之人，所有至纯至朴者所组成。这就是“扩展”的含义。“在真正的有教养者之中，是不存在种族之别的”——有教无类。



### 三十九

我在这些札记的开头曾谈到粗俗。卑鄙下流者的突出标志就是粗俗。相反，单纯朴质之人的确切标志则是彬彬有礼、高雅脱俗。在此，我将举出两个例子，一种是真正的骨子里的粗俗，另一种则是真正的礼貌，那种发自内心的礼貌。

去年夏天，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发给上海各报的电文这样描述华北的可怕景象：“天津，七月十五日电：街头上躺着成千上万具尸首，死尸在阳光的照射下发着惨人的光。城内大部分地区还在燃烧。夜幕降临时，熊熊的火焰将郊野上空映得一片血红。”然而，面对这一电文及成千上万具仍盯着他们面孔的尸首，上海租界的外国侨民竟张灯结彩，举着火把骑自行车游行，以庆贺北京的陷落和公使馆解围！在上次美西战争期间的一次海战中，一艘美国军舰以其惊人的发射技术宣告了自己的胜利。当迅捷、不断而准确的炮弹致命地击中一艘西班牙舰艇的时候，美国军舰甲板上的士兵们目睹自己精彩的射击表演激动万分，他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但这时，站在甲板上、暴露在西班牙人枪口之下——而不像上海那帮外国侨民藏在彩柱后面的美军舰长，却平静地对下属们说：“不要喊叫，小伙子们，可怜的魔鬼们快要死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礼貌、那种发自内心的礼貌，它构成一切军人道德或武士道的基础，也表明美国这个民族仍然是健康的，尽管人们可以在当今美国看到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东西。

## 四十

罗斯金说：“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军人都要比商人更重荣誉。因为军人的职业不是杀人，而是被杀。”日本伟大的军人和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sup>①</sup>——那个曾手持利剑将“残忍的恶魔”赶出封建的日本，并创立了爱德温·阿诺尔德（Edwin Arnold）爵士所说的那个实实在在、优美动人、彬彬有礼、充满艺术情调的日本的人，临死之前，他躺在床上，派人叫来他的孙子德川荣光，并对他说：“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于慈”<sup>②</sup>（这个“慈”字就是拉丁文“alma”，或基督教《圣经》中所言的“mercy”和“loving-kindness”）。

## 跋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文里的“乱臣”，我译作“the sneak”（鬼鬼祟祟，暗中生乱之人），而一般均译成“a traitorous minister”（叛乱之臣）这个词的本意是指一个无法无天、惹事生乱的臣子和官员，或者如卡莱尔所言的

① 德川家康（1542—1616）：日本江户幕府的创建者。1590年随丰臣秀吉灭北条氏，领有关东八州，筑江户城。为丰臣氏“五大老”之首。秀吉死，辅秀赖。1600年打败秀赖一派，掌握全国大权。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开幕府于江户。1615年灭丰臣氏，次年病死。

② 日本《外史》卷22。——原注

“不守法的生乱之人” (an anarchic person), 他之生乱, 并不一定出自冥顽不化的私念, 而是由于其内心混乱的状态, 由于现代“走狗人生观和坦诚之伪”的混合物的促化。这些东西使他背叛了本性中的君王风度, 背叛了他的君王、人民与国家。事实上, 他给人们带来的不是秩序、和平与亲善, 而是乱世。中文里的“贼子”一词, 我翻作“the cad” (举止粗俗、行为不端的无赖), 而一般译为“robber” (盗贼), 或“son of a thief” (窃贼之子)。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指一个麻木不仁、无情无义, 但破坏性不大的人<sup>①</sup>。罗斯金说: “与上帝的力量相对抗的东西或力量, 那称之为‘钱财’的‘首敌’, 始终可以从如下两种魔鬼的功能中简单地分辨出来: 那就是‘欺骗之主’ (Lord of Lies) 和‘灾难之主’ (Lord of Pain)。”如今, 拥有假律师、假政客或外交家以及骗人报纸的欧美现代政治或外交, 就是“欺骗之主”的化身“乱臣”。拥有假军人的自动机器警察及其机械枪的现代军国主义, 就是“灾难之主”的化身“贼子”。法国大革命期间, 一个激情冲动的人高喊: “我要求把乱臣和贼子们抓起来”。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erudimini, qui judicatis terram (且听着, 统治者们, 请明察: 决定世界事务的人, 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

<sup>①</sup> “贼”字用作动词时, 是指存心的、残忍的伤害。所谓“害也”。——原注

#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sup>①</sup> 或 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

## 箴言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任务是什么？  
是解放，不仅是爱尔兰人民的解放，希腊人的解放，  
或其他国家人民的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解放，  
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欧洲人的解放。<sup>②</sup>

——海涅《旅游印象》

毫无疑问，对于许多人来说，所谓的远东问题无非是指中华帝国的最近前景。但人们只要对此稍为认真地加以思考，就不能不注意到问题并未就此完结。因为在贸易和金融的纯经济

---

① 无政府状态 (Anarchy)：不少学者将此词译作“混乱”，亦可。

② 原文为德文：

Was ist aber die grosse aufgabe unserer Zeit?

Es ist die Emancipation, nicht bloss die der Irländer,

Griechen, &c., Sondern es ist die Emancipation der ganzen

Welt, absonderlich Europa's, das mündig geworden ist.

问题、以及因国际物质利益纠纷而引起的和平与战争的政治问题上，远东问题里还涉及到一个道德的问题，一个比中华帝国的政治前途更为严峻亦或更为现实的大难题。

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法兰西的克勒芒（Clermont）举行的第二次宗教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sup>①</sup>）亲自向广大民众发表过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人们那被抑压的情感骤然爆发，同时听众中升起‘Deus Vult’（上帝之意）的呐喊。”而今在我们看来，那些民众的感情似乎很难叫人理解。确实，当我们今天以本世纪眼光去看待他们当时所施行的愚蠢的、宗教的和狭隘的政治计划时，十字军东征对于那些一心想去践踏东方民族的欧洲人，显然是场劳命伤财、昏愦糊涂的事业。然而，当我们去研究欧洲民族的理性与道德发展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那十字军东征尽管是一场出于自愿和头脑昏愦的狂热与贪婪的远征，但其对于人类种族文明的完善无疑仍具有严肃的道德动机和道德作用。在那一行动上，看起来顽固贪婪，但确实含有“上帝之意”。因为我们知道，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首先便意味着打碎当时欧洲的拘谨古板的寺院文明。十字军东征之后，在欧洲赢来了马丁·路德及其新教改革。所以基佐<sup>②</sup>先生在他的《文明史》一书中指出：

---

① 乌尔班二世（Urban II，约1042—1099），罗马教皇（1088—1099在位）。为扩张教权，与德皇亨利四世、法王腓力一世相争。1088—1089年企图使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听命于教皇，无结果。1095年召开克勒芒会议，煽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② 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总理。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被迫去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试图以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著有《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等。这里提到的《文明史》，应指《欧洲文明史》一书。

“十字军东征的最终结果，是通向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迈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欧洲各民族目前在远东的行径，这在德国被叫做“Kolonial Politik”（殖民政策）——谁都不怀疑这十九世纪的现代远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大体不过是一场贪求物质利益并着眼于贸易目的的自私行动，但其对于人类种族文明的完善，也还是有一个道德的动机和道德作用的。当德国皇帝在基尔（Kiel）庄严宣告“上帝之意”寄于现代远征的时候，那种场面和他那陌生的中世纪语言，使人非常奇妙地想起1095年在法国克勒芒的情景。谁知道这场称之为“殖民政策”的现代远征之最后结果，不会像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的基督教一样，即使不完全改变现代欧洲文明与社会结构，也会使其在修正中结束呢？正是这一思想，而不是什么黄种人将来可能入侵的观念，激起了这位显然是中世纪欧洲最后的一位皇帝，去绘制了他那幅“黄祸”的著名图画<sup>①</sup>。

不过确实，对于任何不辞辛苦去研究远东民族的道德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人来说，黄种文明本身如何会对欧洲人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实在让人难以思议。欧洲人，尤其是那些讲求实惠的英国人，他们习惯把现代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生活水平”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或文明的标准，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东方民族的实际生活无疑是十分低劣和难如人意的。然而，生活水平本身却并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尺。在今天的美国，生

<sup>①</sup>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黄祸图》。他画的是一幅草图，后来再由一位德国名画家加工而成。图中的意思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白人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来自他们的入侵。辜鸿铭对“黄祸论”的驳斥，是近代中国人中最早的。但他对德皇绘制《黄祸图》动机的解释，却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并不符合事实。

活水平比在德国要高得多。可尽管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会认为某所德国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简单和相对低下，因此要怀疑教育在该大学的价值，但我相信，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游历了这两个国家之后，会承认德国人不如美国人文明。

实际上，生活水平完全可以作为文明的“条件”来考虑，它却不是文明本身。举一个物理现象来说明。热在一个动物体内是生命和健康的条件，但是动物体内的温度本身却并非是衡量其内部结构组织完好或粗劣的真正与绝对的标准。一个结构组织真正完好的动物躯体会因某种反常原因而变得很冷。同样，某一民族的生活水平也可能由于某种经济原因而变得十分低下，但它本身却不是该民族道德文化或文明的证据。爱尔兰的土豆欠收和大不列颠长期持续的贸易萧条，可能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人们却不能由此判断说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已经变得不怎么文明。

然而假如单纯的生活水平不是文明——那么什么又是文明呢？欲解释全世界各国的文明就有如对单个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教育那样，实在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过，我倒是可以通过一具体事例来阐述我对文明的理解。1816年英国皇家海军巴兹尔·霍尔（Basil Hall）上尉访问朝鲜时，有一位年老的朝鲜下级官吏曾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他那种彬彬有礼和悠然自在，实在令人欣羨。考虑到迄今为止他很可能连我们的生存方式也一无所知时，却能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这种得体有礼的风度，仅此似乎已表明、而毋需别的情形来证实：他不仅已进入到社会上层，而且已达到其所在社会的文明的高度。实际上，让人感到奇妙的是，在不同的国家，无论社会状况可能存在多大的差异，其礼貌都是大体相同

的。这种优良品性在那位朝鲜官员身上便得了极好的证实。当他乐于我们请他干什么、和无论我们对什么事情似乎表示关切的时候，他便立即怀有兴趣。他十分好问，一旦发现任何起初使他感到过迷惑的事物的用途时，总是高度地满足。但他并不一下子过分地表示赞赏之情。他肯定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教养好、观察敏锐的人。”

我所谓的文明就是如此。一切能够产生像霍尔上尉上面所描述的这样一种样子的人的社会，便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如果说以上解释说明了在远东民族的文明里有教养者或社会上层的典型特征，那么已故麦嘉温（Macgowan）<sup>①</sup> 博士下面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则可说明那种文明对于下层民众的影响。

麦嘉温博士说：“在前面所述中国人的工商业生活中，可以注意到这个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他们的结合能力。这种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他们来说，由于生来崇尚权威和恪守法纪的天性，组织与联合行动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驯良不同于那种精神崩裂遭致阉割的民族，而是由于其自我管束的习惯，和地方性、公共或市政事务中长期听任其‘自治’（Self-government）的结果；可以说他们的国家，立于人人自治自立之上。倘若这些人中最贫穷可怜、最不文明的部分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孤岛之上，他们也会像在原来地区生活、受过理性民主熏陶的人们那样，很快便将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

<sup>①</sup> 麦嘉温（John Macgowan, ? - 1922）：英国伦敦会在华传教士，近代汉学家。1860年来华，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曾著有《近代中国的人和生活方式》、《中华帝国史》等书，对中国人的自治能力甚为欣赏。



从以上对远东民族文明的说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文明本身不可能对欧洲民族构成潜在威胁。然而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并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之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任何一个有兴趣研究欧洲现代制度之精神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最近一百年来，在通常所谓“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欧洲一直滋长着一种新的道德文化意识，和一种大异于那可称作古代中世纪文化与秩序的新社会秩序观念。在本世纪末，即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个名叫杜·克罗斯 (Du Clos) 的法国人曾说：“Il y a un germe de raison qui commence à se développer en France (在法国，有一种理性的胚芽正开始滋长)。”无疑，一般认为，严格说来，今日所谓的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和概念都是由本世纪法国哲学作家们第一次真正认识并传播开去的。但值得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知道也估计不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它对杜·克罗斯所谓的“理性胚芽”的兴起没起什么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发展与传播是起过促进作用的。众所周知，那种“理性胚芽”最终发展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它在本世纪带来了欧洲中世纪制度的“culbute général”（全面解体）或彻底崩溃。

这对上帝神灵真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在此，我不禁要指出，

那些来到中国，要使异教的中国人皈依其宗教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他们应当使自己成为给欧洲传播中国文明思想的工具。因为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思想，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

我已经绕了一个大弯子——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文章的主题上来。这种文明的冲突，或更确切地说这种现代自由主义和古代中世纪主义的冲突，就是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它不是黄种人同白种人之间的冲突，而倒是部分欧洲人为将自己完全从古代中世纪文明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一句话，它是今天德国人所说的“Kulturkampf”（文化之争）。

欧洲中世纪道德文化起源于基督教《圣经》。基督教《圣经》作为歌德所说的一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典籍，有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巨著，它永远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正如马太·阿诺德先生所说，《旧约》道德之崇高，耶稣基督个性之魅力，以及《新约》中其教义的明了简朴——所有这些，可以说都已深入到欧洲出产的最好人型（best types of humanity）的骨髓之中。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歌德的“世界文学”能够发生影响的人们来说，它将始终保持永恒的力量和价值。当然，这一力量和价值并不伴随着那些普通的人。因为一般欧洲人，要想充分地感受到基督教《圣经》的力量，就必须得和撰写《圣经》之人处于同等的理智状态。但我想，现在一般都会承认，杜·克罗斯所说的“理性胚芽”已极大地改变了一般欧洲人的理智状况。对于这样一些普通人，基督教《圣经》纵或不是全然晦涩难懂，也是难以理解的。而其结果，势必是《圣经》不再

能成为真正的道德文化的源泉。在伦敦一校务会议上，已故教授赫胥黎<sup>①</sup>曾说：如果这些（不列颠的）岛屿上完全没什么宗教；那么借助于《圣经》去传播宗教的思想，也是不可能渗入人们的心灵的。

总而言之，我们相信现代自由主义的真正道德文化，如果不那么严格，恐怕是一种比来源于基督教《圣经》的欧洲中世纪文化更为博大的文化。一方面，过去的道德文化在人一般主要依赖于希冀或敬畏的情绪，而另一方面，新的道德文化则依赖于人性的整个理智力量：求助于他的理性和情感。在旧的文化中，那种关于人性的理论是“性本恶”（人生来就处在原罪中），即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坏的。可现代道德文化的理论则认为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好的（“性本善”），而且如果它得到适度的发展并求助于它自身，在世界上就会产生健全的德性和社会秩序。旧文化的方法起于“敬畏上帝乃智慧之发端”，现代文化教育方法则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起源于基督教《圣经》的古代文化的语言是象征性语言，即形象、符号、隐喻性的语言。现代道德文化的语言则是具体实在的语言，即科学语言。一种语言是这样说：“对于他，正确地使其交谈有条不紊会显示出上帝的恩赐。”而用另一种语言说则为：“要想治国，必先齐家，要想齐家，必先修身。”

以上，便是我从人性理论、教育方法和语言上，对古代中世纪道德文化与我们称之为的欧洲现代道德文化之间不同点的一个概述。我相信，欧洲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化，对于人们的生

---

<sup>①</sup> 赫胥黎（Huxley, 1825—1895）：英国杰出的生物学家，主张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系统的普及者。

活以及他们的社会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将是不同的。古代道德文化使得人们对权力和权威盲目和消极的服从。现代道德文化的影响即如麦嘉温博士谈及中国人的特征所说的那样：“国民自治自赖乃有国。”欧洲中世纪道德文化的结果，用一句话来说，是封建统治。而自由主义旗号下的现代道德文化的结果，则将是麦嘉温博士所说的“理性民主”，即自由制度的统治。

当今，欧洲作家习惯谈论基督教文明是比远东人民的儒家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其实这两种文明的目标无疑是相同的，即保证人们道德的健全和在世界上维持国民秩序。但如果我所讲的欧洲古代和现代的道德文化是不错的话，那么我想就必须承认，尽管建立在一个依赖于希冀和敬畏之情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的文明或许是个极其强大甚至更为严格些的文明，但可以肯定，建立在一个依赖于人的平静的理性基础之上的道德文化，纵使不是一个较高层次的，也是个极其博大的文明。这一文明人们更难达到，而一旦实现，就将会永恒持久，不衰不灭。

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一部分欧洲人而言，获得新的道德文化确实很不容易，而且黄种人文明，不仅对于现在的欧洲民族，就是对于人类的命运与文明也不是真正的威胁。欧洲民众，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对使用暴力丧失了理性，且崇尚他们古代的中世纪道德文化，由于没有充分获得现代的新道德文化并用它去作为保持国民秩序的一种约束力量，所以而今其维持治安，在根本上不是通过道德力，而是靠警察或称为“军国主义”的纯粹外在力量。卡莱尔说：“现代的欧洲各国是无政府状态加上一个警察。”一位法国作家说得更妙：“C'est 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然而在现代欧洲，维持这种规模巨大的军国主义的无数必

要开支对于人们的经济健康来说，正起着一种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在我看来，欧洲人民要想逃脱这种毁灭的厄运，只有两条路摆在面前：要么是为获得新的现代文化去奋力抗争，要么就回归到中世纪的信仰上去。但回归到中世纪信仰上去，欧洲人民是决不会愿意的。伟大的俾斯麦公爵说过：“wir gehen nicht nach Canosaa”（我们绝不回到卡诺莎<sup>①</sup>去）。况且，欧洲人民纵或愿意，现在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真正的中世纪信仰上去了。如果他们试图回归，那么就只可能出现基督教救世军那样的劳命伤财或耶稣会教皇至上主义的骗子。

现在，如果有人想知道一种什么样的毁灭文明、毁灭一切道德文化的力量，以及基督教救世军那种浪费有一天会出现在欧洲，那么他应该读读中国太平天国暴动的历史。那次暴乱中的中国基督教徒们，抛弃了他们本民族的仰赖理性的道德文化，而退回到依赖于民众心中希冀与敬畏情绪的中世纪欧洲的道德文化上去，其结果是践踏了各省，屠戮了百万生灵。

至于耶稣会的教皇至上主义，它甚至比基督教救世军的浪费更为糟糕。耶稣会教皇至上主义的智力欺骗对于人性来说是一种践踏。这种践踏的结果，有如卡莱尔所指出的，将是普遍的灾难，反抗和谗妄；过激分子骚动的狂热，复辟暴政的冷酷，百万生灵惨遭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军队的杀戮；那‘不义的

---

<sup>①</sup> 卡诺莎 (Canossa)：意大利北部的古城堡（在今勒吉奥 (Reggio) 附近卡诺沙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因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主教叙任权，被后者是开除教籍，帝国境内诸侯乘机叛离，1077年1月，亨利被迫冒着风雪严寒，翻越阿尔卑斯山到卡诺莎向教皇“悔罪”。据载，亨利身着罪衣，立于城堡门口三昼夜，始得教皇赦免。后来“往卡诺莎去”成为屈辱投降的同义语。但辜鸿铭这里有意指回归教士统治时代。

君王以法律裁决不义’的令人毛骨耸然的场面。”

说得更简明些，耶稣会教义的实际结果借用一句粗俗的表达，可以像福音书所定义的那样，知道你的面包哪一边涂上了黄油。<sup>①</sup>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私卑鄙精神习惯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法国，路易斯·拿破仑之后就出现了巴黎公社。有谁知道，如果欧洲人民回到中世纪信仰并且只成功地达到耶稣会的教皇至上主义，那对于他们又必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已经说过黄种文明对于欧洲民族决不可能形成一种威胁。在我看来，危险倒更在于欧洲那“养尊处优的集团”（Pampered unit）竭力驱使政府以一种愚蠢蛮横的方式同这一文明进行交往。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这种“养尊处优的集团”的喉舌便是报刊。他们齐声要求所谓在中国的炮舰政策并平静地列出瓜分中国的计划。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曾经想过，一旦中国的官僚统治被破坏，人们像后来在土耳其亚美尼亚的人民那样狂热，那么要维持中国四万万民众的秩序与治安将会耗费欧洲各国多大的开支。已故戈登将军说过：“要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大批军队。”不管中国的官僚统治在今天是何等的令人失望与腐败，他们的统治依然是一个道德的而不是一个警察的统治。军国主义在欧洲必要但在中国却不然。外国人在中国实施炮舰政策，将只能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有相关的利益构成损害。依我之见，在上海建立一所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国际学校，与此同时派遣大批中国学生去欧洲和美国，这比起出动欧洲各国最强大的舰队来，倒更能促进外国商业的利益。

① 即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相反，一旦军国主义在中国成为必要，那么中国人肯定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势必为外来军事力量所制服。但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全世界都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大笔额外的军事负担。

在欧洲，由于人民的不满情绪，军国主义是必要的，它是文明的庇护者与捍卫者——一种权力范围内的力量，用丁尼生中世纪的话来说，它的真正作用在于：

“打倒异教徒，捍卫救世主。”

即：打倒暴虐、野蛮与混乱。可是后来欧洲的军国主义却不被用来对付混乱与野蛮，反而用来对抗真正的文明，反对中国人民的好政府。这种欧洲军国主义愈是被滥用，其所耗资的负担就只会愈加沉重。

因此，对于欧洲人民来说，要想逃脱被其军国主义负担所压垮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为获得我们称之为的那种普遍自由主义名义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斗争。但欧洲人民要实现这一点，很难说清要花多长时间。就我个人看来，上世纪欧洲的那种自由主义确已衰退。比康兹菲尔德伯爵在谈到他那个时代英国的自由主义时，说他惊奇地发现其已变成一种实际的政治独裁。我以为今天欧洲那种自由主义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独裁：一种“养尊处优集团”的独裁。前一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是有文化教养的，今日的自由主义则丧失了文化教养。过去的自由主义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

如果能设想一个在上世纪不得不用杀死国王、险些推翻王权暴举的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再生今日，那么他肯定会用莎士比亚作品中“布鲁图斯”(Brutus)的话来告诫今天的假自由主义者：

难道我们打击世间的一流人物  
只是为了助纣为虐吗？难道我们现在  
以卑鄙的行贿玷污我们的手指  
出卖我们廉耻的广阔空间  
只是为了换取可能得到的这么一堆垃圾吗？  
我宁愿做条狗去吠月，  
也绝不这样做一个罗马人！

然而，我们却不必绝望。我相信目前的所谓“殖民政策”运动在欧洲的最终结果，将会是真正自由主义的复兴。基佐先生在其关于欧洲文明的演讲中，谈到中世纪基督教远征的动机以及其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影响时说：

“对于最初的编年史家，及他们笔下的十字军的最初成员来说，穆斯林教徒是他们憎恶和鄙视的唯一目标；显而易见，那些如此谈论他们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后来的十字军参加者的历史，说起来就十分不同了；很清楚，他们已不再将其看作怪物；并且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他们的观念中去；他们彼此住在一起；在他们之间一种勾通关系甚至某种同情已然建立。”因此，基佐先生接着说，双方的灵魂尤其是十字军战士的灵魂，已经从因无知而产生的那些偏见中解放了出来。最后他说：“所以，这是向通往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迈进”。

欧洲这一称作“殖民政策的现代远征”，在欧美终将完成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而这种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又终将产生一种全球性的真正的天主教文明；这一文明不建立在一个仅仅



依赖人的希冀与敬畏情绪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而建立在依赖人的平静理性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它的法令不是出自于外在的某种强力或权威，而是像孟子所说的，出自于人类生来热爱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

在新的文明之下，受教育者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可以自由地做正确的事情。农奴或没有教养的人所以不做错事，是因为他害怕世间的皮鞭或警棍以及死后阴间的地狱炼火。而新的文明之中的自由者则是那种既不需皮鞭警棍，也不需地狱炼火的人。他行为端正是因为他喜欢去为善；他不做错事，也不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或胆怯，而是因为他讨厌为恶。在生活品行的所有细则上，他循规蹈矩不是由于外在的权威，而是听从于内在的理性与良心的使唤。没有统治者他能够生存，可无法无道他则活不下去。因此，中国人把有教养的先生称作君子（“君”相当于德文 Koenig，或英文“King”，“a kinglet”，即一个少王）。

美国人爱默生谈到他访问英国和卡莱尔一起参观 Stonehenge 这座英国最古老的纪念碑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说：

“星期天我们在雨地里谈了许多。我的朋友们问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美国人——拥有一种美国思想的美国人。由此我想到的既不是各政党会议，也不是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阁员，不是诸如此类想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灵魂。于是我说：‘当然有的；不过拥有那种思想的美国人是些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我恐怕这种思想你们英国人是不爱听的，或许只会觉得荒谬可笑，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有为了这一真理而勇敢地站起来捍卫的人。我很

清楚，再没有比这种勇敢更能博得我的敬意了。我能很容易地看到那可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这就像上帝的存在一样无疑。不必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正如杜·克罗斯谈及现代自由主义将依赖于“理性胚芽”的滋长一样，人类未来的文明就在于爱默生的这种美国人的思想之中。进而言之，爱默生这种美国人的思想又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在此，它包含了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而要解决这一难题，既不完全依赖于国会，也不完全依赖于议会，既不依赖于皇帝、国王，也不依赖于内阁大员。解决它的办法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即需要具备在欧美发现的那种最单纯的灵魂。诗人们曾为这种新的文明唱过赞歌。那个自称为人类精神解放而战的德国骑士海涅唱道：

Ein neues Lied, ein besseres Lied,  
O Freunde, well ich euch dichten;  
Wir wollen hier auf Erden Schon  
Das Himmelreich errichten.

一首歌，一首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给你们写出它来：  
让我们在这人间  
建立起上帝的天国。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唱道：

让我们祈祷它的来临，  
它将为那一切而来，  
为了理性和价值遍及大地

可能带来生机和那一切：  
为那一切，为那一切  
它仍将为那一切而来。  
在这广阔的大地上，  
人与人之间应该亲如兄弟。

最后，法国人贝朗杰（Béranger）在幻境中看到了他所谓的神圣同盟（Sainto alliance des Peuples）并且唱道：

J'ai vu la Paix descendre sur la terre,  
Semant de l'or des fleurs et des épis;  
L'air était calme et du dieu de la guerre  
Elle étouffait les foudres assoupis.  
Ah! disait-elle, égaux Par la vaillance,  
Français, Anglais, Belge, Russe ou Germain  
Peuples, formez une Sainte alliance  
Et donnez-vous la main!

我目睹和平徐徐降临，  
她把金色的花朵麦穗撒满大地；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  
她抑制了使人昏厥的战争霹雳。  
啊！她说，同样都是好汉，  
法、英、比、俄、德人，  
去组成一个神圣同盟，  
拉起你的手吧！

## 附录

### 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致辜鸿铭的信<sup>①</sup>

1902年7月27日写于中国  
发自美国“肯塔基”旗舰

辜鸿铭先生

我亲爱的先生：

承蒙您厚爱，送书给我，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了您所写的每一个字，我相信我受益良多，最后，我在许多深怀兴趣的问题上站到了中国人一边。

你的极其真诚的  
再次感谢您的厚谊，  
我乞望保持。

R. D. 艾文斯

---

<sup>①</sup> 此信录自1923年《北华正报》社重版《尊王篇》一书书前附言部分。艾文斯（Robley Dunglison, 1846—1912）：美国海军将军。1902年任美国亚细亚舰队总司令，1907年奉罗斯福总统命率美国海军舰队访问全球。此信写于中国海岸，他收到辜鸿铭所赠《尊王篇》一书，阅后复信。信中所谈即此书。



## 致一家英文报刊主编的信<sup>①</sup>

北京 1903年8月25日

致主编

先生：

鉴于不久前曾因北京处决一名革命领袖，而在外国人士当中引起了异常情绪和过激言词，我认为有必要以中国人的观点就这个案件作一自我克制的阐述。

在我看来，公众就这一案件对中华帝国政府的指控，可以分成三点：

第一，司法程序不正当；

第二，判刑过严；

第三，处决过分残酷。

现在，为了断定司法程序是否不正当，有必要了解案情的真相。

---

<sup>①</sup> 此函录自骆惠敏先生编注，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71-276页。它是辜鸿铭交给《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G. E. Morrison）一封信的抄件。此信是写给某英文报刊主编的。我们现在已无法证实它发表在哪家报刊上，或是否曾公开发表。

真实情况是：沈克诚<sup>①</sup>其人被控不仅犯了写文章进行诽谤和煽动叛乱的罪行，而且确系一个旨在推翻帝国政府的革命社团的领导成员，上述社团的成员确曾企图在1900年纵火焚烧武昌和汉口两座城市，为此，许多成员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阁下处死。沈克诚被捕后，在受刑部委任的法官提审时，不仅对其全部罪状供认不讳，而且公然扬言引以为荣。刑部据此判以死刑，并以全部提审过程奏请皇上降旨处决。但是刑部收到的不是通常的朱批处决谕旨，而是一道由军机处封交的廷寄，钦命将囚犯不是一般地公开处决斩首，而是立毙杖下。这道敕令就那样执行了。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我的一个能讲英语的学生告诉我的可靠消息，他是刑部郎中，是目击最后行刑过程的见证人。据他说，杖毙的敕令只在名义上执行了，实际上这个人是在挨了几棍子以后被用一条带子勒死的。

目前，按照中国的国法，皇上未经咨询皇家司法官员是不准下令把一个人处死的。未经咨询皇家司法官员，只凭皇上的专横意旨去惩处一个人，中国话叫做诏狱，相当于革命前法国统治者发出的拘票。中国这种诏狱治罪事属非法、违法，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专门阻止此类事情。当前所涉及的这一案件中，这种不通过内阁直接颁发廷寄敕令的干预行动，按照正常司法程序可以看作是皇上不当地行使其君权。但是，必须记住，在

<sup>①</sup> 沈克诚或沈葵，是一位新闻记者和1900年因暴动计划败露在武昌被杀害的维新派领袖唐才常的同党。沈于1903年7月17日被捕，同月31日在刑部被毒打致死（见《实录》第518篇）。这一事件使在华的外国人大为震惊，最后他们说服北京的各国公使拒绝清朝政府所提引渡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章炳麟和邹容的要求。这两个人是《苏报》案中被控的首要人物。（见莫理循1903年9月7日致濮兰德函。）

骆惠敏注

中国，皇上可以以一国之主的身分或别的理由驳回皇家司法官员所作的定讞，因为皇上的裁决是最高法律。

由此可见，指责中华帝国政府司法程序不正常的鼓噪是十分荒谬的。人们记得在不久前的布尔战争中，一位被指控为倾向布尔人的英国妇女据说被非法逐出了非洲。当此案提交英国法律当局时，颁布了一项未经议会同意的敕令，支持放逐令的合法性。当时弗雷德里克·哈里逊先生<sup>①</sup>以漫无节制的措词谴责英国内阁大臣们的违宪行为。但是我不认为柏林的哪一个德国国务大臣会想到要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总之，我并未听说英国政府因为英国内阁的这一违宪行为而被谴责为野蛮的政府。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对政治犯和犯煽动罪者判刑过严的问题。让我提出下列需要考虑的情况：

尽人皆知，香港和东京对鼠疫的预防措施之一是，把整个区域的建筑物，不管多么有价值，全部夷为平地，如有必要则全部用火焚烧。我想任何人对于采取这样严峻的预防鼠疫的措施也不会提出疑问的。现在按照中国人的看法，无政府主义是同鼠疫一样的坏，而中国这个国家把所有对正统权威的公然违抗看作是最危险的瘟疫，或者确切地说，是无政府主义病菌。因此，为了消灭一切可能的无政府主义病菌，采取最强有力的严厉措施是必要的。中国的君主是最高正统权威的象征，而对于公然违抗最高正统权威者的惩治就是处死。中国宋代的伟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著中国史是一部关于中国合法政府历

<sup>①</sup> 可能是弗雷德里克·哈里逊（1831—1923年），英国学者、历史学家和作家，英国实证主义委员会的主席（1880—1905年）。——蒋惠敏注。



史的最伟大的标本著作，然而他在谈到审判一个政治犯的案例时写道：“一家（即罪犯的家庭）哭何如一路哭（就是说遭受未惩办罪犯的后果之苦）”。事实上，对罪犯实行不适当的和欠考虑的宽大，实际上就是对于受这些罪行后果之苦的人们的残忍。

关于严厉惩办政治犯的问题，人们应该记得，布尔战争之后不久，有一个爱尔兰人，竟然由于犯了法律上认为的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还有，在辛丑条约中，列强要求对任何参加排外社团的中国人均应定罪处以死刑。因此，面对这些事实，我认为让外国政府出面干涉，以减轻对那些公开宣称要推翻中国现政府并谋杀所有满族的中国人的惩治，是荒谬而不合逻辑的。

最后，谈一谈处决残酷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指出两件事。第一件，根据中国人的观点，认为用棍子打死的严峻和残酷程度比砍头处死要轻，因为前一种惩处不会造成中国人感觉特别可怕的身首异处。但是为了免得中国人对事情的这一颠倒看法，被认为是荒谬可笑和难以置信的，让我再举一个看起来更为荒谬可笑和难以置信的外国人对惩治观点的例子。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个英国军官被作为间谍逮捕，判处绞刑。这个可怜的人苦苦哀求不要把他吊死，他宁愿听任一排士兵同时把他们枪筒内的子弹对准他的身体射击。的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欧洲式的军法处决是那样的野蛮而可怕，正如在欧洲人心目中把中国式的乱棍打死的处决看得非常野蛮而可怕一样。

关于残酷处死的问题，我想提醒注意的另一点是，如果认为过于残酷和野蛮的指责只是就现在这一案件而言，那么，这一指责不应直接针对中国现政府，而应指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法律是中国人民文化的产物，现政府不能对此负责。如果人们认为中国的法律残酷而野蛮，也不应该归咎于中国现政府，而

应归咎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因此，在我看来，当前这种直接针对中华帝国政府的愤怒呼声，是反常而不公平的。

用现代欧美人民的道德观念来判断中国的法律，它无疑像是残酷的和野蛮的。但是在对有关中国人和他们的文明与刑罚的残酷性作出最后判断之前，我愿提出两点重要考虑。

第一点，中国刑事裁判制度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欧洲的裁判制度的基础，从杰里米·本瑟姆（边沁）以来，便单纯是功利主义的原则，即仔细盘算其收益和损失。用简单的话来说，现代欧洲惩办罪犯的动机，仅仅是希望阻止犯罪、保障社会安全使之不受伤害和损失。但是在中国，惩办罪犯的动机是对犯罪的憎恶。简言之，欧洲国家惩办罪犯是为了保护钱袋。在中国，国家惩办罪犯则为了满足国家正义的道德情感。欧洲法理学家全然不以道德上的是非感来看待犯罪分子，只是把这些人看作是社会上应被谴责的分子，必须采取对社会和国家损害最小而获益最大的方法予以铲除。与此相反，中国的法理学家把罪犯看作是应该被人憎恨的恶棍，在制定惩办他们的法律时，以憎恨犯罪的道德感为指导，而这种道德感是必须满足的。在中国道德主义者看来，某些罪行是特别令人憎恨和骇人听闻的。所有具有健康道德感的人，都应该具有反对这种罪行的感情，因此，为了表现对这种罪行憎恨和恐惧的道德感，在中国有必要用残酷和野蛮的手段来惩处这种犯罪行为，否则那是不符合并非残酷的中国人的精神，而且也不符合并非不人道的中国文化的主旨的。

关于这一点，我想再进一步讲一讲。如果一种文化是否残酷和不人道，要以人类遭受的痛苦后果去判断，我认为，没有偏见又善于思考的欧洲人，在确定其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之前，当

他睁开眼睛看一看现代欧洲的毁灭性战争机器给人类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时，就很可能迟疑不决是否使用强烈谴责的语言了。的确，像一位中国朋友对我讲的那样，当你考虑进口的鸦片使中国人民蒙受的痛苦时——一个家庭中的男性和挣钱养家的成员吸食鸦片，使他的妻子儿女所受的饥寒之苦——倘如你们考虑到这一切，那么据最近路透社报道，英国下院开始对于所谓中国残酷可怕地处决政治罪犯的歇斯底里叫嚷，就变成极端不合逻辑和荒谬可笑了。<sup>①</sup>

最后，我想说明我不嫌麻烦地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不完全是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辩护，而是向外国人说明：他们错误地同情所谓上海的维新派是很愚蠢的。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中国真正的改革只能出自品学兼优的中国好人之手。但是这些被无知的外国人设法使他们成为英雄的所谓维新派，从道德上和智力上说都是病态的人。这些人正像我上面说过的那样，是受鼠疫或无政府主义细菌感染的人。必须承认，空口说说怎样处理这些被鼠疫和无政府主义感染的人最好，那是很容易的事。我个人并不认为目前当政者对这些维新派采取的措施，在现在情况下是最明智的。不过，这些措施是否最明智，那是留待这个国家的好政府的负责人去解决的问题。外国政府或外国人干涉这个问题，只能是有害的，而且会使事态恶化。我经常反复说

---

<sup>①</sup> 辜鸿铭所指的是1902年8月13日兰斯东勋爵在英国上院对斯宾塞伯爵提出的关于上海《苏报》案被捕者问题的回答。这位外交大臣提到了处决沈克诚的报告后说：“爵爷大概注意到了不久前一个中国人在北京在骇人听闻的野蛮情况下被处死的可怕消息；我们感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案件的问题上，我们不可能同意这些被控告的人们应服从中国的判决。”（《英国议会议事录》第四辑，第127卷，第1123栏。）——骆惠敏注。

过，指导外国人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一个原则是，如果外国人要求中华帝国政府尽到一个好政府的职责，那么外国人的一个简单的责任就是，允许中华帝国政府有充分自由和权限，去采取它认为是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最好的措施。比康兹菲尔德勋爵说过：除非一个国家现实有效的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个国家是不可能治理好的。外国人在中国应该支持的事业不是改革和维新派的事业，而是支持好政府<sup>①</sup>的事业。支持好政府的事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用各种可能的办法维护正统权威的权力。

辜鸿铭

---

<sup>①</sup> 此处恐怕是指“良治”的事业，“好政府”系“good government”误译。



## 且听着，统治者，请明察： 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sup>①</sup>

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辜鸿铭译为“找到其道德本性真正的中心线索和平衡状态”，即，找到他们处于正常状态的真实自我——译者），而不能期月守也。”

上文所寓涵的意思是，当一个人、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事务陷入困局时，对于这个人或民族来说、唯一正确的摆脱方法，就是去找到其道德本性的中心线索和平衡状态，去寻回他们的真实自我，或者通俗一点说，去恢复他们心境的平衡、保持其评判的不偏不倚。如果一个人或民族将做到和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一切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说明这种道德上的寓意，我将冒昧地以那场不幸的、至今仍在继续的日俄战争所产生的事务僵局为例，对此加以剖析。但愿这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民族的感情。

---

<sup>①</sup> 此文从1904年12月10日起，开始在《日本邮报》上连载，1906年由上海墨丘利（Mercury）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单行本。本书自单行本译出。辜鸿铭在此文中谈到俄国侵占满洲的动机，中日战争的起因等问题时，有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表明了他对民族政治的无知。

我相信，目前世上每一个有头脑的人——甚至于日本和俄国的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肯定都盼望这场倒霉的、使他们的同代人蒙受了如此多灾难与痛苦的战争尽快结束。我更相信，除了那些彻头彻尾的魔鬼的化身之外，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灾难和痛苦再多拖延一分钟。但据我所知，除了托尔斯泰<sup>①</sup>伯爵一人之外，还没有人公开提出过结束这场不幸战争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我之所以相信并声称托尔斯泰伯爵提出了结束这场不幸战争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因为他在圣诞献词中，想到并倡导了一种真正的儒家办法，一种在前文我们引述过的孔子那段话中所教导的办法。托尔斯泰伯爵要求过世界、要求过他本国的人民、要求过并且现在还在要求日本人民：要好好反省自己，或者，像孔子所说的，找回其真实自我——恢复其心理平衡、并保持其公正的判断力。

在此，我要指出的是，对于日俄民族之外的世界来说，要反省自己，找回其真实自我，恢复其心理平衡和公平判断，相对说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托尔斯泰伯爵就非常容易地进入了退隐西山的平静之中。但是我恐怕托尔斯泰伯爵并未很充分地认识到，在目前复杂的事务困局中，要俄国人民做到这一点该是多么多么的困难！而对于日本人民来说，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更是难上加难。

确实，一个保持了内心平衡和公正评判的人，肯定能够发现并且承认，要俄国人民做到这一点是极端困难的。现在，他

---

<sup>①</sup> 托尔斯泰：19世纪俄国人文豪，1906年曾写给辜鸿铭一封公开信，支持辜氏反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事业。他俩的关系，可参见黄兴涛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们正处在最近战场失利所带来的痛楚之中，正如他们自己知道并强烈感受到的，这是他们缺乏战争准备的结果，另外，恰如我将说明的，也是由于在他们方面，对于日本民族根本没有什么邪恶的意图。因此，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要俄国人反省自己，找回他们的真正自我或者恢复其内心充分的平静及冷静的判断，以便思考结束目前这场不幸战争的可能办法，是极端困难的。

然而，如果说俄国人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那么我以为，在目前的局势下，要日本人做到这一点就更为困难了。简直可以说，它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其中存在一个还不为世界所知的道德原因。我冒昧地说，如果俄国人、热情而慷慨的俄罗斯人对此稍有所悟，那么就不会有战争——这场不幸的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使日本民族在目前事态中难以保持内心平衡与公正判断的道德原因。事实上，迄今为止，日本民族在保持内心平衡和公正判断方面，相对说来还做得不错，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最近的战役中赢得了胜利。这一点，也表明了日本人民的道德水平及其文明程度非常之高。我之所以说这一道德原因使得日本人民难以保持内心的平衡及公正的判断，是因为不仅在目前这场战争、在这场相对弱小的民族反对一个大帝国的斗争中，而且在最近的50年时间里，整个日本民族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已经做出了惨不忍闻的、令人痛心的牺牲。

那么这一原因是什么？整个日本民族在近50年里为之做出惨痛牺牲的伟大目标是什么？对于这种牺牲，卑鄙无头脑的欧洲人给予冷嘲热讽，而有头脑的欧洲人则用轻微的赞扬加以贬



低。甚至于连我也曾一度困惑不解，倾向于责怪对此负有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并为之心怀愤懑。那么，是什么原因迫使日本民族做出这样的牺牲：送出他们年轻、柔弱的日本少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们不是象露斯（Ruth）一样挺立于异国的土地，而是象斯潘塞（Spencer）的乌娜（Una）一样，踽踽在野兽和衣冠禽兽充斥的中国海岸？又是什么样的伟大目标使得世界文明的绚丽之花——那柔弱、温顺、纯洁、敏感的日本少女做出牺牲，被迫飘泊和流落在香港、天津、山海关、旅顺港去出卖她的贞洁，遭受贫困和痛苦的折磨？这种贫困和苦难，对于任何妇女的那种敏感的女人天性都是一种伤害和摧残，就更别说那高度文雅、灵敏、和具有艺术天性的日本妇女了——贫困和痛苦曾一度使她们绝望，几乎使她们发疯，但好在她们有优秀的道德品质，所以也就没有太受到伤害，那种典型的日本妇女，她们身上那种温柔、真诚、勇敢及其文雅的女人特性，并未因此受到损害。同样，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娇小、瘦弱、恋家的日本青年偷偷地躲进轮船，到美国去学英语的？最后，是什么样的伟大目标，使住在香港四楼一间小屋里的贫穷而年轻的日本姑娘（日本学者冈千仞在其《中国游记》中提到的），本能地，以一种真正日本女人特有的本能，将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施舍费寄给她年幼的弟弟，以便他能够学英语的？

那一使全日本民族——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近50年来为之做出了惨痛牺牲的伟大目标，就是：要使那些半开化、半受教育、坚持要来日本和中国的欧洲人；那些崇拜残暴武力和比残暴武力更为低级之金钱的欧洲人；那些心中认为没有上帝、政治世界没有道德，因而不承认或不害怕道德法律，除了残暴武力之外一无所惧的欧洲人——使那些现代的欧洲人，如果他

们非要来日本和中国不可的话，在对待日本人和所有他们称之为亚洲人的人时，请带上道德法律所要求的全部尊重；不是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作为人类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取人。说得更具体一些，要使每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欧洲人，像对待血气旺盛、蒙蓝色面纱的欧洲白人妇女那样，以同样的尊重来对待最贫穷的日本和中国妇女。这，就是整个日本民族如同一个高贵的殉难者，在最近 50 年里为之做出惨痛牺牲的伟大目标。

在此，我必须恳请我的勇敢的日本兄弟 (cousins)，当他们看到其过去和现在的苦难——看到他们自己的人民为了这一伟大目标而做出的惨痛牺牲时，不要让感情失去控制。要知道所有心灵高尚的人，即便是欧美人，都同情过并且仍在同情着他们。不仅如此，当我勇敢的日本兄弟一旦懂得并保持了心理的平静，能够很好地实现心境的平衡、一种充满自信的平静，那么，不仅他们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将得以实现，而且他们将容易战胜任何胆敢反对这一伟大目标的民族或者国家联盟，孟子曰：“仁者无敌”。

下面，我想打断一下，借此机会解释我在别的地方使用过的一个科学术语。不幸的是，我可以在此指出，当我试图动用我的全部天赋、脑心并用，考虑借用一个真实、准确、科学的术语的时候，那些单用脑袋思考的人们却经常误用着浮夸的修饰性语言，或者如他们称之为的：一种唯情论语言。这些人不懂得语言要想符合科学规律的真正精确 (Scientifically Correct)，必须是脑和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在此想解释的术语，是“魔鬼的化身” (incarnate devil)。我所谓“魔鬼的化身”，指的是像写过《茶花女》那部名著的法国佬那样一种类型的人。我认为，

如果你想准确和科学地描绘这样一种人，“魔鬼的化身”这一术语是唯一能用的真实、精确、恰当科学的术语。从中，你不仅可以看到卡里班<sup>①</sup>粗野丑恶的感官特质，而且可以看到靡菲斯特<sup>②</sup>那不健全的、畸形的、老朽虚弱的智能。从这种人身上，玛格丽特（Margaret）弄清了恶棍的真正标志，她说：“从其面部神情可以看出，他一生从未爱过任何东西。”现在，假如有人想要检验和了解自身的德性状况，我将冒昧地建议他把这本书作为其灵魂的检测器或者标尺。凡是读此书时能感到一种愉悦或欢愉之情的人，便可以肯定，他身上已带有恶棍的真正印记，除非他立即去看道德医生，否则便无望治愈，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也就是揆诸适者生存的法则，他不适合生存。相反，凡是道德状况正常有序的人，读到此书时，他一定会感到厌烦和恶心，其道德状况愈好愈健全，其厌恶之感也就愈加强烈。真的，如果有人要我以自己有限的欧洲文学知识，来命名一本代表欧洲文明最低落的书，我会毫不犹豫地以《茶花女》这种书名之。在欧洲知识阶层中，像《茶花女》这样的书居然能成为一部世界名著，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可以说是其文明或道德教育普遍衰落的令人担忧的标志。

这里，我想扯远一点说，像埃德温·阿诺尔德（Edwin Arnold）爵士这样的男人，和培根小姐（《日本的姑娘和妇女》一书的作者）这样的女人，他们对日本式妇女的陶醉和迷恋，正是那种被称之为天性或已达极限的道德本性的真正标志。世上

① 卡里班（Caliban）：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半兽人，丑恶而凶残。

② 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欧洲中世纪关于浮士德（Faust）的传说中的魔鬼。

每一种伟大而悠久的文明都产生过优美的妇女类型。事实上，妇女乃是民族文明之花。犹太或希伯来文明产生过黛博拉 (Deborah) 和露斯 (Ruth)；希腊文明产生过伊芙琴尼亚<sup>①</sup>，珀涅罗珀<sup>②</sup>和安提戈涅<sup>③</sup>；罗马文明产生过科尼奥兰勒斯 (Coriolanus) 的母亲和妻子，莎士比亚以其魔笔对她们所作的描绘，胜过任何一幅历史画卷。意大利的基督教文明在其最佳时期，产生过佛罗伦萨花园里的太太和小姐们，如但丁笔下的比阿特丽斯 (Beatrice) 和卜伽丘笔下的女人。英国的基督教文明在其最佳时期产生过莎士比亚戏剧中光彩照人的妇女群像。甚至基督教文明的再生果，美国的“五月花”清教主义，也在其鼎盛时期产生过像玛格丽特·富勒 (Margaret Fuller) 那样甜蜜的波士顿姑娘。最后，我要说的是，目前欧洲文明的衰落和退化，在那些称之为社交妇女 (Society Woman) —— 健壮的男人气十足的女人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中国，这些好管闲事的外国太太正忙于将中国美妙的小脚女人（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中国妇女不得不裹住脚，自我保护，不致于过度劳作）改造成像她们一样健壮的、男人气十足的妇女。

在此，我愿借此机会，恳请我的日本兄弟尽可能保住他们神圣的东西。旧日本什么都可以欧化，唯有蠢蛋和像日本式妇女这样的东西不能欧化。我很尊重伊藤侯爵，在武昌时<sup>④</sup>，他曾告诉我，正是他，在日本倡导了妇女的服饰改革——但我要冒

① 伊芙琴尼亚 (Iphigenia)：希腊女神，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女儿。

② 珀涅罗珀 (Penelope)：希腊女神，奥德修斯的忠实妻子，贞妇。

③ 安提戈涅 (Antigone)：希腊女神，奥狄甫斯的女儿，曾不顾敌人禁令为战死的哥哥营葬。

④ 指 1898 年伊藤博文来华游历，途经武昌。

昧地说，日本民族不应让像伊藤侯爵这样的功臣名人，去以他不圣洁的手插手日本妇女的服装改革。日本妇女的服饰是与其自我和天性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她们服饰完美的轮廓和样式，与其颜色浑然天成，乃是其完美的情趣和得体风度的外在表现，实际上，也就是其完美特质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如我所说过的，妇女是一个民族道德文化或文明的花朵。人们可能还记得，外国驻华使节夫人们是多么地欣赏中国皇太后<sup>①</sup>陛下的完美风度的。这位皇太后就是满族文明之花，或确切地说是满族统一中国后的中华文明之花。正是由于满人有更好的文明，有外国公使夫人们所欣赏的那种文明之花——或更确切地说，有着比汉人，比明朝末年的汉人更好更高的文明水准，所以只有这些游牧之民能够征服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华大帝国的主人。

如同皇太后陛下是满族文明之花一样，日本式妇女也是日本文明之花。今天的日本文明，我愿意在此指出，它是真正的、原初的中国文明——真正的儒家文明，其根其本，在于我现在正翻译的那本书中<sup>②</sup>。今日中国真正的中国文明或儒家文明，其文明的艺术与精致，用我们中国和日本人的话来说，称之为“文物衣冠”，而不是现代日本人所发明的所谓“美术”，“美术”一词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日本固有的<sup>③</sup>——所有这一切，

① 指慈禧太后，即西太后。

② 指《中庸》，他当时正翻译此书。

③ 可参见辜鸿铭译《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一句译文的注文。他认为，“art”（艺术）一词的准确翻译，并不是现代日本人所发明的“美术”一词。“艺术品”的准确译文应是“文物”，“艺术实践”的准确译文应是“艺”。

在元朝统治中国时期及其此前的蒙古游牧民族的铁蹄践踏之下，都丧失了其真正的和原初的特征。确实，成吉思汗进攻日本的庞大舰队被突然四起的狂风恶浪所吹覆，那真是有如神佑，从而在这块阳光明媚、山青水秀的日本孤岛上，挽救和保留下来部分真正的中国或儒家文明，就仿佛是老天有意让我们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儒家文明的真实图景一样。简而言之，在今日的中国，真正的儒家文明或道德文化，可以说正处在衰落状态，相反在日本，它却正处于强盛时期。由此可见，那种地道的日本式妇女实际上是真正原始的中国或儒家文明之花。在此，我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日本德育家贝原（Kaibana）的女子大学，本质上就是进行的纯粹儒家教育。

下面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诚实的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摩尔）和他的军官们曾对义和团小伙子面对欧洲人的枪口无所畏惧地狂热冲击感到惊异。现在，俄国的库罗伯特金<sup>①</sup>将军和他勇敢的军官们，则对日本军队的狂热——那种疯狂的不怕死的勇猛感到惊奇。但是西摩尔将军及其军官们却不知道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上所雇佣的乱七八糟的欧洲人是如何对待中国妇女和中国姑娘的；库罗伯特金将军及其军官们也不知道在俄国控制的满洲铁路沿线，在旅顺港、大连，俄国人是如何对待世界文明最绚烂的花朵日本姑娘的。然而必须在此公正地指出，我听说在野蛮地对待妇女方面，俄国人还不算最坏，最坏的是别的欧洲国家的那些下贱货，主要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不过俄国政府却对他们在占领满洲过程中雇佣这些人负有责任。

---

<sup>①</sup> 库罗伯特金（Alexei Nikolalevitch Kuropatkin, 1848~1925）：日俄战争时期俄国方面军的总司令。

但愿我已经将我所要说的观点表达清楚了。那就是，日本民族已经为之作出牺牲且目前仍在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就是要使欧洲人像对待欧洲白人妇女那样来对待贫穷可怜的日本女人。简而言之，要使欧洲人尊重日本妇女，尊重那些日本文明之花；或换言之，要使欧洲人尊重日本文明，正如我所说的，那种真正原初的中国文明或儒家文明。

我在以前所著的一部书中<sup>①</sup>，曾请求日本民族抛开他们的欧洲眼镜，用其自己真正的日本眼光来看待和理解所谓远东问题的真正症结。其实，我上面所谈到的那种伟大目标就是这一症结所在。这一目标，就是我在《尊攘纪事》一书中所读到的——该书作者是日本学者冈千仞，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了。这一目标，就是已故的日本天皇陛下，现在的日本天皇陛下之父在1854年祭告祖先（告七庙）时所宣称要捍卫的，他号召日本民族团结在他周围时，使用的是中国和日本的骑士们共同的口号：“尊王攘夷”。

在此我要进一步指出，这也是中国的皇太后陛下向康格夫人及其他公使夫人们以“中外一家”相呼吁的目的。当她的呼吁无济于事时，便去号召中国的浪人、义和团拳民们团结在她的周围，以保卫那些受到在华欧洲流氓无赖们所凌辱的满族妇女，那些遭到铁路上所雇佣的欧洲人蹂躏的中国姑娘，实际上也就是捍卫我们中日共同的文明目标。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也是美国海军准将培理（Perry）——日本人认为他正给日本带来新的福音，并给他立碑的那个美国人——1853年宣布来日的伟大目标。简而言之，从最正确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远东问题

<sup>①</sup> 指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

的真正症结，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整个日本民族已经为之作出牺牲，现仍在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就是以更巨大的物质力量，使欧洲人，使拥有战舰、机枪和立德炸药的欧洲民族像兄弟一样地看待和对待他们称之为亚洲人的人，或者像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所说的，天下一家，将其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来看待和对待。

事实上，远东问题的真正症结就在这里。只有当欧洲民族——当那些对欧洲各国政府负责的人们忠实于上帝和良心，并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那些允许到日本和中国来的欧洲人能像兄弟一样看待和对待他们称之为亚洲人的人，在上帝及其道德法则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到那时也除非到那时，远东问题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任何人，不论其地位多么低下，只要有助于上述局面的形成，他就对远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相反，不论他多么聪明智慧，可能提出金本位及诸如此类的改革方案，作出多么明智的同盟选择，拿出多么强有力的满洲政策——只要他的工作与实现上述局面背道而驰，那么他就只能将远东问题弄得更糟，以致于无望得到解决。

前面我提到中日的骑士们共同的口号是“尊王攘夷”，经由英国诗人丁尼生阐释后，它也成为基督教骑士的口号。借此机会，我想解释一下在我们与大英帝国所签订的条约中被禁止使用的那个“夷”字的含义。我要指出的是，从中国和日本所使用的“夷”字本意来看，不仅不像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是夷，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是夷。那些在中国人和日本人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的尊贵的欧洲人；那些奉献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使得日本民族获得今日地位的欧洲人；那些不久前死于日本运输船的勇敢而高贵的英



国人；所有这些欧洲人都不是夷。我要在此指出的是，所谓的夷，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当一个美国船长枪击中国人的背部，使中国人几乎丧命，他却仅仅给了 20 美元作为补偿，而在这个时候，那位美国领事竟然责骂这位船长不该给中国人那么多钱，骂他是个傻瓜蛋，并责问道：“为什么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最后我要说，真正的夷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财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还有那些人们几乎想象不到的、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却以基督教自傲、歧视那些自愿嫁给卑微、贫困的中国教师的欧洲年轻女教士、并将其开除出传教机构的欧洲传教士。真正的夷，我想有必要在此补充一点，是那些傲慢自大的儒士，诸如康有为及其日本门徒、像星彻（Hoshi Toru）那样的所谓改革家——他们欣赏、崇拜和羡慕欧洲人，不是因为他们好，而是因为他们大、富和强。事实上，有黄夷人也有白夷人，正如有白夷人也有黄夷人一样，所以孔子说：“有教无类”。

现在，我已经为自己在这篇儒家方法的解释中所要表达的观点扫清了道路。我说过，要想结束这场不幸的日俄战争，对于两国人民来说，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思之再思，找回他们失落的真正自我，恢复其心灵的平静和判断的冷静状态。为了达到此一目的，我将冒昧地给日本人面前摆出三个事实，给俄国人面前摆出两个事实。当他们双方都充分地恢复到其心灵的平静和判断的冷静状态，以致能正视我将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时，他们就会觉悟到双方都已成为可怕误解的受害者。

我要摆在日本民族面前的三个事实如下：

## 事实一

第一个事实，是日本民族戴着外国眼镜来看问题，对于俄国人民的品格已形成了完全错误和彻底荒谬的看法。

时下流行的对于俄国人民品格的评价，正如人们从欧洲和日本的报纸和一般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他们一般说来恶毒、狡诈和自私。下面我将传唤三个合格的证人，来证明俄国人的品格恰恰与时下流行的观点正好相反。

我要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单纯、未受教育、质朴无华的虾夷人。在我看来，唯其完全未开化，他的证词才更有价值。因为他的陈述不受世俗成见的影响，没有预设的偏见和假话，所以，他那单纯质朴的眼睛，反而能够透见事物真正的本质。一个早期日本作家林四兵卫（Hayashi Shibei），正如我在《神户记事》（Kobe Chronicle）的最近一期所读到的，他曾说：“那些来与俄国人接触的虾夷人，他们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胡椒、白糖和布匹的供应。在虾夷人的语言中，他们称俄国人为 Hori shii Shiyamo，意思是‘红色的好人’。”林氏解释虾夷人称俄国人用“红”字的缘由时说，那是因为俄国皇帝命令那些俄国人必须身穿红装。

我唤来说明俄国人民真正品格的下一个证人，是一个性情和生活状况同那些单纯未开化的虾夷人截然相反的人。

这个人，就是欧洲最有文化教养的智者：俄国女皇叶卡特

琳娜二世<sup>①</sup>。她的德国血统造就了她深沉的性格，欧洲最好的智识文化——18世纪法国哲学家文化，又赋予了她清澈、灵敏和明晰的眼光。她对俄国人的品格有着如下深思熟虑的评价：“宇内决没有比俄国人更果敢，更坚定，更真诚，更人道，更仁慈，更慷慨，更乐于助人的人了。没有人比得上他们那般五官端正、相貌堂堂、肤色好看、体格健壮和身材优美。他们绝大多数营养好，或者说反应敏捷、肢体强健。他们有着浓密的胡须、长长的头发，俄国人天生厌恶阴谋诡计，因为这与他们的诚实与正直完全不相容。没有人比他们更温柔亲切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和亲友；他们生来尊重父母和长上；服从命令时迅速而准确，并始终忠实可靠。”

最后，我要传唤来说明俄国人真实品格的第三个证人，是日本人自身——当代日本人。日本民族应该还记得现任俄国皇帝陛下从前在日本所遭遇的那场事故。他们肯定不会忘记在那种情况下，不仅俄国政府，而且俄国人民、俄国的新闻机关在对待这一事故和日本民族时，是多么通情达理，多么人道和慷慨。如果日本民族好好反省一下，找回其真实的自我，恢复其心灵的平静和判断的冷静状态，一定会承认，要是发生在俄国王储身上的同样事故发生在英国王子或德国王子身上，不要说英国政府或德国政府，就是英国或德国新闻机关及其民众，其对待日本民族的态度将会是多么不同。

我想我已经证明了时下流行的对俄国人品行的看法是极端荒唐的；总的说来，他们不仅不恶毒、狡诈和自私，而恰恰相

---

<sup>①</sup> 一译喀德邻二世（1729—1796），1762—1796年间在位。原为德意志一公爵之女，后废夫彼得三世，自立为皇。

反，根据上面的证词，他们是善良的、天生反感阴谋诡计的，因为狡诈与其生来的诚实和正直完全不相容。此外，他们还慷慨大方。

## 事实二

我要摆在日本民族面前的第二个事实，仍然是他们戴着外国眼镜，对于俄国外交和对外政策总的说来形成了同样不合理、不公正的评价。

时下流行的对于俄国外交与对外政策品格的评价，是认为它最富欺骗性、不可信赖和具有侵略性。

用不着我在此多费唇舌，显而易见，一个具有善良、反感狡诈、慷慨等民族性格的人所组成的国家或政府的行为，怎么可能会富于欺骗性，侵略性和完全不可信赖呢？因此，时下流行的对于俄国外交与对外政策品格的普遍看法，是难以想象的。

我实在很遗憾，此时此刻，我既无时间和空间，也没有可供使用的必要书籍，不然，我将能够证明俄国的外交及其对外政策不仅不富于欺骗性、侵略性、不可信赖，相反，我还能证明自彼得一世时代，或更确切些说自叶卡特琳娜二世以来至今，俄国的外交和对外政策是欧洲各国中最诚实、最凭良心的——不仅不具有侵略性，而且甚至可以说最谦让、最人道和最慷慨的。鉴于手头没有材料证明这一切，我将传唤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人，来证实我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即，俄国的外交并不是富于欺骗性的、不可信赖的。

我传唤的证人是俾斯麦公爵。他在其《思考与回忆》

(Gedanken U. Erinnerungen)一书和从圣·彼得堡的来信中，都清楚地驳斥和绝对地否认了那种认为俄国外交富于欺骗性和不可信赖的流行看法。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这本书，无法准确无误地征引俾斯麦公爵的话。但无论是谁，只要有兴趣去查证此书，都将能证实我所言不差。在我看来，俾斯麦公爵的证词，不亚于两万个能说会道的编辑为此所作的辩护。

### 事实三

我要冒昧地摆在日本民族面前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事实如下：

目前在世人看来，显而易见，是俄国方面对于日本的错误行动和不公正，给了日本民族对俄开战的正当理由——这些俄国方面明显的错误行动和不公正态度，绝大部分又被日本帝国政府误导和误用的政策火上浇油了。

我骤出此言似乎有些冒失。但我必须恳请我的日本兄弟心平气和地听我把话讲完。

我想这么说是不错的，即，在日本民族和世界看来，日本对俄开战的正当理由有如下两条：

1. ——俄国无理地占据满洲，并拒绝让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说七道八。

2. ——在讨论和协商满洲问题过程中，俄国政府对于日本的态度欠缺考虑，几近于无礼。

在此，为便于清楚地说明问题，我想先谈谈第一条中的第二点，即俄国拒绝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说七道八。说明这一点之

前，我将先代表俄国，明确地阐释一下俄国在满洲的真正政策。在满洲，俄国的真正政策，并不是拒绝日本和世界各国分享用俄国的钱、劳力和俄国人民的血汗开发的满洲资源中能够得到利益及一切合法的特权，而是绝对不允许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除了满洲的主人中国之外，以任何方式干扰俄国政府在满洲去做它认为正当的事情。简而言之，俄国在满洲的政策不是关上大门，拒绝一切或任何合法的外国贸易和事业，而是向一切妨碍俄国政府在满洲绝对自由行动的外国干涉关闭大门。

正是基于这种关门政策，俄国政府不允许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说七道八。我要在此指出的是，俄国的这种政策，建立在一个重大的原则之上，大俄罗斯帝国就是在这一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俄国政府放弃了这一重大原则，整个大俄罗斯帝国就会土崩瓦解、四分五裂。那么这一原则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它就是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所主张的：“除非一个国家的政府有绝对的权力去做它认为正当的事情，否则在那个国家，良治便无从谈起。”

因此，我说，俄国拒绝让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说七道八是基于一个原则，一个俄罗斯帝国政府不能放弃，一旦没有它，大俄罗斯帝国就会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原则。凡是仔细看过日本驻彼得堡使臣与东京之间往返电文的人（这些电文已由日本向世界公开），都将注意到拉姆斯多夫（Lamsdorff）伯爵对例野（Kurino）先生所谈到的困难，即俄罗斯帝国政府——当其完全决定在满洲做该做的事情时——他发现制定政策的任何变通策略、并将其插入俄日之间协约的任何条款中都是困难的。实际上，拉姆斯多夫伯爵本能地感到，作为一名有教养的真正的俄国绅士，如果他改动条款中的任何句子，稍作退让，或使那个

重大原则稍受损害，那么他就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叛卖者。这，我可以说就是那一重大原则——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所主张的原则，俄罗斯帝国政府在芬兰推行的、反对欧美那些正大喊大叫的乌合之众的原则。自称是他那个时代所有自由主义者中最为自由的德国诗人海涅，以惊人的洞察力指出：“Der Absolutismus in Russland ist vielmehr eine Dictatur Um die liberalen Ideen Unserer neuesten Zeit, in's Leben treten zu lassen”（专制主义在俄国毋宁说是一种真正的独裁，一种使我们时代自由主义观念得以产生的独裁。）。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我所谓的第一条的第一点问题了，即，俄国占据满洲显然是无理的。我已经在说明俄国对于满洲的政策中，谈到了她对日本和其他列强的态度。现在，我将在阐释俄国对于满洲的政策中，再论及她对于满洲的主人——中国的态度。俄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建立在一个原则上，即“la force attendant le droit”（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在此，我可以指出，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原则，外国列强在北京和天津的使馆保持强大的卫兵武装，就是采用的这个原则。事实上，依我看来，俄国在满洲驻军，倒比外国列强在使馆保持目前的卫兵武装还要有理由些。

然而人们会对我说：“所有这一切都说得不错，可是俄国有什么权力呆在满洲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抱歉，我必须从日本帝国政府陷入误导和误用的政策中谈起。

正如我在前文所提到的，日本民族为之做出惨痛牺牲并不得不武装起来的伟大目标——那种正当的目标，是要使欧洲民族，使全世界尊重日本和日本人。当日本民族致力于这项工作

的时候，她甚至赢得了包括欧洲人在内的人们的同情和赞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类人，他们本该比其他人更尊重日本民族，然而却没有显示应有的尊重——他们不尊重日本民族。这类人就是腐败的、奴颜婢膝、懦弱无能的中国官大人，也就是像李鸿章之流的人，他们与欧洲人亲昵并向其百般谄媚，因为这些欧洲人居住漂亮的洋房，挥金如土，享用香槟酒和昂贵的雪茄。不仅如此，那些身后跟着德国犹太狗的中国官大人，还看不起日本人，藐视日本民族——那为了保卫我们共同文明的事业而不惜出卖其少女贞操的日本民族。

这，我认为就是日本民族在 1894 年要与中国开战的真正 *Causa belli* (战争原因)，和正当理由。日本开战的目的，是要教训像李鸿章那样腐败、奴颜婢膝、懦弱无能的中国官僚，顺便说一下，此人后来成为中国寡头幕府集团的首领，要教训这些人尊重日本人——尊重日本民族。正如我们现在都知道的，日本民族实现了、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李鸿章只得在日本人面前屈膝求和。

在日本民族达到了他们向中国寡头统治集团开战的目标之后，他们要做的正当事情，道德法则所要求日本民族采取的行为路径，是要求足够的赔偿、赔偿战争费用，以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损失，这在战争结束后都是可以允许的。然而日本民族，或毋宁说当时的日本政府却超越了这一点，他们做得太过分，也就破坏了道德法则。*Hinc illae lachrymae!* (这就是他们的可悲之处!)

的确，在这里，我该借此机会说说当我读到东京的日本教授们鼓吹帝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论文时的心情。我当时忍不住自言自语道：这些东京的教授们实际上正在教唆日本民族破坏



道德法则，如果日本民族听从了这些教授们的话，他们就将变成像中国那些起而反抗邪恶、为公理而战的义和团拳民们一样的人。他们本来是为了捍卫道德法则而起，但最终自己却耽于抢掠，去抢劫和掠夺他人财物。最后，我要在此说的是，当日本民族变成中国义和团拳民时，就像天上有上帝，道德法则有效用一样可以肯定，欧洲民族将站出来，即使欧洲民族不站出来，其他民族或国家也会出来镇压日本这些扭曲的义和团拳民，正如八国联军 1900 年镇压中国义和团拳民一样容易。

言归正传。我说当日本民族要求中国割让领土、割台湾、割弃满洲时，便破坏了道德法则。在此，我要指出，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日本帝国政府当时要求中国开放新的通商口岸的做法，甚至比要求割让领土还要坏，因为要求割让领土，日本民族还只是出于为了自身利益的自私，而要求毫无益处地在中国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则是试图取悦、谄媚和讨好欧洲民族。日本人的这一行径，是极其卑鄙无耻的。

事实上，当日本民族要求中国割让领土时，他们下了一件“后义和团主义”（Latter-boxerism）的蠢事。正如我说过的，日本民族一旦变成“义和团拳民”，欧洲民族就会起来镇压他们。果然不出所料，如我们所知，俄、法、德三国出而阻止日本民族对中国、对满洲的中国财产施行“后义和团主义”的极端暴举。

以上，便是满洲戏剧性事件的第一幕。

现在，人们会问，三大列强阻止日本民族对满洲施行“后义和团主义”暴举的动机何在？在此，我将不考虑法德两国，关于他们在这一行动中的动机，我承认，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论据可以下结论。因此，我将只限于谈论俄国。那么，俄国要求日

本将满洲退还给中国的动机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借机说一说，在欧洲，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一件事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现代欧洲人理智的缺陷和不足，那就是，欧洲公众，尤其是大不列颠的公众，他们总是固执地将俄国政府的每一次行动，都归因于卑鄙的动机，歪曲和曲解其最明白不过的仁义和慷慨之举。当俄国现任皇帝陛下召集列强会议，商讨在列强中普遍裁军的问题时，就有那么一些狂妄自大、自以为高明的公众在那说七道八，如果他们实在不是精神错乱，就该是些荒唐可笑、应受到严厉谴责的无耻之徒——这些公众断言并试图证明虔诚的亚历山大一世的继承人，那个曾组织“神圣同盟”的俄皇之合格继承人的这一最人道的热心之举——现任俄皇的这一仁义之举，是最阴险、最恶毒、最不择手段的阴谋之一，它是俄国政府对欧洲列强的利用。

我现在能够回答那个问题了：即，俄国坚持要日本民族把满洲退还给中国的动机何在？

其实，这一动机与促使现任俄皇陛下召集列强会议商讨裁军问题的动机是一样的。俄国所以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是为了减轻世界的军事负担。我这样说恐怕有美化俄国之嫌，因此我纠正一下，俄国的动机毋宁说是为了减轻俄国人民的军事负担。

在此，我想补充一点，即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是非常自私的——我所谓自私，就是说不那么仁慈。俄国的外交政策不像其他欧洲国家的 *Kulturträger*（文化载体）政策，去寻求甚至诉诸侵略得以分享其他民族的贸易和商业利益——他们那“英国人绝不作奴隶”的自由制度的利益——他们那宏伟壮观的文明，*l'éblouissement de l'humanité*（人道

的炫光)的利益——他们那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军事系统的利益——他们宗教的利益。简而言之，俄国的极端自私，表现在他们绝不想给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带去光明。俄罗斯帝国政府唯一关心的是俄国人民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人是非常自私的。

我们还是来谈正题。俄国之所以希望满洲仍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变成日本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不是军事化的民族，而日本则已经变成了这样的民族。如果满洲变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俄国就将不得不在东部边境保持大批武装部队，这样就会加重俄国人民已经无法承受的军事负担。

实际上，俄罗斯帝国政府坚持将满洲退还中国的动机，只是想避免加重俄国人民的军事负担而已。的确，那些没有研究过因而不了解俄罗斯民族历史和品性的人，不知道俄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是多么强烈。俄罗斯民族那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堪称最为庄严雄壮的圣歌，就是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和平的。正是遵循俄国人民的和平热望，或更确切地说，在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推动下，亚历山大一世，那位欧洲历史学家还没有给予公正评价的、欧洲有史以来真正虔诚、品德最为优秀的统治者——组建了称之为“神圣同盟”的东西。它预示和宣告了自宗教改革以来，在欧洲，一种事物的状态，某些不是保护物质利益、而是保护文明、道德利益和上帝神圣的道德法则的国际联盟——必将出现，除非整个世界文明彻底毁灭，在这个星球上除了大炮和汽车碎片之外，什么也别想留下。正是出于同一种动机、受到俄国人民渴望和平意愿的激励与推动，现任俄皇陛下、亚历山大一世合格的继承人，召集了列强会议商讨普遍裁军问题。最后，我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帝国政府坚持要日本归

还满洲给中国，也是因为这一原因。

至此，满洲戏剧性事件的第一幕也就终结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满洲剧的第二幕，这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俄国人是怎样进入满洲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是中国主动自愿地要求他们来的。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败伏在日本脚下，欣喜若狂的日本民族误入歧途太远，他们竟然要对中国滥施“后义和团主义”暴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时候俄国出来帮助了中国。他将满洲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交到中国人手里。对此，中国自然极为感激。特别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中国“幕府寡头集团”，他们感激俄国，还因为俄国此举多少挽回了他们丢尽的面子。为此，他们大喜过望。李鸿章的幕僚，后成为驻英公使的罗丰禄<sup>①</sup>，高兴得都犯了傻，以致在巴黎接受法国新闻记者的采访时，竟挥舞着拳头，不仅蔑视日本，甚且蔑视英国。

请允许我在此解释一下中国的“幕府寡头集团”是怎么回事。对那些研究过本国历史的日本人而言，这个术语不难理解，而对于那些不懂得日本历史的外国人来说，做点解释还是必要的。中国的“幕府寡头集团”，是中国官员中所谓进步的亲欧派，李鸿章是其首领，巢穴在天津。他们掌握了中国政府的实权，控制了最有油水的肥缺和财权。与此同时，对此承担责任的却是北京政府，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sup>①</sup> 罗丰禄：福建闽县（今闽侯）人。字履臣。光绪初为驻英、法、德使馆翻译。后入李鸿章幕。1896年以记名海关道赏四品卿衔，任出使英、意、比大臣。1901年改为出使俄国大臣，未就任。

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前面说到中国对俄国感恩戴德。接着，中国的幕府寡头集团便说服北京帝国政府，提出要与俄国签订攻防同盟条约。李鸿章，那个幕府寡头集团的首脑，被派往圣彼得堡。

下面，我将说明俄罗斯帝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自制、诚实与正直。我说过，中国的幕府寡头集团通过俄国的调停，多少挽回了几分面子，因此，为了保有超越中国政府之上的特权，这个寡头集团便不顾一切去讨俄国的欢心，让她答应与中国签订攻防同盟条约。但俄罗斯帝国政府，出于正直，正如我所说过的，那种贯穿欧洲历史的俄国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品格，毫不含糊地拒绝了签订这样一个条约。

最后，中俄双方达成了一个折衷的协议<sup>①</sup>，俄国方面保留自行其事的权力，同时答应支援中国，在她认为合理和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为中国打仗。中国方面则给予俄国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力。我要在此指出的是，俄罗斯帝国政府在这一活动中非但不是自私自利的，而且任何人只要看过俄中协议和那个时期北京与圣彼得堡之间的电报，都必定会承认，它在这一活动中自始至终都是多么的正直。

我认为，俄国人就是这样进入满洲的。

利用这个机会，我将谈一谈大英帝国公众在满洲问题上，对俄国采取敌对态度的短视与蠢笨的恶意。在我看来，那实在无异于精神错乱。任何人只要稍稍考虑一下，就一定能看到，俄国修筑大西伯利亚铁路，即便实际上没有做到，至少也在努力去从事一项伟大的文明工作，即，通过开发地球上的荒芜之地

<sup>①</sup> 即所谓“中俄密约”。

为人类谋福利，同时为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与交往创造便利条件。我并不是说俄国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动机完全是出于慈善，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敢断言此举全然是出于自私。众所周知，西伯利亚铁路是向全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开放的。当俄国正在从事这一伟大文明工作的时候，人们所想到的是，每一个有资格被认作为文明的民族，都应该尽可能去帮助俄国人，帮助他们设法将其正在从事的伟大工作引向成功——起码，不应妨碍或阻挠他们去获得成功。

现在，假如说有什么能帮助使西伯利亚铁路获得成功，那就是让这条大西伯利亚铁路经过满洲延伸到中国海。然而满洲在法律上不属于俄国，而属于中国。如果俄国政府是一个不讲道德的政府，它就会找一个借口占据满洲。没有人会否认，为了使西伯利亚铁路顺利完工，占领满洲对俄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不知道别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抵御住这种诱惑。但俄国并没有非法占领满洲，而是取得满洲的主人中国的充分同意，来到满洲修筑铁路。不仅如此，俄国还同意并给予中国和中国人享用铁路、俄华银行，实际上享用修筑满洲铁路可能带来的利益的平等权力。

我之所以要说英国公众精神错乱，是因为英国人必须明白，俄国人将钱投入满洲，这笔钱的很大一部分在中国人中流通，扩散和渗透，必然要流入山东、直隶和或多或少进入中国的其他省份。这样，俄国人花费在满洲的钱，他们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回到他们自己手里——这笔俄国的钱实际上提高了整个中国的购买力。最终，中国人购买力的提高，如果说对谁有利的話，那么最为有利的，就是同中国有最大贸易的国家。

然而英国人对我说：“目前还刚刚开始，当俄国正花钱修路

的时候，事情的确是这样。但这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等铁路修好之后，他们就会关上门——关上满洲敞开之门。”对经济状况稍有知识的人肯定知道，即使俄国能够关闭此门她也不会去关。为什么？因为连俄国自身也不是一个工业国或制造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和原材料生产国。满洲的情况则更糟，它对于俄国人或任何想使其国民进入工业国的人都无甚益处。事实上，同俄国比起来，满洲更是一个农业和原材料生产区，如果俄国人帮助满洲增加原材料产量，那么他们要么只好把这些东西运到圣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博物馆去，供无所事事的参观者观摩欣赏，要么将这些原材料运往其他国家——到日本、美国和大不列颠，换回他们需要的工业制品。我以为，关于大不列颠公众在满洲问题上的精神错乱一点，我不必说得更多。

下面，我想讲讲俄国出兵满洲和它拒绝从满洲撤军的问题。

只需加以简单的说明，就能使人们对俄国行为的对与错一目了然。

我们假设有两个人 R 和 C 要合伙开一个商店，条件是：R 方出资购买商店将要出卖的商品，C 方则将他的部分房子提供出来当作商店使用。当 R 方花了一大笔钱买来商品，并将其置于 C 方作为商店用的房子中时，突然由于 C 方不小心和房子管理不善，或因坏客人的失误，致使房子失火，并蔓延到作为商店用的房子和商品储藏室。在这种情况下，C 方的邻居 R 方要做的最自然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会说，他要做的最自然的事情就是，不仅立刻派他的仆人去救火，而且将其留在那里照看商品，直到 C 方能承诺并给予满意的安全感为止，以便他（C 方）今后能够更好地照看房子，同时非常小心和留意什么样的客人可以允许他进入商品储藏室。

简而言之，俄国之所以出兵满洲，是因为中国的“义和团”使俄国人所拥有的财产——他们经中国充分同意带入满洲的财产面临到破坏与毁灭的危胁。

那么，俄国又为什么不愿从中国撤军呢？因为中国不会或者说不能给予它满意的安全感，中国受到恶毒劝告的迷惑并苦于外来的压力，无法承诺能够照管好俄国在满洲的财产，并给其以满意的安全感。

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唤起世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世界不是普遍的、令人遗憾地相信俄国是一个一贯不守诺言的民族、那么这个事实就不可谓不重要。这个事实是：当“义和团”和外国使馆卫兵们处在狂怒的灾难性争闹中的时候，中华帝国政府一面尽最大努力去制止“义和团”，一面致电圣彼得堡，要求双方协商并请俄国帮助中国说服其他列强采取措施制止使馆卫兵。俄罗斯帝国政府回电说：“我现在无法帮助你，因为你错了。除非你拯救使馆，使他们安全地脱离危险，我才帮助你。”一旦使馆脱离危险之后，俄国就履行了他的诺言，立即建议列强将军队从北京撤到天津。

我已经充分地解释了第一条，即，俄国明显无理地占领满洲及其拒绝让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说七道八。为了使整个事情更为清楚明了，我将扼要地作几条综述。

1. —— 俄国人是怎样进入满洲的？

俄国人进入满洲，是中国请求他们来的。双方进行过协商并征得了中国方面充分的同意。

2. —— 为什么俄国要派兵入满洲？

俄国派兵进入满洲，是因为中国的义和团使俄国人所拥有的财产，那种经过中国充分同意带入满洲的财产面临到破坏和



毁灭的威胁。

3. ——为什么俄国拒绝撤走它的军队？

俄国拒绝撤走它的军队，是因为中国不会或者说不能承诺与答应满意的条件，只有俄国自己能够保障它在满洲财产的安全。

4. ——为什么俄国拒绝让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说七道八？

俄国人拒绝这一点，是因为俄国在满洲对于日本和全世界的政策，除了满洲的主人中国之外，是一种对于利益均沾敞开门户，对于干涉关上大门的政策。

5. ——俄国后来在满洲对于中国的政策是什么？

俄国在满洲对于中国的政策，建立在一个非常自私的原则之上，这个原则与列强在北京和天津保留占领军所采取的原则是一样的，即“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6. ——为什么俄国在它的满洲政策中，对于日本和世界要采取关门反对干涉的态度？

因为俄国政策中这种关门反对外来干涉的态度，基于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大而正当的原则——一个俄罗斯帝国政府绝不能放弃、否则大俄罗斯帝国就会土崩瓦解的原则。

7. ——俄罗斯帝国的那一重大原则是什么？

这一原则就是比康菲尔德勋爵所主张的：“我不知道君权神授的理论是否还站得住脚，但我相信，除非一个国家的政府有绝对的权力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良治便无从谈起。”

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条，实际上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当讨论满洲问题时，俄国人的不友好态度表明其欠缺考虑，对日本几近于无礼。

在此，我想说的是，俄国对日本的不友好态度，无论是军

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都已直接被日本帝国政府所误导与误用的政策火上浇油了。这一强化物是什么？就是英日同盟<sup>①</sup>。这个同盟刚一缔结时，我就对英国朋友说，该同盟将要破坏远东的和平。当然，我毫不怀疑英国和日本在签订这一协约时都抱有美好的愿望，可是任何人，只要他心平气和地审视此事，就必定承认，英日同盟的直接结果，是不仅将两个极为讨厌的道德因素引入了对远东怀有兴趣的国家政策与国际关系之中，而且将其强化了十倍——这两个道德因素就是嫉妒与猜疑。这就是我要说英日同盟是一个破坏了远东和平的同盟的原因。事实上，英日同盟也是一次破坏，破坏了对远东感兴趣的欧洲国家之间团结与友情的行动。因此，任何以公平无私的观点看待此事的人都将发现，英日两国对此同盟负有责任的政治家是一些应受到严谴的罪人。他们的判断能力欠缺到以致于要犯罪的程度。不管怎么说，对于日本民族来讲，英日同盟是日本与欧洲各国开始接触以来，那些当权的日本政治家所走下的最具灾难性的一步棋，如果没有这个英日同盟，俄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仅对于日本和在朝鲜的日本人，而且对于中国和满洲的中国人的态度，都将十分不同。事实上，如果没有英日同盟，满洲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日本人民，只要他们心平气和地观察一下诸事，就必定会发现，英日同盟的缔结无异于向世界表明，日本民族要去介入

<sup>①</sup> 英日同盟：1902年英日两国为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以及为侵略中国和朝鲜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它规定：（1）双方承认彼此有权干预中国和朝鲜的内政；（2）一方如对第三国作战，他方应守中立；一方如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作战，他方应予军事援助。日本依靠它进行了对俄战争，侵略了中朝两国。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被废止。

欧洲政治，要去参与欧洲各国荒唐而疯狂的“殖民政治”竞赛。这种竞赛在欧洲各国，不是由其国王和统治者所推动，不是由民族中的精英人士所推动，而是由一帮乌合之众所左右，被那些拥有新式金科玉律，正如我曾说过的、不用欺骗邻居就能占邻居便宜的那种金科玉律的群氓所引导的竞赛。事实上，日本民族正在去加入欧洲各国彼此争斗的疯狂的现代政治竞赛中。

诚然，没有什么当然的理由可以反对日本民族去参与欧洲政治，并由此变成一个强国——一个真正强大的、盖过全世界的训练有素的帝国主义。我以为，没有什么当然的理由反对日本民族做这一切甚至走得更远些。不过，我要奉劝日本民族的是，如果他们听从了其英国朋友或东京教授们的话，企图通过参与欧洲殖民政治的疯狂竞赛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那么日本民族就像孟子所谓的缘木求鱼者一样，将得不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

以上，就是我认为有责任摆在日本民族面前的三个事实。下面，我将尽可能简短地谈一谈我要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两个事实。

### 事实一

我要摆在俄罗斯民族面前的第一个事实是：尽管俄罗斯帝国的重大原则——那个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所主张的原则是正当的，但它后来在贯彻这一重大原则过程中所使用的代理人或工具及方法却有缺陷，以致于造成了灾难。

过去二十年里，我没有机会与俄国最高层官员——如罗森

(Rosen) 男爵和雷萨尔<sup>①</sup> 先生保持个人或官方的联系——但我却有很多机会与俄国中下层官员进行接触，像那些在华领事和译员之类。从我个人的亲身感受和从别人那里听到的经验来看，我必须指出，被派到远东来的俄国外交官一般说来，正如去年在北京一个英国使馆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是一些你不动怒就无法与之讨论严肃问题的人。事实上，也许除了罗森男爵和雷萨尔先生那样的人之外，一般俄国的外交官员都是些完全没有自由教养或文化素养的人。他们所受的自由教育的程度限制了他们自身，以致于只能用法语书写和打印僵硬刻板的程式化公文。

在此，我冒昧地提醒俄罗斯帝国政府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去年我在北京发现，俄国驻华使馆中没有一个是具有能力的中文翻译。当人们考虑到俄国目前通过开放满洲铁路在中国所拥有的巨大利益时，仅这样一个事实就足以暴露出情形是多么可怕！爱默生说：“政府总是太晚才懂得，任用不诚实的（或无能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就如同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不过，俄罗斯帝国政府在公职服务中找不到有能力的、真正有教养的人员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一原因，就在于它后来努力贯彻俄罗斯帝国的重大原则时所采用的方法上。

我不知道是否确实，但我确曾听说，在俄罗斯帝国的公函里，末尾惯常用的一句是“别多说”，好比英国公文里所谓的“上帝拯救国王”，和我们中国的上谕中所用的“钦此”。依我的愚见，俄国目前统治方式中的这一意味深长的习惯用语，就像奉行俄罗斯帝国的重大原则遭致的失败一样，肯定要毁掉大俄

---

<sup>①</sup> 雷萨尔 (Paul Mikhailovitch Lessar, 1851—1905)：俄国外交官，1902—1905 年任驻华公使。

帝国。因为当俄国皇帝习惯于对他的大臣们使用“别多说”的短语时，我想将没有一个真正有教养有自尊的人愿意去做俄国大臣。同样，如果政府各部门的首脑无论何时下达命令，都要使用“别多说”的惯用语，那么该部门的所有属员就只能变成机器，成为一些只会用法语写僵硬刻板公文的人。事实上，整个政府机构就会因此变成人们称之为的“官僚主义”或死机器，不仅堵死本国人民的生路，而且还会因此触怒他国人民，直到他国人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出义和团、红胡子或战船去捣毁那个死机器为止。

这，我相信就是俄国政府何以找不到有能力和真正有教养的人，将他们送到远东去做那些人们不必动怒就可以与之讨论严肃问题的外交官和领事人员的原因。

中国古代某诸侯国的国君（指鲁定公——译者）曾问孔子：“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回答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 事实二

我要摆在俄罗斯民族面前的第二个事实，是我在谈及日本民族所犯错误时没有提到的，现在我要告诉俄国人民，俄罗斯民族及其帝国政府在导致这场战争中犯下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一个比日本民族所犯的任何错误还要大得多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在与中国和日本民族打交道时，不知道和没有充

分地认识到他们是在与一个非常文明的民族在交往。这样的民族不同于他们迄今为止所接触的那些中亚的部族，他们更服从于道德力量，而不是残暴的武力，更不必说只是那种残暴武力的炫耀与威胁了。

许多没有能力理解人类心理活动的人，怀疑俄国民族对于日本的义愤是否出自真诚。然俄国人的义愤的确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无论是俄国民族还是俄国政府，实在都没有进攻日本或侵略日本的任何意图，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自身的做法的是公正的、甚至于根本没有想到日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进攻他们。关于俄罗斯民族，我能够说的就这么多。

然而我必须指出，尽管俄国人对于日本人的义愤是真诚的，但却不公平，非常不公平。这就好比一个拥有大枪在手的大汉，做了某种事情，被另一个手握短枪的小矮个子明显地、甚至不公正地误解为侮辱，这时大汉应该做的，最好是通过道德手段使矮个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大汉不这样做，而只是耸耸肩，枪弹上膛——在这种情况下，大汉有权生气，矮个子则愈发怒火满腔，他见以小枪对抗大枪处境不妙，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大汉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装好子弹的时候，便突然向大汉开枪射击。

实际上，俄国政府在目前这场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与1900年（庚子年）外国使臣在北京所犯的错误的是一样的。1900年，在北京的外国使臣们得知中国各个阶层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排外情绪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以一种道德力量平息这种情绪；要么以一种物质力量扑灭这种情绪。然而外国使臣们却一条也未采纳，他们所采取的是第三条异乎寻常的道路，即物质力量的炫耀与威胁——他们只是往中国派入了少量的使

馆卫兵，刚好够把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推至高潮，而不足以做任何别的事情。现在我们都已知道了这种异乎寻常做法的结果。为了对他们公平起见，必须指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亚洲的一个懦弱民族，只需几个武装的白人便足够唬住和吓倒他们。殊不知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他们能够感到正如孟子所说的：“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同样，在目前这场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帝国政府也一定知道在日本各阶层人士中已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反俄情绪。《日本邮报》，一份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曾不断提醒世界注意日本民族的这一精神状态。同1900年北京的外国使臣一样，这时的俄国政府也面临着两条道路，而它却选择了第三条特殊道路，即，既不是以道德手段，也不是以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消弭日本的反俄情绪，而只是诉诸武力威胁而已，其结果，我们现在都已有目共睹了。今日的旅顺港就是1900年的北京公使馆，只不过不幸的是，没有一个头脑冷静的帝国国母（指慈禧太后——译者）往那倒霉的堡垒里去送西瓜了！

俄国政府之所以会犯与1900年外国使臣在华所犯的同样错误，是因为该政府以及俄罗斯人民在与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在与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在交往。不仅如此，这个民族还与中国那可怜的过激主义者义和团拳民不同，它是一个拥有高质量的炮场和训练有素的炮兵的民族。

以上，就是我认为有责任摆在俄国民族面前的两个事实。

如果日俄双方的人民都反省自己，找回他们的真正自我，恢复到其心灵的平静状态并保持其判断的冷静公正，我敢肯定，他

们都将能够明察我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事实。一旦他们双方都像我一样地明察这些事实，那么我相信，他们就都将禁不住感到彼此都已成为可怕误解的牺牲品，当两个民族，特别是两个道德的和文明的民族认识到他们彼此都已成为可怕误解的牺牲品时，这两个民族的绝对责任，如果他们真像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关心人类和文明的利益的话（对此我毫不怀疑），那么就是必须立即结束目前这场不幸的战争。

两国的军人们都已在战斗与牺牲中各自为可敬的祖国尽到了责任。现在该是日俄两国国内的民众尽他们责任的时候了——要敢于去做那些道德上公正的、有助于立即结束这场不幸战争的事情。伟大的法国人丹东在祖国的危难之际曾说：“让我的名字泯灭吧，只要能拯救我的祖国法兰西！（*Que mon nom soit flétri, mais que la France soit sauvée*）”本朝（指清朝——译者）的一位中国政治家更为冷静地表达过同样的思想：“我宁为天下之所不韪，我不为我心之所不安。”

我以为，现在也该是日俄两国的政治家——那些对于其可敬的人民的幸福负有责任的人们，像两国的军人一样显示其勇敢的时候了——要勇于制造和平，并因此将他们的国家从这场不幸战争的更加灾难性的后果中拯救出来。

如果真有可能，我将冒昧地走到日本天皇陛下面前，首先恭请陛下记住我们共同拥有的古代文学的教诲：“兵犹火，不敢将自焚也。”其次，我将请天皇陛下记住伟大的德川家康所说的话：“治天下之道在于慈。”请求他怜悯日本人民——他那正遭受痛苦的臣民。最后，我将最恭敬地恳请天皇陛下记住那个伟大目标，我们共同的文明的目标，陛下伟大的圣父1853年祭祖时宣告并发誓要保卫的目标。我恭呈陛下注意，如果这场不幸



的战争还被允许延续更久，那么这一伟大目标就将陷入危险之中。因为臣民的痛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他们能忍受的极限，人们就会陷入混乱。实际上，当日本军队在满洲赢得胜利，外国报纸为之喝彩叫好时，日本国内民众所遭受的贫困痛苦业已超过了极限，他们由此将变得极度混乱，不道德和不文明，以致于将得不到任何文明民族的尊重。现在，日本民族打这场战争的目标，即，使欧洲民族尊敬日本人的目标已经达到。甚至于库罗伯特金将军也说：“日本军人在战斗中不仅勇敢，而且侠义，如同绅士。”

在结尾，我将毕恭毕敬地恳请日本天皇陛下召集他最忠诚最有能力的顾问官，把我所写的东西摆到他们面前，在他们充分考虑过我的观点之后，问问他们：这场不幸的战争究竟是不是由两国政府的误解所造成？如果他们充分地考虑过我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说我错了——这场战争不是误解的产物，而是俄国的邪恶及其侵略意图的结果，因此日本必须战斗到底——要真是那样，我无话可说。但如果陛下忠实而有能力的顾问官们同意我的观点，那么我将恭请陛下立即给俄皇陛下拍一封电报，请求在下述两条提议中任选一条结束战争：要么将两国间的现有争端全部提交海牙国际和平法庭去裁决，要么，更好一些，同意两国政府直接接触，在除中国之外不允许任何其他列强干涉的情况下，商讨解决目前的争端。从过去对俄国历史的研究来看，我完全确信俄国人民的诚实与慷慨，以致于坚信如果日本天皇陛下通情达理地采纳我冒昧建议的步骤，不仅两国间的和平与友谊很快会建立起来，甚至和平与友谊的到来将附着对于痛苦的日本民族来说非常慷慨而有利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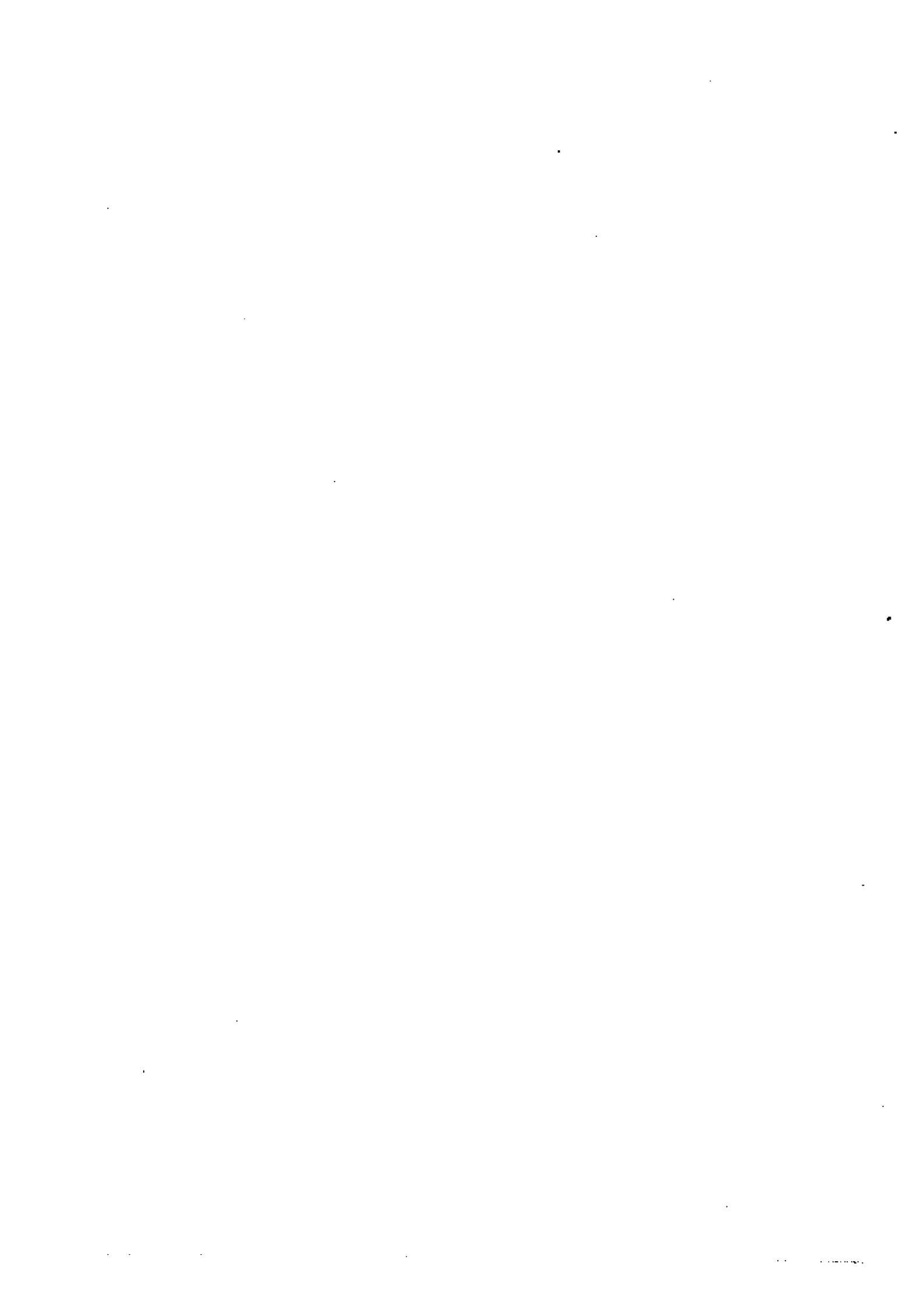
将来某一天，当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传到俄国，到达俄国皇

帝陛下眼前，他或许还记得多年以前他访问汉口时，我做过他与张之洞总督之间的翻译——如蒙俄皇陛下读到我所写的这些东西，我将敬请他听从俄国人民渴求和平的愿望；记住俄罗斯帝国的传统政策，他那虔诚的、神圣的祖先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这种政策更关心的是人类和文明的道德利益，而不是物质利益，更不用说只关心军事上的荣耀了。

最后，我要专门给那些在远东拥有利益的欧洲民族一些忠告。他们应当从这场日俄战争中得到最重要的教训，即必须懂得，当 they 与日本和中国民族打交道时，他们是在同高度文明的人民在交往，这些人更服从于道德而不是残暴的武力。如果欧洲民族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继续在远东坚持英国报纸称之为的“枪炮政策”，那么总有一天，他们会像今日的俄国人民一样，被猛烈而痛苦地震醒过来。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crudimini qui judicatis terram! (且听着，统治者，请明察：决定世界事务的人，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

辜鸿铭硕士

武昌，1904年11月21日



## 致汪康年书<sup>①</sup>

穰卿吾兄大人阁下：

昨奉惠书，承荷垂念，至以为感。前允寄拙作，所议论皆迂远，不切时事，恐与贵报体裁实不相符，然前既允诺，今即照寄上，用舍唯兄酌之。如列入报中，请先刻戈登事及赠日人序，后再刻其余。近日南皮入京，<sup>②</sup>，弟恐亦不免随节同行，相见在即，余容面谈。此请著安。弟汤顿首。（又月十一到）

---

① 此信录自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光绪进士。张之洞幕僚，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时与辜鸿铭结识。1896年，他与黄遵宪创办《时务报》，延梁启超为主笔，鼓吹变法。1904年入京任内阁中书。1907年创办《京报》，1910年又创《刍言报》。

② 南皮入京：指张之洞晋京。查张之洞进京约有两处，一次为1903年5月，一次为1907年9月。见《张文襄幕府纪闻》中《不拜官》一篇有“丁未年（1907），余随张文襄入都”一句，因疑此信即作于此时。大概是汪康年新创《京报》，让他写稿。

## 给托尔斯泰的祝寿文<sup>①</sup>

今日我同人会集，恭祝笃斯堆<sup>②</sup> 八秩寿辰。窃维先生当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归于正道，钦佩曷深。盖自伪学乱真、刍狗天下，致使天下之人汨没本真，无以率性以见道。惟先生学有心得，直溯真源，祛痼习而正人心，非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欤？至若泰西各国宗教，递相传衍，愈失其真，非特无以为教，且足以阻遏人心向善之机。今欲使天下返本归真，复其原性，必先开民智，以祛其旧染之痼习，庶几伪学去，真学存，天下同登仁寿之域焉。今天下所崇高者，势力耳，不知道之所在，不分贵贱，无有强弱，莫不以德性学术为汇归。今者与会同人，国非一国，顾皆沿太平洋岸而居，顾名思义，本期永保太平。孰知今日各国，专以势力相倾，竞争无已，匪特戕贼民生，其竟也，必至互相残杀，民无噍类。故欲救今日之乱，舍先生之学之道，其谁与归？今之所谓宗教，如耶、如儒、如释、如道，靡不有真理存乎其中，惟

---

① 此乃辜鸿铭1908年8月受“亚洲太平洋协会”同人委托所起草的给托尔斯泰的祝寿文。原始出处不详。录自杜英穆：《崇古好辩的辜鸿铭》一文，见《梁启超、辜鸿铭、章炳麟》第二篇（台湾《别传丛书第五种·学术名家别传》）

② 笃斯堆：Tolstoy的音译，今译为托尔斯泰。

是瑕瑜互见，不免大醇小疵；各国讲学同人，如能采其精英，去其芜杂，统一天下之宗教，然后会极归极，天下一家，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为祝。

## 雅俗辨

——译辜鸿铭博士二十五日致《文汇报》主笔书<sup>①</sup>

昨贵报刊论说一篇，题曰《中国人与外国人》，内有“外国人以其所学所行，振拔中国人成一种族，过于中国数千年圣贤”一语。余愿凡读《文汇报》，而曾读余近著之《中国欧斯福大学一事》之绪论者，咸留意于斯言。因忆艾诺尔德<sup>②</sup>文集内某篇，曾引用马凯雷之言，其语意语气，与昨贵报论说之词名相似。马凯雷之言曰：“今日通行英国之文学，较之三百年前世界之文学，殆远过之。”艾诺尔德从而议之曰：“斯言诚然。独不思斯宾诺塞<sup>③</sup>之名言乎，‘自夸乃身心之害之一端也’。”艾诺尔德复谓，我曹若是之自夸，我曹之文学，出以马凯雷矫健之文笔，既入粗俗而又自画矣。”外国友人之曾读余所撰《中国欧斯福大学一事》之短篇绪论者，曾询余所谓今日输入中国之欧洲文化之粗俗，应作何解？余思余所指之粗俗，余所谓可骇之粗俗，就余所引昨晚《文汇报》之词句证之，蔑以加于此矣。余

① 此文录自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出版的《尚贤堂纪事》第四册“晨杂录”之“译辑门”。

② 艾诺尔德：现一般译为阿诺德，即马太·阿诺德。

③ 斯宾诺塞：现一般译为斯宾诺莎。

更欲一言以申明之。夫往日中国圣贤之所以未能振拔华人者，或圣贤误教华人以自夸自骄为非德行，亦如斯宾诺塞所言谓为身心之害者。然今日华人，如效法外人，而争自夸傲，则华人将一振而至于前数千百年来未至之地位。窃谓如昨晚贵报所刊之论说，极有关系，比之《字林西报》所载运动聚会之纪事，固较有关系，而于有思想之人，亦大有裨益也。有思想之人，读余所援引之词句，必引法国之成语曰：“余虽触于怀，而于余心滋有得也。”





华英合璧  
**痴汉骑马歌**  
鸿铭辜汤生译

JOHN GILPIN  
DONE INTO CHINESE  
BY KU HUNG MING.

这是辜鸿铭所翻译的英国 18 世纪诗人科伯 (William Cowper) 的一首叙事长诗。它描述了布贩子约翰·基尔宾 (John Gilpin) 骑马出游的趣事。全诗生动诙谐，是科伯的精品。辜鸿铭翻译的这本小册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上未标明翻译和出版的年月。疑出版于 1905—1910 年之间。可参见胡适《四十自述》。

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

1

JOHN GILPIN was a citizen  
Of credit and renown,  
A train-band captain eke was he  
Of famous London town.

昔有富家翁，  
饶财且有名，  
身为团练长，  
家居伦敦城。

2

John Gilpin's spouse said to her dear,  
    "Though wedded we have been  
These twice ten tedious years, yet we  
    No holiday have seen.

妇对富翁言，  
结发同苦艰，  
悠悠二十载，  
未得一日闲。

3

"To-morrow is our wedding-day,  
    And we will then repair  
Unto the Bell at Edmonton,  
    All in a chaise and pair.

明日是良辰，  
城外好风景，  
愿乘双马车，  
与君同游骋。

4

“My sister, and my sister's child,  
Myself, and children three,  
Will fill the chaise; so you must ride  
On horseback after we.”

阿姨与其女，  
妾偕三小儿，  
一家盈车载，  
君当骑马随。

5

He soon replied, “I do admire  
Of womankind but one,  
And you are she, my dearest dear,  
Therefore it shall be done.

富翁对妇言，  
相敬既如宾，  
若不从汝言，  
相爱岂是真？

6

"I am a linen-draper bold,  
As all the world doth know,  
And my good friend the calender  
Will lend his horse to go."

我是贩布客，  
声名驰寰区，  
有友情更重，  
愿借千里驹。

7

Quoth Mrs. Gilpin, "That's well said;  
And for that wine is dear,  
We will be furnished with our own,  
Which is both bright and clear."

君言诚良是，  
还当载美酒，  
沽市酒值昂，  
家醕旨且有。

8

John Gilpin kissed his loving wife,  
O'erjoyed was he to find  
That, though on pleasure she was bent,  
She had a frugal mind.

妇言良可钦，  
富翁喜不禁，  
虽怀行乐志，  
犹存节俭心。

9

The morning came, the chaise was brought,  
But yet was not allowed  
To drive up to the door, lest all  
Should say that she was proud.

请朝将车来，  
未许直到门，  
趋车出庭户，  
恐惹他人论。



10

So, three doors off the chaise was stayed,  
Where they did all get in.  
Six precious souls, and all agog  
To dash though thick and thin.

相去两三户，  
车马立踟蹰，  
大小六家口，  
登车任驰驱。

11

Smack went the whip, round went the wheels,  
Were never folk so glad;  
The stones did rattle underneath,  
As if Cheapside were mad.

鞭声何得得，  
轮影何团团，  
黄尘匝地起，  
行人举首观。

12

John Gilpin, at his horse's side,  
Seized fast the flowing mane,  
And up he got, in haste to ride—  
But soon came down again;

富翁立马旁，  
双手握马鬃，  
上马不成骑，  
下马复匆匆。

13

For saddle-tree scarce reached had he,  
His journey to begin,  
When, turning round his head, he saw  
Three customers come in.

富翁方上鞍，  
去心留不住，  
回首一顾盼，  
有客来买布。

14

So down he came; for loss of time  
Although it grieved him sore,  
Yet loss of pence, full well he knew,  
Would trouble him much more.

欲去不能去，  
欲留心不甘，  
失时虽云苦，  
失财更难堪。

15

'Twas long before the customers  
Were suited to their mind,  
When Betty, screaming, came downstairs,  
“the wine is left behind!”

客意实难合，  
相将又费时，  
秋香忽来报，  
美酒犹在兹。

16

“Good lack!” quoth he -- “yet bring to me  
My leathern belt likewise,  
In which I bear my trusty sword  
When I do exercise.”

富翁大惊异，  
命婢将酒来，  
取我佩刀带，  
佩刀慎莫开。

17

Now Mistress Gilpin Careful soul!  
Had two stone bottles found,  
To hold the liquor that she loved,  
And keep it safe and sound.

贤妇善绸缪，  
特恐酒味走，  
寻有两玉壶，  
玉壶载美酒。

18

Each bottle had a curling ear,  
Through which the belt he drew,  
And hung a bottle on each side,  
To make his balance true.

富翁既结带，  
玉壶各有环，  
将带穿环口，  
左右挂腰间。

19

Then over all, that he might be  
Equipped from top to toe,  
His long red cloak, well brushed and neat,  
He manfully did throw.

衣冠既齐整，  
长袍复加身，  
侃侃意气扬，  
顾盼无比伦。

20

· Now see him mounted once again  
Upon his nimble steed,  
Full slowly pacing o'er the stones,  
With caution and good heed.

富翁复上马，  
石路多崎岖，  
款款行石路，  
兢兢防疏虞。

21

But finding soon a smoother road  
Beneath his well-shod feet,  
The snorting beast began to trot,  
Which galled him in his seat.

行到康庄道，  
渐觉马蹄忙，  
马既适所意，  
那顾人张皇。

22

So "fair" and "softly," John he cried,  
But John he cried in vain;  
That trot became a gallop soon,  
In spite of curb and rein.

呼马缓缓行，  
无奈马不听，  
缰辔勒不住，  
长驱莫与竞。

23

So stooping down, as needs he must  
Who cannot sit upright,  
He grasped the mane with both his hands  
And eke with all his might.

马上坐不稳，  
腰折未敢直，  
两手握长鬃，  
用尽平生力。

24

His horse, who never in that sort  
Had handled been before,  
What thing upon his back had got  
Did wonder more and more.

名马事人多，  
未经如此骑，  
何物覆背上，  
惊疑不可知。

25

Away went Gilpin, neck or nought;  
Away went hat and wig!  
He little dreamt, when he set out,  
Of running such a rig.

任马狂奔去，  
冠巾随风飘，  
出门意气高，  
到此竟悴憔。



26

The wind did blow, the cloak did fly,  
Like streamer long and gay,  
Till, loop and button failing both,  
At last it flew away!

长袍随风舞，  
飘飘若悬旌，  
钮扣支不住，  
飞去更无情。

27

Then might all people well discern  
The bottles he had slung;  
A bottle swinging at each side,  
As hath been said or sung.

长袍既飘去，  
露出双玉壶，  
玉壶左右摆，  
一若悬葫芦。

28

The dogs did bark, the children screamed,  
Up flew the windows all;  
And every soul cried out, "Well done!"  
As loud as he could bawl.

犬吠杂童呼，  
窗牖家家开，  
同声齐喝采，  
仿佛听春雷。

29

Away went Gilpin—who but he?  
His fame soon spread around;  
"He carries weight! —he rides a race!  
'Tis for a thousand pound!"

富翁去如飞，  
四邻尽传谣，  
此人赛走马，  
欲得千金标。

30

And still, as fast as he drew near,  
    'Twas wonderful to view,  
How in a trice the turnpike men  
    Their gates wide open threw.  
行到北市关，  
守者望马来，  
急急起欢迎，  
将门大张开。

31

And now, as he went bowing down  
    His reeking head full low,  
The bottles twain behind his back  
    Were shattered at a blow!  
低首伏马上，  
汗流竟浹背，  
背后双玉壶，  
一时尽破碎。

32

Down ran the wine into the road,  
Most piteous to be seen;  
Which made his horse's flanks to smoke  
As they had basted been.

酒流满道路，  
美酒最可怜，  
马身灌美酒，  
气蒸如出烟。

33

But still he seemed to carry weight  
With leathern girdle braced;  
For all might see the bottle necks  
Still dangling at his waist.

富翁仍负重，  
走马兴未阑，  
壶碎颈犹在，  
飘零系腰间。

34

Thus all through merry Islington

These gambols he did play,

Until he came unto the Wash

Of Edmonton so gay;

如此颠狂态，

行遍城郭外，

直到清溪边，

风景美如绘。

35

And there he threw the Wash about

On both sides of the way,

Just like unto a trundling mop,

Or a wild goose at play.

随马入清溪，

左右拂溪水，

如球滚水中，

如禽戏水里。

36

At Edmonton his loving wife  
From the balcony spied  
Her tender husband, wondering much  
To see how he did ride.

妇立倚阑干，  
遥望眼欲穿，  
忽见狂驰马，  
心中如火煎。

37

“Stop, stop, John Gilpin! —here’s the house;”  
They all at once did cry;  
“The dinner waits, and we are tired;”  
Said Gilpin “So am I!”

齐声呼停马，  
午餐已过时，  
富翁远回答，  
晚餐未有期。

38

But yet his horse was not a whit  
Inclined to tarry there;  
For why? —his owner had a house  
Full ten miles off, at Ware.

马悬主家厩，  
直奔不肯止，  
主家在邻村，  
相去三十里。

39

So like an arrow swift he flew,  
Shot by an archer strong;  
So did he fly—which brings me to  
The middle of my song.

马飞如矢箭，  
富翁真痴汉，  
狂态写长歌，  
到此得一半。

40

Away went Gilpin out of breath,  
And sore against his will,  
Till at his friend the calender's  
His horse at last stood still.

富翁气喘喘，  
狂奔不回顾，  
直到主人家，  
马足始停驻。

41

The calender, amazed to see  
His neighbour in such trim,  
Laid down his pipe, flew to the gate,  
And thus accosted him;

主人闻客至，  
出门来相迎，  
见是富家翁，  
心中喜且惊。



42

“What news? what news? your tidings tell;  
Tell me you must and shall—  
Say why bareheaded you are come,  
Or why you’ve come at all!”

问君何处来，  
问君欲何之，  
不巾亦不冠，  
问君欲何为。

43

Now Gilpin had a pleasant wit,  
And loved a timely joke;  
And thus unto the calender  
In merry guise he spoke:

富翁善戏谑，  
出语多诙谐，  
既辱见询问，  
敢陈下鄙怀。

44

"I came because your horse would come;  
And, if I well forebode,  
My hat and wig will soon be here---  
They are upon the road."

君马怀主人，  
我故来相望，  
冠巾行不远，  
已在道路上。

45

The calender, right glad to find  
His friend in merry pin,  
Returned him not a single word,  
But to the house went in;

主人闻客言，  
故亦不张皇，  
不待答言语，  
转身入室堂。

46

Whence straight he came with hat and wig;  
A wig thus flowed behind,  
A hat not much the worse for wear—  
Each comely in its kind.

入室取冠巾，  
头巾何连连，  
冠犹旧家样，  
不新亦不鲜。

47

He held them up, and in his turn  
Thus showed his ready wit;  
“My head is twice as big as yours,  
They therefore needs must fit!

主人亦滑稽，  
奉冠立道傍，  
君之头颅小，  
自然能戴上。

48

“But let me scrape the dirt away  
That hangs upon your face;  
And stop and eat, for well you may  
Be in a hungry case.”

君面满灰尘，  
敢请为君扑，  
且住加餐饭，  
聊以充枵腹。

49

Said John, “It is my wedding-day  
And all the world would stare  
If wife should dine at Edmonton,  
And I should dine at Ware.”

富翁转回答，  
夫妻同出门，  
半途各西东，  
岂不被人论。

50

So, turning to his horse, he said,  
“I am in haste to dine;  
’Twas for your pleasure you came here,  
You shall go back for mine.”

回首向马耳，  
我腹已苦饥，  
我既为尔来，  
尔曷为我归。

51

Ah, luckless speech, and bootless boast!  
For which he paid full dear;  
For, while he spake, a braying ass  
Did sing most loud and clear;

侈口何容易，  
自来满招损，  
正在言语间，  
有驴鸣近苑。

52

Whereat his horse did snort, as he  
Had heard a lion roar,  
And galloped off with all his might,  
As he had done before!

马闻驴声嘶，  
仿佛闻狮吼，  
又发狂逸性，  
往前直奔走。

53

Away went Gilpin, and away  
Went Gilpin's hat and wig!  
He lost them sooner than at first,  
For why? - they were too big!

任马狂奔逸，  
冠巾又飘去，  
冠大头颅小，  
飘去更匆遽。

54

Now Mistress Gilpin, when she saw

Her husband posting down

Into the country far away,

She pulled out half a crown;

妇见富翁去，

遥遥未得还，

急切无计较，

探囊取金钱。

55

And thus unto the youth she said,

That drove them to the Bell,

“This shall be yours when you bring back

My husband safe and well.”

持金谓童仆，

若得囊砧旋，

旋归且无恙，

赏汝此金钱。

56

The youth did ride, and soon did meet  
John coming back amain;  
Whom in a trice he tried to stop,  
By catching at his rein;  
童仆去未远,  
富翁来仓皇,  
为欲止马住,  
伸手捉马缰。

57

But not performing what he might  
And gladly would have done,  
The frightened steed he frightened more,  
And made him faster run.  
本欲止马住,  
奈力不从心,  
马反为所惊,  
纵去不可擒。



58

Away went Gilpin, and away  
Went post-boy at his heels,  
The post-boy's horse right glad to miss  
The lumbering of the wheels.

富翁去如飞，  
童仆踵其后，  
童马脱羁绊，  
得意自昂首。

59

Six gentlemen upon the road,  
Thus seeing Gilpin fly,  
With post-boy scampering in the rear,  
They raised the hue and cry: —

道旁六骑士，  
遥见富翁来，  
童子逐其后，  
情景真怪哉。

60

“Stop thief! stop thief! —a highwayman!”

Not one of them was mute;

And all and each that passed that way

Did join in the pursuit!

捉贼复捉贼，

六人齐声呼，

一时行路者，

相率接履趋。

61

And now the turnpike gates again

Flew open in short space;

The toll-men thinking, as before,

That Gilpin rode a race.

又过北市关，

门开见守者，

守者思如前，

此人赛走马。

62

And so he did, and won it too,  
For he got first to town;  
Nor stopped till, where he had got up,  
He did again get down.

富翁果赛马，  
争至伦敦城，  
适至上马处，  
下马气始平。

63

Now let us sing, long live the king;  
And Gilpin, long live he;  
And when he next doth ride abroad  
May I be there to see!

天子万万年，  
富翁寿且康，  
他时骑马出，  
我亦愿观光。

COWPER (科伯)

#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此书最早出版于1910年。1912年上海墨丘利公司(Shanghai Mercury)再版。头版时扉页上写着：“献给张之洞”。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这里我们翻译的是再版本。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发起。自1833年开始，陆续发表九十本书册，故又称“书册派运动”。它标榜复兴早期基督教会的传统，改变现有礼仪，并企图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建立一条中间路线，保护教会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和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运动受到政界和国教会的抵制，英国的大学领导人和各地主教谴责他们是罗马主义派。1845年纽曼等改信天主教，在英国国教会中影响很大。之后，运动势力减弱，方式改变，由皮尔兹领导。他坚持恢复传统的教义和礼仪，但并不皈依天主教。辜鸿铭在此书中，是把以张之洞等领导的清流运动，即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文明，更严格地按儒家原则办事的运动，与英国的牛津运动相比拟。

## 卷首引语

“我的英国朋友们问我：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国人——有一种美国思想，对于美国未来的合理发展有自己见解的人？好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提问。对此，我既没有想到各政党会议，也没有想到国会；既没有想到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大臣，没有想到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之类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心灵。我说：‘有，当然有。’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我的确从未见过在哪个国家有哪个人以足够的勇气去坚持这一真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崇拜教者。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无疑，毋需以枪易枪，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sup>①</sup>

爱默生

---

<sup>①</sup> 这段美国文豪爱默生的话，辜鸿铭一生常挂在嘴上，曾在论著中反复使用。不过使用时，可能是凭记忆之故，常略有出入。

## 再版记言

辜鸿铭先生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需求量极大，因此有必要再版。这次出版，基本上没什么变动，只是附上了一封写给《字林西报》的信，和一篇关于德龄公主（实为郡主——译者）《紫禁城的两年生活》一书的书评。同时还收录一封中国著名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信，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但愿这些附加部分是有益的。

出版者

1912年4月

## 自序

有一天，我同一些外国人讨论；上海的中国居民和欧洲居民谁更道德？对此，一个英国人说：“那完全要看你观点如何。”这个英国人的此种“观点”哲学，就是马太·阿诺德所谓大不列颠人特有的无神论代词。马太·阿诺德说：“有一种哲学理论在我们中间广泛流传，它使人们相信，尽善尽美的品德或至当至上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起码，公认的和可行的至上品德或至当理由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阿诺德接着还援引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试图将几种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周围的人，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每个人对于宗教或世俗的完善，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

现在，人们之所以无法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事情的真实状态，不仅在于每个英国人都有他自己的小小看法或观点，而且在于他根本不相信有所谓正确或错误观点这种东西。我有一个受人尊敬的英国熟人，他是上海头脑最为冷静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临寒舍小宴，我把国内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的手迹拓本拿给他看，这位英国人说他敢肯定他的买办的字写得比这要出色得多，起码笔划要更为工整。这就是他自己的小小看法或观点。还有一个英国人，也出身于公立学校，活跃于上海上流社交圈。有一次他对我谈起诗来，说他极为欣赏马可利（Macaulay）勋爵的《古罗马之歌》。于是，我便把马太·阿诺德



的有关评论拿给他看。阿诺德说：“一个人若不能从马可利勋爵那些短歌貌似金属之鸣中，辨听出瓦釜之音来，他就不配谈诗，包括马可利勋爵的那些诗：

人们来到这个尘世，  
死不过是或早或迟。

读这样的诗不感到厌恶难受，那真是难。”

可这位公立学校出身的英国人看后却对我说：那不过是马太·阿诺德个人的意见或观点。照他看来，这些诗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每一个英国人，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所说的，对于诗歌、艺术、宗教，政治和文明，如何才算高超，怎样才算完美，都有着他自己小小的看法或观点。

当然，一个英国人对于中国艺术品或英国诗歌这类事物发表自己的小小看法或观点，尽管有害，却无关紧要。而当像莫理循<sup>①</sup>博士和濮兰德<sup>②</sup>这些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的通讯员们，这些对于中国已故皇太后的品德或中国的政治与文明，就如同我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头脑冷静的英国朋友评论中国艺术品一样喜欢发表自己看法的人，当这些人将他们关于中国事态的“观点”送到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而英国政府又根据这些

---

① 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英国人，生于澳大利亚。1897年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他是当时舆论界的活跃人物，主张中国政治上“西化”，经济上加强同英国的贸易关系。为辜鸿铭所恶。后者也因此骂辜鸿铭为“疯子”。

② 濮兰德 (John Otway Percy Bland, 1863—1945)：英国人，曾任职于中国海关，担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后为中英公司驻华代表。他是一个敌视中国的新闻记者，经常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反对中国的文章，著有《中国：真遗憾》等书。

“观点”来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的时候，悲惨祸乱的发生，如义和团运动，围攻各国驻北京公使馆，或更加悲惨的，在满洲发生的日俄战争，那场因文明的问题而起的科学大屠杀，不就成了顺理成章、不足为奇的事情吗？

然而，究竟有无正确与错误的绝对标准呢？对于艺术和诗歌，对于宗教和世俗常规，乃至对于文明，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公认的至当标准，可以据之判定孰好孰坏，孰优孰劣呢？说到道德或宗教与文明，基督教传教士会说：“是的，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基督教标准。”同样，在中国，一个儒学士大夫会说：“唉，如果你们基督传教士揭橥你们的基督教标准，那么我们中国人就要抬出孔教的标准。”

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1039—1112年）的弟弟，曾讲过一个乡愚第一次进城的故事。说那个乡愚见到一头母马的时候，硬说是见到了一头母牛。城里人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面前的牲口是母马而不是母牛，那个乡愚却反驳说：“我父亲说它是一头母牛，你们怎敢说它是头母马呢？”因此，当基督教传教士告知中国文人学士，道德或宗教与文明的绝对标准是基督教标准，或者，当中国文人学士告知基督教传教士说，孔教标准是绝对标准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比是那个乡愚。

在本书的正文中，我说过：“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无能为力，正如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的思潮和理论时束手无策一样。”我还说：“要想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中国文人学士需要扩展（expansion）。”我这里的所谓“扩展”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后来被归纳成体系的称之为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论汇编，行为规范与信条，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正如中国的文明或欧洲文

明并非真正完美无缺的文明一样。中国文人学士之所以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此种认识。现代欧洲文明无论利弊如何，其伟大的价值与力量——说到这里，我希望能与那些认为我排外的外国朋友言归于好——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欧洲人民已经有力地抓住了这种扩展观念，并且这种伟大的扩展观念已经传到中国。马太·阿诺德谈起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事态时所说的情形，正与中国今日的情形相同。阿诺德说：“我们长期在其中生活与活动的那种封闭的知识视野，现在不是正在打开吗？种种新的光辉不是正畅通无阻地直接照耀着我们吗？长期以来，这些光辉无由直射我们，因而我们也就无法考虑对它们采取何种行动。那些拥有陈规故套并将其视为理性和上帝意志的人，他们被这些陈规故套束缚了手脚，无以解脱，哪里还有力量去寻找并有希望发现那真正的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呢？但是现在，坚守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陈规故套——那种极其顽强的力量，那种顽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经令人惊奇地让步了。当前的危险，不是人们顽固地拒绝一切，一味地抱住陈规故套不放，并将其当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他们太过轻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连陈规新矩一并蔑视，以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烦自己去考虑什么理性和上帝的意志。”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当前的危险，不在于人们会把马太·阿诺德所说的陈规故套，即因袭已久的是非标准误认为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在于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这种东西存在。伦敦《泰晤士报》说：“对于‘完美’，人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不仅如此，现在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每一个英国人，都认为他自己对于“完美”的看法或观点即便

不比别人高明，起码也和别人一样高明。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所谓的正确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因此，现代英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因为打着开金矿，卖便宜肥皂，或借款给中国人修些无用的铁路来赚钱的如意算盘，试图将“自己对于‘完美’的小小看法”强加给中国人，所以，只要中国人予以抵制，他就会怒火中烧，变成一个病态的悲观主义者，像濮兰德那样，写一些心怀歹意，无中生有的下流事情来诽谤中国官员。

那些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过濮兰德之流所写的有关清朝官员的充满歹意的鬼话和令人作呕的诽谤文字后，也应该去看一看已故戈登将军对于中国官员的有关看法。在将两者加以比较时，人们应该记住，戈登将军是一个闻名于世的基督教武士和一位君子，而濮兰德只不过是一个写通俗韵文的聪明作家和一个令人失望的中国政府前任雇员。戈登将军说：“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逼迫中国人进行突如其来的改革，他们将会以一种猪一般的顽固群起抵制；但如果我们引导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情愿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并极易管理。他们希望有一种选择权，憎恨突然给他们划定道路，仿佛他们于事无关，不在话下。我们从前试行的办法，就是迫使他们走某种道路，使他们付出同样的代价，并认为与他们交换意见徒费唇舌，毫无必要。……我总在考虑那些清朝官员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最困难问题；他们可能完全认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却不会去贯彻它；我们必须承认，说起来做这做那容易，而真正做起来却要难得多。如果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改革，我们就对这些可怜的家伙大加斥责，却没有考虑到变革必须尽可能循序渐进，赢得人心。我还能替这些（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说得更多些。他们有很多缺点，但却蒙受了那些掠夺他们国家的外国人带给他们的

更多冤屈。”<sup>①</sup>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像濮兰德那样来中国谈进步和改革的一般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比我们旧式的中国文人学士要不如。诚然，中国文人学士除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不知道任何文明；但他们至少对自己的文明尚有所知，而濮兰德之流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那些油嘴滑舌地谈论中国的进步与改革的人，甚至连他们自身的文明也不知道，实际上不知道和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因为他不相信存在正确理性和上帝意志这样的东西，而不相信这种东西，世上就没有文明可言，只可能有无政府混乱状态。

依我看，其实比我们旧式的中国文人学士还远为不如的现代英国人更需要“扩展”，一种心灵开阔意义上的正确扩展。但“真正的扩展”并不告诫人们说不存在可以据之判定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至上之德和至当理由这类东西。心灵扩展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我们领悟到像伦敦《泰晤士报》称之为我们自己小小看法的所谓完美，距离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实在非常遥远。这种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存在于事物的内在本性之中。的确，当英国人一旦弄清了真正扩展的意义所在，他就会意识到他现在那种小小的猜测，即那种对于宗教和世俗完美的小小看法，实在是一个极其狭隘的小小看法，由此，他还会感到不再那么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这种小小看法强加给别人了。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真正的扩展。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用一句政界的时髦词来说，就是“门户开放”的原则。不是贸易和铁路的“门户开放”，而是知识和道

<sup>①</sup> 此段引文与1910年版略有差异。

德上的“门户开放”。毫无疑问，没有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真正的扩展是不可能的。这种“门户开放”原则，用圣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检验一切事物，择善固执”。

简而言之，不仅今日中国，而且今日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进步”和“改革”，而是“门户开放”和“扩展”，不是那种政治上的或物质上的“门户开放”和“扩展”，而是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扩展。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扩展，而没有真正的心灵扩展，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我已经给过圣保罗对“门户开放”的定义，下面，我再提供一个孔子关于“扩展”的定义，孔子说：“在真正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是不存在种族之别的”（有教无类）。

正是怀着促进世界“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和“道德上的扩展”事业之愿望，我写了下列文章，也是出于同一愿望，现在我将它们汇集成书，提交给公众阅览和批判。

辜鸿铭

1910年2月1日于上海

## 雅各宾主义<sup>①</sup> 的中国

一个中国官员<sup>②</sup> 致一位德国牧师的信

我尊敬的赫尔（Herr）牧师：

大约 5 年以前，我以“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的名义给《字林西报》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我说：“就我所见，目前中国改革运动的狂热，将注定导致一场灾难。”现在灾难来临了。革命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而告终。人们都对此感到意外，我却不然。如果你读到辜鸿铭先生题为《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你会看到他在中国人分成三个等级——（1）满洲贵族；（2）中产阶级文人学士；（3）群氓。

中国过去 250 年的历史开始于

1. 满人当权

太平天国暴乱后到来

2. 中产阶级的崛起

中日战争后到来

3. 满人重新掌权

---

① 雅各宾主义：即所谓过激主义。这里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激进革命主张与实践的蔑称。

② 一个中国官员：这是辜鸿铭假托，实际上是他自己。

义和团事变后到来

#### 4. 一个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在这场“新学”拳民暴乱<sup>①</sup>之后，我们面临了

#### 5. 群氓掌权

正如我说过的，5年以前我所预见的灾难现在来临了。然而，真正的灾难，让我在此指出，它还不是伴随着流血和财产破坏的革命。真正的灾难是革命以袁世凯成为共和国总统而告终。目前这场革命，开始于四川那场暴动，就这场暴动本身而言，它可以称之为—场合理的暴动。正如它将被记住的，它是为了反抗北京政府允许外国人处理中国的铁路问题，就好像中国人于事无关，不在话下似的。目前这场革命暴动的最初起因，应该被记住，它是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当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群氓利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最终将其转化为一场革命时，真正的灾难降临了。当像伍廷芳<sup>②</sup>博士这样的人都能拍电报给中国皇帝叫他退位时，那实在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马太·阿诺德谈起群氓时说：“至于群氓，无论他是一个粗暴蛮子，还是一个庸俗市侩，如果他记得——每当我们愚昧而激情冲动地坚执一个过激主张的时候，每当我们渴望以纯粹的暴力压服对手的时候，每当我们嫉妒他人的时候，每当我们蛮横残暴的时候，每当我们只崇拜强权或成功的时候，每当我们参与瞎嚷

<sup>①</sup> 辜鸿铭在此指的是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他以为这场革命形同义和团暴乱，不过暴乱者具有所谓“新学”知识。

<sup>②</sup> 伍廷芳（1842—1922），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曾留学西洋，任香港律师。后回国入李鸿章幕，曾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驻美国公使等职。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等发起成立“共和统一会”，旋任南方民军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进行南北议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司法总长。



嚷反对某些不受欢迎的显贵，以壮声威的时候，每当我们残忍地践踏战死者的时候，他对那些受害者均无同情之心——那么，他就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那永恒的群氓精神。”现在，任廷芳博士正参与反对不受欢迎的满人的瞎嚷嚷，为之壮势，这清楚无误地表明，他身上有着阿诺德所说的那种永恒的群氓精神，并已深入骨髓。

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它意味着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袁世凯，正如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所说的，是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改革运动<sup>①</sup>时出卖了同党，现在群氓掌权了，他自然是共和国总统最为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时期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声誉好的东西，都将面临毁灭的危险。

几天前，你们德国领事馆有位绅士对我说，他很奇怪我们汉人竟然那么长久地屈从于满人的暴政！他问我，满人究竟为中国做过些什么。在回答他时，我问他是否见过康熙瓷器，我告诉他，如果他见过康熙瓷器，就应该知道满人为我们做过什么——他们给了我们汉人一颗美好的心灵，以致于我们能生产出那些美丽的瓷器，当然还有其他美丽的东西。简而言之，中国在满人统治下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真正花一样的国度。当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中产阶级在中国掌了权，中国变成了一个庸俗市侩的民族。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引述过一个带贵族气的英国人所描绘的一幅关于广州和部分裸露无掩的广东人的图景，那是李鸿章掌权之下的中国的图景——一个粗

<sup>①</sup> 指戊戌变法。

俗丑陋的中国。顺便说一句，正是为了反对这种粗俗丑恶的中国，中国的牛津运动者们才奋起抗争。

如果说李鸿章统治下的中国变得粗俗丑陋——那么现在，在袁世凯统治之下，包括孙逸仙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e）的群氓们大权在握，不受限制的时候，我们中国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忽然想到这一点。歌德说：“Was uns alle bändigt — das Gemeine”（压抑我们的是什么？——庸俗）。庸俗，中国所有的那些低级、庸陋、粗俗、卑鄙和可耻的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和充分的“自由”，可以发展自己了。简而言之，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声警告人们，必须防治“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为贵族化的茶园小坐，看到了**新中国**——伙剪了辫子的中国人，谈吐粗俗，举止嚣张，骚动狂乱，吵吵嚷嚷，其厚颜无耻实在无法形容。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领会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义。现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为袁世凯统治下的**年轻中国**通过剪辫最终采纳了欧洲文明的事实而兴奋不已。这些上当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年轻中国**所采纳的完全不是什么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海的欧洲文明——歌德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一种欧洲文明正在生长的疾病而已。想一想，一旦四万万中国人都染上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流行病，采纳这种上海的欧洲文明，都变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园所见到的那些剪了辫子的中国人那样庸俗透顶，卑鄙之尤和骚动不安的人，那将给世界文明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请记住，这些新式的卑鄙和骚乱型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炸弹。人们谈论着袁世凯统治下的**新中国**，

依我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祸”。“Völker Europa's, bewahret eure heiligsten Güter”（欧洲人，保住你们最神圣的天良）。

现在，在上海，当我与欧洲人，甚至那些有教养的欧洲人谈起上述这些话时，他们都称我为理想主义者。但这些现实主义者忘记了一件事。在我看来，当今的时事评论家和政客们完全忘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个法国作家所说的：“一切文明和统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在于民众的一般道德，和公共事务中正直行事的足够程度。”

中国的旧式政体，让我在此指出，尽管有种种缺陷，它仍然在民众之中维持了一般的道德水准。这一点，从欧洲传教士——男人、妇女和孩子——能穿过幅员辽阔的帝国游历而不出大的危险的事实，便能得到证明。至于在公共事务中正直行事，也能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证实：旧式政体下的中华帝国政府，尽管财政极端困乏，仍然能够定期支付庚子赔款。

而现在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之下，一切都将不可能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欧洲，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分离的机构，而在中国则合而为一。在欧洲，教会负责人民的道德，国家则主要负责维持秩序。而在中国，国家既要负责人民的道德，又要负责维持秩序，二者兼管。欧洲的教会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国，国家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皇帝。因此，在欧洲，如果你破坏和取消了对上帝存在的信仰，维持民众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困难的。同样，在中国，如果你攻击和取消了人民对皇帝的尊崇，你就等于破坏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赖以存在的整个结构——事实上你破坏了中国的宗教，它不是超越尘世的神道教，而

是一种人间教，一种以中华帝国大清王朝为天堂，以皇帝为上帝——上帝的代理人的宗教。一旦破坏了这种宗教，你在中国要保持民众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在中国对皇帝的忠诚是一种宗教，可以说，它是儒家国教（State religion）的基石，与欧洲的教会宗教（Church religion）区别开来。正如在欧洲，殉道者因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万死不辞一样，在中国，殉道者则宁愿万死，也不放弃对于君主——天子和天使的忠诚。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的统治之下，民众连一般的道德水准也不可能维持。

然而人们会说，在中国，我们发生过许多次以改朝换代告终的革命，中国人都并没有因此沦丧道德。但是，在中国，每一次导致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始终都存在两个条件。其一是，革命为人民（people）发动，而不像现在这场革命那样为群氓发动。孟子说：“得乎邱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sup>①</sup> 显而易见，在目前的这场骚乱中，普通国民（邱民）不仅始终没有参加革命，而且公开反对革命。另一个条件是，那个成功地变作最高统治者的人，必须具备能激发憧憬并赢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质。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袁世凯奉命出山保卫大清，可他出山后，不是像一个有廉耻的人那样去尽职尽责，而先是恭顺地屈从于革命党，然后百般狡计，使其统帅的士兵坠失忠君之心，并拥兵自

<sup>①</sup> 辜氏原译将孟子此言顺序打乱了，译为“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得乎邱民为天子。”他将“邱民”译成“普通国民”。

重，逼迫皇帝退位，最后成为民国总统。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一个具有最起码常识的普通人，也无法将此种行为与廉耻和责任的最基本原则（名分原则，忠义观念——译者）调和起来。然而，最令人奇怪的还在于，袁世凯自始至终从没有进行过拒绝屈从的努力，哪怕是装模作样的努力的也没有过。这样一种人，怎能博得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丧失了一切廉耻和责任感。

这，就是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下，中国民众即便连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个原因。而失去了民众的一般道德，又怎能进行统治，更谈不上文明了。

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推迟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给了未来。的确，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比人类流血还要更坏万万——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大清王朝不仅是中国权威尊崇的象征和旗帜，而且是中国政教和中国文明目标的象征与旗帜。这面旗帜交托给了袁世凯。但他却像一个懦夫和卖国贼一样，借口挽救这面旗帜的布料，不得不将大清抛弃。然而，经管这面旗帜的官员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救出这面旗帜的布料、那花费了许多金钱的物质的东西，他的责任在于捍卫那为之战斗的目标——那无价的道德利益，而旗帜的布料只不过是其表征罢了。像袁世凯这般行事的官员，每个有廉耻感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懦夫和叛徒。

我的许多外国朋友笑话我，认为我对满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于它的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目标的忠诚。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试图告诉人们的，就是我们为了这一目标——中国文明、中国政教、那种名誉和责任宗教的目标，来反对现代欧洲文明，那种利欲宗教而孤注一掷的战斗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现在能见到的真理，包含在这样一句话中：“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财神。”张之洞告诉我们并教导文人学士：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调和。现在这种局面，就是我们调和的结果。辜鸿铭先生在此书第1版第42页中写道：“纽曼<sup>①</sup>博士和张之洞所采用的调和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导致了耶稣会教义，在政治上则导致了称之为马基雅维里主义<sup>②</sup>的东西；”“在中国，张之洞向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所传授的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当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如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

正是张之洞所传授的这种耶稣会教义的作用，使得整个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在革命者和袁世凯面前，其忠诚与抵抗能力土崩瓦解，令人费思。事实上，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使得中国

---

① 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 英国国教会内牛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初系英国国教会信徒，抨击天主教。1833年与凯布勒发起牛津运动，呼吁恢复英国国教会的早期传统；提倡恢复严谨的纪律，持守正统教义，维持圣事和教会礼仪等。后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撤回对天主教的抨击并加入了天主教。引起英国国教内的极大震动。1864年发表名著《为自己的一生辩护》(即通常所谓“辩护书”)。1878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选为红衣主教。

② 马基雅维里主义 (Machiavellism): 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指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理论旨意。

的文人学士们在袁世凯屈从于群氓、逼迫皇帝宣布退位并成为民国总统后，欺骗他们说他们仍然忠于皇上时，文人学士们竟然信以为真。最后，也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的阴险狡诈精神——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精神——甚至使得那些有教养的外国人，对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袁世凯的所做所为连盗贼也不如的事实视而不见。

爱默生在《英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谈到英国人实事求是，憎恶两面讨好、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机会主义者时说到，“牛津那些激进的暴民追随在托利党人埃尔登（Eldon）勋爵之后，大声叫喊着：‘老埃尔登在，为他喝采：他从不叛卖！’”接着，他又提到英国人给予路易·拿破仑的荣誉并对此加以注解，说道：“我相信，当伦敦的贵族和平民在这个成功的小偷面前，像那个那不勒斯下等人那样卑躬曲膝的时候，我有幸结识的英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以此为然。然而，尽管这种行为令人作呕，作为国家，怎样才能采取一系列必要而有机的措施来加以抵制呢？政府总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诚实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就如同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如果像我所说，中国革命以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而告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么，我以为，若是外国列强找不到抵制袁世凯及其民国的办法，迈出承认它的令人作呕的一步，那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它不仅危害中国，而且危及全世界。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西班牙贵族，当他受命接纳一个身居高位的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时，说道：“我完全服从命令，然后便焚毁自己的家园。”如果外国列强承认袁世凯，那么，中国人就将同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暂时接受他；但随后必定焚毁自己的家园，在焚毁自己家园的同时，也将纵火全世界。

在结尾，让我再一次强调中国共和主义意味着无神论的事实。当罗伯斯庇尔<sup>①</sup>在法国革命期间公开宣布无神论，并制定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的法令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渴望见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然而，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到来的不是黄金时代，而是动摇欧洲王权的“恐怖统治”。现在在中国，袁世凯的喉舌不仅无耻地宣称共和政体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而且实际上宣称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等于是无神论的代词。所有欧美人都希望看到一个改良、进步和繁荣的新中国，但在我看来，袁世凯及其共和国在中国的直接后果，甚至于比法国的“恐怖统治”还要可怕——它必将迫使欧美民族非常严肃地反省他们对待中国及其文明的方式。

汤生

---

<sup>①</sup> 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1758—1794），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的实际首脑。



## 导 论

谈起牛津，过去的牛津，马太·阿诺德说：“我们是在牛津那个优雅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我们不会不懂得这样一个真理：美丽芬芳乃是人生至上之境的本质特征。我们喜爱美丽芬芳，厌恶丑陋下流，这种情感，已成为我们对许许多多遭受挫折的事业依恋不舍、对各式各样获得成功的运动不以为然的内在动因。这种情感实实在在，从来没有彻底败下阵来，即便是在挫折之中，它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马太·阿诺德接着说：“看一看大约30年以前震撼过牛津中心的那场伟大运动的过程吧。凡是读过纽曼博士《辩护书》(Apology)的人们都可以发现，这场运动所攻击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终赢得了胜利并泛滥开来。牛津运动则受到挫折，遭到了失败。我们的残兵败将流落四方。真所谓 *Quae regio in terris nostri non plena laboris* (世界上哪个地方不充满着我们悲哀的故事)。”

前些天，当我正在琢磨马太·阿诺德上述这些话的时候，看到了一份要为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报告。我得知，这份规划出自牛津。于是我擦擦眼睛，自言自语道：自从纽曼博士时代以来，世界、牛津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纽曼博士之牛津运动的目标，是反对自由主义。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进步和新学。而眼下这场从牛津发起的运动，在中国建

立一所大学的规划，则是要向中国输入西方观念。西方观念在中国，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也意味着进步和新学。那么，马太·阿诺德所说的牛津情感，那种鼓舞和激励纽曼博士的牛津运动去反对自由主义、进步和新学的情感，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现在的牛津学者，已经找到了办法可以将牛津情感与进步、新学调和起来了吗？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调和是可能的。古人说得好，“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同时又供奉财神”。换言之，难道牛津的学者打着同春风得意的进步与新学事业联盟的旗号，就真能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帮助吗？在牛津和英格兰，高尚的人们自言自语道：“我们实在同情正在与进步和新学战斗的中国人。这种进步和新学使得他们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为了帮助他们更为有效地战斗并赢得胜利，我们将给他们提供武器。的确，这些武器都取自于进步和新学的武库，但是，我们却用追求美丽和优雅的牛津情感对之加以了调剂，如果可能，用那基督教神圣的优雅和芳香来加以调剂就更好了。”

下面，我并不想对目前要在中国建立大学的规划提出什么意见或批评，我想给塞西尔（Cecil）勋爵及那些对这一大学规划感兴趣的人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大约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伟大运动的故事，它在许多方面，与纽曼博士领导的著名英国牛津运动故事如出一辙。我想，讲这一故事对于他们或许不无益处。中国那场牛津运动的目标，也是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进步和新学的现代欧洲观念。现在，新的牛津运动就要到来了，我相信，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将要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同现代欧洲的进步和新学观念战斗了。当此之时，回顾我们过去的运动，可以总结经验。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和如何失败：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新的外国盟友都将是有用的。我尤其有资格讲

这一运动的故事，因为我有幸加入到牛津人的行列中参加了战斗。我们艰苦奋战了30年，然而现在我们的事业却几乎失败了。有些人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许多人投了降。余下的所有人现在都已流散到四面八方。

领导我参加战斗的首领，是已故的帝国大臣张之洞。当我两年前在北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彻底绝望了，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获得更为宽容的投降条件。运动中，同样接受张之洞指挥，和我一道并肩战斗的战友梁敦彦<sup>①</sup>，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去年见到我的时候，向我下达了“各自逃命！”（Sauve qui peut!）的命令——我恐怕是我们的队伍中唯一仍然绝对相信对我们的事业、那反对进步和新学之现代欧洲观念的中国文明事业最终必将胜利的人。但现在，我孤身一人，像维吉尔所写故事中的英雄一样。那个英雄在特洛伊城被攻破之后，不得不四处流浪，起先，他是想在贪婪的色雷斯人中间寻个安身的地方。而我现在在上海，为了给我的家庭守护神和那个伟大的特洛伊守护神（Penatibus et magnis Dis）找个临时避难所和栖身之地，也不得不与黄浦江的污泥之龙（Mud dragons）搏斗<sup>②</sup>。寻遍整个上海地区，我都找不到一个英国人肯向我伸出救援之手。因为：“人人可管之事，也就是无人过问之事。”

我要讲的我们为中国文明事业拚死决战的故事，是很长的。它与我过去的的生活紧密相关，并勾起我对倒下的战友、死去的亲人、及所有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

---

① 梁敦彦：字崧生，广东顺德人。第一批赴美的留学幼童之一。回国后长期在张之洞手下任职，曾官至外务部尚书。民国时曾参与张勋复辟，负责外交联络。

② 指出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它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悲哀故事。

Sed si tantus amor casus cognoscere nostros,  
Et breviter Trojae supremum audire laborem,  
Quamquam animus meminisse horret luctuque refugit,  
Incipiam.

但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们的故事，  
想简要地听一听特洛伊的最后灾难，  
尽管一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瑟缩哀痛，  
那我还是开始讲吧。

## 第一章 满人当权

—

北京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国家精英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正是这个翰林院，成为了我所谓中国牛津运动的总部。那些参加并坚持了这场运动的年轻的翰林们，称之为“清流党”——国家净化党。这个中国的民族净化运动，像英国的牛津运动一样，可看作是儒教中保守的高教会派<sup>①</sup>的复兴。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引进那些为李鸿章和中国自由主义者所热衷的外国方法和外国观念，通过呼吁国民更严格地信守儒家原则，来净化民族心灵和规范民族生活。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中国的牛津运动，我想有必要先相当详细地谈一谈中国的社会本体或社会秩序。

---

<sup>①</sup> 高教会派：英国注重教会礼仪的圣公会中的一派。

二

马太·阿诺德将英国国民依次划分成三大阶层——蛮族、庸俗者和民众。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划分成三个阶层。蛮族是满人——生来的贵族；庸俗者乃受教育阶层，文人学士从中产生；民众则是中下层市民和劳工阶层，从中派生出富裕商人和买办——凭其勤劳，也可能跻身于贵族之列。满洲贵族的特长，在于他们的英雄气概或高贵品德。中国文人学士的特长，在于他们的智力。民众或劳工阶层的特长，则在于他们的勤劳或辛勤工作能力。孔子说：“力行近乎仁”，马太·阿诺德称之为希伯莱精神，这就是中国民众或劳工阶级的勤劳力量。孔子又说：“好学近乎智”，马太·阿诺德称之为希腊精神，这就是中国文人学士的知识力量。最后，孔子说：“知耻近乎勇”，这就是满洲贵族的气节或高贵品格。作为中国唯一的军事部族的后裔，满族人远比汉人有气节，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军人。没有什么东西比尚武更能促进气节的养成。一个真正的军人，总是不断地以勇于自我牺牲相砥砺，而自我牺牲，正是气节和所有高贵品格的根基。

中国社会在健康的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国家物质充足，民族安康。其次，必须依靠中国文人学士的知识能力，来训育和管理民众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劳动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

来指导——将民众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之上。简而言之，在中国，民众的勤劳力量是不得不生产；文人学士的知识能力是不能不施教；满洲贵族的高贵是不得不指导民众的勤劳力量，使国民过上高尚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曾经在中国内地旅行，看到那些保存下来的桥梁和运河的外国人，将会懂得我所谓民族生活的高尚指导——引导民众的勤劳力量在物质方面趋向一个高尚目的的意义。至于精神方面，像编纂《康熙字典》那样宏伟的著作，就充分地证明了早期满族皇帝的高尚品格和他们指导民众精神生产趋向一个高尚目的的能力。

### 三

然而，在外来势力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承平日久，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然结果：满州贵族的高尚品格或英雄气概，由于缺乏积极的军事活动的促进，不免衰退，萎缩。至于中国的文人学士，参加科举考试须得殚精竭虑，其知识能力确实仍能得到锻炼。然而，由于缺乏早期那种催人奋进的满族影响之滋补推动，他们的智力也大大衰退，数量仍存，质量尽丧。如果你把康熙时代早期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和后来满族影响削弱后的诗歌加以比较，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事实上，中国文人学士的知识能力，在失去了满族强有力的高贵影响之滋补作用后，也就丧失了其优雅，而变得卑劣和粗俗不

堪了。<sup>①</sup>

承平日久之后，正如目前这样，唯一没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是劳工阶层的勤劳之力，那种勤奋劳动，努力工作的力量。然而，即便是中国普通民众没有受到削弱的这种勤劳力量，由于得不到文人学士的训育和管理，不仅变得粗俗，而且效率降低。更为糟糕的是，它还失去了高尚的指导。没有满族人以高尚品格去引导它趋向于高尚的目的，中国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被卑劣的目的所浪费。也就是说，它不是被引导去生产一些促使国民身心健美的生活必需品，而只是为了刺激、满足感官的愉悦和虚荣之心去生产，实际上生产的只是一些供人逸享、

<sup>①</sup> 知识，若失去其内在固有的优雅，便是英国人所谓常识。这种常识，或丧失了优雅的知识，当其被滥用而扭曲，变得麻木硬化的时候，就是卡莱尔所谓河狸（狐狸的一种——译者）之智，马太·阿诺德称之为庸人市侩之智。卡莱尔将其称之为狡猾的狐狸之智，是针对它被欲望所强化的情形而言的。这种河狸或庸人之智，对于日常工作，诸如收关税，做统计之类有用，但绝不能用在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上。因为它能教人才智，不能教人品德，能够教人头脑，不能教人心灵。孔子在谈到教育时说：“以一种焦急亟忧的心态关注人民的爱好，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最高的教育”（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再者，狡猾的狐狸之智，对于修铁路、开纱厂、造电机是有用的，却不能用在与文化有关的问题上——因为它不仁，不知道同情为何物。穆罕默德说：“上帝将同情放在你的心中”。正因为这种被欲念所强化的狐狸之智，或缺乏优雅常识——现在成为控制各民族生活和文明命运的至上力量——不知同情为何物——从而使我们能够说明，何以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看不到和意识不到：一味追求自己增加生活上的舒适，奢华和绚丽多彩的程度，却不顾周围的人们正在挨饿或仅能过上聊以充饥的生活，硬要强迫他们与之进行贸易并修铁路，这不仅不道德和不公正，而且情趣也卑劣至极，太不像话。爱默生说：“过一种相当克己或极为慷慨大方的生活，似乎是一种（舍己为人）的苦行主义。一般善良的人们，常常认定那些悠闲富裕者即是如此。理由是，他们对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怀有兄弟般的情谊。”——原注



奢侈和摆阔的工具。

#### 四

罗斯金以其毕生的精力，要使人们相信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其目的是教人民和国家怎样花钱而不是怎样挣钱。的确，当今中国财政的不景气和世界经济的萧条，不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也不是由于缺乏工业制品和铁路，而是由于可耻的浪费性的消费。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都意味着缺乏高贵的指导，没能使民众勤劳的生产力倾向于高尚的指导。在有高尚品格指导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将懂得怎样花钱，怎样为高尚的目的而花钱。当人们懂得怎样为高尚的目的而花钱的时候，他们将不在乎有什么，而在乎怎么做——不是去追求浩大、豪华和炫耀，而是追求高雅的趣味和生活环境的优美。当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品德之高，已足以使他们除了高雅的情趣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之外别无所求时，就不会把民众勤劳的生产力浪费在修建大而难看的房舍、长而无用的公路之类东西上了。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勤劳的生产力得到高尚的引导而不是被浪费，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称得上是真正的富裕，它不是富在有钱或拥有大而难看的房舍上，而是富在人民身体健康和心灵优美之上。

歌德说：“每一种天赋之物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发展，有人只鼓励美的东西，另有人则只鼓励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一个国家。有用的东西自我鼓励，因为大众生产，人人不可或缺；美的东西则必须被

鼓励，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展示它，而许多人又需要它。”因此，袁世凯和莫理循博士认为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诸如煤、铁、廉价的肥皂，便宜的电车，无线电报——即歌德称之为有用的东西，其实不必加以鼓励。而已故皇太后认为中国所需要的那些东西，诸如她的颐和园的美，《论语》的美，中国诗的美，乃至八股文的美——即是歌德所谓美好，必须加以鼓励的东西。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展示它，不仅许多人而且所有的人又都需要它。如果缺少了歌德称之为美的这些东西，便不会有高尚的品格，而没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们看到的，人民勤劳的生产力就会被可耻地浪费掉。紧接着，那里人民生活中所有的舒适、奢靡与豪华煊赫，就会像死海南岸罪恶之都里的苹果那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这样，我们谈论的那个时期，即承平日久，外人来华前夕，苏州、杭州之类城市里纸醉金迷的安逸、豪奢生活已明显地表现出国内业已存在浪费性消费的癌症。其原因，正如我已说过的，是由于失去了满族人高尚品格的指导，那种使人民勤劳的生产力趋向于高尚目的的指导。事实上，无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白白浪费了人民勤劳的生产力，而且使人民的劳动果实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由此，也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这就是外国人最初携带商品和鸦片来华时中国的状况。外国人通过做生意和贩卖鸦片，向沿海一带的中国商人和买办阶层公开传授了那又快又容易的生财之道，于是本民族原有的无耻和浪费性消费的癌症急剧恶化，红肿起来，公平分配人民的劳动成果不仅困难，并且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这样，城里的富人和寄生虫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不能变为寄生虫的乡下人，则不仅越来越贫穷，甚至无以为生。当一个国家的民众，

除富人及其寄生虫之外，发现他们已竭尽全力、拚命地劳动仍无法养活自己之时，那么留给他们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发疯发狂，起而猛烈地荡涤那民族的癌症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症候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苏、杭这样的城市。在中国，荡涤这种无耻浪费之癌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国暴乱。<sup>①</sup>

## 五

太平天国暴乱发生后，满洲贵族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已完全丧失了勇武精神或高尚品质。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塘时，就遇到了满族军队的英勇抵抗。外国人从关于北塘战役的战况报导中可以看到，那种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满州贵族身上依然存在。那么，他们在太平军面前为何一筹莫展，狼狈不堪呢？真正的原因在于，虽然满洲贵族方面有他们的高贵品格，但在太平军方面，却又有他们的狂热。

何为狂热？狂热就是陷入疯狂之中的高贵人性。对于社会弊病的强烈义愤感，在太平暴乱分子那麻木迟钝的本性中也激发出了勇武的高贵品质。因此，面对太平暴乱分子的狂热或高贵的疯狂，满洲贵族的英雄气概和傲慢抵抗就毫不奏效，不值

---

<sup>①</sup> 在中国，太平天国荡涤民族癌肿的暴乱，是从南方的广州附近开始的。因为在那里，民族癌肿突然加剧，这应归咎于外国贸易和英国鸦片的“开化”。义和团运动对此癌肿的荡涤——正如我们从发生天津的那场短促而又可怕的暴乱中可以看到，其内在意义也在于此。那场运动起于天津，因为那里的人民最为深切地感受到李鸿章及其进步和新学癌症的肿痛。——原注

一提了。在此，顺便指出一点，欧洲那些具有崇高的精神和其他杰出的道德品质的旧式贵族，所以对革命和革命者始终是、至今仍然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原因也正在这里。一个贵族的傲气，也许能使愚蠢学徒和店主组成的俗不可耐的乌合之众产生敬畏感，但是，一个不能或不愿正视民众社会错误的贵族，其所有的英雄气概和最优秀的战斗素质，在上帝的正义面前也是无能为力。因为上帝的正义，总是我国革命和上海骚乱这类事变的最终根由。正确与谬误，正义与非义，在骚乱和革命中是如此的鱼龙混杂，难以分辨，这就要求你既要具有准备出击的拳头，又要有明敏的双眼。否则，即便你紧握的拳头包上最好的克鲁伯钢甲，若向上帝的正义出去，也会将自己的拳头砸得稀烂。简而言之，要想有效地对付狂热或陷入疯狂的高贵人性，要想对付疯子，最最需要的一点，是才智——知识的力量。因此，当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在满洲贵族面对叛乱者的狂热无能为力之时，已故皇太后便不得不求助于汉族文人学士知识的力量，完全依靠他们去镇压叛乱。于是，马太·阿诺德所谓的统治权或政权，也就是统治中国的真正的主动权和指导权，从满洲贵族手里转入汉族文人学士手里。满洲贵族的权力中心或指挥总部在北京，而汉族文人学士的指挥部则在地方各省。因此，从满洲贵族到中国文人学士的权力转移，也就意味着政府的实权从中央北京转移到地方各省了。这就是许多外国人已经观察到了的中国现政府权力分散的开始和形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

然而，当时地方分裂的祸患，被一个伟大的汉族文人学士消弭了。他就是已故的曾国藩侯爵（前任驻英公使曾纪泽之父）。这位伟大的侯爵乃中国文人学士的领袖。已故皇太后授与

了他“便宜行事”的绝对权力。在整个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他可以说是中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在他的统率之下，汉族文人学士毅然响应皇太后的号召，他们脱下身上的长袍，虽然对战争韬略一窍不通，对行军打仗之苦极不习惯，但仍然奋发努力，克服了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他们先是以超人的知识及时制止了太平军的疯狂进攻，接着在实战中逐渐学会了战争艺术，最后终于扑灭了这场叛乱的烈火<sup>①</sup>。

---

① 大侯爵曾国藩说：“我令儒生率农夫以平天下。”——原注

## 第二章 中产阶级的崛起

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相当于欧洲的法国革命，两者都是要摧毁不公正的腐败的社会秩序。如同欧洲法国革命之后一样，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国家的统治权也从贵族转到中产阶级手里。此外，捣毁旧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震动，也总会带来习惯势力如人们心目中的常规和旧俗的崩溃。一场革命之后，人们往往能够以一种比较自由和独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种方式就是所谓自由主义。一个民族的才智，一旦摆脱常规和旧习的束缚，就立即变得积极活跃，生机勃勃。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正如欧洲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才智的焕发和飞跃之势遍及全国。在这种智识持续增长之初，那位伟大的中国文人学士尚能引导和控制这股失控后的力量，将其纳入秩序。但是不久之后，智识的增长停滞了，这种失控的势力（仍自称为自由主义）不仅迷失了方向，而且误入歧途，极易损害国民生活。正是为了要把这种游离失控、误入歧途的力量严格按照儒家原则纳入正轨，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兴起了。

## 二

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反对李鸿章——中国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表帕麦斯顿<sup>①</sup>勋爵。李鸿章继大侯爵曾国藩成为中国文人学士的领袖。当那位伟大的中国士人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仍然有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重建工作——一个极为现实的重建社会和各级行政管理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欧洲人的东来、以及他们那极其强大的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

第一个问题——重建社会和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那个伟大的汉族士大夫做得即使不算是完全彻底，起码也是迅速和成功的，非常值得称道。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后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整个中国的行政和社会机器迅速恢复了正常运转，辽阔的帝国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

然而，在处理另一个问题——即怎样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问题上，那个伟大的汉族士大夫则完全失败了。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一筹莫展，就如同在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思想和理论无

---

<sup>①</sup> 帕麦斯顿 (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译巴麦尊。三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1855—1858, 1859—1865)。原为托利党人，后成为辉格党人。任内曾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还镇压过印度民族起义；挑起克里米亚战争；并在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南方的奴隶主。

计可施一样。要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需要“扩展”，但是，这些文人学士是在狭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压根就没有所谓“扩展”观念。鉴于现代欧洲文明的东来，他们所想到的“扩展”，就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仅此而已。

不过，当时在中国，有一个大人物对于真正的“扩展”意义有所领会，他是一个满族人。正当汉族的文人学士们忙于修建兵工厂和试制现代枪炮时，文祥<sup>①</sup>，后来的领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设立了同文馆<sup>②</sup>，一个旨在使中国青年接受充分的欧式教育的学院。的确，曾国藩侯爵后来也曾派出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不过，同那个伟大的满族政治家相比，这位大侯爵的欧式教育观念是极其模糊和狭隘的。曾国藩侯爵及其汉族文人学士是要派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枪炮，掌握驾驶战舰技术。而那位伟大的满族政治家对于欧式教育的看法，却与此截然不同。若有人想了解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创设同文馆的构想是多么广阔和宏伟，只要阅读一下他与美国驻华公使的一段谈话就够了，这段谈话刊登在美国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讯》里。不幸的是，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拯救中国的正确的扩展思想，却被

---

<sup>①</sup> 文祥（1818—1876），满州正红旗人。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道光朝进士。1861年与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衙门大臣。后官至户部、吏部尚书、晋武英殿大学士。自1861年至死，兼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达15年之久，是著名的洋务派头领之一。

<sup>②</sup> 同文馆：也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由奕訢、文祥等奏设。最初主要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除学习外国语言外，还开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等课程。经费、人事等方面，多受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控制。美国人丁韪良曾任总教习多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委托给海关总税务司、即现在的赫德爵士来贯彻执行。对于这个未来中国赖以拯救的极其重要的教育机构，赫德爵士不是选派第一流的学者、绝对胜任的人来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一个美国前传教士<sup>①</sup>担任总教习。这样，本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曙光、启蒙和“扩展”之源的同文馆，却被变成了一个收容贫苦、饥饿和无用青年的二流食宿学校。

事实上，在中国，一度有两个人想着手拯救中华民族，但不幸得很，这两个人，都是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庸人，令人黯然神伤。尽管赫德爵士和李鸿章无疑都对中国做出过贡献，但赫德爵士对于同文馆和所有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漠不关心和疏忽大意，李鸿章对于120个归国留学生的消极处理态度，都将使他们永远背上难以洗刷的耻辱。在李鸿章看来，只有枪炮和战舰才能拯救中国，而赫德爵士则认为，拯救中国，最为重要的是高额国家税收。对于这两种关于国家强盛之本的观念，我大胆指出，赫德爵士的比李鸿章的还要狭隘、卑鄙和无耻。

### 三

我们已经得知，中国文人学士关于中国“扩展”的思想和观念，是要拥有现代新式的枪炮和战舰。为了推行这一“扩展”计划，李鸿章将那些富人，中小商人和买办阶层，那些在

---

<sup>①</sup> 即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美国教会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传教。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年被赫德荐为总教习，直至1894年。后还担任过京师大学总教习。著有《花甲记忆》等书。

对外贸易中挣钱获利之徒吸引到自己周围。这些人都赞成采用外国方式方法的所谓进步事业。然而，他们那采用外国方式方法的拙劣观念，其中包含了马太·阿诺德谈起英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时所斥责的一切粗俗和丑陋之处，这种粗俗和丑陋，令翰林院——中国的牛津那些知识贵族的精英们为之震惊。这样，中国的牛津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强烈排外的运动。它排外，并不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憎恶外国人；它排外，完全是因为这些学者看到了映于眼前的李鸿章及其追随者所采用的外国方式方法骇人的粗鄙与伤风败俗。这便是真正的中国文人学士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础。

中国牛津运动中相当于纽曼博士地位的，是已故的李鸿藻<sup>①</sup>，后来的翰林院掌院学士。他不是个杰出的思想家，而象纽曼博士一样，是一个温文尔雅、品德纯正的人。这一辈士大夫今天谈起他来，不仅怀有敬仰之忱，而且充满爱戴之情。他逝世后，已故皇太后赐给他荣耀的“文正”谥号。

同这场中国牛津运动有关的两个最著名人物，一是已故张佩伦<sup>②</sup>，那个福州海战中的主角，一是已故帝国大臣张之洞。参

① 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同治帝师。曾掌管翰林院。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授协办大学士。光绪初年，以清流议政，名重一时。称为“清流头”。以他为首的清流党，则称为“前清流”。

② 张佩伦（1818—1903），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字幼樵。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19世纪70、80年代清流派的主角。与张之洞称为“清流角”。是“翰林四谏”之一。（“翰林四谏”说法不一，一说是张佩伦、张之洞、陈宝琛、宝廷；一说以黄体芳代宝廷。）1884年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务。马尾海战因无备，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被革职充军。后入李鸿章幕，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著有《洞于集》。

加这一运动的其他名人还有：已故的邓承修，陈宝琛<sup>①</sup>（最近被召到北京）、徐致祥<sup>②</sup>和陈启泰（江苏巡抚，前些时候刚去世）。

中国的这场牛津运动，在东京湾战役爆发前夕达到一个高潮，势不可挡。等到李鸿章将边界协定问题弄得一团糟之后，这些年轻的翰林们意气风发，为了国家利益大声疾呼，使李鸿章被迫畏缩了一段时间，躲到一旁徒生闷气。接着，清政府派陈宝琛为钦差，赴上海高昌庙去与（法国公使）巴诺德谈判。张佩伦则被任为福建会办大臣，去保卫福州。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前去防守广州。

这帮年轻气盛、头脑发热的文人学士，毫无实际作战经验，书生典戎，自然是一塌糊涂。最终的结果是，法国耐不住了，舰队司令孤拔下令摧毁了福建水师。张佩伦，如同拉丁诗人一样，丢盔弃甲，狼狈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张之洞则幸运一些，法国人没有攻打广州。

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东山再起，大权重握。中国牛津运动就这样失败了。到上海高昌庙谈判的陈宝琛，受了免职处分。张佩伦，那位福州海战中的主角被流放到驿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满后，等待他的的是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命运：他竟成了李鸿章的乘龙快婿。邓承修被派往东京湾去划定边界，不久就从政坛上永远消失。徐致祥则长期被搁置在翰林院，终于沉缅酒色，死

<sup>①</sup> 陈宝琛（1852—？），福建闽县（今闽侯）人。字伯潜，又字篔庵。同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阁后以敢谏著称，是“清流党”健将，称“清流尾”。1891年被黜，回原籍赋闲二十年。辛亥革命前夕起用，任山西巡抚，未到任，被留作溥仪的师傅。后支持溥仪复辟。

<sup>②</sup> 徐致祥：浙江嘉定人，同治进士。著名的清流人物。曾官至大理封疆。有《嘉定先生奏议》。

去时还很年轻。死前，他上书猛烈弹劾张之洞<sup>①</sup>，措辞严厉，指责他背离了早期的原则，向李鸿章靠拢。

#### 四

中国牛津运动中，有两人在清流党解体后没有失宠，他们是李鸿藻和张之洞。皇太后对李鸿藻一如既往，恩遇有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李死后，她赐给了他“文正”称号。这件小事在我看来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已故皇太后的心是站在牛津运动一边的。同已故维多利亚女王不能容忍帕麦斯顿勋爵一样，已故皇太后也绝不会真的喜欢李鸿章，尽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双富有经验的手来处理政务。当张佩伦、那个福州海战的主角流放归来，入赘李（鸿章）府之后，李鸿章请求太后将其官复原职，对此，太后不客气地加以了拒绝。她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属于牛津运动阵营的人，竟然会跟李鸿章的女儿结婚。

李鸿章已被我称之为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那么张之洞，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格莱斯顿<sup>②</sup>勋爵。他们分别是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产物。格莱斯顿勋爵先是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保王党人，后来成为了国家统治者。张之洞起初是一个儒家高教会保守代表，后来则成为立宪政治的鼓吹者。他们都是学者，但学养不

---

<sup>①</sup> 1893年，徐致祥上奏，劾张之洞“辜恩负职”、“滥用公款”、“起居无节”等。经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核查，将徐氏之参驳回。

<sup>②</sup>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长达14年之久。对内实行温和改革，对外推行殖民政策。

厚，学识肤浅。事实上，从他们两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牛津运动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不足。

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从各自既定的理论原则出发来看待问题。在英国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则；在中国则是基于儒教的原则。双方的学者都理所当然地认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则和儒教原则千真万确，而不敢揆诸事物的本质，来检验一下这些原则究竟是否真的正确。简而言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牛津运动，其思想都从未涉及到事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从未触及到事物的道德本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牛津运动都不是真正的、而只能算是肤浅和虚伪的智识启蒙运动。投身运动的学者们缺乏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思想，也没有真正的思想家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信念，因为他们的思想从未触及到自身道德本性的本根之上。这就是投身牛津运动的学者们极易发生转变的原因所在。纽曼博士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莱斯顿和张之洞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自己的政见。

简而言之，张之洞和格莱斯顿一样不是思想家，而是一个杰出的雄辩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而是一个文人士大夫。但作为牛津运动的成员，张之洞却有一种李鸿章从不曾有过的思想能力。李鸿章实在是个庸人，不过，像帕麦斯顿勋爵那样，他是一个带贵族气的庸人。他具有一个翰林外在的涵养和良好的仪度，因为他出身于翰林院——中国的牛津。但是，除了参加科举考试所受到的一般教育外，他绝没有更多更高的文化教养。当然，勤奋而有条不紊的办事作风补偿了他的这一不足。长期处理实际事务的丰富经历，使他获得了切实可靠的常识，因而处理起问题来，他比张之洞那样见识不广、缺乏主见的学者要更为果断和老练。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继续留在广州。正是在那里，他偏离了牛津运动的原则，而变成了一个改革主义者。那场外国人所知的中国改革运动（指清末新政一译者），其真正的发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凯。这场改革运动，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发展实业即实业化为目标，张之洞在广东形成了这一思想，并在武昌付诸实施。第二阶段开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目标是振兴军事即军事化，改革军事体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张之洞编练了一支由德国军官培训的中国模范军队。改革运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其直接目标是实现教育的西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按照马太·阿诺德的说法，正是纽曼博士领导的牛津运动的影响，才导致了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崩溃，同样，在中国，也正是由于牛津运动的影响，才得以打倒李鸿章及其粗鄙不堪、腐败至极的寡头政治集团。牛津运动——挚爱优雅的牛津情感的影响——使得张之洞觉察到并憎恨李鸿章所引进的那些外国方法及其惊人腐朽的人们自身的庸俗卑鄙。张之洞和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最初都坚决反对引进外国方法，因为他看到了伴随这些方法而来的粗俗和丑陋。但中法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单是用严正的儒教原则，要对付诸如法国舰队司令孤拔那配备有可怕大炮的丑陋而骇人的战舰一类的东西，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开始调和折衷。他一方面感到采用这些丑陋可怕的外国办法迫不得已，不可避免。又认为在采用这些方法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其中的庸俗丑陋成分。在此，我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作为张之洞纯洁动机和高尚爱国精神的证据。他在担任两广和湖广总督期间，正如有些人可能会说的，滥花了公款引进了外国方法，但同时，他

也毫不吝惜地拿出并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私人财产，用以创办高等学院和学堂，专门鼓励人们研习儒家原则（指创办存古学堂之类——译者）。他认为此刻加强这种研习，以消弭他被迫引进的外国方法之粗鄙和丑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 五

于是，张之洞变成了一个革新主义者。这位牛津运动成员的改革政策，成为中国的一股政治潮流，它最初阻碍了、然后抑制了、最终摧毁和消弭了李鸿章粗鄙的自由主义及其寡头政治集团。事实上，正是这股中国牛津运动所创发的情感之潮，助长了文人学士阶层中对于李鸿章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寡头政治集团的潜在不满，并为它在甲午战后的突然崩溃和最后消亡铺平了道路。当李鸿章从日本带着和约及耻辱回国时，正是牛津运动所创发的这种潜在的不满情绪，使得陈腐、顽固保守的帝师翁同龢之流，也将自己的命运与新兴的康有为激进党及其凶猛激烈的雅各宾主义联系在一起。

马太·阿诺德说：“对于过去的强烈不满，抽象的革新体制的一股脑运用，一种见诸文字、精心入微炮制出的新式学说，一个面向未来的合理社会：这些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做法。”也是李提摩太<sup>①</sup>牧师和那些自称为中国朋友的外国人极为赞赏的康有

<sup>①</sup>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国传教士，威尔士人。1870年来华传教，并与清朝官僚结交，曾对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官僚产生过一定影响。后任广学会总干事，出版《万国公报》等书刊宣传基督教，传播西学。支持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一生主要致力于宣传让中国接受外国人的“保护”、“开化”和统治管理的所谓“新政策”。

为的做法。

而且，外国人不仅赞赏康有为及其做法，当已故皇太后试图以她最好的方式将中国从康有为及其同党凶猛暴烈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出来的时候，驻华外国公使们还千方百计干涉她的行动自由。而普通民众，整个华北的农民们则起来支持已故皇太后，反对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从而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外国人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只有文人学士才是排外的，一般人则不排外。殊不知在所有国家里，普通民众都比知识阶层更为保守。在中国，文人学士同一般民众一样排外，反对革新，恐怕后者的程度还要严重些。中国只有一个阶层不排外和不反对革新，那就是在对外贸易中赚了钱的买办和暴发户。

一般民众之所以起来反对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乃是因为这种雅各宾主义意味着要使中国全部欧化。虽然，我还不能确定早期中国牛津运动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无疑有助于一般民众本能地感觉到，中国的全盘欧化意味着输入粗鄙和丑陋。因此，当普通民众看到外国人和列强公开支持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那对普通民众意味着带来庸俗和丑陋的恶魔时，还有什么比这些人，这些满脑子恐惧这一恶魔的人愤然而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抛入大海更为自然的呢？这就是义和团狂热内在的道德原因。

由此，北京的局势变得复杂至极、危险之至。已故皇太后竭尽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腕来挽救危局。但驻北京的欧洲外交官们，不仅不同情这位国母，反而极尽威令恫吓之能事，并带着一小撮卫兵耀武扬威。为了抵制康有为凶猛暴烈的雅各宾主义，皇太后不得不唤起满洲贵族的高贵精神和傲慢的抵抗力



量。已故宓吉<sup>①</sup>先生在其《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指出，满族人是中國各阶层中最不排外的。然而此刻，满人的热血沸腾起来了。这沸腾的热血，带着高贵精神及其傲慢的抵抗力量，同外国外交官的威吓与命令针锋相对，狭路相逢，一场大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时候，即便已故皇太后再伟大，也是无能为力，正如德国诗人所言：“攻击愚昧，神仙来战也是枉然。”

## 六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已然脱离了他的革新方案。不仅康有为，还有那个雅各宾中最才华横溢的人梁启超，实际上几乎所有最著名的年轻雅各宾分子，都要么是他的学生，要么是他的特殊门徒。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最初在北京鼓吹他的雅各宾主义时，当即被赶出了北京城。正是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再次进京煽惑已故光绪帝，使其接受了他的雅各宾主义改革方案。但这一回，牛津运动的影响又一次挽救了张之洞。马太·阿诺德所言的那种追求优雅和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憎恨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凶暴、激烈和粗陋。于是，在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处于最后关头时，张之洞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

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像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向回退

---

<sup>①</sup> 宓吉 (Alexander Michie, 1833—1902)，英国人。1853年来华经商。后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并充李鸿章顾问。《英国人在中国》一书即《阿礼国传》。

缩。这一指责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向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计划虚夸不实。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译给总督听，然而总督听不进去，还说我不懂中国政治。但这时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露出了狰狞面目，总督便想起了我，于是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朋友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我举出上述细节，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对于那种指责他像真正的投机分子和叛贼袁世凯那样，转而攻击其雅各宾朋友的不公正的责难，我代表老幕主所做出的反驳是无庸置疑的。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sup>①</sup> 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

<sup>①</sup> 即著名的《劝学篇》。署名作者为张之洞，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全书24篇，4万余言。分内外篇。内篇强调封建伦理纲常有关世道人心，不能动摇，这是“本”。外篇认为有关工商业和学校报馆诸事，可以而且应该变通举办，这是“通”，“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全书贯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猛烈攻击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之说，又竭力颂扬清王朝“德泽深厚”，一味“教忠明纲”，故得慈禧太后和光绪赏识，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下令广为刊布，实力劝导。该书还当即被外人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传教士吴板桥将其译为英文，题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凡是此类的改革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自辩书”陈述了他之所以放弃早年严格信奉的儒教原则，赞成和提倡引入西方文明方法的理由。

## 七

张之洞的这部名著，像纽曼博士那本著名的《自辩书》一样，是人类智识发生微妙偏差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证。按照这两个人的看法，明辨是非的真理和道德准则都不是绝对的——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约束力。关于纽曼博士，正如查尔斯·金斯尼（Charles Kingsley）所批评的：“真理自存，总体说来，它不必也不应该只是罗马传教士的美德之一。”至于张之洞，他一方面认为儒家原则是真理，在个人生活中必须绝对遵从，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原则在现代国家生活中则行不通。儒家之教，告诫个人或国家不必专心致志于财富、权力和物质的繁荣，本乎孔子“贱货贵德”之说。而现代欧洲的新学则教导人们，人生的成功和国家的强大，基础在于拥有财富、权力和物质的繁荣。按照那个在中国鼓吹西学最为热心的李提摩

太牧师的说法：“一种没有商业价值的教育，是绝对无用的”<sup>①</sup>。

面对这两种矛盾的理想——儒教的理想和现代欧洲新学的理想——张之洞试图以一种天真的方式将它们调和起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个人必须有双重道德标准——一重是关于个人生活的，另一重则是关于民族和国家生活的。作为个人，中国人必须严守儒教原则，但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则必须抛弃儒教原则而采纳现代欧洲新学的原则。简而言之，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人就个人而言必须继续当中国人，做儒门“君子”；但中华民族——中国国民——则必须欧化，变成食肉野兽。为此，他动用了自己丰富的学识，举出古代中国试图变做食肉动物的混乱时代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学说。

张之洞以为他这种奇特而荒唐的调和是正当合理的。理由是，我们处在只认强权不认公理的食肉民族的包围之中，时代迫切要求解除对于中国及其文明生存的巨大危险。因此，在张之洞这位爱国者和儒门弟子的心目中，中国及其文明的利益与安全是超越一切道德准则之上的，就如同在纽曼博士心目中对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利益和安全的认识一样。事实上，正因为纽曼博士对于基督教的优雅与美好是如此的挚爱，才使得他为了挽救和维护基督教——在他看来，基督教具体体现在罗马

---

<sup>①</sup> 当梁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有没有对梁国有利的办法时，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现代那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那些新学的倡导者们，如果清朝大臣们问及基督教中正义的完整意义时，将答曰：“何必曰义，亦有铁路、最惠贷款而已矣。”借此机会，我想指出的是，我出席过许多在华传教士与总督、巡抚和各种清朝官员的谈话会，但从未听到他们谈论像“基督教中正义的完整意义”这一类问题。所有的谈话全都是关于铁路、科学、财政、医药、技术教育和反缠足的。——原注

天主教会中——认为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抛弃基督教原则是正当合理的。同样，出于对中国及其文明的强烈忧患，张之洞认为他被迫调和，迫不得已抛弃儒教原则，至少对于中国的民族生活来说，也完全应该。

无论是纽曼博士还是张之洞，像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一样，由于我已指出过的那种弱点，都成为极端的理想主义者，那种其才智被过于强烈的空想所歪曲的人。孔子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法国人茹伯则说：“愚昧，从道德方面看，可以减少罪过；从智能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过。”纽曼博士和张之洞所采用的这种调和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导致了耶稣会教义，在政治上则导致了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东西。尽管张之洞和纽曼博士这样的人，正如我所说过的，是品格高尚动机纯洁的人，但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

## 八

当庚子灾变结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后，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开始致力于采纳欧化方案。——中日战争首次将欧洲那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可怕怪物带到中国门口，置于中国古老文明的面前。此前，中国的文人学士虽然对这一可怕

怪物感到惊奇、厌恶和憎恨，但他们仍然蔑视它，试图不去理会它对于中国人民及其文明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个怪物远在欧洲，在另一个大陆，所以危害尚且遥远。而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及其文明与这种可怕的怪物——现代欧洲那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之间——就仅仅是一海之隔了。于是，在中国文人学士之中，便激起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忧患意识。其结果，自然是一场由忧患和激动所造成的疯狂。那些最坚定的保守派，甚至已故的光绪皇帝，也愿同康有为及其中国的雅各宾派，同这些打算把希腊人的木马引入特洛伊城<sup>①</sup>的人们合作。实际上，也就是要祈求和呼唤现代欧洲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之可怕怪物来援助中华民族。对此，反对的呼声蜂拥而起：“我害怕希腊人，甚至怕他们的礼物！”（*Tinco*<sup>②</sup>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张之洞在这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建议来个调和，但骄傲的满洲贵族起而声言：“不可，我们宁愿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去死”，誓死抗拒（*Perissons en resistant*）。已故的帝国大臣徐桐，一位中国一流人物和满族派成员便说：“要亡么，要亡得正。”

与此同时，对这种可怕怪物的恐惧，对现代欧洲实利主义文明可能即将占领中国并毁灭中国文明的可怕恐惧，迫使一般中国人、整个华北的农民发了疯，他们组成义和团，奋起支持满洲贵族。已故皇太后尽其最大努力设法摆脱这种困难而复杂的局势。但是，当外国海军袭击并攻占大沽口的消息传到北京

---

① 这里是指引狼入室，引祸进门。在特洛伊战争的第10个年头，希腊人制造了一个大木马，内置勇士若干，特洛伊人听信一个战俘的谎话，将木马拖入城内。结果希腊人得以里应外合，攻陷特洛伊城。

② *Tinco*：疑是“*Tmeo*”之误。

之后，皇太后得出了“对战败的人来说，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唯一的救星。”(Una salus victis, nullam sperare salutem)的结论。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馆开火。于是，满洲贵族和整个华北的农民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做出极端之举，要赤手空拳地将可怕的现代欧洲实利主义文明这一怪物，以及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统统赶入大海。就这样，中华民族以自身的文明资源，以满洲贵族的英雄主义和勇敢的义和团小伙子的视死如归精神——正如海军将军西摩尔的一个部将所看到的，他们如痴如狂地向现代欧洲的枪口冲锋，与他们的对头作孤注一掷的抗争，来保卫和挽救中国文明。可是，这最后一搏以失败告终。此后，中国人民得出一个结论——正如我将说明的，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他们自身的文明资源，要对付现代欧洲民族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没有效果的、和不中用的。

## 九

因此，如我所说，当朝廷在庚子事变后回到北京时，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欧化的道路。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局势的可怕可悲之处在于，当中华民族决心抛弃他们自身的文明，采纳现代欧洲文明的时候，在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现代欧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丝毫的了解。康有为及其中国的雅各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只想通过一个单一的改革行动，仅凭皇帝的一纸“上谕”来欧化中国。若

不是已故皇太后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成功地取消其外甥、已故光绪皇帝的统治权，镇压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那么，世人将看到一场可怕的悲剧：整个中华民族就像一个疯子一样行动起来，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毁房子，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纸房子的假货。

已故皇太后在庚子灾变结束回到北京后，决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她绝不允许自己或任何别人像其外甥光绪那样行事，即听从康有为与中国雅各宾派居心不良的鬼话，按自己个人的意志颁布法令来改革和欧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高贵满族天性的满人，她个人对于欧洲文明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作为一国之主——在这里，已故皇太后显示了她品德的完美和杰出的政治家风度——作为一国之主——她感到有责任让自己个人的愿望服从于全民族的意志。不仅如此，整个骄傲的满洲贵族也像她一样，出于高贵的满人天性，并不热爱现代欧洲文明的方法。这里，我可以指出，主要是那些暴发的买办阶级和一部分卑劣的文人学士，那些具有粗俗的中产阶级庸人智慧而缺乏像满洲贵族那样高贵天性的人——主要是他们这些暴发户和卑劣的文人士大夫，渴望欧洲文明的物质享受，因而叫嚣要欧化中国。这样，中国已故皇太后不得不以她伟大的人格，强迫骄傲的、生来倔强的满洲贵族服从全民族欧化的意志和命令。但尽管如此，她仍下定决心，每一个欧化中国的改革行动和措施，都不能个人说了算，包括她本人在内，而必须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认可——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显要，以及各省总督巡抚的同意才行。简而言之，已故皇太后决定，如果中国非要进行一场革命不可，它将是如伟大的英国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所说的：“一场合乎法律秩



序的革命。”<sup>①</sup>

① 非常奇怪，似乎没有人知道中国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立宪政府。所以如此，我以为乃是由于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代议政体”和“立宪政体”之间存在极大差别的缘故。一个立宪政府，它的执政者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按人民的意愿办事；而一个代议政府，它的执政者不仅要得到人民的拥护，按人民的意愿办事，而且人民的认可权还必须从形式上授给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中国，的确从来没有过代议政府，但中国政府又是一个得到人民拥护、反映人民意愿的地地道道的立宪政府。连外国人在受过挫折，吃过苦头之后，也知道在中国，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便会一事无成。事实上，中国的宪法是一种“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正如英国宪法一样，后者与其说是一个“法律上的”宪法，还不如说是个“道德上的”宪法。在中国，按照法律，一个地方官虽要服从上司，但在自己的辖地却有绝对的自主权。一旦他违反了道义宪法，不按人民的意愿办事，他的衙门就会被拆毁，脑袋就要搬家。从法律上讲，皇帝的权力也是绝对的，但如果他违反了“道义上的”宪法，人民就会造他的反，他的王座就保不住。简而言之，在中国，人民对于皇帝和官员们的服从，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服从，而是一种“道义上的”服从，是基于道德法律和儒家的“君子之道”。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宪法是一种道德宪法（参见我译作《人生准则》的《中庸》第20章或16章）。

但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人们谈论中国需要宪法时，应该记住，中国的文人学士现在想要和呼唤的不是立宪政府，中国现在已经是立宪政府了，而是“代议”政府。我认为文人学士们不该得到它，并希望他们永远也得不到。因为一旦中国有了代议制政府，中国文人学士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废除中国的上议院

我指的是满洲贵族——随之而亡的将是满族的高贵品格。在此，我最后要说的是，外国人应像索尔兹伯里勋爵将说的那样：“在中国，要把宝押对（Put their money on the right horse in china）。聪明人，一点即透（Verb. sap.）。”事实上，那些自称为中国的朋友的外国人，不应敦促中国人制定什么宪法，而应把法国人茹伯的这些话给中国文人学士听：“去呼唤自由魂吧，不要呼唤自由人。道德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自由。从属就其自身而言总比独立要好。一个意味着秩序和条理，另一个则意味着孤立的自足。”然而，我不知道，在那些声称是中国的朋友，以给中

国带来开化和文明为荣的外国人中，是否有一人能将我所引用的茹伯的这些话译成中文。从我与那些自称为中国和中国人朋友的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实际情况正如约翰逊博士谈起“爱国主义常常是恶棍的最后逃避所”一样，在中国这儿，无论如何，“对于中国人的友谊，乃是失业的欧洲人最后的避难所”。——原注

### 第三章 满人重新掌权

继大侯爵曾国藩之后，中国文人学士名义上的首领是李鸿章。在中日战争李鸿章倒台之后，中国的文人学士则群龙无首。其结果，是中国的统治权，正如我所说过的，它曾经在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汉族文人士大夫手里，现在则又重新回到了满洲贵族手中。裕禄，<sup>①</sup>这位义和团暴动时在天津自杀的满人总督，继李鸿章之后做了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不过，他还算不上是满洲贵族的首领。成为满洲贵族首领的，是已故军机大臣荣禄。<sup>②</sup>他是中国的索尔兹伯理勋爵。

已故索尔兹伯理勋爵，是英格兰贵族阶层中最后一个不仅拥有卡莱尔极为欣赏的那种彬彬有礼的英国气派，而且在私人

---

<sup>①</sup> 裕禄（约1844—1900）满洲正白旗人，喜塔腊氏，字寿山。监生出身，1887年授湖广总督，因反对修芦汉铁路被降职。1898年升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旋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义和团运动初起时主张镇压。后清廷改剿为抚，他亦改为利用义和团以排外。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他败守北仓，北仓败，自杀于杨村。

<sup>②</sup> 荣禄（1836—1903）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字仲华。荫生出身。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所宠信。后得袁世凯密报，帮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任军机大臣，节制北洋海陆各军。曾屡请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

和社会生活中还拥有马太·阿诺德谈论诗时所称的——“气魄”的人。同样，中国的荣禄也是满族最后一个不仅具有高尚品质、尊贵气派，和人们常可以从有教养的满族青年身上看到的那种温文尔雅，还具有宏大气度、一种“大人阁下”——大贵族威严的人物。目前，我在北京见到的最为出色的满洲贵族，甚至于现在的摄政王，也没有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身上的那种“气魄”。除荣禄之外，近来满洲贵族中唯一的另一位具有“宏大气度”的人，是已故皇太后。皇太后不止是一位像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伟大贵妇或女国主，她还是一位高贵的“不同寻常”的女性。<sup>①</sup>

然而，俾斯麦对于索尔兹伯理勋爵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荣禄。在谈到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索尔兹伯理勋爵时，俾斯麦说道：“他只不过是一块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相反，俾斯麦则与比康兹菲尔德勋爵一样，富有才华。无论是索尔兹伯理勋爵还是满人荣禄，都不曾自命为天才。相比之下，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比康兹菲尔德勋爵，则都费尽心机加强修养——以提高智识水平。另外，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的血液里，都只仅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可以说是块好铁或贵金属，但是他们却并未努力，或因太过执拗与骄傲，不屑于去努力把自己血液中的贵金属经由智识修养的精致坩锅与文火耐心地加以提

---

<sup>①</sup> 目前这一代皇室后人或满洲贵族成员，由于离群索居，其为人行事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较刻板生硬，过分自律，不够镇定自若，加之从小家境优裕，生长于温室之中，所以“不善交际”（*gaucherie*），就连那桐和铁良也不例外。他们没有自信，也缺乏在上流社会有广泛交往，见过世面的人们的那种涵养（*Savoir-vivre*）。……原注

炼，事实上，他们未能将其血液中的好铁冶炼成纯钢。<sup>①</sup>

结果，他们两个人，索尔兹伯理勋爵这个品格高贵的英国大贵族，与骄傲的满洲贵族荣禄——当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本人又负有最高责任的时候，——两人都非但未能控制局势，反而听任局势的摆布。索尔兹伯理勋爵做梦也没想过要向南非的布尔人开战，更没想到要吞并德兰士瓦。但他听凭事态自由发展，直到南非共和国总统克鲁格 (Kruger) 送来了最后通牒之后，那个伟大而骄傲的赛希尔<sup>②</sup> 的热血，才终于战胜了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索尔兹伯理勋爵，使他在战争爆发前夕的那场极其动听、令人难忘的演说中，怒火中烧，不可遏止。这一演说，读起来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科里奥兰纳 (Coriolanu) 的那场演说：

你有数不清的谎话！叫我撕裂心肺  
也容纳不下。呀，奴才，你这该死的奴才！  
原谅我，爵主们，这是我生平头一次  
不得不骂。

其结果，是布尔战争的爆发和南非持续两年多的祸乱。同样，中国的荣禄——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总督衙门的电报会证明的——他做梦也不曾想攻打外国使馆，更谈不上要将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去。要说正确和公正，外国人指责已故中国

① 子路，儒家学派中的彼得，那个孔子最勇敢的弟子初次见孔子的时候，孔子问他：“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口：“学岂益哉也。……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屐革。以此学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箠而砥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原注

② 赛希尔 (Cecil)；索尔兹伯理的本名。

皇太后和荣禄处心积虑围攻使馆，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就好比指责已故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理勋爵在南非战争之前，阴谋发动布尔战争并吞并德兰士瓦一样。事实恰恰相反。荣禄尽最大努力，去抑制那些刺痛了自尊而发疯的满族王公们，保护在京的外国人，维护和平。当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sup>①</sup>军纪涣散的部下杀死时，他心如刀割，给张之洞总督发出一封告别电报，绝望地呼叫：“Tout est Perdu for l’ honneur——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自尊了。”实际上，像索尔兹伯理勋爵一样，荣禄听凭事态自由发展，漫无节制，直到外国海军发动猛攻，占领大沽炮台，他身上那骄傲的满族血液才占了上风。于是，他放开抑制之手，让端王带着疯狂的拳民、董福祥带着漫无军纪的甘军为所欲为。其结果，是华北骚乱一年有半，中国人民宁愿每年把千百万两白银送入外国国库。

这样，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一经考验，便表明他们正如俾斯麦所说：“只是一块看上去像钢的涂料石膏。”孔子说：“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论语·阳货第十七》）。

<sup>①</sup> 董福祥（1840--1908）甘肃固原人，造反起家，后被左宗棠收编。所属官兵多为甘肃人，称甘军。曾参与收复新疆之役。1897年调防北京，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参与围攻使馆，杀死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辜鸿铭此处有误，德国公使克林德并非为甘军所杀，而是被端王的虎神营士兵打死的）。庚子议和，董氏被指为“首凶”，但因他握有甘军实力，虑“激变”，清廷仅予革职处分。

二

议和完结、朝廷返京不久，荣禄便死去了。此后，庆王<sup>①</sup>继之成为满洲贵族的领袖。尽管中英两国社会状况有别，但庆王就是中国的贝尔福。像贝尔福先生一样，他是一个大悲观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有些没有头脑的外国人，还有中国人，将这样一个事实，即庆王从其所栽培和庇荫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捞的下属那里接受钱财和礼物，说白了也就是他受贿的事实，看重过了头。其实，庆王并不像李鸿章那样，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使得他无所顾忌地从其被保护人那里接受礼物和金钱，正如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波尔<sup>②</sup>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在他那个时代容忍和庇护英国的“假公济私者”一样。沃波尔爵士曾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庆王则说：“我的身后事，与我无关”（*Après nous, le deluge*）。在庆王看来，如果一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连他这个奢侈惯了的老头子及其一家老小也养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挽救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耗尽了全部的房产、私人财物乃至自己的

<sup>①</sup> 庆王，即奕劻（1836—1918）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麟孙。1884年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他奉命留京，与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议和。后任内阁总理大臣。此人贪鄙昏庸、纳贿卖官，结私揽权，是袁世凯在京的靠山。

<sup>②</sup>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英国民主党领袖，两度任财政大臣（1715—1717, 1721—1742），后一任时间极长，成为内阁事实上的掌权者。

一生，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老头子就要依靠自己来为自己及一家捞点外快了。假如英国的贝尔福先生是生活在乔治时代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犬儒主义将使他像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一样，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者”。假如他生活在中国，也会接受张伯伦先生及其伯明翰朋友的礼物和钞票，就像庆王接受袁世凯及其广东朋友所送的礼物一样。<sup>①</sup>

爱默生说：“我们评价一个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希望的大小。”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指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抱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确切标志。——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像所有国家的贵族一样，最初都是一个军事部族或种族，其专长在于能征善战。它从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视发展体力，而不是脑力或智力。因此，该部族的后代，甚至到了晚近，社会环境改变了，但一般说来，他们仍然不爱去进行脑力或智力方面的训练，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然而，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养，你就无法有思想，无法了解思想。进一步说，若没有深厚的智能修养，你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而没有思想，便无法对现实作出说明。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只能看见事物的外表，却无法见到事物的内涵，见到那物质客体的内在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对于一个没有思想的农

---

<sup>①</sup> 在我与黄浦江的污泥之龙奋力拼搏的时候，一个上海的高级律师告诉我，按照英国的法律，除了法官和警察之外，受贿不算犯法。在华外国人，当他们听说一个中国官员，像上海道台这样的公职人员捞钱致富的时候，会立刻厌恶地指手划脚说，中国必须改革。而当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国有公司经理，那些和上海道台或两江总督一样的公职人员，以自己公司的股份进行投机，稳操胜券地赚大钱，发大财的时候，英国人却说：“这当然是不道德的，‘它违反了最高的道德’。但是，唉，罢了，天天如此嘛。”——原注



民来说，正如华兹华斯所言：路旁的樱草就只是一颗樱草，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简而言之，没有思想，人们无法说明和了解现实的内涵，而没有正确的思想，人们便无法得知现实真正的内涵——那种现实内在的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sup>①</sup>

因此，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像中国的满洲贵族和英国的上层阶级，因为他们缺乏智识修养，一般说来没有思想且无法理解思想，结果也就无法解释和说明现实。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如若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她就会将其人和民族一起吞并——在太平时期，对于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会和文明秩序中的人来说，不必自

<sup>①</sup> 这里，我转述一幅弗雷德里克·特力乌斯(Frederick Treves)爵士在《灯笼的另一面》一书中所提供的画面，它是描写中国的伯明翰广州的。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即袁世凯的朋友和追随者们，还有中国的伦敦佬，那个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笔下的阿新，都来自这个地方。特力乌斯写道：“广州是一个梦魔般的城市，一切都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街道阴暗狭窄不见天日，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巷子里挤满了菜色的人群，有的衣着肮脏，有的裸露着黄皮肤。他们光着脑袋龇牙咧嘴，他们战战兢兢，鬼鬼祟祟，从一条巷子移向另一条巷子，带着诡秘奇异的神情，使人一看见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的邪恶、可怕的暴乱和刻毒的残忍。”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思想的英国贵族来说，一个衣着肮脏，拖着彘尾，黄着皮肤的中国人，只不过是一个拖着彘尾、皮肤泛黄的中国人而已。他无法透过表面的黄皮肤看到其内在之物——那种中国人的道德特质和精神价值。如果他能够的话，他将看到在拖着彘尾、黄着皮肤的中国人的内里，还别有洞天。在那里，他将看到道教及其胜过古希腊男神女神的神仙群像；他将看到佛教及其无限悲天悯人的诗歌，它们与但丁那深邃的诗歌一样的美妙、伤感和深沉；最后，他还将发现儒教及其“君子之道”。几乎没有英国人能够料到，这种包含“君子之道”的儒教，总有一天将改变欧洲的社会秩序并摧毁欧洲文明。但那个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看不到这一切。对于他来说，一个留着彘尾、黄着皮肤的中国人，就只不过是一个黄着皮肤、留着彘尾的中国人而已，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原注

行理解生活中环绕自己的种种现实——那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社会，既成社会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因为这些现实已经得到了解释，绝对毋需人们再去自行解释。然而，生活在革命和“扩展”的时代——比如当今生活在中国和欧洲的人们——当文明与文明相遇、冲突和碰撞之时，一个民族旧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习惯，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样很容易破碎，——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新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否则，新的现实，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没他们、吞没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发现那些具有智识修养的贤者，像中国文人学士的代表张之洞，英国中产阶级的代表纽曼博士和格莱斯顿，他们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这些人做出了真诚而英勇的努力，来说明解释新时代的新现实。但是，由于他们的智识修养肤浅，不够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确，只是虚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们对于新现实，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只能做出虚假的总体说来错误的说明。当他们发现自己错误的解释和说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改变主意去搞折衷调和：以一种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来自行拯救。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类人的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正如我所说明过的，使得人们在宗教和道德上成为耶稣会士，在政治上则成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

另一方面，贵族阶级中人，在一个革命和扩展的新时代，由于他们缺乏智识修养，没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释和说明现实。比如像义和团运动中的端王和疯狂的满洲王公贵族们，他们不去设法了解和认识现代欧洲文明的新现实，而是以英雄主义作拚死一搏，去对抗新的冷酷的现实——

那可怕的现代欧洲文明的物质主义器械，诸如连发的来福枪和马格西姆枪。仰仗满族全部的英雄气概、勇武精神和高贵品格，去赤手空拳地与之搏斗。但这些新的冷酷现实，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样，以这种方式自然是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因此，在一个革命和扩展的时代，满洲贵族阶级的人们，当他们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格去英勇抗击新时代的新的冷酷现实，而又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时候，他们只能发现自己被可怕的新现实冷酷无情地击倒——不久，他们就拒绝再战。然后，他们掏出手帕揩干额上的汗珠说：“好一个野蛮的讨厌东西！与这种绝对无法理解的野蛮东西作战是毫无益处的。罢了，罢了，如果我们要灭亡，就灭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后，我们都难免一死，迟死早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此时此刻，我们还不如将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生活尽量过好。”由此，我们就能够了解像中国的庆王、英国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人怎么变成悲观主义者，然后又由悲观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者的了。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贝尔福先生的犬儒主义使他能容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并培植和保护在南非的赛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和杰米逊（Jamieson）博士；中国庆王的犬儒主义使他竟说：“我死之后，即便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并对袁世凯及其广东朋友所送的礼物和银票来者不拒。

#### 四

因此，我们发现，我所谓“一个人或民族抱有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确切标志”一说完全正确。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智识修养肤浅不深的人，他们具有不完善、不正确的思想，一旦面临革命和扩展时代的新现实，他们就变成了极端理想主义者，或者像拿破仑所说的空想主义者（idealogues），从极端理想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又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而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里主义，不过是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别名和伪装形式罢了。另一方面，像庆王和贝尔福先生这样的人，他们甚至连肤浅的智识修养也没有，没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变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样的中产阶级代表，其高贵的天性使他们摆脱了其错误的人生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虚伪的理想主义的结果。同样，庆王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贵族阶级代表，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也使他们摆脱了其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所造成的后果：那极端物质实利主义的结果。因此，尽管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在理论上都是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信奉的却与其持论不同，他们过着一种正直无私的高尚生活。同样，尽管庆王和贝尔福先生在理论上均为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者，并且最终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贝尔福先生是一位温和的悲观厌世者，

庆王则是一位好心肠的玩世不恭者。我相信，在英国，贝尔福先生是他的朋友们所尊敬的人物。而中国的庆王，我在北京时就曾听说，他受到仆人和随从们的敬重。

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的人，尽管其错误的人生观对他们自己的道德生活伤害不大；同样，庆王那样以犬儒方式供养自己及其家属的恶习，容忍张伯伦的贝尔福先生和赛西尔·沃波尔那类人的恶习——对他们自身的高贵气质也没有太大的玷污，事实上就贝尔福先生来说，他那种态度甚至还可能给他的高贵品质增光——然而，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错误的人生观，以及庆王和贝尔福先生的恶习，最终将对世界——对于世界文明，产生无穷的危害。因为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里主义使一个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则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识生活，而没有真正的智识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第四章）

## 五

英国人有个“霸王”兰斯东<sup>①</sup>，中国人也有自己的“霸王”

---

<sup>①</sup> 兰斯东（Henry Charles Keith Lansdowne, 1845 - ?），英国政治家，一个强权人物。

铁良。<sup>①</sup>铁良是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党的绊脚石 (bête noire)，兰斯东勋爵则成为英国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嫌恶对象。中国的革命党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满人铁良，犹如英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憎恶兰斯东“霸王”。因为兰斯东和铁良这种人不仅是“霸王”，而且是沙皇——一个上帝派来的可怕沙皇，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无赖”，打击乱臣和贼子，消灭一切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事实上，这两个人，是那欧洲必定要来的、甚至中国也可能要来的超人同类，除非欧洲人和我们中国人马上改弦更张，那个超人将会携带比俾斯麦首相的“铁血”政策更为可怕的东西来，不仅报复性地“改造”我们，而且残害和丑化我们及其全部文明——将文明中的所有精华，其香甜之处，美丽之处，乃至聪慧之处，统统糟塌得面目全非。现代欧洲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大约两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在本国与这个极其骇人的超人面孔打过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学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慄。他在中国，人称秦始皇，就是那个修筑长城的皇帝。这种超人，英国的兰斯东和中国的铁良只能算是其虚弱的代表，真正强有力的象征人物是中国那个著名的皇帝。这种即将来到欧洲也可能来到中国的恐怖超人——代表着“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他是《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也是现代那些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神。希腊人称之为公正的审判官或报应女神。罗马人则称之为本丢·彼拉多，他

<sup>①</sup> 铁良 (1863-1938)，满洲镶白旗人。字宝臣。曾任户部、兵部侍郎。1903年赴日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继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1910年调任江宁将军，辛亥革命时，负隅顽抗，兵败逃。

不知真理为何物，把拿撒勒的圣人（指耶稣——译者）与强盗巴拿巴不加分别地一并钉到十字架上。

现代欧洲人称这一超人为“警察”。这个欧洲“警察”现在也到了中国。<sup>①</sup>除非欧洲人不再做食肉兽，而我们中国人既拒绝变做食肉兽，又拒绝变成没有思想的英国人，——这一“警察”、这一代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警察”，就会不断成长，直到他变成那种可怕至极的超人，有一天要毁灭全部文明，毁灭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留下一片荒漠并称之为秩序为止。

## 六

生活在革命的混乱时代和社会变革时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识修养的人，要想不变成丧失理智的疯子，或不变成使他人丧失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以下三种方式：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类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学问或智识高于简单智识或常识，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抛弃常识、变成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者，即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所谓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就是通过一种虚假的极端理

---

<sup>①</sup> 上海的纳税人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否则，那个“警察”——我指的是“警察”的鬼魂——将逐渐膨胀，直到将整个租界建成一个大兵营供其居住，而所有非警察人员都将没有房子栖身。除非上海志愿队向道台衙门甚或南京进军，以武力迫使道台或两江总督把江苏全省都划归他们，扩大租界。有头脑的英国人应当铭记戈登将军的话：“一个心怀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军队。”军队或警察越多，纳税人要掏出的钱就越多。聪明人，一点就透。——原注

想主义，一方面以宗教热忱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以热烈虚假的爱国主义相标榜的人。他们那自欺欺人的实践，实际上已经毁了自己的道德品质，但他们还在诓骗自己，以为由此保住了自身高贵的品格。再一种方式，就是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所代表的。他们的常识远远超过了学识，生活在乱世之中，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置学识乃至高贵品格——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变成悲观主义者和犬儒。悲观主义者是抛弃和扭曲了智识的人；犬儒则是在抛弃了高贵品格之后，又抛弃了“道德法律”的人。但是，悲观主义和犬儒，当其实际上抛弃高贵品格——抛弃道德法律的时候，却认为他们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贵品质，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那样是通过自欺欺人。悲观主义者和犬儒坦白地说：“如何进退，需要三思。”他们用莎士比亚笔下鲍西亚（portia）的话来为自己开脱：“如果行善与知道何为善行一样的容易，那么小教堂就变成大教堂了，穷人的陋居就变成王子的宫殿了。”然而伏尔泰说过：“C'est la malheur des gens honêtes qu'ils sont des lâches——胆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

最后一种方式，可以英国的兰斯东勋爵和中国的满人铁良为代表。他们既无常识又无学识，只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这样一种人生活在乱世，要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变成白痴。他们成了盲目巨人，有力量却没有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智慧。但他们是道德上的巨人，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一种道德力量。人们指责卡莱尔，说他不道德，因为他崇拜强力，殊不知所有“真正”的力量都是道德的——是一种道德力量。所有真正的力量都具有建设性，因而是道德的。而假的或虚伪的力量，虽貌似强大或自以为强大，



其实虚弱不堪，就像那“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一样——一旦付诸检验，会立马败北。它具有破坏性，因而是道德的。所有真正的力量之所以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总是力求建立秩序，即使在进行破坏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必要的破坏正是为了建设，——所有真正的力量所从事的破坏，都是为了建设——为了建立秩序。<sup>①</sup>

盲目的力量——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那样的人的无知无识的力量——是一种巨大的真正的道德力量，因为他们能够克己。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请教他何为真正的道德生活（仁），孔子回答说，就是“克己复礼”。因此，中国的端王及其拳民，以及英国那些鼓吹妇女参政的女人们所具有的那种狂热或高贵的

<sup>①</sup> 真正的军国主义甚或战争，即真正的武力，并不是不道德的，但是，侵略主义或假军国主义，比如欧洲日前建造无畏战舰的竞赛，不惜浪掷金钱维持那些穿红色硬领制服的人们（指军人——译者）无度的消费来保证“和平”；这种侵略主义或假军国主义，在中国，正如我们知道的，它意味着捍卫各种条约中的“神圣权利”，意味着不惜浪掷金钱前来拜见已故皇太后，向她表示“真诚的友谊”，不是吻她的双颊或握她的手，而是在她的面前，在她那些扬子江岸饥饿的人民面前，把无畏战舰开来开去，耀武扬威。我说过，侵略主义，比如现代欧洲的假军国主义，不是真正的武力，而是腐朽的酿乱力量——它是不道德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奥立瓦·克伦威尔和腓特烈大帝的真正军国主义，都不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些军国主义带来的结果，正如我们知道的，是持久的和平，对于欧洲人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和繁荣局面。但是，路易·拿破仑的侵略主义或假军国主义则不道德，其结果是一场大毁灭和巴黎公社的出现。约瑟夫·张伯伦的侵略主义或假军国主义也是不道德的，其结果并未带来和平与繁荣，而带来的是鼓吹妇女参政的那些女人，她们尖声叫喊并与英国警察搏斗。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1843—1909，俄国东亚舰队总司令——译者）的侵略主义，连上海人也该知道，它带来了——不说别的——起码是给上海带来了贸易萧条和一段难熬的岁月。——原注

疯狂，虽然是真实的力量，却并非是健全可靠的力量，因为他们不能充分地克制自己。在此，我可以顺便说一说，北京和外地的那些贫苦的满族家庭妇女——还可捎上日本妇女——所有这些高贵的妇女，处于无政府混乱时代，为了尽力保持她们的高贵品质，甚至比英格兰那些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遭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中国的妇女，特别是满族妇女和日本妇女<sup>①</sup>，却没有尖声叫喊去跟警察搏斗。她们只是以苍白的面容，倦怠的双眼，和凹陷的两颊做沉默的抗议。当一个生人从旁经过并试图与她们搭话的时候，这些苍白的面孔因太疲倦而失去骄傲，因太悲哀而不再美妙，她们以无声的尊贵移开目光，转身走开：

她转身凝视地上，

面容丝毫不为埃利阿斯的话所打动，

俨然一块坚硬的燧石或马尔佩斯山上的大理石。<sup>②</sup>

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中国义和团运动狂热风暴的英国人，都应该到北京或南京贫苦的满族聚居区去走一走，看看那里本该成为最优秀的高贵妇女们所遭受到的摧残，如果他有些头脑，起码还有一点高尚的人性，那么，他就会自愧无颜，悔不该谈论什么汉人或满人穷凶极恶，魔鬼无情之类混活了。简而言之，这些汉族和满族妇女，还有日本妇女，由于她们确实坚强，具

① 辜鸿铭始终认为日本文明是真正的儒家文明，日本妇女是真正的中国式妇女。

② 原文如下：

*Illa solo fixos oculos aversa tenebat,*

*Nec magis incepto vultum sermone movetur,*

*Quam si dura silex aut stet Marpesia cautes.*

有真正的道德力量，拥有孔子所讲的古代自尊的人们那种克己和沉静，所以，她们比英格兰那些尖声叫喊并与警察搏斗的现代妇女、那即使和她们遭受到同样的苦难、也必定没有她们坚强的妇女更有自制力。

## 七

言归正传。虽然满人铁良像兰斯东勋爵一样，没有荣禄和索尔兹伯理勋爵的“气魄”，但由于他们能够克己，因而也就摆脱了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特有的弱点：极端的急躁和任性。铁良，和兰斯东勋爵一样，以沉着冷静著称，在革命和国家剧变的时代，这是一种伟大而可贵的品质。借用一句俾斯麦的隐喻来说，如果荣禄和索尔兹伯理勋爵是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那么铁良和兰斯东勋爵则是水泥——坚硬的水泥。引伸一步说，在革命和扩展的时代，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样的人——拥有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变成了“毒气”；像庆王和巴尔福先生那样带有极端物质实利主义倾向的人，则变成了“泥浆”。而像铁良和兰斯东这样的人，由于连何为理想主义何为物质实利主义也一概不知，仅仅具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便成了又硬又纯的水泥。对于奠基房子来说，水泥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材料，它能用来抵挡暴风雨和洪水的冲击，保证房屋不致于整个地坍塌。然而，当环境迫使你不得不改变和扩建房屋的时候，那房中用水泥制成的东西不仅没有用，而且肯定还难以处理，妨碍你干事。

要是赶上一场地震，那就连房子带房中的一切，都要一并遭殃。

隐喻的话就此打住。在一个国家，像中国的满人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他们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刻板僵硬，但确实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moral hardiness”），又具有傲慢的抵抗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沉着冷静。

即使天塌下来，砸在身上，  
他也绝不动摇，毫无恐惧。<sup>①</sup>

这样的人，在社会剧变和国家动荡时期，就抵抗和防止急剧的社会堕落、国民道德总体的败坏，以及社会与文明的彻底崩溃这一消极防御目的而言，是极为可贵的。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种人极端虚假的理想主义没能起到防止作用。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那种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只能帮倒忙，将局面弄得更糟。

## 八

事实上，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这样的人是现代清教徒：此种人，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而不是像“谈起

---

① 原文为：Si fractus illabatur orbis,  
Impavidum ferient ruinae.

来就害怕”的英国人斯特德先生，汉口的杨格非<sup>①</sup>牧师、甚至于张之洞这种人——才是现代文明真正的清教徒。但是，这些现代清教徒是心中没有神的清教徒。无论如何，他们的神，我说过，跟《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差不多。现代清教徒，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那样的人，他们心中的神是——荣誉和责任。他们不知道也不承认《新约圣经》里的神：爱和仁慈。当仁慈之神向现代清教徒请求以更真确的道德法律，一个比讲荣誉和责任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的法律：“宽恕罪犯，体谅作恶和违法的人，乃至对不人道的人也以人道相待”——当仁慈之神请求按此种法律行事的时候，现代清教徒却回答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要求绝对忠实和崇敬的神，我们必须公正无私。”甚至于爱神——我们见到的那些面容苍白、双眼倦怠，两颊凹陷的满族妇女——恳请于他们时，也是徒劳。当爱神如此请求的时候，现代清教徒用缓和而冷酷的声音回答道：

我不能爱你这么深，亲爱的，  
我对荣誉也不曾如此厚爱。

就这样，现代清教徒决定参加公平竞赛了。中国的铁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兰斯东勋爵则要在英国继续建造无畏战舰。与此同时，中国的满族妇女那苍白的面容越来越苍白，两颊陷得越来越深；而在英国，要求女人参政的妇女则尖声叫喊着与警察搏斗，到头来，不是自

---

<sup>①</sup>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55年来华，先在上海传教。1861年从上海出发，遍历华中各省，为第一个深入华中的基督教传教士。最后卜居汉口，在两湖传教，有“街头传教士”之称。据说所设福音堂达百余座。曾在汉口创办博学书院，后改为杨格非学院，培养华籍传教士。著有《对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呼声》等书。

身的女人味消失殆尽，就是一命呜呼。现代清教徒们就这样公平竞争下去，直到总有一天，现代欧洲将会听到一声大叫，就像两千年前在古代欧洲所听到的那样，当时，他们把《犹太书》<sup>①</sup>中那个拿撒勒的圣人钉在十字架上——叫喊着：“潘神<sup>②</sup>死了！”简而言之，跟古代清教徒一样，现代清教徒，比如铁良和兰斯东勋爵这种人，他们太过刚直耿介，太道德了，不可能去冒一个不道德的险，因而也就无法维护道德和文明于不堕。

因此，对于那种积极的扩展和重建工作，那种开阔心胸便于了解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时代的各种新情况，并懂得如何处理这些新情况的积极工作，像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当然是毫无用处的。不仅如此，甚至于让他们去做那种激励工作，正如我所说过的，那种满洲贵族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所肩负的特殊任务，他们也难以胜任。因为他们太过刚直刻板了。他们品质高贵，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一朵晚秋的菊花，生长在阴冷的寒空下，沐浴不到阳光——太冷，太无光泽和缺乏热度，万不能打动人的心灵、温暖他们的情怀，点燃他们的激情。要想激励民族扩展工作——达到激励的目标，就必须以激情去点燃一个民族的火热之心，从而实现灵魂的扩展，使之能够容忍和接受新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是那些品德高贵的男人和女人具有爱心，具有强烈的激情，他们热情奔放，可以发狂，像中国的端王及其拳民，或者英国那些主张妇女参政、实实在在与警察搏斗的女人一样。正如我的一个苏格兰女朋友最近来信所说的：“她们主要不是为自己着想，而

① 《犹太书》，《新约圣经》中的篇名。

② 潘神 (Pan)：希腊神话中的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

是为了她们那更贫苦和不堪折磨的姐妹们。”<sup>①</sup>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 九

如果说铁良是目前中国的满洲贵族中最坚强和最好的典型，那么端方<sup>②</sup> 便是最软弱和最坏的典型。端方是中国的罗斯伯里勋爵。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同中国的端方一样，又跟著名的或声名狼藉的白金汉公爵韦利尔斯<sup>③</sup> 属于同一类人。这位白金汉公爵，就是德赖登<sup>④</sup> 讽刺诗里的那个齐木里（zimri）：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① 今日英国那些“市井之人”，那些没有高贵品质的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他们对法国人以其更灵敏和细腻的感觉称之为“la brutalité des journaux anglais”（“英国新闻的暴行”）的东西，那种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负有责任。——英国的市井，他们不是公正地考虑和人道地对待“女拳民”或英国如今的那些女权主义者，而是用粗俗和不正经的称呼来嘲弄这些贫苦的不堪折磨的高贵疯妇，以此表明其无耻的犬儒主义或卑鄙的恶毒，就像上海的一份最有名的英文报纸习惯于称中国富有“贵族之风”的妇人——已故皇太后为“女仆”一样。——原注

②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1899年护陕西巡抚。1900年慈禧逃到西安，他拱卫周祥，得宠署湖广总督。1904年调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1905年与载洋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回国后，建议朝廷预备立宪。1909年因在东陵拍摄慈禧葬仪，被摄政王免职。1911年起用为督办铁路大臣，在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所杀。

③ 韦利尔斯（George Villiers, 1592-1628）：英国海军将领。

④ 德赖登（John Dryden 1631-1700）：英国诗人和戏剧家。

的确，德赖登对软弱、轻浮、不忠不实、聪明过人的白金汉公爵的无情描绘，尽管时间和社会状况可能不无差异，但却同样可以用在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和中国的满人端方这两个现代名人身上。因此，我毫不客气地将德赖登那首令人叹赏的妙诗，全文抄录在此：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他固执己见，所见总是荒谬，  
他什么都做过，没有一事能够持久；  
然而，月亮轮回一遍之间，  
他却成了化学家、提琴师、政治家和小丑。

责骂和颂扬是他的经常论断，  
为要显示高明，他总是走上极端。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唯有弃他一事除外。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离开宫廷他自嘲不断，然后组建政党  
将心自宽，但主席职位从来与他无关。

威廉·约翰逊·科里，罗斯伯里勋爵在伊顿公学的教师，谈起年轻的达尔门尼（罗斯伯里在公学时的名字）时所说的话，也完全符合满人端方。威廉·科里说罗斯伯里“不愿手掌上染上灰尘”。然而，一个不愿让手掌沾上灰尘的人，生活在无政府混乱时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进步，赢来地位、荣誉、名



望和显达，不去辛勤工作和奋斗，不去拼搏到“手指关节失去血色”——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操守的。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满人端方，很年轻时就当上了部堂衙门的主事，属于北京有名的“公子哥”。大约20年前的北京，有三个衙门主事以放荡、奢侈闻名。直到今天，北京妓院的那些老鸨还记得并谈起“大荣”、“小那”和“端老四”。大荣就是荣铨，庚子暴乱时期任浙江按察使，被外交团列上黑名单，遭到流放。小那就是那桐<sup>①</sup>，现在北京外务部的尚书。最后那个端老四，就是现在的端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治所在天津）。这三个年轻的满洲贵族，入仕都很早，可谓少年得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北京的长者们对他们的看法，与威廉·科里对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颇为一致，都认为他们“有些不祥的鬼聪明，却不乏风趣”。简而言之，端方，正如我所说过的，入仕之初，属于北京“花花公子”中的佼佼者。

作为花花公子，不能也不必有什么原则或宗教信仰，对于所有的花花公子，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巴黎或伦敦的也好——除了信奉人人都必须投机钻营，知道利益所在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再者，所有花花公子，除了信仰“享乐宗教”之外，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然而，带着享乐的念头加上

---

① 那桐：生卒年不详。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光绪举人。初任户部主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充留京办事大臣。1903年为外务部会办大臣。1906年授体仁阁大学士。1909年为军机大臣。皇族内阁成立时，为内阁协理大臣。后病死。

时髦的原则去投机，一般说来都好景不长。除非一个人碰巧特别幸运，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那样，娶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享乐的信仰，我说过，一般说来，很快就会以破产告终，不仅身体玩完，品德丧尽，名誉扫地，而且还会出现现代人特别是现代花花公子最为害怕的情况，它比赴滔滔火还要可怕，那就是因负债累累而完蛋。与此相应，我们发现，端方，那个北京最放荡的花花公子之尤，那个衙门中年轻的满人主事，抱定享乐主义，尽情奢靡不几年之后，大约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即便实际上没有破产，实践上也是负债累累了。于是，破产的端方，那个年轻的满洲贵族，有了伦敦或巴黎的花花贵公子们在同样处境中的表现：尽力出卖或典当自己作为一个贵族的名望，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在北京名公子中佼佼者的身份转换成现金。换言之，为了现金或骗取现金还债，端方与那些金融界人士——银行家和买办们拉上了关系，交上了朋友。这些人，对像他这样的贵族兼名公子当然另眼相看，他们将其不仅当成一件难得的装饰品，而且视作一件有商业价值的宝贝。于是，端方成了天津汇丰银行买办、臭名昭著的吴调卿<sup>①</sup>那类人的赞助者和知心朋友。实际上，端方在天津还真的开办过银行，或者把他的名义借给这些银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在义和团之乱爆发后，这些银行倒闭了，端方那时正在署理湖北巡抚，他厚颜无耻地拒绝偿还债务。当他的债权人把他的负债票出卖给一个在天津的美国公民时，他便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先生，让他阻止那个美国人干预此事。

<sup>①</sup> 即吴懋鼎，字调卿，安徽人，早年为天津汇丰银行买办，为李鸿章的淮军购买军火。戊戌时期为农工商总局的三名主事之一。曾创办天津火柴厂等。

十

但是，中日战争之后，端方发现，与天津的买办和李鸿章豢养的德国犹太狗拉关系的骗钱术已然过时，他找到了更好的摆脱负债困境的出路。因为这时候李鸿章已经垮台，康有为和其他中国激进党人正以暴烈和凶猛的雅各宾主义勃然而兴。端方，这个破了产的满洲贵族，还有那个从朝鲜回国的破了产的“暴发户”袁世凯，与激进派和雅各宾党人携起手来，共同拥护康有为的变法事业。作为回报，在已故光绪皇帝发布变法诏令之后，那个同天津汇丰银行前任买办吴调卿搅在一起的端方，被赏给三品内务府大臣的职位，并兼任农工商总局监督。然而不久以后，康有为垮台了，其党徒被送上了断头台。但端方倒一点也不狼狈，这位公子哥诡计多端、厚颜无耻——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利用约翰逊博士称之为恶棍最后逃避所的“爱国主义”大做文章。实际上，康有为刚一倒台，已故皇太后重掌政柄时，端方就以中文白话写了一首爱国歌——肉麻地颂扬已故皇太后及其辉煌政绩。由此，他得以摆脱了与康党及其雅各宾主义之干系的严重后果。

但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破了产的、以爱国主义作为最后逃避所的满洲贵族来说，北京已是无法容身。他打通关节，得以外放，成为陕西按察使，不久又升为陕西布政使。拳民乱起时，他迁为代理陕西巡抚。起初，谣言纷纷，传说义和团已经得手，并消灭了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海军增援部队。陕西的端方便兴高采烈地给已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封电报，劝他炸毁汉

口和所有长江的通商口岸，以切断来自上海外国人及其军舰上的一切给养。张之洞不得不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告诫这位以爱国自居的年轻的满人巡抚说，形势严峻，万万不得有此种儿戏之举，让他最好还是维持好本省的秩序。一向乖巧的端方幡然悔悟，他立即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仅竭力保护陕西境内的传教士，而且对他们极尽谄媚讨好之能事。

从陕西巡抚迁为湖北巡抚后，端方感到爱国主义并非生财良途。于是又抛弃爱国主义，选择更好的赚钱之道——与外国人交朋友，特别是与那些有利可图的重要人物拉关系。不过，他有时候也与那些无业的、把对中国的友谊作为最后避难所的外国人交往。这些外国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并欣赏这位满洲破落贵族那种骄横凌人和放肆的戏谑与嘲弄，因为他是个总督。我顺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满族高级官员中唯一一个言谈举止最无教养，令人讨厌的人。已故张之洞总督就极其憎恶此人。记得在武昌的时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荡荡的步态，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抚！”话扯远了。然而，端方也常常发现自己吃了亏，他同后一种外国人交往经常是一无所获，我说的后一种外国人，指的是那些无业的洋佬。事实上，德赖登谈论白金汉公爵的那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端方及其外国朋友：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无论怎么说，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并不傻的外国朋友——那些精明的美国人，则迎合他的癖好，诸如爱好搜集中国和埃及古董之类，甚至于用黄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励他。而当端方有话可以戏弄他们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美国朋友和其他

洋朋友们，已经是大笔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经搞到了一笔中国国家的赔款。

我不必再谈端方的官宦生涯了。谁都知道，他通过炫耀与外国人的友谊，受命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对于端方来说，无论是考察宪政，还是与洋人友好都不是目的，只是投机的手段。这时他盯住的是两江总督的职位。果然，他考察归来便如愿如偿。当上两江总督后，端方像罗斯伯里勋爵一样，又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意味着好大喜功，一事无成，如约瑟夫·色菲斯（Joseph Surface），大谈高尚优美的情操，却挥金如土。正是这种空洞的帝国主义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别学校，专门教育那些出生在瓜哇和其他荷属殖民地的中国男孩。同样是出于这种空洞、虚幻、和无良心的帝国主义，端方在他所统辖的人民饿死或几乎要饿死的时候，竟然设计建造了一个优美的公园，它的兽圈里有两头小狮子，——几乎花了一百万两银子！事实上，端方自打成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员，到如今当上大权在握、关系到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总督，他始终依然故我，从来忘不了也改不掉了那挥霍钱财的特有技能。早年他破落败家，今日则将其统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气大丧，濒临崩溃的边缘。上海的中国士大夫文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称之为“债帅”。他们还把《上海周刊》送给我们上海的荣誉市民福开森<sup>①</sup>博士的戏称，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应变有方”。

<sup>①</sup>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美国人。1888年文华传教。创办汇文书院。1897年辞教会职，协助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曾允盛宣怀和端方的顾问。民国后，还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他研究中国美术有成绩，是著名的“中国通”。

不错，已故的张之洞也滥用公款，但他本人的生活却很清廉。环视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总督衙门像张之洞当总督时的武昌（湖广）总督衙门那么破烂，待遇那么差。在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所有这些在张之洞手下当差的人，都同我们的首领一样清廉。我在武昌的老友和同僚梁敦彦，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当他被迫接待盛宣怀，即那个后来的督办铁路大臣，那个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里面最富的成员的造访时——不得不把一条家常红毯子扔过去盖住客厅里那个破烂坍塌的土炕即中国人的沙发。

但是，满人端方及其在他手下当差的人却与此截然不同。他们滥花公款，为的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他们以为自己过奢华的生活是责无旁贷，以便激励和带动他人（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激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梦想，端方盼望把中华民族搞得富裕繁荣起来，他认为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身先士卒，带个好头，无论想什么办法，先把自己变成豪华富翁再说。实际上，已故张之洞，正如我们已说明的，他揭橥一个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脚的理论，以为中国人就个人来说，必须严守儒家原则，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儒门君子，而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则必须抛弃儒家原则，去变成食肉野兽；而端方，及其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则揭橥更为莫名其妙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必须坚守儒家原则，同时民族中的个人则不妨抛弃这一原则，见机捞它一大把，以赢得那“不沾灰尘的手掌”——在丧失天良的生活中获得成功。一句话，在现时代，一个自称帝国主义者的人，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和中国的满人端方，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丽亚（Ophelia）所说的那个牧师一样：

他指给别人一条险峻多刺的天堂之路，

自己却像一个无所顾忌的放荡人物。  
踏上樱草嬉戏的快乐小径，  
对自己给予他人的忠告满不在乎。

十一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综述。端方是一个彻底丧失了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满洲贵族。两年前，我在北京时，曾听他的一个幕僚对已故张之洞说：如果政府举行一场考试，设奖考一考中国的督抚之中谁没有良心，那么端方总督必得头奖。年老的张之洞极为痛楚地苦笑了一下，点头表示同意。实际上，近来，无良心的端方对于中国官场风气的败坏，比任何一个高级官员都严重，除了袁世凯之外。说句公道话，端方比起袁世凯来，还是要强得多。在血液里，他毕竟有或者说曾经有过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而暴发户袁世凯除了贪婪、伶俐和狡诈之外，实在一无所有。他那种狡诈，卡莱尔称之为狐狸之智，一种缺少优雅成分的智识，或者说是被欲念强化的常识。就端方而言，他身上那种满族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毁坏，使他感到痛苦，就像罗斯伯里患下可怕的“失眠症”一样。相反，那些骨子里卑鄙无耻的人，如袁世凯，他们那无良心的、乃至荒淫无度的生活，只能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肥，油腻腻，矮墩墩。其实，端方这种人，在本质上还不算卑鄙无耻，只是道德品质被其轻率、任性和固执的自我放纵削弱和毁坏了。——这种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危害在于，他们身居高位以后，那些寄生虫，国

内的那些邪恶分子便蜂涌而至，聚集到他的周围，像一块臭肉上的蚂蚁或杆菌，不仅损害这些虚弱者自身的身体，而且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命脉和物质命脉。最近当端方离开南京北上时，一个中国学者兼诗人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讽刺诗，极为辛辣，其中有一句是：“狐鼠都来穴建康”（所有肮脏的动物，如狐狸、老鼠，都来这里搭窝造巢）。简而言之，像中国的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这种人，其最大危害在于，当他们成为首相或总督时，正如德赖登对白金汉公爵的描写那样：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只有弃他一事除外。

孔子说：“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第十七章）这就是孔子对于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和中国的满人端方这种人、这种自称为帝国主义者的现代型新人所作的描绘。

## 十二

在本文的开篇，我曾对满洲贵族及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说过许多赞赏和表扬的话，人们可能会因此认为我著此文乃是利害攸关，偏爱使然。其实，我赞赏和要表扬的，乃是中国满洲贵族至今依然的那种良好的质地和高贵的气质。不过，我必须指出，中国满洲贵族目前的实际状况，确实离值得赞扬还差得很远。



跟英国贵族一样，满洲贵族最初是个军事部族。明朝末年，中国复兴时代伟大的爱国皇帝——我指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译者），他的后人经过苦战，终于将蒙古游牧民族赶出中国，恢复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即古代中国的豪侠之风——后来，大约三百年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又一次退化了，丧失了其高贵品质，无法保卫中国文明。当时，未退化的，只有生活在白雪覆盖的深山中的那些北满部族——他们最初仅有二十八甲<sup>①</sup>——因此，他们不得不进入中国本土，来指导和协助中国统治阶级，照管好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物质福利，并保卫中国文明。简而言之，中国现有的满洲贵族，最初是一个军事部族，后来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潜移默化的内在力量，它激励、改善并形成了中国的新统治阶级。

然而，跟英国的不列颠贵族一样，中国的满洲贵族打败了汉人，赢得并重建了中华大帝国。此后，他们逐渐地不把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帝国视作人民托付给他们照管的神圣之物了，而只把它看作祖宗的遗产或既得利益，认为有特权享用，而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一味地花天酒地、以为可推动劳工阶级的利益，促进商业繁荣。有个真实的故事，讲一个无知无识、颇有来头的满族高级官员，太平天国暴乱前受任为两广总督。这位出身名门的满洲贵族，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搜集和玩赏玻璃器皿和鼻烟壶上，当有人规劝他要他好好尽一个总督责任的时候，他说：“我的责任！笑话！哎，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满人受圣上的鸿恩，被派来当总督，不是来办什么事，而是来享福的？！”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像法国格拉蒙特公爵的回忆录和英国最近出版的卡

<sup>①</sup> 满人最初的基层组织，带有军事部族的特点。

狄根夫人回忆录这样的书，将太平天国前中国上层社会的腐败情形如实记述下来，传之于世。不过，我们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叫《红楼梦》。据可靠说法，书中内容是以纯粹的事实为根据的——它记述的是一个名叫明珠的满洲大贵族家族的兴衰。它的衰落，乃和珅的垮台所致。和珅是乾隆朝权势显赫的政治家，以贪婪著称。后来被乾隆的继位者嘉庆皇帝给杀掉了。但《红楼梦》在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小说。它描写了明朝末年的社会状况，比左拉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有力度。《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没有高尚理想的社会生活：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除了吃、喝、穿戴、互相调情之外，没有一点正经事情——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略施淡墨，描个轮廓而已：那些违反了第七条戒律（指基督教中上帝予摩西“十诫”中的第七条，即“不可奸淫”——译者）的无味细节，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大加渲染。不过，《红楼梦》尽管算不上是写实主义小说，但它所反映的满洲贵族中上层人物堕落的程度已经很是惊人了。从小说里所描写的一件小事便可见一斑。书中的角色之一在谈及这个满洲贵族大家族时，曾说：“整个王府内外，也只有府前那两个大狮子是干净的了。”

的确，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由于丢掉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丢失了高尚理想，结果，堕落了满洲贵族，无法给予国民所期望的高贵引导，——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卑鄙无耻的浪费性消费，最终招致了那场太平天国大叛乱的灾难和激变。如果说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中国的满洲贵族实在犯下了大罪，那么，他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些头扎红巾的狂热的叛乱分子，突如其来、气势汹汹地杀入那些无忧无虑、尽情享福、腐化堕落、享

有各种特权的满洲显贵驻防的城市。正如那位希伯莱预言家所说的：“地狱已因此自动扩大，并张开了它那无边无涯的大嘴，他们的盛名，他们的民众，他们的荣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落入那张巨嘴之中。”事实上，太平天国叛乱刚刚爆发的时候，驻防在不同城市的许多满族显贵，几乎全部丧命：老人、青年、男孩、妇女、女孩、婴儿——统统被狂怒的太平军赶尽杀绝。所有满人和站在满人一边的汉人，都被称之为“妖”或“阎罗”，必须加以斩杀。

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统治权，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到中产阶级文人学士手里。由于丧失了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动权，中国的满洲贵族便无力发挥他们在社会组织或社会秩序中的应有作用——激励和引导中国人民去过一种高尚的国民生活。既然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简而言之，如同不列颠贵族组成了英国上议院一样、享有特权的中国满洲贵族，也构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中国“上议院”。因此，除非从外部来人，或从他们内部出现强有力的成员，着手改造满洲贵族，给其体内注入新的生命力，我们中国的“上议院”，犹如英国的上议院一样，将不得不被废除。但紧接着，我们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打算做的那样，学英国的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把上议院解散——那么我们会丧失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国家便会失去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集结点与重振的依托。

### 十三

眼下，马太·阿诺德对他那个时代英国贵族的看法，用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身上也是合适的。他说：“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人像我们上流社会一般英国人这样，对于世界的现实变化如此的无知、迟钝，糊里糊涂。他既无思想，也没有我们中产阶级的那种严肃认真态度。正如我常说的，这种严肃认真态度，可能是本阶级得以拯救的伟大力量。唉，当听到贵族阶级中一个年轻富豪兴致勃发，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财富和物质享受大唱赞歌时，我们勤劳的中产阶级中人，即便庸俗透顶，其良心所在，也会吓得倒退几步。”

说起我们的满洲贵族缺乏智识，任何一个与北京汉人称之为满族大爷的人因公打过交道者，都能告诉你这么一个头戴蓝顶子或红顶子的白痴，他会毫无理由地与你辩论不休，纠缠没完，而根本不懂什么叫交涉或辩论，一直到你觉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气疯，被迫犯下谋杀之罪，因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个面无血色、两眼无神、絮絮叨叨的白痴给憋死。不过，目前在中国，满洲贵族最大的缺点，还在于他们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现任摄政王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倒是有点过于严肃认真的毛病。我在北京见过的大多数满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当今国事的严重，也没有意识到在国家财产方面他们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险性。正如拿破仑说起上个世纪的法国顽固派那样，现在中国的

满洲贵族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甚至于义和团灾变之后，虽然吃尽了苦头，却丝毫也没有接受教训。他们所剩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骄傲——那种门第高贵、身无分文的苏格兰少女的骄傲。

当然，我以上所说也有许多例外。目前的满洲贵族中，像铁良等人，便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中国的满洲贵族最杰出的道德品质，那种或许可以拯救自身的伟大力量——是他们的纯朴和耿直 (guile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满人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仍然是一个不狡诈的民族，一个具有伟大的质朴心灵的民族，其结果，是生活简朴，清风可操。现任外务部侍郎联芳<sup>①</sup>，曾留学法国，在李鸿章手下供职多年。他本有机会像李鸿章手下的“暴发户”们那样大捞一把——然而现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国留过洋的人当中最贫寒最清廉的一个了。还有一个锡良<sup>②</sup>，现在的东三省总督。他是从小知县做起，最后升任大总督的，其生活也很清寒，是个廉洁的人。说实话，要是不怕把这篇文章写得太长，我本可以再举出官场内外我所认识的许多满人贵族的姓名，他们心地质朴，举止优雅，并有法国人所谓“发自内心的得体的礼貌” (la politesse du cœur)。他们都是真正的君子，一旦知道怎么办，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尽职尽责，一旦听到召唤，便不惜为了君国的荣誉献出生命。在此，我还想再提一下满族妇女，特别是较为贫寒的满族家庭里的那些妇女，她们靠朝廷

<sup>①</sup> 联芳：汉军镶白旗人，字春卿。同文馆毕业，曾赴法留学。1910年由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

<sup>②</sup> 锡良 (1853—1917)，蒙古镶蓝旗人。巴岳特氏，字清弼。同治进士。初在山西任知县，逐级升迁。1900年任山西巡抚。后又曾任湖北巡抚、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总督、云贵总督。1909年授钦差大臣，任东三省总督。

补贴的微薄俸银为生，自己过着克己的、半饥半饱的生活，像奴隶一样做苦工，努力成为一个贤淑之妇，去尽自己对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责任。<sup>①</sup>

#### 十四

总而言之，公平合理地观察中国目前的种种混乱和颓败状况，我必须指出，那种最好的材料，凭借它可以产生出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种真正的新中国的最好材料——将仍然要在中国的满洲贵族中去找。的确，正如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处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扩展新时代，所有习惯于墨守陈规，对事物的变迁流转、对一切人类制度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缺乏认识

---

① 已故阿奇博尔德·福布斯(Archibald Forbes)先生谈起1871年巴黎被困期间人民的苦难时，说道：“在那次围困中，最遭罪的是那些过于自尊的、固定工资到不了手的人们，最难以救济的也是他们。那些女人倔强至极，自尊过分。有一座楼房的守门人，总是对分配食物的布施者说，在某层有两个老太太一定在大挨其饿，可当你去按她们的门铃时，出现在你面前的却是庄重大方，毫无饿态的人。‘不错，英国是一个善良的民族，仁慈的上帝会报偿他们。顶楼上有些可怜人正迫切需要食物，送给他们，他们会感激你；哦不，他们不会接受施舍。行行好，早安，先生！’接着劈头盖脸一下关上门。哎，这真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中国的满族家庭也是那些自尊和有固定俸禄的人所组成的。那俸银，由于国库空空，也就微不足道。中国的满族妇女同样倔强至极，自尊自傲透顶。我认识一位广州老太太，她丈夫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被杀害。两个月后她生下儿子，并节衣缩食，把他抚养成人，还供他读书，给他娶了媳妇。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挚友，当时正在邮传部做小职员，月薪30两。然而这位高贵的老妇人，为了庆祝她的教女(god daughter，受过洗礼的女儿)也就是我去世不久的妻子的生日，花钱就像一个王妃那样慷慨大方。——原注

的贵族，都是最容易陷入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的困境之中的。实际上，在扩展的新时代，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不幸得很，中国的满洲贵族，跟所有的贵族一样厌恶智识修养，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话又说回来，虽说满洲贵族没有思想和不懂得思想，他们却有其某种可贵的东西，如没有这种东西不仅一种新的好的事物秩序，甚至旧秩序，旧秩序中的最佳之物，中国文明中的精华也势必遭到破坏和毁灭。一言以蔽之，满洲贵族有“气节”。这种道德品质在中国的任何阶级中，至少在我们庸俗的中产阶级文人学士中是不易找到的。中国的文人学士，我们庸俗的中产阶级，在此我可以指出，除了少数几个人例外，如现任两江总督，福州海战中的主角张佩伦的侄儿<sup>①</sup>，他虽然还年轻，难以成为牛津运动的实际成员，却是一个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目前中国文人学士的庸俗与丑恶的特征，从上海的中文报纸上随处可见，顺便补充一句，他们在张园的“各种表演”<sup>②</sup>就更为庸俗不堪了。这些文人学士已经是彻底丧失了道德，除了虚荣和狂妄之外，毫无品行可言。而中国的民众，辛勤工作阶级，的确，他们的道德至今也没有受到太大损害。但中国的民众没有政权，庆幸的是他们目前还没有掌权，因为在中国，民众的真实伟大的道德力量尽管强大，却是一种粗陋、残暴的力量，它没有满洲贵族道德力量的高尚与优雅。因此，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于维护它的“否决”权，正如在太平

---

① 指的是张人骏。直隶丰润人，字千里，安圃。进士出身。1905年任山西巡抚，1907年升两广总督，1909年转两江总督。为人行事有儒者之风。武昌起义后，抗击革命军，后不知所终。

② 指立宪活动。

天国叛乱和义和团暴乱中一样——那种否决权只能成为一种可怕的破坏力量。

简而言之，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个新中国赖以建立的唯一基础和基石，是满洲贵族。但正如我所说过的，满洲贵族，这个中国的上议院必须革新。不仅中国，还有英格兰，目前亟需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贵族。中国的满洲贵族，正如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时代的英国贵族一样，我以为直到今天，他们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不过，满洲贵族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来领导他们。我们的满洲贵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铁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现任摄政王<sup>①</sup>——正如我在后文要说明的，他是一个和铁良一样纯洁和高尚、并且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所有这些人，只能够维护——且他们正尽最大的努力在维护——旧的秩序，使中国文明的精华免于破坏和毁灭。至于扩展的积极工作——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创建一个新中国，——满洲贵族，正如我所说过的，还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有思想且能够理解思想的人去领导他们。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贵族找到了他们的领袖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此人的优势在于，他既不属于庸俗的中产阶级，也不属于野蛮的贵族阶级。因此，满洲贵族将可能从一个留过学的中国人中找到他们的领袖，一方面，他没有受到过分的教育，没有中国文人学士那种自大和不切实际的迂腐；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满洲贵族的傲慢和阶级偏见。实际上，也就

<sup>①</sup> 即载沣（1883—1951）清宣统帝父，爱新觉罗氏。袭封醇亲王。1908年宣统继光绪位，他任摄政王。次年罢免袁世凯，设立禁卫军，代为海陆军大元帅，集军政大权于皂族。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武昌起义后，被迫辞职。后病死。



是一个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中的道德价值和美的观念有真正认识，又具备说明和理解现代欧洲文明中扩展和进步思想能力的人。如果满洲贵族有了这样的领袖，外国又能接受忠告，把一些真正有智识修养、除了懂外交和写新闻专电技术之类文明之物，还懂得文明问题的人派到中国来做外交官，如果这些外交官对于我所描述的那个留过学的中国人不仅不加干涉，给予放手处理一切的权利，甚且以他们的德望来支持他——那么，中国真正的改革，那为了新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这个新中国，不单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文明和全人类。Ab integro saeculorum nascitur ordo!（世纪的秩序将重新诞生!）

##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我说过，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倒台，中国文人学士失去了领袖，其实应该说，中国文人学士中的自由党失去了领袖。大侯爵曾国藩死后，正如我们看到的，政权落入到两派文人学士手中，一派称之为湘军系，一派称之为淮军系。湘系是些湖南人，属于保守党，司令部在南京。淮系是些安徽人，属于自由党，司令部则在天津。大侯爵曾国藩一去，保守党的湘系逐渐失去权势，除了从国库里按期领取抚恤金外，那些曾经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湖南人再也没有任何别的特权，于是长江流域又出现了哥老会（秘密结社），对帝国统治构成新的威胁。相反，自由党的淮系在李鸿章领导下，则权势日增，直到大权在握，统治全国。特别是掌握了支配国家钱款和拔去他人顶戴花翎的权力，还控制了国家那些最有利可图的肥缺。

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自由党的淮系集团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但保守党的湘系却还有领袖，他就是已故两江总督刘坤一。实际上，此时初兴的康有为雅各宾党尚未形成气候，刘坤一不仅是保守党的湘系首领，名义上也成为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领袖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坤一在中国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他跟威灵顿公爵一样，并非学者，甚至不算文人，只是一个军人而已。其与威灵顿公爵的不同之处

在于，他是中国的苏格兰高地人。中国的长江流域就是英国的英格兰。汉口以上的长江流域上部，包括山陵覆蔽的湖南省及其“内湖”，形成中国的苏格兰高地。汉口以下的长江流域下部，包括安徽和南京，形成中国的苏格兰低地。长江流域的居民具有苏格兰人的一切特性。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像苏格兰低地人一样，机灵、精明，是讲求实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劳，贪婪鄙吝。比如李鸿章，就是长江下游的安徽人，带有苏格兰低地人机灵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个便上”或中国所谓“碎银”看得极重。相反，长江流域上部居民，特别是湖南人，则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粗豪，耿直，勤劳，节俭但不吝啬。不过，无论是长江流域上部还是下部的居民，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勇敢或坚毅。这种道德品质，是中国其他各省人特别是广东人所不具备的。事实上，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中出力最大的，也正是具有苏格兰那种“勇敢坚强”品质的湖南人和安徽人。

我说过，刘坤一不是学者，而是一位军人，——一位粗犷的苏格兰高地老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风，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他缺乏智识修养，甚至还不如李鸿章斯文，但像威灵顿公爵一样，他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因功显达。久经沙场的磨练，使他对人对事富有实际的见识，有成熟的判断力。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一点，也与威灵顿公爵相同。说实话，刘坤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气节或道德勇气(moral hardiness)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甚至于张之洞也缺乏气节或道德勇气，尽管他是一个秉性高洁的人。我说过，目前中国唯一称得上有气节的有教养阶级，是满族人。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1900年，华北爆发了义和团狂

热运动，北京帝国政府在列强攻占大沽口之后，被迫宣战。南京的刘坤一发电两宫，认为把战争的恐怖带给他治下的人民是不应该的，但尽管如此，他却向皇太后和皇帝陛下表示效忠，如果外国列强侵犯他统辖区的任何部分，无论是获胜还是落败，他都将誓死捍卫中华帝国的荣誉和尊严。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一君子人欤？君子人也。”<sup>①</sup>

## 二

刘坤一死后，中国文人学士受三大巨头领导。这三大巨头是张之洞、袁世凯和前两广总督岑春煊。<sup>②</sup>中日战争后，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陷于绝望，在绝望中，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乐于追随康有为的过激党，赞同他那连根带枝的彻底改革方案，此种改革终于演变为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然而，张之洞首先警觉起来，他同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划清了界线，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发表了反对他们的宣言书。正是牛津运动的影响，那种反对丑陋粗鄙、追求美好优雅的牛津情感，把张之洞从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了出来。讲到这里，我可以指出，张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对于国家最伟大的

<sup>①</sup> 见《论语·泰伯》。但此言并非孔子所说，而是曾子所言。辜鸿铭记忆略误。

<sup>②</sup> 岑春煊(1861-1933)，广西西林人，字云阶，岑毓英之子，光绪举人。1900年因护送慈禧有功，升任陕西巡抚，后又升任四川、两广总督。1907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因与奕劻、袁世凯争权，被免职。民国后，曾参与反袁和护国运动。

贡献，就在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危急存亡关头，他本人觉悟并率领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们脱离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如果张之洞与中国文人学士跟康有为搅和在一起并支持他到底，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但不管怎么说，要不是张之洞和中国文人学士及时退出，已故皇太后绝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对付和镇压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使国家免遭他们那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的灾难和毒害。

袁世凯，三巨头中的另一个成员，在这危急存亡时刻，也从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同伙中脱离了出来。就张之洞而言，他脱离他们，是因为品格高尚，性情优雅，牛津运动的影响使他更加精炼。而袁世凯则不然，他之所以抛弃雅各宾朋友，抛弃康有为及其党徒，纯粹是品质卑劣之故。

### 三

袁世凯乃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索尔兹伯理勋爵曾把张伯伦先生称之为“杰克·凯德”。<sup>①</sup>的确，像杰克·凯德一样，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实在都属于群氓党，分别代表他们国家那粗野、浅薄、污浊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在所有国家，群氓都并非是不道德的。在中国，群氓甚至于极为道德，比目前中国的知识阶级、文人学士们要有道德得多。——这一点，从

---

<sup>①</sup> 杰克·凯德 (Jack Cade, ? —1450)，英王亨利六世的反对派领袖。1450年曾领导商人造反。5年后爆发的约克族与兰加斯德族之间的“蔷薇战争”，也与他有关。

他们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努力工作所表现出的正直诚实中，可见一斑。然而，即使是中国的群氓，尽管他们有道德，却并不高贵。群氓之所以不高贵，是因为他们无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个人要想高贵，必须首先彻底战胜和抑制其自身的动物性——他的欲望。民众的确拥有实力，但这种实力来源于强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种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群氓是粗俗不堪、无优雅之处可言的。这种粗俗与强烈的欲望两相结合，便使得民众在掌权之后，总是蛮横残暴。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袁世凯还是英国的张伯伦，由于他们分别代表了本国的群氓，所以也就一并拥有了群氓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他们两人都是强人，但是，正如我说过的，他们的力量由于来源于自身强烈的欲望，因而是一种卑鄙残暴的力量。此外，他们俩都具有天生的智能，但却只是一种丧失了优雅和美妙成份的智能，即英国人称之为常识的东西，在华外侨则名之曰：“自救本能 (savey)”。实际上，袁世凯和张伯伦都有足够的“自救本能”。他们深知生姜入口便有辣味，与饭碗作对是愚蠢至极的，一旦失去了饭碗，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便真能带来太平盛世也不行，而这一点，像康有为那些强烈渴望太平盛世立即实现的雅各宾党人，却是不很明白的。

我说过，正是出于卑劣的本性，袁世凯摒弃了他的雅各宾朋友。像袁世凯和张伯伦先生一类人之所以改变政策，跟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的情况不同，后者是因为生性轻浮，而他们则完全是出于冷静的算计。袁世凯加入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一伙时，并没有康有为及其党徒们的那种热情，和他们那种对太平盛世的渴望，只是因为他盘算着李鸿章倒台了，而康有为及其激进党却有王牌在手。同样，看到他们出牌轻率不慎，

即将输掉时，便又将这些朋友弃如敝履。事实上，像约瑟夫·张伯伦一样，袁世凯是一个完全没有热情和高尚冲动的人，也根本不理解热情和高尚的冲动为何物。正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那种高贵的疯狂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并感到同情，从而使得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对省内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的义和团农民青年，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残酷镇压，大下杀手。奇怪的是，他这种暴行，竟然得到那些同他一样的、没有头脑且卑鄙无耻的外国人的喝采，为他赢得荣誉。简而言之，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先生这样的人，他们身上带有着群氓的一切卑劣和残暴的特性。

#### 四

袁世凯步入政界，是从做吴长庆<sup>①</sup>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开始的。当时，吴将军受大清帝国政府派遣，率领中国军队进驻朝鲜仁川。袁世凯是早期镇压太平军的名将和统帅袁甲三<sup>②</sup>总督的远房亲戚。袁甲三的许多部将后来都成了将军，吴长庆

---

① 吴长庆(1834—1884)，安徽庐江人。字筱轩。曾参与镇压太平军，是著名的淮军将领。后又随李鸿章镇压捻军。1882年奉命率部赴朝鲜汉城，镇压兵变。袁世凯随他进入朝鲜。

② 袁甲三(1806—1863)，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从祖父。道光进士。1853年南下攻捻，任帮办团练大臣。在攻捻过程中屡受挫折，又遭排挤。但终成捻军劲敌。他一生主要是镇压捻军，辜鸿铭将捻军与太平军混为一谈，似不妥。1861年，袁甲三任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两年后病死。

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凯尚未成年时，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无赖，被赶出家门。后由袁甲三的另一个部将，最近才升任长江巡阅使的程文炳抚养成人。程的一个儿子与袁世凯一块念过书，他告诉我，袁世凯从小就固执任性，自私自利，完全靠不住。

卡莱尔描述耶稣会创始人伊格内图斯·罗耀拉时，说道：“（他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带有嗜欲的比斯加亚血统，其特点是厚颜无耻，好色荒淫，公然无道，尤其是欲望极强。在他看来，这个宇宙就是一个饮食店，里面有大蒜，有牙买加胡椒，还有不幸的女人和其他调味品，再加上一些配菜，专供大胆的人去满足欲望。除此之外，宇宙间就只剩下谣言和空谈了。在这样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实践中，伊格内图斯已度过了差不多三十年。”

袁世凯早年在他的故乡河南项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学和亲身实践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无分文，完全破产为止。他的朋友们乐于打发这个年轻的无赖，于是借给他赴朝鲜的旅费，在那里，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吴（长庆）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不过，袁世凯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却并非没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渐地向上爬，后来得到李鸿章的保荐，被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这样，他成为天津李鸿章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 五

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一样，中国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暴



发户和骤起的新贵。暴发户和新贵的标志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这一点，凡是与袁世凯所宠爱的留过洋的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都能看到，这些人生活奢侈，趾高气扬，他们的主要特征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北京的中国文人学士称天津袁世凯的党徒为票党——狂妄自大大。两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督察院的官员在街上与我同行。当他看到袁世凯口衔金烟嘴，叼着香烟，乘着新式洋马车，后面跟着耀武扬威的侍从马队，浩浩荡荡地从旁经过时，情不自禁地向我诵起《诗经》里的如下诗句：

骄人好好，  
劳人草草，  
苍天苍天，  
视彼骄人，  
矜此劳人。

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有意模仿满族人荣禄的气魄；天津和北京的许多外国人，都错把袁世凯的这种狂妄自大，当成了荣禄的那种真正的气魄。已故的满人荣禄虽有不少缺点，但却是一个生来的贵族，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暴发户和新贵。我曾对袁氏的同党唐绍仪<sup>①</sup>说，袁氏有百万富翁的做派而无百万富翁的

---

<sup>①</sup> 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少川。为避溥仪讳，曾改名绍怡。辛亥革命后恢复本名。曾官费留美七年。曾在朝鲜和天津小站练兵时期与袁世凯共事。1907年出任奉天巡抚，1910年任邮传部尚书。辛亥革命时，充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与民军谈判议和。曾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与袁不和，愤而辞职。后参加护法军政府，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1938年被军统特务刺死。

钱财。其实，袁世凯装出的气魄或骄狂自大，正是手中并无百万的百万富翁所摆出来的架子。

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骄狂，大有助于南非布尔战争的爆发，同样，袁世凯派驻朝鲜时期的骄狂自大，则促使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等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为自己骄狂的严重后果感到害怕，便逃回天津。说句公道话，天津的李鸿章并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对导致战争的那个骄狂之徒、那个过于热心的暴发户十分气恼——因而对逃回天津的袁世凯不理不睬。这样，袁世凯就又一次流落街头，负债破产，只得千方百计四处求人向李鸿章说情，希图重新得到李氏的优遇，他求到了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人物盛宣怀<sup>①</sup>，但事情毫无结果。从此，他对盛宣怀怀恨在心。后来他升任直隶总督时，便将盛氏所担任的中国电报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督办的职务全部免去。此事是盛宣怀亲口告诉我的。

未能重新进入李鸿章的寡头政治集团，袁世凯便另辟蹊径，去巴结北京的满洲贵族。经过离职回京的程文炳将军，即他那个早期保护人的引见和疏通，他得到了满人荣禄统帅下的新建陆军副统领之职。不过，他在满洲贵族手下立足未稳，李鸿章便垮台了，康有为及其激进派异军突起。袁氏认为时机已到，又赶忙去投靠康有为与激进派。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到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又叛卖了他的雅各宾朋友。此后，他就明确地投

---

<sup>①</sup>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字杏荪，号愚斋。早年入李鸿章幕，颇得信任。曾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积极协助李鸿章办洋务。一生经办过许多个厂矿企业，1902年因与袁世凯发生冲突，曾失势。后内结奕劻，又复起。辛亥革命前曾任邮传部尚书。

身到满洲贵族一派中，与之形成了一个集团，可以称之为“联合党”。如同约瑟夫·张伯伦成为索尔兹伯理勋爵的亲信仆从一样，袁世凯则成了满人荣禄的心腹仆从和走狗。

我不必详细追述袁世凯的为官履历。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的特种部队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任上，义和团狂热风暴爆发了。我们已经看到，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那场误导和愚昧的暴乱之高贵动机，只是残忍地以玩世不恭和兽性的手段，去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农民。从山东巡抚，他继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他到天津就任之前，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组成了临时政府，他们已经打扫和整顿了天津的环境，使天津成为现代欧化的自治城市。袁世凯从外国临时政府手中接管了天津市政，他坐享其成，得到了许多不该享有的荣誉。外国人看到天津进步和改革的表象，看到天津成为一个欧化的城市，便一味夸奖袁世凯。刘坤一死后，袁世凯，正如我说过的，他与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一起，成为了左右中国政治的三大巨头。

我本不该对这位已经倒台的中国张伯伦的经历和品质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但鉴于以下事实，我还想再唠叨几句。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两国的英文报刊，都以一种自以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权威腔调，极力推出袁世凯这座泥塑的偶像来，这种做法只是荒谬可笑，对于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倒也没有什么太大妨害。他们神化袁世凯，说他是拯救中国必不可少的唯一伟人，从而给现任摄政王的统治投去不信任的阴影。英国舆论过去曾一度奉李鸿章为偶像。有些与宓吉先生见识相仿佛的英国人，甚至称李鸿章为中国最了不起的老人。如今，英国人对宓吉先生所谓的那个最了不起的老人，还有什么

好话可说呢？<sup>①</sup>

但公正地讲，李鸿章还不是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李鸿章只是一个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恶毒。而康有为及其中国雅各宾党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恶毒暴虐。在他们的雅各宾主义中，包含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一种希冀立即带来太平盛世的强烈渴望。而袁世凯，则综合了庸人李鸿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宾党人康有为的暴虐刻毒。事实上，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一样，两人都是雅各宾党人的叛徒。<sup>②</sup>

## 六

下面，我不再谈袁世凯。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明确指出，这

---

① 上海仅有两座公共塑像，一座是李鸿章的，一座是巴夏礼爵士的。（巴夏礼 Harry Parkes, 1828-1885, 英国外交官。1841年来华，次年充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璞鼎查随员，参加鸦片战争。1956年代理广州领事期间，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参加北京天津战役，是臭名昭著的侵略分子。）两人都不是好东西！一个民族的品质，可以从他们所崇拜的天神或英雄身上看出来。上海的中国人和德国犹太狗把李鸿章尊为英雄，英国人崇拜的则是巴夏礼爵士。巴夏礼爵士同李鸿章一样，是马太·阿诺德所谓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人。那位可怜的到中国来过的唯一真正的基督教武士戈登将军，却被人与福开森博士相提并论。上海有一条僻静的糟糕透了的马路，竟以戈登与福开森两人的名字命名。不过，说起来，上海人的英雄崇拜真是可笑至极。他们曾把一个家庭生活最理想的卓越人物的大名，送给了家庭生活最不足为范的人们常来常往的一条大街。——原注

② 1910年版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没有这段文字。它是1912年的版本增补的。

种生性粗俗、庸陋和蛮横的人们，损害了他们本国真正改革和进步的事业，因而也必然危害他们所在国高尚的国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例如，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人人知道，他采纳了比康兹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但是，意味着使大英帝国强大的帝国主义，对比康兹菲尔德勋爵来说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大英帝国的良治和世界文明。换言之，比康兹菲尔德勋爵要使大英帝国强大，只是为了能使大英帝国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去做它认为对于大英帝国的良治、进而对于世界文明事业来说是正确的事情。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也就是使大英帝国强大，则本身就是目的。无论如何，他的帝国主义与良治或文明没有关系。张伯伦先生帝国主义的目的，只是要让大英帝国境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吃的东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实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国家或民族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然后能狂妄自大，趾高气扬，称霸全世界。比康兹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其结果是推进良治和文明的事业，使英国式的法律和英国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赢得全世界的尊崇。孔子谈起他那个时代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时说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所谓“披发左衽”，就是成了野蛮人。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比康兹菲尔德勋爵和德国俾斯麦首相的政治才能，欧洲人民现在也要堕入无政府和野蛮状态了。相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其结果则是要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适，能狂妄自大、趾高气扬地去欺辱全世界。它所带来的是在南非的布尔战争，是英格兰鼓吹女人参政的妇女，是印度投掷炸弹的无政府主义学生和每年预算六千万英镑的赤字。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有治人无治

法”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在中国，这一公理比在英国或欧洲要有力量得多。中国国家管理中的“宪法”，正如我所说过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纸上的宪法、国家法规或治安条例来约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责有权的人们不敢为非作歹。简而言之，中国的良治完全仰赖我们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因而在中国，当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的所做所为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在中国，像一切专制独裁的政府一样，政府行好行坏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像袁世凯这种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种支配权，那后果便可怕至极。这里，且不谈那种奢侈浪费，为了维持袁世凯及其寄生虫们骄狂恣肆的排场，在天津，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已破了产。在此，我只想从那些灾难性后果中举出一个实例。袁世凯，正如我所说过的，他成为了统治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三头执政的成员之一。三巨头即张之洞、袁世凯和岑春煊，他们乃是当时中国文人士大夫所公认的领袖。已故皇太后正是依靠这三个人，来指导与推行改革运动或中国的欧化新政的，我说过，在1901年銮驾回京后，整个中华民族就决定采取这样一场欧化改革了。张之洞仍是三巨头中唯一有思想和能懂思想的人，他在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或欧化，必须首先从改进和变革公共教育入手。袁世凯则毫无自己的主见，他以其粗俗卑鄙的狐狸之智大体上抓住了张之洞的这一思想，然后立即狠命地催迫和促使那个可怜的老人，正如我曾说过的，那个缺乏道德勇气的张之洞，糊里糊涂就答应劝说已故皇太后不等到新的教育体制有个草案或经

过讨论，就将整个现行的旧式公共教育机构悉行废除。其结果，是拥有四万万人的整个中华帝国，目前可以说绝对没有任何公共教育可言了。只有在一些大城市的几座造价高的、陋而俗的欧式红砖楼房里，还有人在把一些蹩脚的英语，和现代欧洲科学术语以及其它学科的日式译文混在一块，向学生灌输着，对这些东西，学生们丝毫也不理解，就被强行塞进脑中，结果使他们一个个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白痴。这就是前文中我所谓像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有掌管教育或文化事务任何权力的一个实例。已故的著名法国人内农<sup>①</sup>先生说：“人们健全的教育，乃是达到一定程度的高等文化教育的结果。像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已经发展了为数不少的大众通俗教育，却没有任何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而这种缺陷，就势必长期以他们知识分子的平庸，行为举止的粗俗，精神上的浅薄以及普通智识的缺乏为代价。”中国旧式的公共教育尽管可以说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致力于给人们一个像内农所说的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不仅如此，这种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还造就出像大侯爵曾国藩乃至张之洞本人这样杰出的人物。

## 七

三执政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岑春煊，前两广总督，现在

---

<sup>①</sup> 内农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著名东方语言学家，评论家。

在上海做寓公。他是著名的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sup>①</sup>的长子，其父曾被指控与马嘉理谋杀案<sup>②</sup>有牵连。岑毓英是一个厉害人物，他用克伦威尔挫败爱尔兰叛民的严酷手段，挫败了云南回民起义军。像乃父一样，岑春煊也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是德国人所谓容克<sup>③</sup>党的党员，他的家族也来自蛮荒的仍处在半开化状态的广西省，即中国的波美拉尼亚。因此他跟俾斯麦首相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在其政治生涯之初，他也同俾斯麦一样是个极端保皇主义者——*plus royaliste que le roi*。事实上，岑春煊在义和团事变爆发后才崭露头角，他以其极端的保皇主义精神引起了已故皇太后的注意。当朝廷逃至陕西西安时，他赶紧奔去救援，与1848年俾斯麦赶去救护柏林的朝廷一样。

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按下不表。且谈彼此之间的相异之点。

---

① 岑毓英（1829—1889），广西西林人。字彦卿。秀才出身。1856年云南回民起义爆发，他率团练到迤西助攻起义军。曾迫使义军头领“二马”（马复初，马如龙）投降；“二陶”（陶新春、陶三春）败亡，并杀掉起义领袖杜文秀。1883年升任云贵总督。

② 马嘉理谋杀案：也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说“谋杀”，乃是不实之辞。实际情况是，1874年，英国为在我国西南地区扩张势力，修筑从缅甸到云南的铁路，命军官柏郎率二百多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要入云南。英国驻北京使馆派职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1846—1875）前往迎接。马嘉理带领“探路队”私自进入云南内地，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打死。后英国借此生事，逼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

③ 容克（Junker，辜鸿铭写作“Yunker”）：意为地主之子或“小主人”。原为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16世纪起长期垄断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19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化，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它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各邦在19世纪下半叶联合后右翼势力的支柱。



俾斯麦是一个含辛茹苦、始终不懈地提高自身思想修养的人。而岑春煊则绝对没有任何思想修养。不过，正因为他完全没有文化修养，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的，不像雅各宾党人，诸如卖弄博学和怀有空洞理想主义的康有为之辈。他不是空想家，而是一心一意务实的实干家。他确实没有满洲贵族的优雅之处，但同时也没有暴发户袁世凯那种狂妄自大，庸俗不堪，装模作样讲排场的鄙陋习气。到上海岑春煊的寓所拜访过他的外国人，都可看到，这位伟大的厉害总督的儿子，自己也是总督，他的生活却相当简朴。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君子，不属于那种暴发户买办阶级。

总之，岑春煊是一个坚强有力、忠心耿耿的狂热保皇派。他主张对雅各宾党人和革命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迅速处理。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erich William) 1848年谈论俾斯麦时所说的那样，岑春煊在当今中国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目前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需要的是善于妥协与和解的建设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则太过强硬、不屈不挠，因此难当大任。歌德见了同时代的溷瓦茨<sup>①</sup>元帅，说道：“再也没有比缺乏见识的行动更为可怕的事情了。”此刻，像希腊的阿喀琉斯<sup>②</sup>一样，这位厉害的总督离开了所有当权者，坐在上海马卡姆路他的寓所里满脸愠怒，毫不妥协。眼见中国越来越糟，他实在忍受不住气恼的折磨，便到杭州湖畔、普陀海滨逛悠散心去了。

① 溷瓦茨(Vorwarts)：普鲁士陆军元帅，曾参与滑铁卢战役。

② 阿喀琉斯(Achille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跟外，浑身刀枪不入。在特洛伊战争的第十个年头，因希腊军统帅夺去他的女俘，二将发生争吵，阿喀琉斯断然退出战争，闷闷不乐，下文所提到阿喀琉斯“闷闷不乐”一事即指此。

β ἤ δ' ἀκέων παρὰ θ ἔ να πολυὸ λό ἴοσ βου θαλάσσης

〔（他）沿着呼啸的海岸沉默地走着〕

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这位中国的阿喀琉斯可能还要披挂上阵，前去为希腊人作战。然而，正如这位前总督几天前对我所说的，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和每个人来说，将会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刻。

## 尾 声

---

现在，我必须结束这个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了。我并不想在世界公众面前，去批评现任摄政王统治下的帝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作为现政府的一个下级官员，我认为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我对于现政府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还是宁愿说给自己的同胞听。其实，两年以前，在给帝国已故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陛下的一封长长的上书中，我已经把关于中国目前局势的所有想法都陈述过了。但在这里，在结束这篇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之前，我很想，也确曾承诺过，要说明目前的摄政王也是一个受益于中国牛津运动影响的人。摄政王的父亲是已故的七王爷<sup>①</sup>，中国牛津运动非官方的保护人。他是已故光绪皇帝的父亲。这位七王爷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就如同英国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在英国所处的地位一样。英国那位已故的女王夫君，在试图指导当时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散漫和无政

---

<sup>①</sup> 指奕譞（1840—1891），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七子，故称七王爷。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1872年进封醇亲王。1884年，奕訢被革除一切职务后，他曾左右军机处。其思想较为保守。

府主义势力中丧了生，同样，中国的七王爷，在发现他指望着能与李鸿章及其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之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斗争的中国牛津运动最终失败和崩溃的时候，也因极度伤心而过早去逝。现任摄政王，当今中华帝国的实际代理人，便是这位尊贵的七王爷——这位中国牛津运动的支持者和非官方保护人的第三子。因此，已故七王爷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完全置于牛津运动者们的影响之下的。最后的一个王府教师，便是已故帝国大臣孙家鼐<sup>①</sup>。由于有这种因素，中国的牛津运动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仍然施加着影响。

这里，我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帝国的亲王之中，已故皇太后认为配做她继承人、堪当指导民族命运之大任的只有两位。她心中牢记孔子所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初，她看中的是有“拳匪”臭名的端王，并把他的儿子指定为大阿哥。如果义和团事变没有发生，今天中国的摄政王便是端王。端王是一个狂热型的人，如果他摄政，他会毫无疑问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有所进取。但是义和团事变招致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使他无法当摄政王了。于是已故皇太后不得不选择目前的摄政王，他是那种有所不为的偏执型的人。如果他不是为了去创造新秩序而做得那么多，他一定能获得更多的荣誉的，因为这些事情做得越多，反而使中国的事态越糟。不仅如此，目前的摄政王正严格执行着已故皇太后的政策，这一政策就是：如果中国一定要闹一场革命——目前的欧

---

<sup>①</sup> 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字燮臣。咸丰状元。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曾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后升擢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

化实际上就真正等同于一场革命，它必须是“一场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现任摄政王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满族的高贵灵魂和自尊自傲品质的年轻人。当外国人指责中国在他的统治下发展缓慢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位满族亲王克己的力量是多么值得称赞。因为这种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纯洁无瑕，无可挑剔，使得他在国家事务中，情愿不以个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导革命。其实，谈起这位摄政王，我们可以同说过这样一句聪明话的智者一道说：“不轻易发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风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比攻城夺池还难。”

## 二

本书就要结束了，我想说的是，在讲这个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过程中，我已尽力说明，自从欧洲人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中国人怎样努力与那现代欧洲那强烈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的破坏力量战斗，使它不致于危害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业，然后我们又如何遭到失败。率领我们战斗的中国牛津运动的领导人现在都已亡故。眼下的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我们是只能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呢？还是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在此，正如马太·阿诺德要说的，我觉得此刻我的敌人正以一种急不可待的喜悦，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却要避开他们。

我说过，义和团事变之后，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的统治阶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面对现代欧洲各国那种物质实利主

义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文明的应战能力不足，无效无用。我还表示过要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统治阶层、中国的文人学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错误的。在此，我将兑现我的诺言。

在我看来，一个人或一国人用以反对和试图消除一个社会错误或政治错误，存在着四种方式。下面，我想对此做出具体的说明。假设在上海地区有一个纳税人，他诚心诚意地相信上海租界运行的有轨电车对于上海人民来说不仅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很坏的、不道德的、伤风败俗、导致混乱的设施。怀着这种念头，他首先可以以一个纳税人的名义，抗议在上海街道上铺设有轨电车道。如果抗议无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几个志同道合者站到马路中央，逼迫有轨电车司机要么停车，要么从他或他们身上碾过去。如果电车司机拒绝停车，他就用拳头和血肉之躯去与电车对抗。这时候，如果没有警察和市政人员来干预，愚蠢的纳税人就会粉身碎骨，而上海的电车道也仍将原封不动。端王及其义和团员用来抵御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到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方法。

上海的那位纳税人，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阻止电车的运行。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伙创办一个对立的电车公司。从财政方面或其他方面设法搞垮这家电车公司，终使其无法存在，无法开业。到这个地步，人们能够想象出上海将会是一幅什么景象。然而，这就是已故的张之洞主张采取的，用以防止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并带来恶果的办法。

上海纳税人能够用来阻止电车运行的第三种方式，正如我曾说过的，是消极抵制，洁身自好（boycott）。但消极抵制和洁身自好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会弊端方面决不会有效。而这正是伟大的俄国道德家托尔斯泰伯爵在给我

的一封公开信中，劝告中华民族阻止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的方法，也就是要我们消极抵制，不理睬欧洲的一切。托尔斯泰伯爵所提议的这种对待社会罪恶的方法一点也不新鲜。佛教改革世界便是通过消极抵制。当世界腐败无道之时，佛教徒们就剃光脑袋进入寺庙，以此洁身自好。结果社会只能变得越来越糟，且最终连挤满各种光头和尚的寺庙也逃不脱被焚毁的命运。因此，世界上的社会罪恶绝不能通过消极抵制来革除，因为消极抵制乃是一种自私和不道德的暴行。马太·阿诺德指出，“茹伯说得很妙：‘C’est la force et le droit qui reglent toutes choses dans le monde; 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强权和公理是世界的统治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强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公理未行，因为公理未行，所以强权那种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统治者。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具有内在认可、意志之自由趋同的东西。我们不为公理作准备——那么公理就离我们很遥远，不备于我们——直到我们觉得看到了它、愿意得到它时为止。对于我们来说，公理能否战胜强权，改变那种事物的存在秩序，成为世界合法的统治者，将取决于我们在时机已经成熟时，是否能见到公理和需要公理。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试图将其所醉心的新近发现的公理强加给我们，就仿佛是我们的公理一样，并以他们的公理来强制取代我们的强权的那种做法，是一种暴行，应当反抗。”

简而言之，当我们认为某种制度不合理时，便去消极抵制它，而想不到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暴行，这是不对的。以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绝不能改革某种制度，即便它真是一个罪恶的和道德的制度。

上海那个真诚相信电车是一种危险和讨厌的东西，是一种不道德的设施的纳税人，能够用以阻止上海电车运行的第四种方法如下：他不必不去乘电车，甚至可以保护它，但在私人生活或公职生活中，他却必须保持自尊和正直的品质，以赢得所有上海居民的敬重。由于邻里居民对他的敬重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他得以参加纳税人会议，又由于所有纳税人对他的敬重，都愿听从他的意见，而对其他人的意见置若罔闻。这时候，如果他能向纳税人说明——上海的有轨电车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和伤风败俗的设施，那么，他将有机会使纳税人们心甘情愿地将电车废置。这，我以为就是孔子制止某种社会或政治罪恶及其改革世界的办法，即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因此，我认为，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将此种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从现代欧洲各国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势力中挽救出来的力量正在于此，并且这是唯一可靠的力量。

### 三

末了，我愿意在此指出，迄今为止，不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势力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文明所固有的这种唯一真正的力量的利用极其之少，而且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直到今天才意识到，自己立身行事一无所成，正是由于我不懂得在生活中通向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是，“修



己以敬” (order one's conversation aright)<sup>①</sup>，照孔子所说的，集中精力去过一种“笃恭”的生活。的确，要说起来，如果不是这本牛津运动故事中所提到那位名人（指张之洞——译者）给予我 20 多年的庇护，我这条命恐怕早就丢了。我很清楚，在这篇故事中谈到这位老头领时，我并非只是一味褒扬。我写这篇故事的目的是不是要臧否什么人或什么事。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如实地了解中国的现状。Amicus Plato, magis amica veritas（我爱柏拉图，但更爱真理）。但在这篇故事结束之时，我愿公开在这里表达我对已故帝国总督张之洞的感激之情，感激他 20 多年所给予我的保护。有了这种保护，我不致于在冷酷自私的中国上流社会降低自我去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此外，尽管我时常固执任性，他却始终抱以宽容，很善意和礼貌地待我。而且我还荣幸地学会了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去为中国的文明事业而战。他是中国牛津运动中最优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学士。两年前，当我在北京见到了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彻底绝望了。我尽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证最后胜利仍属于我们。他摇了摇头。我希望能够再次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返回战场，但现在战局还未明了，我们的头领却死去了，Ave atque Vale!（告别了！）

① 可参见辜鸿铭英译《论语》第 14 章，这是他的独特翻译。从字面意思上看，即慎言，言之有矩。

## 附录

### 已故皇太后

——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

先生：

最近在这个国家举国同悲之日，贵刊上所发表的那篇文章和短评，谈到刚刚去世的皇太后陛下的那些话，在我看来是如此的冷酷，充满敌意和难听之至。因此，我感到不得不对它提出抗议。一个自然史的教授在描绘某些猛兽的有趣标本的时候，也没有你们在描述已故皇太后的生平时这样无情。我并不想在此阻止你们对皇太后的品德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要抱怨的，是你们那文章的腔调。我请问你们——在这个国家万民同哀的时刻，一份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重提那些诬蔑皇太后的残忍、谋杀和暴虐的传闻，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这公平吗？仅仅几天以前，她还是这个国家的国母，而外国人在这里过着一种特权客人的生活。

我并不想就已故皇太后实际上的品行问题，与你们展开争论，现在这个时候也不合适。对于这一问题的审慎意见，我已经在了一本不成熟的小书中做过了阐述。这本书，你们曾经向读者加以推荐，给以好评。对于那些已死心踏地地认定皇太后是一个野心勃勃、刻毒残忍的妇人的外国人，我除了以哀怜之心

重复福音书中那句“Moriemini in peccatis vestris（你们将由于罪恶而死去）”之外，别无他话可说。但对于另外一些尚没有固执此见的外国人，如果你们允许，我倒愿意提供几点意见，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对于皇太后的品格，形成一个比你们所做出的评论更为公正的看法。

我要谈的第一件事，是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问题。与你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认为它不是——正如历史上一切伟人的生活动机一样，从来不是——卑鄙的野心。卡莱尔在谈起他心目中的英雄克伦威尔所涉及到的野心时说：“势利小人以其可怜的奴才之心推想，每天让人把成捆的公文拿给你看，那该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事情。”以中国的皇太后来说，除了每天必须劳神于那一捆捆头绪纷繁的各色公文之外，她从实现野心中得到的另外好处是，无论冬夏，每天早晨必得四点半起床。不仅如此，她还不像纽约的社交妇女那样，尚能从次日数以百计的晨报上见到自己的大名，以及她所出席的豪华宴会的记述，从中得到某种补偿。这样一个付出如此之多，得到如此之少的雄心勃勃的妇人，想必一定是一个卑贱愚蠢之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已故的皇太后都绝不是这种卑贱的蠢妇。

如果不是野心，那么她生活中的支配动机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先来给你们讲一件事，一件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事情。它发生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北京的太和殿。皇太后一直支持李鸿章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当听到法军炮击福州的消息后，立即传谕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大臣们都异口同声要求宣战。这时，皇太后指着小皇帝对大臣们说：“皇帝长大成人和我死以后，他要怎么干我管不着，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允许有人说，一个妇道人家抛弃了祖宗留给她代为看管的遗

产。”

因此，我认为，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是迟早要为尽可能完整无损地保卫帝国王室留给她管理的遗产而奉献一生。按照中国的道德法律，一个妇人的本质责任，不是只为她丈夫活着。她的本质责任是维护其家族的遗产和荣誉。因此，我认为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是一心一意要尽到中国道德法律所要求于妇人的本质责任。当她临死之前，也就是统治中国 50 年之后，她能够满意地宣告：“我们没有辜负祖宗的信任”。这并非是一句空头的夸口。孔子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已故的皇太后就是这样的人。总而言之，她生活中的支配动机不是野心，而是责任。

我要谈的第二件事，是她的能力问题。已故皇太后能力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她不陶醉于自己的聪明，而是善于利用他人的能力。在讨论高等教育（外国人普遍知道的“大学”）的那篇专论里，载有这样一段《秦誓》，其言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

作为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已故皇太后成功的秘密正在于：她的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她绝不是那种 *Voluntas regis, suprema lex*（君王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意义上的独断独行者，对于她来说，自始至终，*judicium in concilio regis, suprema lex*——最高法律，就是她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事实上，在她统治的 50 年期间，中国的政治并非一人独裁，而是以她为首的执政班子的共同治理。其精神，与其说是操纵控制，不如说是稳健、调节和激励。

总之一句话，她智识的杰出，来自于品德的高尚、灵魂的伟大。

下面，我想再谈谈她的趣味爱好问题。在你们丰富的想象之中，皇太后是一个东方专制暴君，而东方专制暴君总是穷奢极欲、吃喝穿戴无不腐化透顶。对于这种奢侈享乐的谣传，最为简单的回答是：已故皇太后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而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品味的人，是决不会沉溺于吃喝、容忍过度奢华的装饰之中的。艺术品味的专横支配，在反对庸俗的消费和奢华的装饰方面，胜过宗教的禁令或戒条，它是一种比后者更有说服力的严格纪律。我曾经进入过颐和园，见过太后的私人住所，还品尝过她享用的食品。从我在园中看到和听到的来判断，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生活的信徒。我在她住所看到的唯一可以视为奢华装饰的，是玫瑰色的泛滥。园中的人告诉我，她唯一醉心的一件事，是花，种植和培育牡丹花。顺便提一句，我在她的桌子上看到一本打开的书，是晚近出现的新版带注的《书经》，里面记载着中国圣贤的统治箴言。我参观颐和园的时候，皇太后已经 69 岁，她仍然在努力学习如何给她的人民一个良治。

不错，修建颐和园，尽一切可能让它更美一些，的确花费了一大笔钱。

Mais, en rendant son peuple heureux, il faut bien qu'un roi vive. (但是，为了让其子民幸福，一个君王应当存活下去)。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记住，当已故皇太后开始花钱修建她的颐和园的时候，她已经努力工作赚回了它。她为把太平天国叛乱时中国的混乱和惨象，变成今天中国相对繁荣的局面，操劳了整整 30 年。在她将权柄移交给外甥光绪皇帝时，向她的人

民、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提出想修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这难道是那么过分的要求吗？的确，当赫德爵士和莫理循博士向我夸述太后生活奢侈的时候，想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我当面对赫德爵士说，他拥有个人铜管乐队等奢华之物，依我看，其生活要比皇太后奢侈得多。

我要谈的最后一件事，是关于她的家庭关系问题。针对你们无端暗示她的儿子，已故同治皇帝秘密之死与她有关，并认为她对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之死负有责任乃无可争辩事实的胡言乱语，我只想替皇太后陛下辩护一句，以不幸的玛丽·安托万内特的话作为辩护词，当遭到同样恶毒的指控的时候，安托万内特平静地回答说：“我求助于天下所有的母亲”。那“严寒的冬夜”的故事，及其“孩子哭泣”的戏剧性插曲，显而易见，不过是地地道道的神话而已。如果当时真有谋立恭亲王儿子为帝那回事，老恭王怎么可能在已故光绪皇帝继位后，仍然能长期得到恩宠呢？如果真有那样一场密谋，老恭王的儿子现在就不可能像我去年在英国公使馆所见到的那样，四肢健全地活得那么自在了。

下面，我再来谈谈她与她的外甥、已故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人们指控她在儿子死后，不按合法程序立继承人，而是立了一个同辈的小皇帝作为儿子，以便能继续摄政。因为她野心勃勃，想大权独揽。其实这一点又犯了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呢？要记住，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完全都是她操劳的结果。当她最初受命管理帝国遗产的时候，中华帝国不仅满目疮痍、混乱不堪，而且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濒于崩溃。经过她 20 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终于不仅彻底保住了帝国遗产，而且将一个凄惨混乱的中国，变成了如今这般井然有序，乃至繁荣的局面。难道

你们认为，让她眼睁睁，冒险让自己 20 年的劳绩和帝国的遗产再度遭到破坏，以至万劫不复是应该的吗？不——她有太强的责任感了——一种按中国法律规定，妇人应维护家族遗产和荣誉的这样一种责任感。

也正是出于这种对于皇室负责的责任感，她对其外甥、已故的光绪皇帝感到格外气恼。这种气恼并非是其个人怨愤的结果，而实在是发源于责任。她为了保护祖宗遗产，已经奉献了整个一生，满怀希望地选择了光绪，原指望他能不负于自己的牺牲。然而，他不仅辜负了她的期望，而且还犯下了试图毁弃她的劳绩及其帝国遗产的罪行。在这最后几年的日子里，她仍然对光绪可能最终不负她的选择抱有一线希望。然而，当她看到他，这个她早年孀居时领养的孩子，这个她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孩子死在她之前的时候——她的生命之光便突然熄灭了。可怜的不幸的孩子已经死去，更加不幸的母亲能够做的，只能是立即随他进入坟墓。

Heu, miserande puer, si qua fata aspera rumpas,  
Tu Marcellus eris. Manibus date lilia plenis  
Purpureos spargam flores.

唉，可怜的孩子，要是你战胜了艰难的命运，  
你将是马尔坎勒斯。请你们赐予手中的百合花  
让我（在墓前）撒下紫色的花朵。

就此搁笔。

辜鸿铭

1911 年 11 月

## 中国的皇太后<sup>①</sup>

——一个公正的评价

### 辜鸿铭评论德龄著《清宫二年记》<sup>②</sup>

当此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满族权力悲剧性丧失的时候，这本由一位新式的满族现代妇女所著的书出版了。它给予了我们有关满族宫廷以及满族上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读来十分有趣也很有意义。过去，在这方面，人们一般都认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两先生的那部书<sup>③</sup>，是划时代的力作。可依我看来，倒是德龄女士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不错，在濮兰

---

① 本文是辜鸿铭辛亥革命后发表在上海英文报纸《国际评论》上的一篇读书评论。

② 德龄（约1884—1944）：一般称德龄公主，实际上是郡主。她是满洲贵族裕庚公爵的女儿。裕庚充任法、美等国出使大臣时，她随父在欧洲生活多年。会英语。1903年回国，与其妹一起入清宫，为慈禧太后贴身女官。1905年父死出宫，嫁给美国驻华副领事，随夫往美。曾将她在宫中见闻写成《清宫二年记》（或《在紫禁城的两年生活》）、《御香飘缈录》、《御苑兰馨记》等书，失实之处不少，可供治史者参阅。

③ 指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合著的《慈禧外记》一书。白克好司（Backhouse, 1873—1944）：英国人，汉学家，曾任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此人人品较差，曾伪造《景善日记》。



德和白克好司先生的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是所有这些有价值的材料，都因作者的过分聪明而被糟蹋了——这种过分聪明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通病。孟子曾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我憎恶你们这些聪明人，因为你们总是把事实歪曲）。对此，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两先生的著作正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它向我们显示出对历史的歪曲竟可以达到何种的程度：刚刚去世的中国皇太后，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伟大女性，她具有一切伟人所共有的品质——纯朴。孟子曾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伟人，切记不要丢掉你单纯的童心）。梅特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谈到过拿破仑智慧中那伟大的纯朴。可是，皇太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还是一位满人。满人，正如我在其它场合曾说过的那样，尽管他们现在有着许多缺点和毛病，但仍然是些不狡诈、心地质朴的人。因此，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既具有高尚的灵魂，又不失赤子之心的伟大女性，那么她就非中国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可是，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两位先生对此一无所知，相反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夸张的、过分渲染的、畸形变态、腐化狡诈的超人妇女形象。而那些鉴赏力已然沦落的现代公众，因热衷于荒谬和耸人听闻的事情，对此也都众口一词：“好一幅美妙的图画啊！”

本书的女作者也是一位年轻的现代妇女，但好在她不过分聪明。或许，正是她那满人的纯朴坦率使她避免陷入这种过分的聪明吧。不过，她毕竟受过现代教育，同所有受过现代教育、描写中国的男女作家一样，她也奢望什么进步和改革，而这些东西恰如横亘在她头脑里的一条长虫。在她第一次觐见皇太后的路上，她说：“我们得知恐怕将被要求留在宫内，我想要是果

真如此，也许能对太后施加某种影响，促使其进行改革，而这对中国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哩！”庞大帝国的复杂机器已然出现了故障，可这个纯朴的黄毛丫头，却自信有能力将它修好！

该书的中心人物当然是刚刚故去的皇太后。她的形象被描绘成异常纯简而又质朴。唯其如此，它才堪称真实。而不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那幅大肆渲染的作品那样，仅是一幅被歪曲的漫画。女作者在描述她第一次觐见皇太后的场面时是这样写的：“在正殿的门口，我们遇见了光绪年青的皇后，她说：‘太后叫我来接你们’。接着就听得殿里高声叫道：‘请她们马上进来’。于是我们立刻进入殿中，一眼就看见一位老太太，穿着一件绣满大朵红牡丹的黄色缎袍。珠宝挂满了她的冕，两旁各有珠花，左边有一串珠络，中央有一只用最纯的美玉制成的凤。”

“太后看见我们，就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她动人地微笑着，对于我们熟知宫中礼节表示惊讶。招呼我们以后，太后就对我母亲说：‘裕太太，我真佩服你，把两个女儿教养得这样好，虽然她们在外国住了那么多年，可是她们的中国话竟说得跟我一样；并且她们怎么会那样懂得礼节？’‘她们的父亲平时管教她们非常严厉，’我母亲答道，‘他先教她们念中国书，而且她们自己学习也很努力。’‘我真佩服她们的父亲，’太后说，‘对他的女儿这样当心，并且给她们受这样好的教育。’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并亲了我的双颊，然后对我母亲说：‘我喜欢你的女儿，希望她们能留在官中和我作伴。’”

上述这些场面，简直无异于《红楼梦》中林黛玉初见贾母一节。这位穿着美丽缎袍，带着动人微笑凝望并吻孩子的老妇人，与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所描绘的那个狡黠、极度邪恶阴

险的超人妇女，究竟有何相似之处呢？

濮、白两先生曾谈及宫中的酒宴。本书对那些庄重的酒宴也有过一次描述：“太后沿着小径走了一程，然后笑着对我说：‘你看我现在不是舒服多了吗？我要走长路，到那边山顶上去用午餐，那里有一块极好的地方，我想你一定也喜欢的，来吧，我们一起去。’”

“太后走路极快，我们必须快步跟着，才不至落后。太监、宫女都在太后右边走，只有一个捧着黄缎椅的太监是跟在我们后面的，这黄缎椅就像太后的狗是随时随地跟着太后的。太后出来散步的时候，常喜欢坐在黄缎椅上休息。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我开始觉得疲倦了，可是太后仍然走得很快，丝毫没有一点倦意。”

“我们终于来到石舫。站了还没几分钟，一个太监携来黄缎椅子，太后坐下休息了。在谈话中，远远瞧见移来两只华丽的大船，四周布满了小船。太后说，船在那儿，我们必须上船，划到湖西去用餐。她站起身，来到湖边，在一左一右两个太监搀扶下上了船，我们也跟着上了船，太后坐在御座上，并让我们坐在船板上。太监送来红缎垫褥替我们铺好。我们身穿洋装很不方便，太后不知怎样发现了，就叫我们站起来，还让我们看看后面跟来的船。我把头伸向窗外，瞧见年轻的皇后和几个宫女在那条船上。皇后挥手，我也挥手。太后微笑着说：‘我给你一个苹果，你能掷给她们吗？’说着太后从桌子中央拣了一个大苹果给我，我用劲一扔，扑通一声苹果落入水中，太后大笑，让我再试，又未中。太后就自己掷了一个，恰巧打在一个宫眷的头上，我们都尽情地笑了。”

马太·阿诺德在谈到诗人荷马时，曾说：“荷马纯朴而高

贵。”我们说皇太后亦然。在前面我的两段摘录里所体现的那种特性——纯朴性，不仅为皇太后个人所拥有，而且为整个满族所具有的特性，确实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我还说，皇太后不仅纯朴，而且高贵。这一高贵的性情，也就是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庄重高雅的风度。遗憾的是，皇太后性格的这一侧面，在该书中没有充分反映出来。然而通过下面这段文字，细心的读者对这位伟大的、高贵的女性这方面的特性，还是可以略见一斑的。在谈到那张由美国画家为太后所绘的肖像时，作者写道：“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康格夫人<sup>①</sup>一封信，求我不要怂恿太后拒绝卡尔小姐来画像。我把这信翻译出来给太后听，太后听了很是发火，道：‘没有人可以用这样的口气给你写信，她怎敢诬蔑你说了卡尔小姐的坏话？你回信时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宫眷从来不能干涉太后的事，而且你（做为一个满族人）也不至于这样卑鄙会在背后说人坏话。’”下面还有一章可以作为太后不仅纯朴而且高贵的例证。在描写太后大驾要由颐和园返回城内的宫苑时，作者这样写道：“这天早晨六点钟，全体起程离开颐和园，正好赶上大雪，许多马匹滑倒在路上，太后的一个轿夫也失足滑倒，将太后掀翻在地，一时人马嘈杂。我立刻觉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太监们高叫‘停下，停下！’于是人马立刻停止下来，路也被堵住了。最后，我们看到太后的轿子停在路边，便都下轿奔过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了太后轿边，只见她安坐轿内，正对太监总管发令，叫其不要责备那个轿夫了，这不是他的错，实在是路太滑了。”拿

<sup>①</sup>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妻子。庚子以后常到宫廷，曾著有《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一书，叙述当时北京宫廷生活甚详。

破仑有一次在散步时，被两个身背重物的士兵挡住去路，当几个官眷卫兵喝令二人为大皇帝让路时，拿破仑则说：“尊敬的夫人，请尊重负重者。”作为伟人，他必定是高贵的，而作为一般人，只有当他或她能够理解拿破仑这句“尊重负重者”的话时，才配称高贵。

我曾在我的著作中谈到过，作为满人，皇太后那高贵的满人理智，使她对欧洲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兴趣。下面，我们不妨看看她对欧洲服饰的看法。该书的作者曾给太后看过一张她身着晚礼服的画像。太后说，“你穿的衣服多特别，怎么连颈和臂都露在外面？我听说外国人穿的衣服都是没有领和袖的，却没想到会像你所穿的那样难看。我不懂你怎么肯穿的。我想你穿了这种衣服一定会感到难为情。以后不要再穿这种衣服了，我看了这样的穿着打扮很不舒服。这也算是文明吗？这种衣服是在有特别事情时穿的呢，还是随便什么时候，甚至有男人在场的时候都可以穿的呢？”作者解释道这只是普通女人的晚礼服。太后听了笑着喊道：“越说越不成样了。我看外国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似乎样样都在倒退。我们在男人面前手腕都不准露一下，但外国对此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皇帝（光绪）总讲要革新，但如果这就是所谓新法的话，我看我们自己固有的东西倒要强得多，还是守旧些好呢！”

如果说以上就是太后对欧洲服饰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太后对欧洲人举止的评价。“太后对我说波兰康夫人（俄国使臣的妻子）真是一位体面有礼的太太。以前来宫里的许多（欧洲人的）太太都没有像她那样知礼，有些太太举止就很不适当。”她又说：“她们似乎以为我们不过是中国人，因此很是瞧不起。可是，我很快就注意到并奇怪地发现：那自以为是文明

的，有教养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依我看，她们所认之为野蛮的，比起她们来，倒好像要文明得多，举止得体得多呢！”该书在描述满族宫廷和满族社会时，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们每人都有优雅得体的举止这一点。甚至于在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书中所提到过的那个可怕的妖魔——太监总管李莲英，尽管他又老又丑，脸上布满皱纹，却也有着优美的举止和风度，从而有其可爱之处。优美的举止风度，恰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健全完美的体现和确证。当然，我非常清楚，此时此刻对于满人的这一优点，无论我怎么说也是不会有人听的，但我在此还是要冒昧地说一句：今日中国那些沉默的、真正高贵的人——少数正与全民族抗争的人——虽然忍受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羞辱，但却应当赢得人们的尊敬，因为在反对这场下流无耻的诽谤运动时，他们没有用有损尊严的一字一句进行过反击和报复。

我说过，刚刚故去的皇太后纯朴而高贵，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下面这段摘录就是关于她如何获取权力并成为伟大女性的原始资料。作者记述说：“七月照常是太后最悲痛的月份，因为该月的18日就是她丈夫咸丰皇帝的祭日。17号早晨，太后去祭奠亡夫。她跪在咸丰帝的灵前，哭泣了许久。宫中也一律戒荤三日，以表虔敬。我当时是太后所喜爱之人，所以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她常叫我伴随她左右。这是一件倒霉透顶的差使。当太后哭时，我也得陪着她哭，然而她却每每停下来叫我别哭，说我无论如何还太年轻，不宜悲痛，同时也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在那段时间里，她告诉我许多她自己的身世。一次她对我说：‘你知道在小时候，我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丝毫欢乐。我初进宫时，大家也都妒忌我的美貌，后来幸运我生了一个皇子，这才好了些。然而在

这之后，我的命运就又不济了。咸丰当朝的最后一年，他突然病倒，洋兵又烧毁了圆明园，我们于是不得不避难到热河，当然这件事是大家都熟悉的。那时我还很年轻，丈夫病危，儿子又还小。当皇帝处于弥留之际时，我急忙抱着儿子来到他身旁，对他说：‘你的儿子在这里。’他听到这话，即微微张开眼来，说道：‘当然是他继承皇位。’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尚有同治可以依靠，能够获得一点愉快，但不幸的是，同治不到二十岁竟又死了。从此我的性情大变，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因为我的一切幸福都连同死掉的儿子一起失去了。稍为慰藉的是，光绪帝还只有三岁就被带到我的身边。他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你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醇亲王，他母亲便是我妹妹，所以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而且事实上我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待的。可是，尽管我为他想尽办法，他的身体却依旧很糟，这是你们都知道的。除此之外，我还有许多苦恼的事，现在说也无益。总之没有一件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样样都使我失望。’说到这里，她又痛苦起来，接着又说：‘人家都以为太后不知有多么快活，却不知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痛苦。然而我总算还很达观，顺其自然，因事而安，有许多小事也就不放在心上，要不然我恐怕恐怕早就躺在坟墓里了。’”

从不靠眼泪来度日，  
从不坐熬那寂静的夜时，  
哭泣到次日黎明——

他知道你不会，（因为）你拥有非凡的力量。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这位纯朴而又高贵的满族妇女，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中成为一个伟大统治者的了。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她保持了一个庞大而又纷乱的帝国的统一。孟子说：“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是谓也。

下面，在本文即将结束之时，我再摘录一段，谈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光绪的皇后——现在的皇太后隆裕<sup>①</sup>。该书的作者初见她时，她显示出极好的举止和风度，且并无丝毫造作之感。下面这段故事则体现了她品性的另一方面。一次作者在与宫眷们交谈并回答她们的提问时，庆王的四女儿问了一个可笑的问题：“‘难道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以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这些人还问了我许多问题。最后年轻的皇后言道：‘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晓得每个国家都有个领袖，有些国家是共和国，像美国就是；美国和我们是很友好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就是现在到美国去的中国人都是些平民百姓，使得美国人以为中国人就是那种样子。我希望能有些好的满人出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好一个年轻的皇后！这位当今的隆裕太后所希望见到的，不正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的首项改革吗？中国人最大的不幸，正是他们不为世人所了解，也就是说正因为欧美人都不了解我们真正的中国人——即太后的那句话——以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懂，所以便瞧不起我们。欧美人的这种态度，是1900年中国庚子事件爆发的排外情绪的真正根源。因为这场运动本身，正

---

<sup>①</sup> 隆裕太后(1868—1913)：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侄女。1889年慈禧强立她为光绪皇后。溥仪为帝时，尊为皇太后，垂帘听政，以载沣为摄政王监国。1912年2月12日，在革命形势的逼迫和袁世凯的要挟下，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



是为了反抗外国人的歧视。同样，目前这场革命（辛亥革命），也是为了反对政府对洋人歧视的妥协和忍让。该革命的矛头所向并非是一个腐败的政府，而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反抗一个软弱受欺的政府。革命的真正动机并非排满，而是源于遭受外人蔑视引发的巨大的羞耻感而生的盲目排外力量。这些拥有如此这般新学的盲目者，天真地想象我们受歧视的原因只是由于我们有辫子，而满族人则须对这一耻辱的标志负责。所以这些盲目的过激分子痛恨满人并坚持要摆脱和推翻满族的一切。正如聪明的辛博森实话所言：“目前这场割发革命，值得世界人民同情。”简而言之，1900年中国爆发的庚子事件，实际上是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的狂热迸发；而当今这场革命，则是一次民族自大心理的狂热爆炸。然而，正是在这里，狂热分子不久就会发现他们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人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割发或换发型，而实在是隆裕太后所希望看到的——派出我们的良民——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美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简而言之，这种最优交往，或能有望打破东西畛域。

今日的德国人都深切地怀念着他们已故的、普鲁士高贵的路易丝王后，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对我们的隆裕太后之同样的深情，不久就会到来。上个世纪初，遭受拿破仑·波拿巴践踏后的德国霍亨索伦王族，正如今日受到英国报纸攻击和侮辱的爱新觉罗皇室一样，遭受到全世界带着怜悯和嘲讽的蔑视。然

而，据说那位忍受了巨大牺牲的普鲁士尊贵的王后，在那段孤寂凄凉的日子里，却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我在前面引述过的、歌德的那句名言：

绝不靠眼泪来度日。

——尊贵的王后所作出的牺牲和忍受的痛苦，终于触发和震撼了全体德国人民的心灵，使他们不仅作为一个民族崛起并击败了拿破仑·波拿巴，而且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有谁又能肯定，当今隆裕太后所受的痛苦，不会激发帝国那四万万沉默的人民也奋起进击，坚决反对并制止这场愚蠢而疯狂的革命，并最终依然在暂时失色的皇室领导下，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纯粹的现代中国呢？正如德国诗人对尊贵的普鲁士王后所赞美的那样，以后我们中国人，也会对今日在北京被残忍背弃的帝国皇后放声歌唱：

你是一颗星，一颗光彩夺目的星，  
往昔的风暴和乌云全都已经过去。



# 张文襄幕府纪闻

《张文襄幕府纪闻》系辜鸿铭现存的两部汉文著作之一。宣统二年（1910年）铅印本。

## 弁 言

余为张文襄<sup>①</sup>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无今昔之慨。今夏多闲，摭拾旧闻，随事纪录，便尔成帙，亦以见雪泥鸿爪之遗云尔。其间系慨当世之务，僭妄之罪固不敢辞。昔人谓漆园《南华》<sup>②</sup>一书为愤世之言，余赋性疏野，动触时讳，处兹时局，犹得苟全，亦自以为万幸，又何愤焉？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枪于怀。古人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识者亮之。宣统庚戌中秋汉滨读易者识<sup>③</sup>。

① 张文襄即张之洞，1909年卒，谥“文襄”。

② 庄子曾为漆园吏，故此以“漆园”代庄子。《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

③ 汉滨读易者：辜鸿铭自称。

## 卷 上

### 南京衙門

余同鄉李忠毅公之文孫龍田司馬名惟仁，嘗詆論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從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謂曾文正功業及大節所在，固不可輕議，然論其學術及其所以籌畫天下之大計，亦實有不滿人意者。文正公日記內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問于何處可以見曾文正陋處？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門規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處也。”

### 不排滿

或問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處何在？”余曰：“在不排滿。”當時粵匪既平，兵權在握，天下豪傑之士半屬門下，部曲及昆弟輩又皆梟雄，恃功驕恣。朝廷褒賞未能滿意，輒出怨言。當日情形，與東漢末季黃巾起事，何大將軍領袖群雄，袁紹、董卓輩飛揚跋扈無少異。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則天下之決裂必將有甚于三國者。天下既決裂，彼眈眈環而伺我

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 虎门轶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日中兴人材，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sup>①</sup>。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入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sup>②</sup>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品赍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失声。庚子年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sup>③</sup>，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清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直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① 指彭玉麟，湖南衡阳人，湘军将领。曾任兵部尚书。中法战争起，以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办防务，驻虎门。卒谥“刚直”。

② 指慈禧太后，卒谥孝钦皇太后。

③ 指咸丰帝刚死。“文宗”，咸丰帝庙号。



## 曹参代萧何

梁启超曾比李文忠<sup>①</sup>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才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曰办善后，一曰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sup>①</sup> 指李鸿章，卒谥“文忠”，称李文忠公。

## 大臣远略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sup>①</sup>，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sup>②</sup>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划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sup>①</sup> 蔡锡勇(?—1897)，广东人。广州同文馆毕业。曾任驻美公使馆翻译。1884年被两广总督张之洞任为洋务局委员，向外商订购冶铁和纺织机器等。后随张之洞到武昌，以道员衔受命筹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织布局等。是张之洞办洋务的得力助手。

<sup>②</sup> 指文祥，死后谥“文忠”。

## 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日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松涛<sup>①</sup>，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sup>①</sup> 松涛，应为嵩焘，即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学者称养知先生。道光进士。曾任广东巡抚。1876年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与保守副使刘锡鸿不合，以病辞归。郭氏思想较为开明，因服“西人之善”处，遭到顽固派的痛恨。所著《使西纪程》被毁板。

## 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sup>①</sup>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sup>②</sup>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sup>③</sup>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生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

① 指张佩伦。字幼樵。

② 合肥，指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故称。

③ 贾生，即贾谊，西汉文学家，政论家，曾多次上书批评时政，与周勃等为政敌。下文的绛侯，即是汉初大臣周勃，他被封为绛侯。

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于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

犹似汉之贾长沙<sup>①</sup>、董江都<sup>②</sup>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为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sup>③</sup>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 孔子教

一日，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唯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

① 贾长沙，指贾谊，他曾被周勃等排挤，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因称贾长沙。

② 董江都，指董仲舒。西汉思想家。曾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曾任江都相，因称董江都。

③ 韩子，指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

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 新算学

辜鸿铭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sup>①</sup>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昌，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业已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

---

<sup>①</sup> 指伊藤博文，日本明治时期内阁总理，一八九八年曾来中国，在武昌与张之洞及其幕僚相见。当时为侯爵。

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

## 孟子改良

陶靖节<sup>①</sup>诗云：“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然亦老矣，检收残篇，亦多失其真。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欲售其顽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窜原文。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sup>②</sup>云云。

<sup>①</sup> 指东晋诗人陶渊明，私谥靖节，故称。

<sup>②</sup> 此处是辜氏反用孟子章句，以讽世。《孟子·梁惠王上》原句为：“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原句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 踐 迹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朱子解曰：“善人质美而未学。”又引程子言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辙，善人虽不必踐旧迹，而自不为恶。”余窃以为，踐迹一解，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即宋儒所谓客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皆所谓踐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谓之孝。曾子论子张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务外自高，务外自高而欲学为圣人之道，其学必不能化其弊，必至于踐迹，故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此孔子对症下药也。盖学圣人之道而踐迹，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况圣人乎？后有荀卿亦学为圣人之道者，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东坡论荀卿曰：“其为人必也刚復不逊，自许太过。”是亦自高之一证也。今日张文襄亦出自当日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而其门下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文明文物一旦扫地净尽。东坡谓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噫！学为圣人之道不化而至踐迹，其祸之烈一至于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务外自高所致。禹对舜之言曰：“无若丹朱傲。”傅说之对高宗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傲与逊之间，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

## 务 外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犹忆昔年张文襄赏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以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则可以言学。

## 生子

袁简斋<sup>①</sup>言：“昔方望溪<sup>②</sup>先生有弟子某，年逾商瞿，戚戚然以无子为虑。先生曰，汝能学禽兽，则有子矣。先生素方严，忽作谩语，其人愕然问故。先生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处有人欲而无天理。今人年过四十，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将天理搀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炽，难以成胎。而且以人夺天，遂为造物所忌。子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禽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之所鼓荡，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谓此无关乎天理人欲也，斯即《中庸》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不贰则诚，诚则有功。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余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

---

① 指袁枚，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清代诗人。

② 指方苞，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家，号望溪。

## 为人

《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 公私利

余随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

是文襄默然让茶<sup>①</sup>，余即退出。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 权

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惟理与势耳。《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甚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窃谓用理得

<sup>①</sup> 清代官场习俗，示客人起身告辞之意。

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 廉吏不可为

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歿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人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

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 爱国歌

壬寅年<sup>①</sup> 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忖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 半部论语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sup>①</sup> 即 1902 年。

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间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废俱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子矣。又忆刘忠诚<sup>①</sup>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 理 财

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官保<sup>②</sup>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于虚。坐谈间，余谓官保曰：“今日度支部为财

① 指刘坤一，卒谥“忠诚”。

② 指盛宣怀，字杏荪，有太子少保衔，故称官保。



政关键，除官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官保欲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官保。”官保曰：“于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官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费，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官保多多。”官保闻之，一笑而解。

## 王顾左右而言他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官保。官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见索。谓余曰：‘《中庸》一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对曰：‘《中庸》一部要旨，官保谓当在何句？’官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官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 官官商商

曾文正复刘印渠<sup>①</sup>制军书云：“自王介甫<sup>②</sup>以言利，为正人

---

① 即刘长佑（1818—1887），号印渠，曾官直隶总督。

② 即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字介甫。

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sup>①</sup>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如此则可以言理财。

## 爱 官

近年朝廷整理财政，注意在绝中饱。然此犹治标，非治本也。今日民困固深，而官贫亦迥异寻常，如刻核太至，其害将甚于中饱。曾文正所谓“爱其赤子，而饿其乳母”，则是两毙之道。张殿撰季直<sup>②</sup>曾谓余曰：“中饱固不可，而中饿更不可。”余曰：“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两不免皆有所伤，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昔国朝蔡漳浦先生复郑鱼门书曰：“士子廉隅不伤，欲启其羞恶之心，不若发其恻隐之心。恻隐者仁也，恻隐

<sup>①</sup> 即南宋哲学家叶适，号水心。

<sup>②</sup> 即张謇（1853—1926）字季直。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因称之为“殿撰”。

之心一摅，则己私自消。亲亲、仁民、爱物，一以贯之，羞恶、辞让、是非相因而有。”此谓知本之论。

## 亡八蛋

学部侍郎乔君谓余曰：“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 禁嫖赌

余尝谓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客曰：“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sup>①</sup>出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风化自任，岂不岿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唯礼教可以已之，非刑罚所能治。刑罚所能治者，作奸犯

---

<sup>①</sup> 指张人骏，字安圃。

科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地方，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刑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邪？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粘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放浪者。君谓张安圃为儒臣，安圃如此不明大体，是焉得为儒臣？张安圃是幼樵胞侄，当时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所谓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坚<sup>①</sup>论西汉诸儒，如张禹、孔光辈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 倒马桶

丁未年<sup>②</sup>，张文襄与袁项城<sup>③</sup>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

① 即东汉史学家班固。

② 丁未年，即1907年。

③ 指袁世凯。袁氏为河南项城人，故称。

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 贱种

有西人问余曰：“我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君能辨别之否？”余对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若一到中国，寄居未久，忽尔体质一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余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肉累累坟起，大腹庞然，非复从前旧观矣。”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 贵 族

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立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土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有英国名下士艾诺尔德<sup>①</sup>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余谓，今日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犹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即以近年学西文学生观之，亦可略见一斑。其回国旧班学生不得意者不必论，其得意者无不身拥厚赏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文忠门下之凡谙西文如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独联留守至今犹家如寒素，清操可风，真不愧为贵族人。

<sup>①</sup> 今译阿诺德。

## 翩翩佳公子

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书皆充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狠，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入，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sup>①</sup>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楨<sup>②</sup>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上，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

① 即端方，字午桥。

② 沈葆楨（1820—1879），福建侯官（今闽侯）人。道光进士。1861年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曾官至两江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与曾国藩发生过节。

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如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 庸言庸行

英国名宰相论用人有云：“国家用人，宜重德行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无君长，而君长之事有大小轻重，即寻常之识量，亦未尝不可以胜任。盖造物于经理天下之事，未尝秘有玄妙之理，一若非一二圣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俭约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人果能行此，且加以阅历，虚心于从政，何难之有？若无德行，虽恃绝等高才，焉能有济？故凡有才无德之人，断不可以任用。盖秉性敦厚而才识不足者，固能遗误事机，然其害岂若彼心术邪僻且有才足以铺张扬厉、粉饰其邪僻者之能败坏国家，至于不可补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尝撰联以自勸曰：“不忤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云。



## 不吹牛屁

壬寅年<sup>①</sup>，张文襄在鄂奉特旨入都陛见，余偕梁崧生<sup>②</sup>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日在朝房，闻锡清帅<sup>③</sup>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日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作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日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屁不吹牛屁。”人谓今日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屁也。”《毛诗》有云：“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屁作起。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日督抚中之佼佼者矣。

① 壬寅年，即1902年。据冯天瑜先生考证，张之洞进京是癸卯年（1903）。

② 梁崧生，即梁敦彦，字崧生。

③ 指锡良，因字清弼，又官至总督，故称“锡清帅”。

## 颂 词

管异之<sup>①</sup>尝谓中国风俗之敬，可一言以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日为盛。今日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日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 马 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办新政，闻西洋有马路，即欲仿照举办。然又闻外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间街道狭隘，碍难开辟。后闻南京、武昌业

---

<sup>①</sup> 即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管同，字异之。

经举行，民亦称便，遂决意办马路。既成，又在上海订购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亦觉甚适意焉。一日，有某道台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群中冲倒一老媪，几毙命，行路人皆为不平，道台之子停马鞭指而骂曰：“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帐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有一乡人应曰：“哎哟，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后某中丞得闻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乘肩舆。韦苏州<sup>①</sup>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谓难得矣。

##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sup>②</sup>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

① 即唐代诗人韦应物。他曾任苏州刺史，因称韦苏州。

② 即袁枚，字子才

才耶？”

## 不 问 民

“麻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日地方一有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谓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曰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入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上下果能认清题目，凡办理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

## 卷 下

### 真 御 史

昔司马温公<sup>①</sup>论言官当以三事为先：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三者具而始可称谏官，然兼之者难矣。国朝陈黄中与王次山论谏臣书云：“御史之职，本无所不当言，而其要在裨主德、肃纪纲、持大体而已。”近日江春霖御史因参权贵褫职，遂愀然去官归乡。由此直声震朝野，人皆曰真御史。余谓江御史不畏强御，此顾名节也，愀然挂冠而去，此不爱富贵也。然今日国事如此之陵夷，岂是如前代，朝有大奸大慝窃政柄，以抑扬威福所使然耶？特以上下皆以顽顿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合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植党乾没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患失之鄙夫，而皆足以亡人家国也。而今日言官即贤如江春霖者，亦未闻上一言以裨主德，建一议以肃纪纲，能使朝野上下革面洗心，徒亟亟攻讦一二贵人琐屑之阴事，愤愤不平，一若与之有深仇积恨而不能自己，是尚得谓之明大体哉？

<sup>①</sup> 即北宋大臣、史学家司马光。死后谥“温国公”，因称司马温公。

## 西洋议院考略

西洋自古罗马后，皆胡俗胡人，有事，其酋长则集群胡以决可否。后西洋分列邦，犹循旧俗，国有大造大疑，国主集群酋议决之，群酋之会曰国会。此西洋中古列邦通例也。宋季嘉定间，英吉利主约翰好讲兵，征赋无厌，英群酋怨之，逼与盟约，后欲征赋，必集国会议可，然后行。遂立册书，永为国典。英人谓此盟书曰《大盟册》<sup>①</sup>。初，西洋俗皆以战猎为事，强有力者立为酋长，故民分曰世族、曰平民。世族者酋长族也，当英吉利之立国也，惟集世族，平民不与焉。久之郡邑平民之有贤望者，或由群酋举，或由国主召，亦入国会。于是国会乃分为上下议院，上院世族居之，下院平民望士居之。及有明中季，英俗罢战猎，民间皆以耕织懋迁为事，于是国饷皆赖商贾富户捐输，乃许巨镇大埠有捐输者，各公举素封之家一人入下议院，至是议院势渐盛焉。国朝初，英吉利主嘉罗斯第一<sup>②</sup>朝用金人，国用空乏，英主集国会，令下议院派捐，议院不允，英主兴兵将诛梗命者，议院亦募民兵与主战，胜遂弑之，国大乱，议院望士之统兵者，名格朗挖<sup>③</sup>。废议院，乱乃定，遂秉国政，称曰

① 今译为“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

② 今译为詹姆士一世。

③ 今译为克伦威尔。

护国主。卒，子庸弱，国人复故主嗣嘉罗斯第二<sup>①</sup>，与盟复立议院，每年一集议，政事不复关白。盖前国主欲征饷始集国会，至是议院之势弥张焉。嘉罗斯第二卒，弟嗣，又失民望，国人逐之，议院召其女与婚，婿，荷兰国主也。议院复与盟，至是议院之势盛矣。此西洋议院之所由来也。乾隆四十一年，英吉利属地在亚美利加洲，各部落叛，英官会盟，遂立为亚美利加合总邦<sup>②</sup>，法亦多仿英制，设上下议院，且国主由民举，所谓民主国是也。乾隆五十四年，法兰西人弑其主，亦仿英制，设议院，国遂大乱，那坡伦<sup>③</sup>起，执兵柄，闭议院，乱乃定。后西洋各国皆设议院，惟俄罗斯不置。夫西洋自议院盛，国主遂比诸牧羊，政皆由国人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信哉！（近年俄罗斯亦创开国会矣。噫！西洋之乱，于斯已极。近有俄著名学士笃斯堆氏<sup>④</sup>新著一书，名曰《世界末境》，盖亦有所见而慨乎言之也。）

## 国会请愿书

余尝谓诸葛武侯之《前出师表》即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何

① 今译为詹姆士二世。

② 今译为美利坚合众国。

③ 今译为拿破仑。

④ 今译为托尔斯泰。

言之？武侯谓后主曰：“宜开张圣听”云云，此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云云，此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祇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亦如无国会也。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吾故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若今日各省代表之所请者，乃是发财公司股东会，非真国会也。盖真国会之命意，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则上下自为一体，然后国可以立。股东会之命意，在争利权，一国上下皆争利权，无论权归于上，权归于下，而国已不国，尚何权利之有哉？噫！

## 马拉马夫

昔年余至上海，见某国领事，谓余曰：“今日中国督抚凡办一事，辄畏惧本省绅士，并且有畏惧学生者，尚复成何政体！”余答曰：“此岂不是贵国所谓立宪政体？”领事曰：“是非立宪政体，恐是马拉马夫政体。”《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余谓民情固不可拂，然至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则乱之阶也。



## 夷狄之有君

辜鸿铭部郎云，甲午后袁项城为北洋练兵大臣，时守京师者多北洋兵队，适张文襄奉特旨陛见，项城特派兵队守卫邸寓。余随张文襄入都，至天津见项城，谈间，项城问余曰：“西洋练兵其要旨何在？”余答曰：“首在尊王。”项城曰：“余曾闻，君撰有西文《尊王篇》，尊王之意余固愿闻。”余答曰：“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派兵队守卫者，乃出自朝廷异数。今张宫保入都，宫保竟派兵守邸寓，是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兵见宫保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至彼此不相顾救，如此虽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亦无以制胜。吾故曰，练兵之要，首在尊王。”予闻是语，谓辜部郎曰：“君言今日兵不知有国家，君抑知各省坐官厅之黼黻朝珠者，其心中目中亦皆知有督抚，尚知有国家耶？君于行伍中人又何责焉！”辜部郎曰：“信如君言。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已瓜分矣。”

## 烂报纸

国朝朱竹垞<sup>①</sup>先生《秦始皇论》云：“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人之徒，素以揆秦为快，不曰嫪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尝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又谓：“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焚之也。”余以为当日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烂报纸之主笔也。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sup>①</sup> 即清代文学家、大学问家朱彝尊，号竹垞。

## 读书人

袁简斋《原士论》曰：“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士者也。所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亦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乱臣十人，岂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今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上，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 督抚学堂

昔年京师拟创办税务学堂，余适在武昌见端午桥，因谈及是事。午桥谓余曰：“现在中国亟须讲求专门学问，鄙意欲在鄂省亦创设厘金学堂。”余曰：“既有厘金学堂，则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曰：“诚然。”余正襟而对曰：“如此，则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乃大笑。窃谓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名也，洎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 女子改良

西人见中国市招有“童叟无欺”四字，尝讥中国人心欺诈于此可见一斑。余闻之，几无以置喙。犹忆我乡有一市侩，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一村塾，招引乡间子弟，居然据皋比为

冬烘先生矣。为取信乡人计，特书一帖，粘于壁右，曰：“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其被误者，盖已不知凡几。内有一乡董子弟，就读数年，胸无点墨，引为终身恨。尝语人曰：“我师误我不浅，其得报也，固应不爽。”人谓汝师之报何在？曰：“其长子已捐道员，而其女公子现亦入女子改良学堂矣。”至今我乡传为笑柄。

## 高等人

昔有一身子极胖大之某教官，颇留心新学，讲究改良，闻新到学宪亦极讲新学，初谒见，称学宪为“高等人”。学宪大怒，以为有心侮己。某教官即逡巡谢曰：“高等人明见。晚生以为，中国几千年来连用字都多欠稳切，极应改良，故如今大学已改为高等学。缘学问之道只有高等阶级，并无所谓阔大者，即如目前宪台身子比晚生身子并不大，不过宪台官阶比晚生官阶高一等耳，故对宪台不称大人，而称高等人。”

## 费解

袁简斋晚年欲读释典，每苦辞句艰涩，索解无从，因就询彼教明禅学者，及获解，乃叹曰：“此等理解，固是我六经意旨，

有何奥妙。我士人所喜于彼教书者，不过喜其费解耳。”余谓今日慕欧化讲新学家，好阅洋装新书，亦大率好其费解耳。如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

## 不 解

昔年陈立秋侍郎名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谙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已谙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

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遂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儒者是无所不通。今若轨放得苟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屁普通矣！

## 看 画

昔有人与客谈及近日中国派王大臣出洋考究宪政，客曰：“当年新嘉坡有一俗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其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人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某少年即入赘作土财主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帐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帐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中国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

洋画耳。

## 华 侨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余谓范蠡者，即当日之华侨也。想当日，齐国穷无聊赖之一般官绅大开欢迎会时，必定要请招待员，挂国旗，奏军乐，吃大餐，有一番大热闹，惜太史公记载陶朱公事，未曾将此热闹情形以龙门之笔描写之，至今犹令人费三日思云。

## 照 像

辜鸿铭部郎云：“余昔年初到英国，寓学堂教授先生家。一日诣通衢，见道旁驻一高轮马车，乘坐其上者为美男子，衣服丽都花簇簇缀冠，上衣缘边悉用金缕蟠结，似显者状。旋见一旧服者，自市肆出，升车接缠在手，扬鞭而去。余归告先生曰：‘今日见一贵官。’并言其状。先生曰：‘汝误矣，彼冠簪花衣金缕衣者，仆也；服旧服者，此仆之主，贵人也。’余曰：‘贵人



何以不自著金缕衣，而反以施之于仆，胡为邪？’先生曰：‘不然，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者也，故衣华丽。汝谨志之。’此与吾《中庸》所谓‘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同义。我中国风俗，向贱优伶，固谓其欲取观于人也。不料今日中国号称士大夫者，事事欲取观于人，即如摄影小照，亦辄印入报纸，以夸炫于人，是亦不知贵贱之分也。”噫，陋矣！

## 发财票

国朝张尔岐<sup>①</sup>先生《蒿庵闲话》云：“荀子曰：‘国法禁拾遗，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此语有味。人偶有所得于分之外，必不能复力于分之内，其得失常相敌，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力，则立尽之术也。原其始，则无分之得为之祸也。”余谓无分之得，足以祸民，本国法所宜禁，此乃言礼教之常耳。如近今禁售彩票，盖亦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然亦须观时局如何，若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纸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趣，今并此生人之趣而亦绝之，吾不知穷无聊赖者，以后更作何聊赖耶？

<sup>①</sup> 张尔岐（1612--1677），清初经学家。

## 卖 穷

袁简斋《诗话》有句云：“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此仁人之言也。我中国江浙两省，素号繁华富庶之区，倚门卖笑者固有其人，然昔年所谓苏班妓女，其声价甲于天下，未闻肯跋涉他省作卖笑生涯者。今则不然，凡行省商埠，无不有苏班妓女展转营业，托足其间。观于此，今日中国尚谓有教养之道邪？可慨也。有西人曾谓余曰：“今日上海卖娼者何如此其多？”余曰：“此非卖娼也，卖穷也。”

## 不枉受穷

国朝张尔岐《蒿庵闲话》云：“邹吉水<sup>①</sup>曰：‘世人相见诉穷，便是贪欲影子，这穷字断送多少豪杰，试看先辈赫赫者大段穷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处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辈药石。又念耐穷，如何得赫出来，此中大有事在。不得所事，只知耐穷，一懒惰无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从事，遇

<sup>①</sup> 即邹元标，江西吉水人，因称邹吉水，明万历年间东林党领袖之一。

穷便自增长气骨，开通识见，不然，富贵枉受富贵，穷亦枉受穷也。勿求增财，但求减用，减欲，斯减用矣。”余谓吾人居今之世，当以“增长气骨，开通识见”八字书诸绅以自儆。

## 叶君传

辜鸿铭部郎曾撰《叶澄衷<sup>①</sup>传》，其文曰：“太史公作《游侠传》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sup>②</sup>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云云。近世自我中国弛海禁，沿海编氓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贻财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或弄法买奸，宗强比周，欺凌孤弱，类皆鄙琐齷齪不足道也。我独见沪上富人叶氏，当初赤手自棹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万，又慷慨好义，清刻矜己诺，此犹是古之任侠而隐于商，且隐于富者也。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谿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毗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赠荣禄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主妇遇之无状，成忠慨

---

① 叶澄衷（1840—1899），浙江镇海人。原名成忠。年十四到上海，后以“驾舢舨往来浦江，供应外轮所需货物”成巨富。捐资得道员衔。曾办燮昌火柴厂，澄衷学堂等。

② 朱家、郭解：汉代侠客。

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宁饿死沟壑耶！遂辞去，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船麇集于沪渚，成忠自黎明至暮，棹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始设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初肆规甚微，然节饮食、忍嗜欲，与佣妇同苦乐，又能择人而任事，故数年间肆业日益远大，乃推广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火柴诸厂，以兴工业，且以养无数无业游民。既饶于货财，自奉一若平素，绝无豪富气象，若构洋楼、集珍物之类。遇人固肫肫，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诚，见显贵士大夫，言犹閤閤如也，毫无谄谀意。又好引重后辈，善体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乐为用。性好施予，无倦容，无德色，客外虽久，戚鄙有缓急厄困者，苟有请，罔不依助，待族人尤笃，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义庄，以贍族之贫苦无告者，附以义塾、牛痘局，葺事则曰，是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举，必力任其成。在沪北购大地，立蒙学堂，以教贫穷子弟，拨十万金充经费，又特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凡肆业中执事，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岁时存问，俾免饥寒。至各直省遇有水旱之灾，则必出巨资以助赈济。封疆大吏高其义，尝请于朝，屡邀宠锡，并传旨嘉奖。光绪己亥年十月，在沪病笃，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汝曹皆当厚待勿替，以继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赏戴花翎，荐升候选道，随带二级，赏加二品顶戴。余谓王者驭贵驭富之权操之自上，日渐凌夷，则不驯至一商贾之天下而不已也，悲乎！然世之贤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泽于苍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犹其次耳。故司马迁曰：无岩处

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云云。余谓辜部郎此作，乃讥世语，非谀墓之文也，故录之。

## 英将戈登事略

戈登，英国名将，名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生于乌利刺城，父为御军炮队大将，娶妇宴德庇氏，名以利撒毕，生四子，戈登为季。戈登之先出于巴克邑之名族，即今英国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戈登初在塘墩就学，年十四岁进乌利刺武备馆，十九岁授御军工营校。咸丰五年，英人伐俄罗斯，始从征至俄国，围西拔斯拖浦海口，在此昼夜守城濠督战，自咸丰五年春至城隐始罢，尝受微伤，先城南既陷，戈登即调赴梗盘寻，仍回西拔斯拖浦，城陷，令毁城中炮台船厂。英俄事平，从勘定俄突新界。咸丰十年，中外构衅，英人犯我顺天，戈登从英军陷京师，焚圆明园。事平，适中国粤匪乱。同治二年，江浙两省上游，在沪设洋枪队，将校皆用欧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领之，戈登遂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二年间凡三十三战，克复城邑无算。江浙为中土最富繁之地，数年经贼蹂躏，至是两省强寇始悉歼平，是役经时一十八月，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皆以为奇功，称戈登为当时名将。戈登谦逊曰：“平此乌合之贼，岂足称耶？但缓以时日，中国官兵亦可平贼也。然中国上官急奏肤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贼，不知此辈既以利应，反复无常，几将贻害中国，较土匪之祸尤烈耳。

鄙人得统此辈，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使为患。此则鄙人有微功于中国也。”当时苏州克复，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sup>①</sup>杀降贼，戈登不义之。中国赐戈登万金，戈登辞之曰：“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鄙人非卖剑客也。”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国游，橐索然如故，寻擢，补格列弗司恩海口军领工程队。居此六年，每于公余之暇，筹给贫乏，遇有疾病者施医药，民间流离无依小儿，皆为收养，教之读书，或荐至各船佣工，不使失所。先英俄诸国议开漯扭河，准各国商船出入，各派使守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任，简赴渤海勒卡利亚国，为漯扭河河口使。光绪元年，戈登应埃及王之聘，至苏丹。先是埃及国沿尼罗河南边近赤道之境，总名曰苏丹，皆沙漠荒野之地，然此域土地宽阔，极南近又寻得大湖数处，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谬往开辟，二年未竣事，辞职去。王聘戈登仍令往接办其事，戈登在此烟瘴绝域三年，竭力任其事，凡地理之险阻，天时之恶劣，以及土人之悍梗，皆以坚心毅志胜之，沿尼罗河一带皆设汛兵，又自埃及定造轮船，使上驶尼罗河，遇滩水浅，即将船折为数段，过滩后仍再合拢，于是苏丹南境大湖曰亚勒伯妮恩舍，始有轮船行走。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盖此域土人之强者，向劫掠人口贩鬻为奴，戈登至此即欲化其俗，禁贩奴事。然苏丹西境有二省，曰哥尔多番，曰达尔夫，此皆为贩奴者泽藪，两省不归戈登一人统辖，则贩奴之事，实不能禁绝，埃及王乃不授此两省。故于光绪二年，戈登遂辞职回国。光绪三年春，经埃及王再三重请，戈登乃复至埃及，授苏丹全境总督，凡北自尼罗河之第二滩，至南境之

<sup>①</sup> 指李鸿章。

大湖东；自红海至西境又特湖诸水发源之处，皆归戈登统辖。三年之间，遍巡诸地，居无定所，时或至东境与哑比西尼亚<sup>①</sup>国诸部，勘定疆界；时或轻骑减从，骤至西境达尔夫省，捕拿贩奴暴客，并以慑服部酋之倔强者。常竟月在骆驼背上，未尝解鞍。政令一出，志在必行，境内强暴虽多，沙漠烈日虽酷，皆不能稍抑其坚力锐志。又四出无常，土人视之犹鬼神，出没无所不至，故诸部蛮夷皆为震服。而苏丹境至此始有王法政令行焉。当时外人在埃及献说干预政事，王及大臣不能镇定，遂听外人游说，纷纷更改法制，以致政令朝出而暮改，于是戈登在苏丹觉事事掣肘，故于光绪六年<sup>②</sup>遂又解职回国。此年英国简命子爵黎本为印度经略大臣，黎本辟戈登为参军记室，同至印度，无几，戈登觉经略幕僚意见与己不能合，即请解任。适中国与俄国为伊犁事牴牾，中国海关总税司赫德径电请戈登至中国商量事件，戈登此行，英国政府因戈登系英国职官，干预中俄事，恐貽俄人口实，故电止戈登，令即时回国，戈登复电曰：“我至中国为排难而已，如朝廷因我系职官，恐貽口实，请悉除衔职，则万无误事。”戈登至北京，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力陈中国武备不修，战无策，不如迁就护大局。大臣问曰：“如事决裂，肯相助否？”对曰：“事如决裂，皇帝肯迁驾内地，鄙人当为中国效力任疆场事。”后事遂解。当时戈登行至天津，见中国北洋大臣李文忠，文忠对外人怨北京诸大臣主战误国事。有某国公使劝中国李文忠借戈登力，拥兵至京师黜诸大臣，废皇帝，自立为皇帝。戈登闻之叹曰：“鄙人虽一武夫，作事何肯鹵莽至

① 今译阿比西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

② 即1880年。

此耶！”戈登回国，是时英国阿尔兰<sup>①</sup>岛富豪世族兼并贫户，私敛重于公税，氓庶困穷，乱人充斥。戈登因往，遍历阿尔兰诸郡，目睹田畴荒芜，农夫冻饿，遂条陈变田租法，朝议不可。然所建白皆切时弊，后数年英廷竟改阿尔兰田租法，本戈登意也。戈登条陈多忤朝臣意，自知在朝必不得大用，适英属地毛里西亚岛统兵大将出缺，毛里西亚在印席洋大海中一孤岛也，英人置戍兵，英官畏远戍，皆不愿往，戈登遂自请往署焉。戈登官斯岛一年，军民称之。会阿非利加洲极南，有英属地曰岌朴（或曰好望角），英人建埠头，辟地利，英民与邻境番部时有争斗，官吏不善处置，各部遂叛。英国驻岌朴大臣因请英廷特派戈登往调停其事，戈登即由毛里西亚航海至岌朴，检察情由，即上书大臣曰：“番部之叛，皆由官吏不能约束本国人，使侵害番人，今拟先简严正之员，令其加意约束本国人，然后可以服番众，而保无虞也。”乃条陈处置法。然所议皆为大臣幕僚梗阻不行，戈登遂请解任回国。戈登既在闲散之列，请假往游犹太国。犹太，昔西人教主耶稣生育行教之地，多古名胜，戈登至此，感古今兴衰沧变之迹，遍历流览，一年始回国。是时，埃及国南境之地，自戈登去后，官吏贪酷虐民，各属回部皆叛，起杀官吏攻官兵，有大酋自称救世主，奉天命复回教，诛无道，埃及官兵竟被困于嘎墩<sup>②</sup>城，于是埃及王乃请于英廷，借一大将使救出困兵，英廷仍派戈登随带将校二员，至嘎墩时，城围尚未迫，戈登即欲率被围官兵出城，然城中避难官吏及家属老弱妇女万余人，戈登不忍弃之，故留守，先将妇女二千余人护送出

① 今译爱尔兰。

② 今译喀土穆。



境。逮及城围既重，英廷有电催戈登率部曲弃城，戈登复电曰：“军民为我抗贼守城，今事迫乃弃之，此岂丈夫之所为耶！”戈登在围已五阅月，外援已绝，粮食将尽，然犹从容督率军民拒守，于是英廷乃拨兵，合埃及官兵，溯尼罗河赴救，两月后救兵始至，然城已陷，戈登卒被害，时年五十三岁。丧耗至英国，官民皆哀伤之。英廷赐其家属十万金，并为铸铜像于都城，以志其忠烈云。

## 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光绪二十三年<sup>①</sup>岁次丁酉，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氏新一领其国战舰，来游长江，时余差次武昌省垣，蒙松枝君屈驾来访，余亦诣战舰答礼。遂即在汉皋邀集东客六七人，借西人酒市命酒，叙谈主客萍水相逢，欢若平生，余心感焉。余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因略识其沿革立国缘由。夫西洋近百年来风气盛开，讲智术，精造器，惟生齿日繁，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诸国因亦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兼以近来中国民俗苟安，士气不振，故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

<sup>①</sup> 即 1897 年。

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尝闻日本国人，近日既习西人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余私心窃疑焉。今得识松枝君，咨询底蕴，乃知其不然也。松枝原日本士族，幼年习西人兵略航船之术，然尤好中国文学，故能荷其国家重任。余于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余不能操东语，前日与松枝晤谈，用英语以酬对，未尽欲言，今聊书数语，以志景仰云尔。

## 士 说

张文襄曾问余曰：“外国各领事本文职，而佩刀何故？”余答曰：“此士服也。”西洋本以封建立国，一国之中有贵族，有平民。平民脱民籍后，武者为士，文者为史。其服制，史则宽衣博带，如今在中国牧师神父所服者是。士则短衣佩刀。领事虽文职，亦属士类，故遇大典礼，则短衣佩刀，服士服也。窃谓今日我中国有史而无士，考古制，通六书者为史，在行伍者为士，故有甲士、士卒之称。两汉、三国时，宰相犹以剑履上殿，为当时朝廷特赐异数，然于此见古制尚存，是时为士者亦尚知士之本义。自唐以后，古制渐泯，乃以能文章应科第者为士，于是名则为士，实则为史，士之本义全失矣。吾故曰：“今

日中国有史而无士”。

## 在德不在辫

近有英人名濮兰德者，曾充上海工部局书记官，后至北京，为银公司代表，著一书曰《江湖浪游》，所载皆琐屑，专用讥词，以揶揄我华人。内有一则曰《黼黻<sup>①</sup>为厉》，大致谓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抑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了，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如此等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事遇之便齟齬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齟齬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黼黻为之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日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失败，亟宜与中国商订新约，以后凡外务部及各省与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迥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于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云云。按如濮兰德以上所言，其貌

<sup>①</sup> 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此指清朝官服。

视我中国已极。然君子不以人废言，其言我中国黼黻衣冠，能使西人畏惧，虽系戏言，然亦未尝无至理寓乎其中。孔子不云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且尝揆之人情，凡遇人之异于己者，我不能窥其深浅，则有所猜忌，故敬心生焉，遇人之同于己者，我一望而悉其底蕴，则无所顾虑，故狎心生焉。今人有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袞袞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畏敬心乎，抑生狎侮心乎？

## 自大

光绪十年，日本名下士冈千仞振衣氏来游中国，曾撰《观光纪游》一书，内载其友人樱泉氏论中国弊风一则，谓樱泉游学中土，其论弊风极为的切。曰所贵于中土士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孜孜治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讲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白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之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竟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

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妆貌銜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怜，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由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米<sup>①</sup>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云云。此日人樱泉二十年前语也。犹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畲，撰《瀛环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貶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孔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所谓廉者无他，但知责己，而不责人；但求诸己，不求诸人而已。

## 依样葫芦

子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注谓：“学之为言效也。”余窃谓，学之义甚广，不当作效字解。如仅作效字解，使后之为学者，只求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所谓依样画葫芦者是也。犹忆中国乾嘉间，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当时又无西人为衣匠者，无已，招华成衣至，问：“汝能制西式衣否？”成

<sup>①</sup> 米：今译“美”。

衣曰：“有样式即可以代办。”西人检旧衣付之，成衣领去，越数日，将新制衣送来，西人展视，剪制一切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复又补缀一块，西人骇然问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雇之成衣又何以异与？噫！

## 学 术

宋陆象山云：“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讲明有所未至，材质之卓异，践行之纯笃，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从容而然，可以谓之圣矣。而孟子顾有所不愿学，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径径之必为，而傲知学之士哉！然必一

意笃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云云。余谓宋代学者，偏在践履，而不知讲明，故当日象山乃有此论。今之学者，不特不知讲明，而亦并不知士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国无实业为急务，遂至经生学士负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将毕生精神注意于此，顾名思义，尚得谓读书人邪！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 风 俗

管异之拟言风俗书云：“臣闻之，天下之风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为野；殷人尚敬，其敝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胜而人逐末。三代已然，况后世乎？虽然，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陈俗之所以日颓也。而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日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谓不然。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远不可言，臣请以汉论之。昔者汉承秦敝，其为俗也，贪利而冒耻，贾谊所云孳孳嗜利，同于禽兽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贾人，重禁赃吏，遂不久而西汉之治成。其后中更莽祸，其为俗也，又重死而轻节，逮光武重

敬大臣，礼貌高士，以万乘而亲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为东汉之治。由是言之，移风易俗，所行不过一二端，而其势遂可以化天下不为难也。”云云。我朝咸同以前，科场弊窦百出，买枪手，通关节，明目张胆，习为故常。及咸丰初年，某案出，朝廷震怒，将当朝宰相柏俊治以重典，天下悚然，由此科场舞弊之风少减。可见风俗之转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肃纲纪，实行不过一二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

## 政 体

国朝潘耒<sup>①</sup>上某学士书云：“某闻善为治者，不务为求治之名，而贵有致治之实。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后儒亦言有治人无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为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假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鞅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则必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

<sup>①</sup> 潘耒（1646-1708），清初学者，对经史、历算诸学皆有研究。



行禁止，中外肅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无以驱策而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之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万民，纪纲肃而民生安矣。”云云。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昔宋苏轼当哲宗初年，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兹姑撮录前篇为正本清源之论，倘有医国手出，或有取于此，庶不无小补。”云尔。

## 看招牌

昔有一洋行主人作军装生意者，尝与中国官场酬应，不时宴请各省委员，以为招徕。每宴会饭罢，出雪茄烟供客，概用上品，价值不贗。而华客每每食未半，辄轻掷之。行主人性素齐且黠，以后宴客即暗易以最劣品之烟，而袭以最上品之烟盒。

一日有某省办军装之道员，素自名为熟悉洋务者，至该洋行主人家晚膳，食罢，主人出烟供客，道员睇其所装之盒，讶然曰：“噢，我知此品一盒当值十洋。”即抽取一枝，含嚼之，喷其烟，扬扬自夸曰：“吾说十洋味道，果不错。”主人惟掩口胡卢。噫！西商在中国售洋货，最重招牌，凡有仿冒其招牌者，必请官惩办。盖知中国人不论货之优劣，而但看招牌耳。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盖有以夫！

## 爱才

国朝沈归愚<sup>①</sup>尚书有曰：“昔欧阳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于道，不惮数千里求之，甚至过于士之求公，良以国家得一人则转相汲引，至于数世犹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笃。”犹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士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立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学生，即今日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余记此非特借以著官场炎凉之世态，亦以志文襄之知人爱才，真有大臣

<sup>①</sup> 即清著名诗人沈德潜，号归愚。曾任礼部尚书。

风度也！

## 不自贵重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赵宣子囚叔向，乐王鲋欲为之请，叔向弗应。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处变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经国远识，更不可及。鲋，小人也，小人不可与作缘久矣。况受其脱囚之惠乎，受其惠而与之异，彼必有辞，徇其所欲，又将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阶之。叔向宁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为所制，大臣之识也。”余谓“小人不可与作缘”一语，最有关系。昔柳子厚因附和王叔文党，身名坐隳，遗恨千古。韩文公谓子厚少年时不自贵重，顾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夫以子厚之品之学，一不自贵重，卒不能自展其才，以裨世用，至如今日以夤缘奔竞为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尚望其挽回大局，宏济时艰，得乎！

## 不拜客

唐李习之<sup>①</sup>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凡贤人奇士，皆自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其贤，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勿尽其才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才，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行，而常人日来矣。况其待常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丁未年，余随张文襄入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今入都，已拜客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意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

<sup>①</sup> 即李翱（772—841），字习之，唐代散文家。

## 自强不息

“唐棣之华，翩其翻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余谓此章，即道不远人之义。辜鸿铭部郎曾译德国名哲俄特<sup>①</sup>《自强不息箴》，其文曰：“不趋不停，譬如星辰，进德修业，力行近仁。”卓彼西哲，其名俄特，异途同归，中西一辙。勸哉训辞，自强不息。可见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

## 犹 龙

孔子适周，将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余谓虞舜，圣人也，而大禹犹戒之曰：“无若丹朱傲。”孔子圣人也，而老聃亦戒之若此。谁谓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纯粹之圣学者，非受老子此一番之告诫也耶！

---

<sup>①</sup> 今译歌德。

## 附录

### 挽张之洞联<sup>①</sup>

邪说诬民，孙卿子<sup>②</sup> 劝学崇儒以保名教，  
中原多故，武乡侯鞠躬尽瘁独矢孤忠。

——外务部员外郎辜鸿铭

---

① 录自《张文襄荣哀录》。

② 孙卿子：即荀子，名况，字卿，汉人避宣帝讳，称孙卿。曾著有《劝学》。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以张之洞比荀卿，认为他为学讲道“未脱功利之念”，不免“大醇小疵”。



## 关于时局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sup>①</sup>

先生：

正好两个星期以前，你允许我在你的专栏里讨论的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到来了，它来得无论是比你还是比我料想的都要快。当这场我所预见的流血革命不幸来临之际，我想我有责任向外国人更充分、更清晰地解释目前事态的准确情形，以便他们不致于惊慌失措。我首先请外国人相信的是，他们对目前的局势完全不必持悲观态度。尽管形势严峻，但却并没有绝望，甚至于还大有希望。对于目前的局势，我想要说的是，它是新中国诞生之时的最后阵痛。

### 腐败还是无能？

那些把目前这场暴乱与太平天国叛乱相提并论的人，实在是胡说八道，它只能表明这些人完全不配评论眼下的局势。太平天国叛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目的是要捣毁那腐败堕落的社会秩序。用卡莱尔的话来说，它是处在社会底层的百万众生对于那养尊处优集团的奢侈浪费和轻浮无聊的反抗。太平天国叛

---

<sup>①</sup> 此信刊载于1911年10月24日的《字林西报》上。



乱之前，中国的养尊处优集团是满洲贵族。他们在苏州和杭州这样的城市里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但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前像满洲贵族那样的养尊处优集团了。现在的满人，作为一个阶级，甚至于比我们汉人还要穷。至于说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中国人，中国的官僚阶级也比上海的买办阶级要穷，其中有些人的经济状况，还不如在华外国人家中的仆人。昏愤糊涂的英国佬奢谈达官贵人的贪污是中国目前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让我来告诉有头脑的英国人，现在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不在于官员的贪污腐化，而在于他们的无能。那些在中国各地听到或看到勒索现象，到处谈论中国官员贪污腐化的人们忘记了，这些可怜的官员也必须要活命，而在目前的体制下，或好或坏，一个官员总得需要一点勒索，否则便无法生存。事实上，自从李鸿章去世和他的寡头政治集团覆灭之后，那种肆无忌惮的恶劣的贪污腐化现象在中国已经极为少见。在一个国家里，高等阶级中存在腐败现象的标志和证据是奢侈浪费和轻浮无聊。然而正如谁都可以看到的，今日中国奢侈浪费和轻浮无聊的现象非常之少。我们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腐败、轻浮无聊和奢侈浪费的高官是端方阁下，中国士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债帅”。总之，在现在中国，恐怕除了上海按摩公司总监和股票经纪人这些在模范租界开着汽车横冲直撞、对贫困而辛苦的劳工市民的身体和生命造成威胁的人之外，不存在我所知道的可以称之为养尊处优集团和贵族的阶级。

一句话，太平天国叛乱像法国革命一样，是一场社会革命，它意味着机体器官本身出了毛病，而目前的这场暴乱则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只意味着一种器官功能的失调而已。

## 暴乱不是革命

因此，我认为，将目前这场暴乱与太平天国叛乱相提并论简直是胡说八道！把法兰西法院的法官对路易十六的那个著名的回答颠倒过来，用于评价目前这场暴动，我以为再合适不过：“Ce n'est pas une révolution, c'est un révolte”（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暴乱）。

事实上，反朝廷只是目前这场暴乱的表象。它实在不过是一场反对或反抗对于本民族的自然和自由发展构成阻碍的某个寡头政治集团的斗争而已。我们可以将其视作日本历史上的萨摩藩叛乱。当日本民族投身于开化或现代化事业的时候，他们首先遇到的障碍物就是东京的幕府。在幕府寡头政治集团被摧毁之后，日本民族才得以真正行动起来。但那些从幕府寡头政治集团手中接管国家事务的人，又开始形成另一个小寡头政治集团。这第二个寡头政治集团，在日本被称之为大久保寡头政治集团。目前的盛宣怀寡头政治集团，就是日本的这第二个大久保寡头集团在中国的翻板。正是为了反抗大久保寡头政治集团，日本爆发了已故西乡隆盛侯爵领导下的萨摩藩叛乱。因此，目前武昌爆发的这场暴乱，可以说是日本萨摩藩叛乱在中国的翻板。日本的萨摩藩叛乱作为一场叛乱是失败了，但它却成功地摧毁了大久保寡头政治集团，因而做了一件好事。

目前的武昌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来说也将要失败，但是它将、至少我真诚地希望它将摧毁盛宣怀寡头政治集团。正如在萨摩藩叛乱之后现代日本诞生了一样，在这次武昌革命之后，我们

也将迎来新中国真正的开端。因此我在这封信的开头说，目前这种极为严峻的形势，是新中国诞生的最后阵痛。

### 一个巨大的危险

不过，在目前这种紧要关头，却存在一个巨大的危险，这个唯一的危险就是：某些勾心斗角的外国列强对于中国不明智地加以干涉。我见过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说，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汉口和汉阳地区广泛存在的日本人财产，正考虑对中国乘机采取某些行动。我真诚地希望这不是真的。我要指出的是，即便汉口地区的整个外国租界、连同租界内所有的外国财产都遭到破坏，其损失仍然是可以弥补的：它实在无法与外国列强的干涉所必然带来的那种可怕后果相比。外国对于保皇者的任何帮助，除了会大大地降低现政府的威望之外，还会激生强烈的排外情绪。目前这场暴乱，我以为是全民族对于现政府的谏劝或抗议。任何外国帮助现政府强制镇压这种民族的谏劝，都会因此激生一种比上次义和团事变还要大还要严重的排外暴动。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治家有足够的远见和政治家的风度，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才好，这种行动即便不会使事态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起码也会使其变得极端困难。

### 失败的必然

在做结论之前，我想在此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反朝廷只

是目前这场暴乱的表象，同时又为什么认为它作为一场革命不会成功。

我之所以说反朝廷只是目前这场革命的表象，是因为，中国最近这场以武昌革命为顶点的骚乱和暴动，乃是本民族渴求充分和自由发展的民族愿望之强烈而激愤的表达。革命者憎恨满人，因为他们认为满人妨碍了这种发展。然而满人并不是真正的障碍。真正的障碍是治体（国家）<sup>①</sup> 缺乏活力，和当权者们的无能。除此之外，在治体内已经发展起来的寡头政治集团所形成的障碍，突然造成了血液循环的中断，从而导致了一根血管在武昌的爆裂。但满人并不是造成这一障碍的原因，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集团才是导致这一障碍的真正原因。因此，我认为反朝廷只是这场革命的表象。

另外，我所以认为目前这场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来说会以失败告终，是因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乃是一个在革命中永远要失败的阶层。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属于众所周知的“革命党”，外国人称之为“Revolutionary Party”。但这个“革命党”，在欧洲应被称之为雅各宾党。从法国革命和其他革命的经验来看，雅各宾派从来都没有过好结果。雅各宾主义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爱国主义。它好比是民族中的健康血液因为治体内的某些障碍而引发了炎症。这种障碍，便是寡头政治集团，它就像人体内的脓液和腐烂之物一样，妨碍了健康血液的自由循环，从而导致了炎症和腐烂。雅各宾主义，那种民族中已发炎的或炎性的血液，对于推倒和驱除本民族的脓液和腐烂之物——寡头政府集团是有用的和必要的。然而一旦雅各宾主义，或者说那发炎变

<sup>①</sup> 辜鸿铭使用的是“Body Politic”，即治体，即国家。

质的血液完成它的任务之后，就不得被摧毁——至少，其中那已经过于腐烂和有害的部分必须被消灭。拿破仑用他的葡萄弹轻而易举地就扑灭了法国的雅各宾主义，使得法兰西内部那已经腐烂变质的、有毒血液的最后废物得到了清除。

### 文人学士的名誉

中国的雅各宾党已经掌握了一支新中国的孩儿军 (Baby Army)，并利用它来推进自己的事业。事实上，新中国的孩儿军现正经历着战火的考验。然而这还不是目前局势真正严重的危险所在。目前，真正的危险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中国的文人学士，此时此刻给予了武昌的雅各宾党以道义上的支持。这里，我可以指出，在我上海的文人学士朋友中，我恐怕是现在唯一一个仍然绝对效忠于朝廷的中国人了。

然而，反对文人学士的不忠行为，中国人有一个防卫武器，那就是孔子学说——孔子学说中的忠诚之教。对于一个有教养的真正的中国人来说，要其公然举手反对皇帝，绝对背叛他头脑中那三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思想，就好比在欧洲人中，要一个男人举手反对一个妇女一样。这就是中国绅士的名誉所在，如果必要，他一定会为此名誉去死，否则就会变成一个恶棍。外国人出于无知，喜欢上海报馆的那些误入歧途的中国人，那些受到传授利益和野心之教的“新学”的毒害，不懂得忠诚之教——那名誉与责任之教意味着什么的中国人。因此，这些外国人现在轻浮地谈论着满人的厄运。

中国绅士们的此种名誉感或忠诚之教，最近受到了巨大的

伤害，因为盛宣怀及其同党的方法，也就是你们所赞赏的那种方法，蹂躏和损害了公众舆论，并使整个的文人学士阶层弃之而去。所以这个时刻，他们对于武昌的雅各宾党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不过，现在政府悬崖勒马、补偿这种损害，为时还不是太晚。一旦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对付盛宣怀及其同党，为那种曾有过的伤害做出补偿，以求得文人学士的谅解，那么它就能重新赢回文人学士们在道义上的支持。而雅各宾党一旦失去文人学士的道义支持，就会一事无成。他们最终将与其怀抱中的那些毫无战斗力的新中国孩儿军们一道，被袁世凯的葡萄弹不费吹灰之力地打得烟消云散。

### 一句出自戈登的话

最后，让我再引用一个英国伟人、曾在中国呆过的戈登将军的话来结束全文。这句话，此时此刻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应铭记在心。戈登将军说：“当我们必须在东方冥行索途之时，最好的道路就是按公正行事。”我认为对于外国人来说，目前情况下所应做的正当之事就是：严守中立，别妨碍中国政府自由行动。一句话，让中国人独立自主，照管好在华外人的良治秩序，使其循规蹈矩。作为为数很少的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中的一员，我愿意负责任地代表我多灾多难的同胞，请求在华外国公众中的最好之人，那些仍然相信名誉和责任之教的人，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也以这种名誉和责任之教来约束个人的行为，在这种困难的时刻，像戈登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们当做的事情。总而言之，如果外国人按公正行事，我们现在

就会赢来一个新的中国。Ab integro saeculorum nascitur ordo!  
(世纪的秩序将重新奠定!)

就谈这么多。

辜鸿铭

上海，10月21日

又及：在这里，我大胆地提出一个建议，在目前这样的危急时刻，我以为滞留上海的外国人应当通过某些有组织的手段，不仅获悉那些新闻报刊所提供的有关当前事件的信息，而且了解中国知识阶层的有关感情与观点。为此，那些有教养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是否可以成立一个“观察委员会”(Watch Committee)，以相互交换关于中国目前正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呢？在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工作中，不说别的，单就其抑制和消除那些毫无根据的有害谣言一点而言，就是极有价值的。不过，这样一个委员会在选择其成员的时候，应当非常慎重才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名人，在上海的某些中国人，那些对中国真实状况的了解程度与洋行苦力不相上下的人，必须被严格地排除委员会在外。为了说明我所谓的中国官员的无能，在此，我可以指出，如果我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能干而称职的上海道台，那么我的这个建议也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他不仅早已主动地成立了这样一个委员会，而且还会成立另一个救济委员会，以帮助那些来自长江各口岸的可怜的难民们。

辜鸿铭

# 呐 喊

辜鸿铭硕士对大战及其他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此书 1920 年在莱比锡由“新思想出版社”出版。扉页上以拉丁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引录了这样一句名言：“为什么英雄在怒吼？为什么人民的言论如此徒劳？”

## 译者前言

我们翻译和出版辜鸿铭在欧洲至今还不为人所知的名为《呐喊》的论文集,出于两点想法。一方面,在德国人民处于今日的孤立之时,它无疑是一种安慰和某种程度的辩解。尽管他是我们“敌对一方的外国人”<sup>①</sup>,可是人们从中却可以获知,这位极其著名的学者是如何不带偏见、富有正义感而又真正通情达理地分析这场世界大战的原因的。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场战争的后果,不仅意味着可怕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和道德的极大灾难,而且它还致使其他民族长期以来对我们所显示的仇恨在不断增长,对我们的误解在不断加深,以致都到了无以复加和荒唐的地步。另一方面,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把这位中国智者质朴而又伟大的思想进一步介绍给我们德国人。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人,一个还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人。这个人,他对西方文化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了解;这个人,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然而他的独立的明确的精神却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不仅自己保持其固有的

<sup>①</sup> 1917年,段祺瑞军阀政府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对德作战,故有此称。

特征,而且还认识到,脚踏实地地立足于自己古老、可靠的文化基础,不要去生搬硬套只适用于另外一种社会状况的西方文化,这对于东方居民的自我生存是极为必要的。在他看来,现代西方文化的物质文明对他的民族只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有害东西。在这里应指出,辜鸿铭先生已有两本书被译成德文,一本优秀的书名为《中国反对欧洲思想的辩护》(此书的德文翻译极为出色,由欧根·狄得利希斯出版社在耶拿出版);另外一本书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及其战争的出路》(同上)。在本书里,辜鸿铭先生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告诉我们从现在令人沮丧的情况下走出来的出路,并建议欧洲人民为挽救文明应建立一种新的“忠诚之教”,就像中国人在“良民宗教”中所拥有的。由此出发,他认为西方和欧洲文化已经失败了,这种文化同宗教和国家生活不健康地两相分离,致使人们那脱离实际的内在生活与缺乏思想的外在生活陷入严重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之中,并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观主义。其结果,就是对一切高尚文化具有严重损害的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形成。——这一切必须抛弃,只有向中国人学习,才能做得更好些。

诚然,如果毫无选择地吸收中国文化,对于我们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对此,我们精神和灵魂上都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对历经千年固有发展的民族自然是不现实的。而且,适用一个民族的东西也并不一定对所有的民族都适用。对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是正确的东西,我们未必就可以不加选择地接受或一概拒之门外。中国文化中确实有许多我们事实上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中国人一贯善于完成他们的公民义务,习惯于对自己内部事务的管理和提出处理外部事务的方策,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首先可以学习中国人极其聪明、有高度教

养、明智而又人道的优良品格。辜鸿铭就是以此来分析世界局势和最近发生的使我们陷入深渊的事件，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事件直到今天我们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警醒。中华民族受益于博大精深的孔夫子学说已经两千多年之久。深刻地理解它，一方面可以吸收那些对西方文化有益的和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对导致世界灾难的西方文化的弱点视而不见。精研孔学的辜鸿铭先生在本集中，给我们指明了改变这个令人沮丧的状况极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已经从这位中国人那里，从北京的这位贫穷的大学教师和作家身上学习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他鄙弃一切高官厚禄，只为科学研究、信仰自由而生，在受压制的大多数愚昧无知的芸芸众生中以“极少数”自处，特立独行，但毫不畏惧，现在他仍然在一如既往地在为真理、正义和人道而斗争。

如果中国人听从了辜鸿铭以及中国真正而真诚的朋友英国的戈登将军、那位辜氏称之为“中国人”的戈登的建议，即当他们在寻找摆脱混乱和通向幸福平安的道路时，按照公平和正义行动，那该多好啊！如果我们耐心倾听这位欧洲尤其是德国人民的真正的和正直的朋友，这位“欧洲人”辜鸿铭从遥远的东方奉送给我们的建议，我们也会做得更好。让我们来认真地检验一下辜鸿铭先生给我们指出的这条道路，是否是拯救我们于目前困境的道路？是否是引导我们通向幸福平安的唯一道路？

我们的大部分报刊都是不可信赖的、可以贿赂的、放肆的和阴险的。它不是向人民进行宣教，而只是要么供人们消遣解闷，要么对人们进行欺骗。因此，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位中国人身上学习到什么是报刊的真正任务，报刊怎样才能成为人民的福音，我们的教师、牧师、军人以及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们应

力图抛弃“强权就是真理”的准则，因为从我们的敌人施强权于我们的方式中，可以看到这种准则会导向何方。我们能够从这位中国人的身上学习到，只有公平和正义之路才是通向我们的目的的唯一道路，可我们的大多数牧师却违背了基督教的博爱的信条，而是宣讲对敌人的仇恨，因为他们并不懂得何为真正的基督教，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位中国人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是基督教的本质。我们的那些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应关心寄托着我们未来希望的青年人的思想和灵魂，可他们却把青年人的脑子里塞满了混乱的无用的妨碍自由自在的无聊琐事，他们根本不考虑对其学生的品格培养问题，或至少不把他们的学生培养成书虫、商人或呆板的工人，而应把其学生培养成自由的、坚强的、诚实向上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位中国人身上学习到，什么是教育工作者固有的崇高的义务以及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向这位中国人学习，由此，我们可以首先弄清一些根本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观才能成为确定的、经受住生活各种风浪考验的世界观，从这种世界观出发，我们才能认识和理解生活的真谛，然后，我们就会豁然开朗，睁大双眼，对古老的宗教、教育、民主、祖国、自由、荣誉和人道概念，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充满极其强烈、极其纯洁的渴望，并使之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从而为我们德国人民的生活塑造出美好幸福的未来。

Introite, nam et hic Dii Sunt!

你们进去吧，因为这里也有天神！

亨利希·奈尔逊

1920年7月 于柏林西区

## 辜鸿铭自序

“目前，当毫无理智的人在叫嚷，冷酷无情的人掌握着统治权，所有的社会公理和一切预防措施因某些人的混乱宣传和鼓动而被毁掉时，聪明人大多沉默无言，明哲保身。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流氓都在觊觎权力，每个傻瓜都在觊觎荣誉，每个骗子都在觊觎钱财。”

正好三十年前，罗斯金先生写下了上述这段话。

在今日的世界，在这个毫无理智的人在叫嚷以及冷酷无情的人掌握着统治权的世界里，我通过文字来感化人，能期望得到什么呢？我想这么做，起码能满足我的一些私人朋友和学生们的愿望，他们经常向我索取在不同时期我发表过的文章，因此，现在我把这些平时所写的东西汇集成册公开发表。

生活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谈起那个混乱的世界时说过：“世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正直而又充满智慧的年轻人，而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人发现了什么是甜美的、能大大造福于人类的美德和智慧。除此之外，他们还清楚地看到了许多人的愚昧本性，并且认识到，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公共事务中理智地处理问题，也没有发现为捍卫正义事业而战的盟友，这时，他们该怎么办呢？”

柏拉图接着说：“人们也许可以把他们和一个误入兽群的人相比，这个人与野兽们本性不容，他想与它们抗争，但却太无能为力，在他试图向同类或朋友有所表示之前，就要被击垮并

无谓地消失。如果他考虑到这一切，便会下决心保持镇静，正视自身的处境，就像一个人面临台风或飓风威胁时，躲入围墙寻求保护一样。假若他只是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就得忍受周围非常糟糕的一切。要是死期临近，他便能完全将快乐、善良的意识同纯洁的希望区分开来。”

辜鸿铭

1917年8月28日 于北京

## 一、基督教会与战争

在《新约·雅各布书》第四章第一节中，圣·雅各布这位基督使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之间的争端与战争，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一定想知道，如果现在人们向欧洲的基督教会及其信徒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回答？几天前，在《京报》的一篇文章<sup>①</sup>里，英国神学家再次对战争的起因作了解释，如果人们拿这种解释和著名的德意志神学家哈纳克(Harnack)对此种解释作出答复的书信加以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欧洲基督教会的信徒们的回答非常有意思而又令人困惑。英国神学家们在他们的解释中，指责德意志违反中立、破坏民权，因而应对战争之过最终承担责任。而德意志神学家在他的反击中，则抱怨大不列颠是人类文明的叛逆。基督使徒雅各布在上面曾提到的他的使徒书中说：“不要互相诋毁，亲爱的兄弟。谁诋毁他的兄弟、评断他的兄弟，谁就在诋毁法律和评断法律。你若评断法律，你就不是遵循法律而是评判员了。”既然这些英德两国的基督教会的信徒们都以评判员自居，并且作为评判员，可以毫无顾忌地咒骂每一个曾武装侵犯过自己祖国的国家。这些虚伪的人，这些和平福音和救世主的信徒们竟然

<sup>①</sup> 此文发表在1914年11月的《京报》(Peking Gazette)上。——原注



会如此表演。他们不去劝戒人们应相互宽容，不打算以好言抚平曾引起可怕战争的人们的欲望与狂热冲动，使之得以平息与化解，而是为了各自国家的私利而无休止地指责对方，这种做法即使对于不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也必定不以为然。

儒家的经典《大学》（理雅各博士在他的译著中将其译为《伟大的学问》）里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么，到底什么是引起今日战争的真正原因呢？导致今日战争的真正动机何在？正像我们所看到的，英国的神学家们说，真正的原因是德意志玷污了全世界人民的美好信仰。同时，英国的新闻界也大肆鼓吹其原因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德意志的神学家及报界则反击说，战争的原因是英国人的诡计与俄罗斯民族的好斗性。如果人们对这一问题以及人类从事某种活动的动机予以深究，就不会不看到，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既不像英国神学家及新闻界所说的那样，也不像德意志神学家及报界所宣称的那样。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位基督使徒说：“你们之间的争端与战争，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不是从你们肉体中躁动的欲望来的吗？你们贪婪，却一无所获；你们仇恨、嫉妒，也全无所得；你们挑起争端，你们发动战争，却同样竹篮打水一场空。或者你们想，经上所说尽是徒然：你们肉体中的灵魂充满渴望与躁动。”

如果人们深入探究人类从事某种活动的行为动机，就不难发现，引发欧洲当前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在于那些完全失去自我克制的欧洲人所具有的狂热冲动及其自私的本性。战争的原因是深藏我们肉体中的灵魂，这个“灵魂充满渴望与躁动”。这个灵魂使我们绝不容忍他人比自己境况稍好，绝不容

忍其他民族比自己强大、富有和成功<sup>①</sup>。换言之，战争的真正原因是欧洲人民可怕的精神状态。那么谁应对欧洲民众的精神状态负责呢？至少在官方看来，基督教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由此人们也许会问基督教会及其信徒，面对当今在欧洲已经发生的令人异常担心的局面，你们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呢？

现在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基督教已经崩溃了。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不过，如果说基督教没有崩溃，那么，根据当今欧洲的精神状况来看，基督教会在今天的确已经崩溃了。事实上，托尔斯泰早就指出，为了拯救基督教，消灭基督教会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我难以深究基督教会究竟由于何种原因造成了今日的崩溃。我们曾听到弗劳德在谈论现代英国的基督教会时说过：“我在英国听过上百次的布道，听过许多关于宗教信仰秘密的阐述，关于神职人员神圣的传教，关于基督使徒的继任，关于主教和辩护，关于金玉之言、灵感以及基督教仪式作用的说教。可是，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从没讲过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正直诚实的品质，还有那些简单的戒条：‘不要撒谎’、‘不要偷盗’。”

宗教教育虽然不属于现代报纸的职能，但是今天我们想使它暂且离开自己的岗位承担一下此种职能。我们想很不客气地再次从基督教的圣书上引用下面一段话，我们认为，这段话对于我们的许多外国读者，即对到中国来做生意赚钱的人会大有

---

<sup>①</sup> 罗斯金说：“在今日欧洲，一切战争及不同国家所以要进行军备，其第一位的原因是，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大多数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都是些小偷，时刻都梦想拥有同类的财富、土地和名誉。”——原注

裨益。这段话就出自我在前面几次提到过的那同一位基督使徒之口，他说：“立法者只有一位，它能使人升入天堂也能使人下到地狱。你是谁，竟敢评断别人？嗜，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上一年，做生意赚钱。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要不了多久，就要化归乌有。对此你们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活着，并愿意做这事或那事，但现在你们竟拚命自夸。所有这些自夸都是邪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过。”

我曾大胆地断言过，在我看来基督教会在今日已经崩溃。我这一断言的根据是，基督教会及其信徒们至今似乎并未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关于这一点，我只指明下述事实就足够了：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无论过去或是现在，他们就不会考虑什么比利时的中立立场，坚持什么全世界人民的美好信仰，又提出什么英国人的诡计或俄罗斯民族的好斗性等诸如此类的观点，而会集中注意力，或至少应向那些对他们的领导表示钦佩的全体信徒们传授什么才是他们宗教真正的精髓。那么，无论从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呢？“在我们的天父上帝面前，那种纯洁不受玷污的虔诚，”基督使徒雅各布说：“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母。它也会保持自己的纯洁而不受尘世的污染。”我们哪怕承担风险，也要把基督教会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上面来，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才是基督教，这才是积极的真正的基督教，这才是基督使徒所理解的“行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过。一个基督教会，如果不知道行善或不去行善，纵使它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也算不上是一个基督教会。

## 二、现代教育与战争

当我最近在写《基督教会与战争》时，我曾说过，目前欧洲战争的真正原因，应当追溯到欧洲人民所拥有的可怕的精神状态。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对民众的精神面貌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欧洲的基督教会已经失败了。

基督教会的行动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看样子主要原因是，正像弗劳德所说的，基督教会教给人民的东西，都是人民不需要的；它没有教的东西，倒是人民需要的。那么，基督教会都教了些什么呢？他们教神学，教名之为宗教的教义。但是人民需要的又是什么呢？人民需要的是教育。基督教会显然不能做到这一点，结果是建立了为人民提供教育需要的机构。在这一需要推动下，在现代欧洲，被人们称之为学校的机构，即拥有现代教育的学校得到了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现在在欧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里出现了教堂和学校、宗教和教育分道扬镳的局面。这种区别，即宗教和教育的非自然的分离，实际上成为今天欧洲民众精神上混乱状态的根源。

而中国则不同。在此我想指出，中国文明中最具特性的一点就是，教育宗教与宗教教育不是截然分开的。中国的“教”字指的是授课、教育，同时也是宗教的名称。换言之，在中国，学校即教堂，教堂即学校。可是在欧洲，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宗

教是宗教，教育是教育，教堂是教堂，学校是学校。事实上，对于教育与宗教的非自然分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就我所知，大不列颠的法律今天甚至连在国家资助的学校里阅读基督教圣经也禁止。法国人走得更远。在公学里，国家不但禁止讲授基督教，而且为了自己的需要，在公学里甚至又创造了一种名之曰“伦理”教的新宗教。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基督教对人民的精神面貌负有根本责任，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里，事实上学校已承担了这种责任。如果基督教会在教义或名义上还对此负有责任，鉴于欧洲民众可怕的精神面貌，就像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的那样——不仅仅在真正的战场上残暴，而且在新闻界也同样可憎——理应受到谴责。如果基督教会因此而受到谴责，那么我们对学校、对现代的学校，对今天欧洲的教育又能说些什么呢？

罗斯金说：“现代普通教育过程的唯一结果是，导致了人们对其人生至关重要问题的所有可能的错误观点。”这是真的吗？让我们来考查一下。比如拿我们目前对战争的看法来说，现代教育对战争都讲了些什么？现代教育指出了战争的严肃性和可怕性了吗？没有。就笔者所知，所有的现代学校都教导战争的伟大与光荣。那么，战争和争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正义？为了荣誉？非也。现代教育指出：“战争为了利益。”<sup>①</sup>若进一步提问，战争与争端为了何人？“战争与争端为了祖国。”现代教育就是这种腔调。那么，如果自己的祖国是非正义的呢？现代教育则回答说：“管它呢！乌啦！我们的祖国！”事实上，根据现代教育学说的要求，我们的义务也许是，如果我们的祖国在

<sup>①</sup> 参阅爱德华先生——现代格甯子爵在战争开始时的演说。 原注

任何时候以强权参战，我们都必须为反对战争而战<sup>①</sup>。

“爱国主义”这个字眼把我们引向了宗教，也就是在现代学校里所教授的爱国主义的宗教。这种宗教在欧洲许多国家中已排挤了基督教。现代学校、现代教育对爱国主义都传授了些什么呢？现代教育教导说，爱国主义意味着，作为一个好的国家的好公民，每个人应完成自己的义务，应对自己的国王或皇帝效忠，应遵守法律，应按照自己的能力而不超出自己的可能生活，应偿还债务，应成为父母的孝子，应洁身自好，应早成家立业。根据善良的牧师在哥尔德斯密茨的“维卡”教区指出的爱国主义的第一条义务，是要成为好丈夫，好父亲，应急亲属之所急，想亲朋之所想，对朋友要忠信，如果他们需要就帮助他们。可从现代教育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便是爱国主义的全部吗？不是的。现代教育指出，爱国主义——在此不妨引用约翰·布若特的话说，是指“人们应对政治怀有所谓值得赞赏的兴趣。”事实上，根据这一观点，爱国主义不过是指为选举权呐喊，为本国政府鼓舌。现代教育还指出，当某人在异国他乡逗留时，爱国主义并非意味着要通过自己的个性、正直与良好风度来维护祖国的声望，而是，如果可能的话在任何情况下以体面的方式，攫取利益，为本国人民争取贸易及别的特权。现代教育最后还指出，爱国主义就是摇旗呐喊，抓住任何机会，高举火把参加游行。事实上，爱国主义就是不论你到什么地方都要高举祖国的大旗。简而言之，从现代教育的意义上讲，就是高扬祖国的大旗，大谈热爱与赞美本民族人民。基督教的经典中说：

<sup>①</sup> 参阅现代日本关于爱国主义的学生课本。人们会发现，这里引的这些话的每个字句都是真实的。——原注

“人类的主要任务就是热爱上帝。”可是在现代学校中，爱国主义的新宗教取代了基督教及其它旧宗教的体系，其经典中云：“人类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英国人，为大英帝国；为日耳曼人，为德意志帝国，为日本人，为大日本帝国；为现代中国人，为光荣而伟大的中华民国大唱赞歌。”

也许许多人会说，这种描述有言过其实之嫌，或认为它不过是一幅现代教育的漫画。可是我坚信，任何人也无可怀疑，人们赋予了“战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概念过多的错误理解，也因此挑起了欧洲可怕的现在要进行到底的战争，通过学校的现代教育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所谓的“战争精神”、并将此作为“爱国主义”的内涵。世人皆知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一种危险，可巴顿·鲍威尔的童子军运动就不是军国主义了吗？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至少是一场严重的军国主义，而此时的童子军运动及他们对战争的呐喊，我们能承认，这不是野蛮的沙文主义吗？中国有句古谚说的好：“兵犹火，不戕将自焚也”。甚至于学生玩带火的游戏时也一定要在监护下进行。可人们感到奇怪的是，整个欧洲既都正在玩这种将一并俱焚的战争之火。基督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告诫道：“拿剑者，必亡于剑”。可爱国者却对我们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后辈习武，为保卫我们反抗侵略而做好准备。”我并不想用我自己的观点来反驳此种论调，而想用孔子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孔子的某位学生因参加武力反对其邻国的战争并担任统帅而感到内疚。孔子对他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陌生的朋友要问，东方孔子的学说——古老的学问与现代西方教育——现代的学问之区别何在？我回答：“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 三、民主与战争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章句下》）。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0）<sup>①</sup>正如现在的欧洲，是一个混乱而又经常发生战争的时期。当时中国封建统治的体系已完全崩溃，从而产生了带有新思想的新的社会秩序，即民主的社会秩序，正如我们在今日中国所看到的。不幸的是，人们并没有理解这种关于在良好基础之上建立此种新式社会的思想。随着对严格的封建习惯的依附与敬畏、即对王权统治敬畏的结束，封建主义基本的和必要的国体之基础、即对当权者的敬畏业已烟消云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

孔夫子临死之前写了一本书，名曰《春秋》（人们可以将此与伽利略最后时日写的小册子相比较）。他在这本书中写到，随着对王权思想和对当权者的敬畏之思想的动摇，春秋战国时期所有无政府状态及不愿结束当时战争的原因，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对此孟子曾有论述。

我们看到，今日欧洲存在着与2500年前中国相同的情况。封建社会的体系在欧洲业已分崩离析。一个带有新思维的社会

---

<sup>①</sup> 这里是取鲁国编年史《春秋》记事的年限。不过止年应是公元前481年，不是前480年。



新秩序，即一个新的民主社会秩序在兴起。然而民主指的是什么？对于欧美的许多国家——我不无遗憾地说，包括从这些国家输入了“新学”之后的中国——民主仅意味着没有王权。美国人说：“民治、民有、民享。”爱德华·格雷先生前些时候谈到今日之战争时说，英国政府准备让民众表决。按照法律的规定，身居国家最高层、应对良治及国家福利负责的国王、皇帝或总统根本没有担当起对本民族应走之路的指导，而是盲目地顺从民众的意志，即所谓的民意。另一方面，人民不只是对自己应怎样被统治而表决，而且必要时还要指出，什么是正义之战，何为非正义之师，国家什么时候或应该对谁开战。如果我们把有无良治的问题放在一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大多数，能否正确地判断何为正义之战，何为非正义之师？正义之战应是为公理为正义或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为文明而战——可什么是真的和假的文明？什么是真正的人类文明，一个民族的大多数知道多少，或者从根本上讲，他们知道什么？大英帝国财政大臣鉴于目前的战争，最近向英国人民讲述了家兔和刺猬的故事。人们尤其大英帝国的大多数臣民，无疑知道家兔和刺猬的区别。可对于文明，真正的文明呢？当人们谈起文明时，他们应当知道，文明并不仅仅是个伟大的字眼，而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是一个充满异乎寻常意义的课题。

对此，人们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即尽管民众、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对文明所知不多，但他们可以找出并选举真正能理解文明并告诉他们文明是什么的人。那么这又重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民族的大多数能够真正发现并选举那些确实理解并能向他们说明文明是什么的正确人选吗？培根说过：“荣誉是美德的反映。这就像一个玻璃杯或任何一个反光体一样。如果它来

自庸众，则是错误的和毫无价值的，而且虚荣多于美的品性。因为庸众对于许多高尚的品格一无所知。最低的品德就能赢得他们的赞誉，中等的品德引起他们内心的震惊。至于最高尚的美德，他们既不明其奥妙，更无可望其项背。只会说：“他们最趋近如日月之光的美德。”如果培根在这里说的是真的，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想理解什么是文明，他们应选择那些对文明略知一二的人。可现在看来，人们确实没有选举那些对文明真能略知一二的伟人！而是选举那些合适的人，那些美德昭日月、巧舌如簧，擅长向人民发表诸如家兔和刺猬之别的演讲人。

对此人们也许会说，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是可以选择正确的人选并能说出什么是文明的。可我觉得，如果人们坚信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可以选择正确的人物，这种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存在了。《新约》中说：“许多人员有资格，可中选者甚少。”柏拉图及古希腊智者都说：“大多数永远是不好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皇帝，当他们谈及自己时不是用“我”或“我们”，而是说“寡人”、“孤家”。所以在所有的国度，在有的时候，对于某个不仅仅希望知道什么是黄油什么是面包，什么是个人利益，而是希望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荣誉和文明的人已不复存在，处于少数，他们也不担心，如果可能的话，只有一个。事实上中国人称有勇气敢于做少数或只有自己即“慎独”的人为士，从字面上讲为“严肃的人”，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他们也可以自称为“寡人”即孤家。

换言之，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民众即大多数尤指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民众，绝无一次能正确地判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什么是尊严，什么是无耻，什么是正直，什么是虚伪，简言之，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相反，当人们问起真理与谎言、

尊严与无耻、正直与虚伪、正确的与错误的文明时，如果把这些严肃重要的问题让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来分辨，那么这种分辨将永远是不正确的。通过此种判断而引起的战争将永远是非正义的战争。

现在我综述一下结束全文。在我最近写的关于“现代教育与战争”一文中，我说过，关于“战争”和“爱国主义”的错误思想，或错误的观念，这些在现代学校所传授的字眼，比任何东西都多地导致了今天的欧战。在此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今天欧美人民对于“民主”字眼的错误概念，并不仅仅是近来所有的无政府状态、所有社会、政治和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源，还是导致目前战争的非直接原因。

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民主的真正内涵是：没有特权；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民主的真正内涵是：一切平等，或像伟大的拿破仑所表达的：“人尽其才”。事实上，民主指敞开的大门，没有出身、地位、种族之别。这才是民主真正的本质而不是别的。在此问题上，对于今天所谓的民主，正如我在文章的开头所指出的，仅仅是指无王权。正如法兰西作家阿尔方·卡尔(Alphonse Karr)所表述的，即：“在学校里学生应当教老师；在军队里，士兵应握有高于将军的指挥权；在大街上，马应驾御马车夫(Les chevaux doivent mener le cocher)。”

对民主作为无王权状态的错误理解，一方面不但打消了现代大多数人对王权统治的信念，而且也打消了对王权本身及人的价值的信念；另一方面，对民主的这种错误的理解，也导致了现在欧洲各国的当政的政治家把权力完全交给一帮乌合之众——一帮现代的对爱国主义带有错误的和颠倒观念的乌合之众。这种观点是他们通过现代教育得到的。更为糟糕的是，这

更助长并迎合了这帮乌合之众的颠倒的观念与激情。事实上，这就是卡莱尔称之为的耶稣会教义，狡猾与奸诈在现代政治家身上的统一。今天所有欧洲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和当政的政客，当他们谈起和平与文明时，即迎合了这帮乌合之众的激情。更有甚者，迎合了这种在下层阶级身上的虚荣与残暴的统一体——这帮走上邪道的现代乌合之众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根本不知如何为一名公民的真正义务并且对此也毫不关心，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爱国主义。正是这些当政政客的耶稣会教义，及今日欧洲毫无责任心的乌合之众的无政府主义，掀起了这场极端非正义、极不道德、罪过深重、最可怕的世人共睹的、正在欧洲发生的战争。为了反对这种耶稣会教义和无政府主义——即错误民主的产物，现代卡莱尔在他晚年的册子里、中国古代的孔夫子在他的《春秋》里都有过阐述。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我在一本名为《总督衙门论文集》的书中曾说：“今日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真正根源不是在中国——尽管中国人民此时正深受其苦——而是在欧美。一个国家出现或多或少的管理的混乱和无秩序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标志或其存在的试金石。无政府这个古希腊的词语从字眼上讲是指“无王权”。无政府状态有三个阶段或层次。第一阶段指某国无有能力之国王；第二阶段指臣民对君主的统治公然或隐然不信任；第三阶段也是最糟糕的阶段，指举国的臣民不仅不相信君主的统治，而且不再相信王权本身，事实上已完全丧失认可王权或人类自身价值的力量。”我感到，现在欧洲和美洲已在迅速地接近这最后最糟糕的阶段。歌德在上个世纪之初用诗的语言写到：

法兰西的不幸是骇人的，在上者真该好好反省自己；

可事实上，在下者应该对此做出更多的思考。  
假如在上者被毁：那么谁来保护彼此争斗的在下者？  
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

#### 四、现代报纸与战争

当人们因歌德之诗《拜伦斯勋爵》的不道德而毫不留情地围攻他的时候，他说，我的诗无论如何也没有像报纸那样不道德。我很想知道，当今的人们是否已经很了解现代报纸是多么的不道德。为了弄明白今天的报纸是多么不道德，人们首先要搞清楚“不道德”（Unmoralisch）这个字的真实内涵。对于很多人来说，“不道德”指的是饮威士忌酒、抽烟或吸食鸦片、或与异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在歌德看来，“不道德”的含义远不止此。“不道德”指的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歌德以为，“不道德”指的是自私与卑鄙。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我把中文“小人”译成“平常的人”，从字面上看是“小人物”，也就是理雅各博士所说的“渺小的人”，已经去世的阿查立爵士把它译成“粗鄙无礼的人”。声名狼藉的唐朝武则天气帝的侄子武三苏，这个小人，这个中国历史上众多不道德角色中的一员，说过：“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在我的眼里，一个拥护我、拥护我的利益的人就是好人；一个反对我、反对我利益的人就是坏人。”这就是歌德在谈到报纸不道德时所指的那种不道德。由歌德和孔子的思想可以看出，不道德就是狭隘、片面、自私自利即鄙俗。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小人，一个渺小的人，即粗鄙无礼之人。一个粗鄙无礼的人也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它比

饮威士忌、抽烟及吸食鸦片还要不道德、还要坏，甚至比与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人更不道德和更恶劣。

事实上，当人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不道德”之后，人们就会像歌德一样清楚，现代报纸是多么的不道德。我们在这里不谈论那些毫无信誉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同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完全一样<sup>①</sup>，它们为了得到报酬，可以诽谤也可以吹捧任何一位豪绅巨富，可以抨击也可以赞赏随便一群愚昧而又卑鄙的乌合之众。这些小册子仅仅靠造谣中伤，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或迎合群氓们的嗜好而维持生存。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报纸，完全是一些与英国《泰晤士报》一样具有很高地位的报纸。《泰晤士报》曾经是而且今天仍然是世界著名的报纸。当德国人在1897年武力占领青岛时，这份报纸在社论中说：“干得好，伟大的德意志！这是对待中国人唯一的办法。”我们清楚地记得，此乃通过电报传过来的《泰晤士报》这篇社论的中心思想。可是在1914年，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开了一战，大英帝国的盟国日本开始远征青岛，现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又说了些什么呢？它说：“干得好，大日本帝国！如果想进行报复，日本完全有权利把这个国际小偷和强盗赶出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个不道德的人能像《泰晤士报》这样，如此会见风使舵呢？

为了弄明白像《泰晤士报》这样很受人尊敬的报纸为什么会如此不道德，人们必须对现在从事现代新闻业的大多数人所属的阶级和类型有所了解。卡莱尔在评论现代文学时曾说：

---

<sup>①</sup> 路希塔妮亚船沉没时我曾说：“德国人真可怕，他们将那么漂亮的船都弄沉了，死了那么多人；可天津的英国报纸做得更糟糕——他们使在华英国人名誉扫地。”——原注

“通向文学的大门拥挤不堪。文学成了背井离乡的唯一主义者和虚荣者的避难所，连低能愚笨的人也心向往之。在那里汇集了永恒的诸神（由于这些人遮掩着完全没有被认识到），还有最卑鄙的、极端颓废的许多无赖。这个避难所是一个没有秩序的、非常混杂的团体，确切地说，事实上它连这种混杂的团体也算不上，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而已。”卡莱尔对现代文学所作的这些评论，也适合——甚至不如说更适合现代新闻界的状况。

如吴说在歌德和卡莱尔时代新闻界和报纸的状况已经是这样，那么，现在它们的状况则更为糟糕。现在，在新闻界中除了片面、狭隘和卑鄙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在歌德和卡莱尔时代还没有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交易（Geschäft）。起初新闻业是一种职业，但现在它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交易。如果说过去在新闻界中存在过颓废的无赖，那么不能因此就看不到其他。在当时的新闻界中，正如卡莱尔正确指明的那样，还有背井离乡的真正唯灵主义者，甚至还有永恒的诸神。在这里，我们从先前新闻界中这些永恒的诸神中只指出三个人的名字就够了，它们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自己取名为尤尼乌斯（Junius）的一位没有名气的作家。但是，自从新闻界变成交易之后，在新闻界中，就像卡莱尔所说的，几乎只剩下最卑鄙的、极端颓废的各种无赖了。对于这一点，只要人们从这次世界战争开始以来充斥于公开出版物中的各种稀奇古怪和五花八门的报道中，就不难作出判断。这些卑鄙、颓废的无赖们还厚颜无耻地将这些做法吹嘘成是一种爱国心，这还不算，他们竟无耻地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无价之宝进行兜售！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些现象只是当今欧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可怕状况的一种不祥之兆，它们还不仅仅是人们在



现代 homme sensuel moyen (沉溺物欲享乐) 中已经感觉到的粗陋的唯物主义, 毫无节制的放肆以及不知悔改的玩世不恭, 而是这样一种现象的不祥之兆, 即交易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一切领域, 包括人们自身最神圣、最崇高的精神生活领域。现在, 科学、艺术、文学和哲学也在待价而沽, 而且它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江湖郎中们身挂闪闪发光、耀眼夺目而又俗不可耐的招牌, 推销自己所谓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没有什么两样, 那些职业的社会缔造者们实在该对此感到汗颜和羞愧! 然而问题远不止此, 今天就连教育事业甚或宗教本身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推销自己了。

现代报纸的这些问题在当前之所以变得如此严峻, 是由于新闻界在今天已变成了新时代的教会, 成为欧美现代民主社会的教会。实际上, 现代新闻界——人们还一直这样称呼它, 已成了新的现代教会, 它取代了基督教会, 并发挥着基督教会的作用。它是新的社会秩序的新教会, 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新教会。这种民主社会正如我最近在论“民主与战争”的文章里指出的那样, 目前在欧美国家正在形成。这种教会的宗教, 人们可以叫它“自由主义”。同基督教曾使古罗马社会解体、灭亡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社会的的方式完全一样, 现时代这一新的宗教, 即“自由主义”, 则促使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灭亡, 并企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现代民主社会。在基督教使古老的罗马社会灭亡以后, 基督教就变成了基督教会, 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新教会。同样的, “自由主义”这一现代宗教在使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灭亡以后, 新闻界现在则变成了另一个新社会——现代民主社会——的新教会。现时代的这一新教会, 即新闻界, 完全继

承了基督教会的衣钵，处处为欧美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道德和精神状况而煞费苦心。另一方面，基督教会今天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正如同道教的宫观和佛教的喇嘛庙一样，已变成了纯粹的装饰物。

在中世纪，基督教会还是一个很好的有道德的教会。基督教教士也是虔诚的。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和平与秩序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后来，基督教会便不再是一个合乎道德的好教会，它不再理解真正的宗教，也就放弃了宗教，抛弃了先前所传授的安于清贫、虔诚与纯洁的教诲。事实上，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已变得毫无作用与堕落。基督教会的上层人物像罗马教皇，事实上为了金钱而出卖了宗教的赦罪，出卖了“基督教教士身分”，买卖圣职，即从事中世纪的等价交易。因此在整个欧洲，爆发了众所周知的三十年战争。德国人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扑灭了这种中世纪基督教会的交易思想。现在三十年战争被称之为宗教改革之战——改革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之战。欧洲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从将来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可称之为改革之战——一种现代教会的改革之战，新时代教会和新闻界改革之战。

如果不对现代教会、现代媒介或新闻业进行改革，在欧洲就不可能有和平、秩序和文明。因为现代教会和新闻界同中世纪晚期的教会一样，不仅没有接受真正的宗教——即自由主义和真正的民主的教育和熏陶——而且已经堕落了，蜕化成了一种商业交易。耶稣基督关于古犹太教会所说的话，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新的现代教会和新闻界，“我的家是一座教堂，可你们却在里面筑起了偷盗之窝”。实际上，人们觉得有必要向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出版者和基督教传教士们——他们在中国不是传授基

督教，而是传授新学，这必然会大大推动文明的新的恐怖，即当前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现代中国人的产生。以基督的话大声警告：“等着瞧吧，犹太教法师和法利赛人，你们这些伪君子！你们背井离乡，制造出了一名犹太教徒，可当他真正成为犹太教徒后，你们又把他变成地狱之子。他因此将遭受的苦难，绝不啻是你们的两倍！”

## 五、日本的辩解

(致《P. and T. Times》<sup>①</sup> 出版商的一封信)

尊敬的先生：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本月 20 号贵报刊载的某位日本总督的文章。该文试图为当政的日本国务活动家批准对在东亚被人们称之为德国殖民政策的“色当”、和不折不扣的欧洲帝国主义的远征决定辩解。

请允许我说，你们这位代表所提出的辩解，我认为是现有的唯一理由，这一理由在他的辩护中，至少是诚实的、可以理解的，但从外部观察，它看起来违反了保证公正游戏的法律或宗教——这与日本的远征在世界的这个区域内，在欧洲大战的邻台朦朦胧胧地出现是一致的。我说违反，因为我相信，每一位日本人都知道这句普通的中国俗语：胜之不武。日语中 *Katte mo era ku nai* (战胜自己、增强勇气)，即被用之于这场今天我们看到的，为反对在青岛的少数德国人而采取的可怕征战中。

为了向您说明，我非常欣赏你们总督所提出的这一论点本身，我想从欧洲历史中给您找出个例证。那时的举措就像日本现在所标榜的一样，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和绝对富有

---

<sup>①</sup> 不知确指何报，疑为《邮政电讯时报》。

建设性的。在已故去的德皇威廉一世的传记里，阿奇博尔德·福布斯 (Archibald Forbes) 在描述 1870 年法兰西色当悲剧的最后一幕或最后的情景时，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在白旗升起的前一小时，普鲁士皇帝便已得知，他的炮兵部队业已占领了整个罗马，这里的法国军队束手无策乱哄哄地挤在一起，各方报道都使他坚信，他已经具有足够的力量，能一举挫败所有反抗的企图。但由于法国人在内心深处仍然顽强不屈，所以好像还必需一个比业已提供的更为强烈的动力促使他们彻底放下武器。在过去，出于人道考虑，为保护由于极度痛苦而处于发作时期的狂犬病患者，不得不去把他们从挣扎中唤醒，现在如果也这样做，必然会人为地加强法国军队的垂死挣扎。德国政府的报告中写到，在某些情况下，用强大的炮火炮击反抗之敌的最后避难所是行之有效的，要使其明白他们已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只有赶快放下武器，迅速投降，此外别无他路。为此，德国皇帝向集结好等待他命令的炮兵说，把所有的炮火集中于色当。”

由此我们可以察知，在战争中，冷酷与无情并不是非人性的。恰恰相反，那才是真正的人性。这听起来也许极其荒谬，为了怜悯，在战争中有时需要残酷无情。人们恐怕因此会想起美国将军谢尔曼 (Sherman) 那句令人可怕的名言：“在战争中要使你的敌人除了眼泪还是眼泪。”就像法国人说的：“*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战争就是战争)

因此，我不想从博爱原则的观点或其他理论出发，来检验日本现在的远征是否是正义之举，我想从君子原则的观点——真正的武士道准则来检验，日本的远征该作何评价。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日本报复德国的话，它完全是正确的。可在我看来，

问题是：它是像一位君子那样来复仇的吗？像一位真正的武士那样来复仇的吗？事实上也就是：日本玩的游戏公正吗？在我看来，情况远非如此。青岛目前的局势是不是和 1870 年福布斯所描述的色当的情况一样呢？如果相似，日本的进攻无疑是正当的。如果不一样，我担心，日本在青岛攻击少数德国占领者的这种“报复”的大规模行动就要比违法还要坏——这将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可怕错误。你们总督的论点，就我所理解，是简单地建立在下列基础之上的：日本进攻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就像普鲁士皇帝对色当一样，使德国人相信他们的绝望处境以放弃青岛，而不是通过战斗解决。实际上也就是，在减少不必要流血的情况下，完成或加速青岛的投降，结束残酷的战争及对中国沿海商业和交通的威胁。一句话，“在远东消除一切不安定的因素”。

但日本的进攻，对加速或完成青岛的投降有益吗？你们的总督对此是毫不怀疑的。他说：“自从日本介入战争之后，德国人——他们都知道进行一场日本式的战争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是，毫无抵抗地把领地交给强者，或早作安排。只有这样才可避免流血。”然而我要说的是，我并不完全理解所谓进行日本式战争指的是什么。如果你们总督指的是一般的合乎道德的勇毅或日本人的武士道，那么我敢断言并且坚信，一名真正的武士绝不会把他的武士道或勇敢挂在嘴上，而且德国人也绝不会在那些大声叫嚣武士道的人的面前感到害怕。如果你们的总督所谓进行日本式的战争指的是野蛮的勇气或战争的叫嚣，这就像人们在日本舞台上所亲自看到的，它们看上去很可怕，但我想这根本不会吓倒在青岛的德国占领者。因为战争的叫嚣只能惊吓野兽和动物，却吓不倒一个文明的民族。

人们口头上也许一直反对德国的政策和德国政治家的策略，即使这样，也没有人会否认，德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文明的民族。事实上，我觉得，你们日本的总督似乎忘记了，武士道并不仅仅是日本的国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在青岛的局势与1870年色当的境况是不相同的。日本目前所采取的行动，除了无用的流血牺牲之外，根本无益于加速或完成德国在远东的色当的投降，相反，它不过是你们总督的一厢情愿而已。在青岛的德国官员们一定会下令，要以血战到底的气概拚命去战斗。他们也许认为不这样做，不但不能结束残酷的战争，反而会延长或激化这场战争。就消除远东不安定的因素来讲，我担心，日本这种草率的行为——大日本民族为反对小部分在青岛的德国官员的出师——会激起非常痛苦的感情，处处造成民族和种族间的仇恨，其结果，也许会带来整整一个世纪的不和平，不仅在远东，而且在整个世界。由于民族或种族的痛苦而引起的野蛮的、血淋淋的可怕战争，不仅使得英日的政治家大声疾呼要保护的上海那几个商贩的商业和贸易利益，而且使得世界所有民族包括日本在内的文明的利益及文明本身，都已陷入危险的境地，现正遭到或承受灭顶之灾。

因此我说，日本现在所采取的、日英当政的国务活动家所决定的远征，比犯罪更糟。如果这些政治家们是坦率的，就应和我一样，无需思索地承认，当他们决定要在远东保持和平并消除一切不安定因素时，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可是每位能心平气和地判断和思考此事的人，我想都会知道，在世界所有的事务中，在人类之间引起或发生的动乱、争端与战争中，仇恨之情是最为危险的东西。那些当政的英日政治家们应

当懂得，像这样一种痛苦的情感，痛苦的民族和种族情感——日本在青岛踏上竞技场进攻一小部分德国占领者而激起和带来的仇恨之情，会在地球上各个国家或民族之中流传多少代。

我把青岛比喻成德国殖民主义政策和欧洲帝国主义在远东的“色当”。在这里，我想有必要也应该公正地指出，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想表明现在的德皇和德国人民单独对欧洲的帝国主义负有责任，他们只是在这场不可避免的欧战中比较突出而已。我坚信，所有参与武力征服世界的人们都应受到审判。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欧洲各国都应毫无例外地对欧洲的帝国主义负责。因为欧洲的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在今日欧洲所有的民族中被错误引导、源于势力均衡的疯狂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我的好些欧洲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我回答道：“感谢上帝，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可是民族主义的后果如何呢？在“新学”输入之前，我们中国没有民族主义，“新学”把民族主义带到这块国土上之后，关于民族主义各种流言蜚语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连上海那些态度冷漠的商人们也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好儿子和好市民、不愿作为皇帝的忠实奴仆而生活，他们产生了赞美纯洁的中华帝国的需要。由此造成了使许多人头落地和房屋被烧的革命。所有这一切都白费力气。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最终结果是，现在中国变成了民主国家，另外还有一个没有辫子、十分肥胖、穿着华丽陆军元帅服的人成了大中华民国的总统。尽管他穿着威严的军服，可当大中华民国尊贵的客人们在他的家里吼叫和冷酷地屠杀他人时，他却一个字也不敢说。这就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结果。欧洲人民中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帝国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其结果不仅导致了欧洲悲惨的血腥大屠杀，而且导致了诸如他们在青岛向我们



所展示的令人惋惜的惨痛悲剧。——1900年北京发生骚乱的义和团运动时，欧洲在远东异常孤立的外交之极大耻辱，也是其结果。当我谈到人们缺乏正常的理智和1900年因义和团悲剧而引起的欧洲各国在北京孤立的外交时，我引述了爱默生下面一段话：“政府总是直到很晚才明白，任何使用不诚实的代理人的做法，对于民族来说，就像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在文章的结尾，请允许我重述我在题为《且听着，统治者，请明察！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一文中所写的下列话。该文发表在1905年横滨出版的《日本邮报》上，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在评述导致这场不幸战争的原因时我说道：

“我想说的是，俄国对日本的不友好态度，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都已直接被日本帝国政府所误导与误用的政策火上浇油了。这一强化物是什么？就是英日同盟。这个同盟刚一缔结时，我就对英国朋友说，该同盟将要破坏远东的和平。当然，我毫不怀疑英国和日本在签订这一协约时都抱有美好的愿望，可是任何人，只要他心平气和地审视此事，就必定承认，英日同盟的直接结果，是不仅将两个极为讨厌的道德因素引入了对远东怀有兴趣的国家政策与国际关系之中，而且将其强化了十倍——这两个道德因素就是嫉妒与猜疑。这就是我要说英日同盟是一个破坏了远东和平的同盟的原因。事实上，英日同盟也是一次破坏，破坏了对远东感兴趣的欧洲国家之间团结与友情的行动。因此，任何以公平无私的观点看待此事的人都将发现，英日两国对此同盟负有责任的政治家是一些应受到严谴的罪人。他们的判断能力欠缺到以致于要犯罪的程度。不管怎么说，对于日本民族来讲，英日同盟是日本与欧洲各国开始接触以来，那些当权的日本政治家所走下的最具灾难性的一步棋，如

果没有这个英日同盟，俄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仅对于日本和在朝鲜的日本人，而且对于中国和满洲的中国人的态度，都将十分不同。事实上，如果没有英日同盟，满洲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日本人民，只要他们心平气和地观察一下诸事，就必定会发现，英日同盟的缔结无异于向世界表明，日本民族要去介入欧洲政治，要去参与欧洲各国荒唐而疯狂的‘殖民政治’竞赛。这种竞赛在欧洲各国，不是由其国王和统治者所推动，不是由民族中的精英人士所推动，而是由一帮乌合之众所左右，被那些拥有新式金科玉律，正如我曾说过的、不用欺骗邻居就能占邻居便宜的那种金科玉律的群氓所引导的竞赛。事实上，日本民族正在去加入欧洲各国彼此争斗的疯狂的现代政治竞赛中。

“诚然，没有什么当然的理由可以反对日本民族去参与欧洲政治，并由此变成一个强国——一个真正强大的、盖过全世界的训练有素的帝国主义。我以为，没有什么当然的理由反对日本民族做这一切甚至走得更远些。不过，我要奉劝日本民族的是，如果他们听从了其英国朋友或东京教授们的话，企图通过参与欧洲殖民政治的疯狂竞赛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那么日本民族就像孟子所谓的缘木求鱼者一样，将得不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

请原谅我的这封长信。就此搁笔。

北京，8月24日。

辜鸿铭

## 六、是义还是利？<sup>①</sup>

已故的戈登将军说过：“在远东，如果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最好的道路是按公平和正义行事。”我认为，如果这样，当我们中国人在奉行某项政策时，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因为戈登——这位基督教骑士和真正的英国绅士，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远比“来自北京冒昧的书信”的作者辛博森<sup>②</sup>先生所指出的更好道路。在目前世界上所发生的巨大危机中，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西方的黑暗中摸索前进，对我们来讲，最好的道路并不是辛博森先生所建议的，怎样做对我们有利、有好处或将来有好处就怎样去做，而是按照戈登将军的话：“公平与正义”去做。

如果目前中国参加协约国作战，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将使得德国和欧洲别的正在相互争斗的国家成为敌人。这难道是中国应该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吗？辛博森先生说：“华盛顿的男子汉义举，北京理当追随。”这听起来着实娓娓动听。然而让我们

---

<sup>①</sup> 此篇辜鸿铭在《读易草堂文集》中意译为《义利辨》。由于两者有所不同，可以参照，故录于此。

<sup>②</sup> 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1877—1930)：笔名普特拉姆·威尔(Putnam Weale)。英国人。生于宁波。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出任英国报纸驻北京通讯员。曾被黎元洪和张作霖聘为顾问。是著名的“中国通”。著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东亚正在到来的斗争》等书。

来检验一下，真正的男子汉义举究竟是什么？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德国及其同盟国的是非曲直，从现情来看，他们实际上正遭受着全世界所有强国的围攻。如今的人们爱大谈什么国际法，可在在我看来，世界上还存在一个比国际法更高的法律，即“君子之道”，英国人称之为游戏规则。我记得当我在苏格兰的一所公学读书时，英国同学根本不认为纠集一伙人去打一个即便在校以斗殴闻名的人这种违背游戏规则的行为是男子汉所为。连英国中学生也不屑做的事，辛博森先生竟在此美其名曰男子汉义举！

美国人采取的行动在美国人看来是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然而这种行动本身根本不是什么男子汉义举。再说一遍，那些试图教授中国人国际法的人根本不懂得，在中国存在着源于孔子时代的真正的古老的国际法。它比我们知道的用于目前情况的任何一部国际法都要好得多。这一中国古老的国际法说：“师出必以名”。可中国现在根本没有对德国宣战的理由。今天欧洲的争战和中国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中国没有值得一提的商船队，也根本不和德国的潜艇战发生接触。事实上，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形成适用于法官在法庭宣判德国的法律。向中国出主意中国应怎样做的人，我以为他根本不理解“厚颜无耻”这个词的意思。中国若采取这样的行动，便完全是一场不可饶恕的厚颜无耻。

事实上，辛博森先生以及其他建议中国以德国为敌，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充分的理由。据我所见，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这样做，是因为战后中国将因此受到协约国的赞扬，或更确切地说，将得到他们的优待以及免于挨打的好处。我所谓免于挨打，正如辛博森先生所说的：“协约国胜利之后，可以使加入其

一边者免于侵侮，凡没有站在胜利者一方的，都将属于战败者之列。”简而言之，这种暗示只有一个意思：好比你的一个朋友正与六七个人大打出手，你因为可以得贿，或停止殴斗后可以免于被这六七个人合伙殴打，便同朋友站在对立一方而去帮助对手。这就是辛博森先生所称之为的义举！我坚信，即便美国商人可能把这描述成最高的正确的商业准则，可哪怕是最卑鄙的小人，也会把这叫做无耻流氓的商业准则。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认为为了回答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应做什么这个问题，裁决的准则是：一个民族是想成为君子的民族还是小人的民族。我要说明的是，因为这种自决是一项有很大影响的决定。它不但关系到中国而且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如果中国听从了辛博森先生和现在生活在中国只考虑自己利益的那些人的劝告——他们大声地催促，对德国——一个和我们邦交素睦的强国采取敌对的行动。在根本没有宣战的理由，没有任何可以诉说的原因，而只是为了战后从协约国得到一点点好处，那么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小人的民族。如果中国成了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么她就应受到审判。

应当清楚地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反对入侵而军事上又特别弱小的民族所得到的唯一保护，有赖于比中国更强大的民族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把友谊、法律和正义看得高于一切利益之上。如果中国本身在她与德国的交往中置这种原则于度外，那么中国又有何理由让别的国家这样做呢！！因此，中国目前正确的、当务之急不是立刻站到协约国一方，如果这样，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将无以自处。一旦一个或几个协约国，比如说日本，当她发现她不可分享的利益在中国时，或者甚至可以说，如果他发现了自己有兴趣来剥削和压迫这个国家，并肢解和吞并这

个国家时，中国对此又能说些什么呢？中国能大声呼吁友谊、法律和正义吗？日本会对她说：“你在和德国的关系中考虑到友谊、法律和正义了吗？那好，我们对待你就像你对待德国那样：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像你在对德关系中所做的。”为此我要说，如果中国奉行了辛博森先生以及其他人的建议，就像一个充满小人的民族所做的，只考虑和最终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中国将受到审判。孟子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履。”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按照戈登将军——这位基督教骑士和真正的绅士、这位我们可称之为“中国戈登”的、中国人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和顾问的话去做，如果中国奉此而行并且坚守此道，即正义与公理，不管辛博森先生和其他在中国的自私自利的外国人如何威胁利诱，拒绝对德国采取敌视行动，这样就可表明中国是一个君子民族，一个置友谊、法律和正义高于自己利益之上的、甚至不考虑自己安危的君子民族。中国如果在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能表明自己是一个君子民族，一个重视“君子之道”的民族，那么她就能赢得全世界的敬重。

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忘记，抛开武力与财力，令人尊敬的得体的举止对一个民族和对某个人都是一种保护。人类和民族之间的争端与战争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原因何在？就在于受到侮辱与攻击或施以侮辱和攻击。所罗门说：“一个温和的回答可以平息怒火，伤害的言词却能激起愤怒。”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藉得体之举止可以避免遭到侮辱，在文明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没有一个人或民族例外。不管她多么强大，如果攻击另一个人或另一个民族，就会变得堕落，这是因为，这个人或这个民族怀着侮辱的动机。同理，对于那些堕落的人或民族也不能施以反侮辱，保持自尊自重，反而能在堕落的人和民族面

前维护自己的尊严。事实上，现实使我感到，欧美人民根本没有把一个简单的真理铭记在心：彬彬有礼能得到它所唤起的敬重。而且这不仅对一个民族、即便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在战前，欧洲的军备竞赛的目的无非是想保护自己，在今日世界的变革中，这种保护自己的动机尤显突出。孔子说：“当陌生的民族相互攻战时，你们应保护好大众的品性、良好的教养与纯洁的美德。事实上，彬彬有礼的美德能善化并赢得他们的敬重。”<sup>①</sup>因此我说，对于中国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保护就是：以德服人。

我的观点依然是，如果中国能表明自己是一个君子之国，她就能赢得世界的敬重并能藉此拯救自己。进而，我宣告，如果中国现在能展示其为一个君子之国，并能将友谊、法律、正义置于有用、利益甚至于个人的安危之上，那么，她不仅能拯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世界和目前世界的文明。因为在我看来，从根本上来讲，现在欧洲盛行的可怕战争的最主要的道德原因正在于：欧美各民族的国务活动家和政客们忘记了“君子之道”，他们的行为即是孟子所谓“先利而后义”，依据孟子的意思：“苟为先利而后义”，是“不夺不履”的。

我认为，在欧洲和美洲各国没有认识到“君子之道”的意义并因此达成协议时，即在置名誉、法律和正义于有用和利益之上以前，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和平之可言。我甚至坚信，在欧洲和美洲的人民没有看出他们处于错误的道路上并对此反省之前，在他们没有认识到目前令人震惊的残暴、痛苦的战争不仅给每一个民族、给每一个人造成悲惨的恶果，而且这种有损

<sup>①</sup> 此段意译，未能查到中文原文。

欧洲光辉的错误和不道德的恶果正是他们所谓新学、自由和进步的文明不可避免的产物之前，世界上不可能有和平。然而现在，他们又要把这种战争之源输入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所拥有的真正的文明与欧洲错误的、不道德的文明是根本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后者以“新学”教导人们把有用的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廉耻、法律和正义置于末位，而中国真正的文明却以旧学教育和引导人们把廉耻、法律和正义置于任何有用与利益之上。

在这个世界纷争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来说确实是展示其文明、道德光辉的好时机；是一个中国人向欧美人民展示其是一个世界上所仅有的伟大民族的好时机；要让欧美人知道中国是一个四亿头脑都懂得“君子之道”意义的民族；是一个义无反顾地置友谊、法律和正义于有用和利益之上，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的民族！有谁知道，一个拥有四亿颗这种头脑的民族所树立的光辉榜样，会对全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美国人爱默生说过：“我清楚地看到滑膛枪崇拜的破产，这就像上帝的存在一样无疑，不需以暴易暴，以枪易枪，唯有爱与正义的法则能引起一场干净彻底的革命。”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足够的能保护自己的武装，如果他们去插手遍布世界的争端，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在中国的文明里，也有爱默生称之为的、不以暴易暴的东西，即爱与正义的法则，那就是君子之道。如果中国在目前世界历史性的危机中运用其文明里所固有的君子之道，有谁知道，正如爱默生说的，不会引起一场干净彻底的革命、并能帮助结束这场给世界以毁灭、正在地球上到处漫延的可怕战争呢？

因此我说：如果中国在目前巨大的世界历史性的危机中表明自己是一个君子民族，这不仅能够拯救自己，而且也许能拯救



世界，拯救世界的文明。

马太·阿诺德在美国作了关于他那个时代伟大的报纸预言家的三次演说。在其中一次演说中，他谈到：“如果我们伟大的《泰晤士报》的富有创造性和灵感的博罗威茨（Blo Witz）先生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物；如果他指出了政治发展的动力、以及一些政府部门被取消的原因及其后果；如果他阐明了至今从未尝试过而又应当被尝试的联合的必要性，并从每日我们深信不疑的事物中揭示出其隐藏的奥秘，那时，人们就常常会重提预言家的话：‘上帝如此智慧，以不用收回其成命！’然而，博罗威茨先生并不是唯一的智者，上帝也拥有自己的智慧，并且无论如何，这一智慧最终总要使上帝获得胜利。（因为）上帝已经把社会福利及国家兴衰，同特定的道德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在即将结束本文时我想说，现在在北京神秘地忙个不停的辛博森先生也不是唯一的智者，庆幸的是，中国的未来并不取决于辛博森先生那聪明的主意。其实，中国的前途只取决于政府高级官员是否愿意严肃地、负责地正视那上帝总是将其同社会福利、国家以及人民兴衰紧密相连的道德因素。

## 七、美国人的心态<sup>①</sup>

在我看来，生存在先辈业已创立的公共机构中的现代美国人，已经丢失了他们的传统。不论从什么角度看，他们都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先辈——那些诚实的、充满活力的美国人的精神。而代之以一种对法律条文报以虚假敬畏的精神。对于他们的先辈，美国诗人曾写道：

那些养育了我们的移民们，  
他们飘洋过海而来，  
为我们发现了这块处女地，  
恩赐给了我们自由的土壤。

——引自《总督衙门论文集》

如果人们还能忆起法兰西大革命时罗兰夫人说的话：“噢，自由，在你的名义下都发生了些什么？”那么今天人们更喜欢倾听英国人和美国人关于人性的话：“噢，人性，在你的名义下都发生了些什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允许他的人民用船向欧洲运送火药、甘油炸药、立德炸药，以及别的战争物资，数量之大，不仅可以用来杀死或杀伤数以百万计的人，而还能够用来毁灭整个人类和人类的文明。他还呼吁新的中立国、甚至贫穷而又无能为力的中国准备参加现在发生

<sup>①</sup> 此文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译自德文《呐喊》第49—56页。

于欧洲的疯狂的屠杀与军备竞赛！噢，人性，在你的名义下都发生了些什么？！在2月21号从北京邮局带回的报章中，威尔伯（Wilbur M）先生把这种欧美国家的精神错乱称为“战时心态”，他认为，在欧洲，领导战争之人的思想状态的逐渐恶化无论如何对此负有责任。他无法原谅美国人民精神智慧的崩溃。我以为，如果对此不能原谅，这本身就是对目前爆发的歇斯底里、和对于如此实际但注定消失的美国民众正常理智的最好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再明白不过。

卡莱尔曾愤怒地说：“美国人是一帮蠢材。”就我个人来讲，我并不认为美国人是一帮蠢材，可我相信，他们是一帮孩子——一帮伟大的早熟的孩子。那为何我们中国人和美国人能够联合起来呢？其原因正如我在前不久出版的一本书中所指出的，我们中国人也像美国人一样是一帮孩子。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存在着下述区别：我们中国人是一帮孩子，可她是一个伟大的拥有三千多年文明历程的民族。而美国人则是一个伟大的但其文明历程不足半个世纪的民族。我曾对古德诺博士——那位已经故去的袁世凯的顾问，渴望为中国制定一套宪法的美国人说，在美洲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中国人已经统治着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化的民族经历了三千年之久，就像我在一本书中所说的，我们已成为一帮拥有成人智力和思维能力的孩子。也正是这一点，成了我们中国人的辉煌的特征，也使我们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民族。历史并没有中国人这么久长的美国人，则是一帮单纯幼稚的孩子，他们并不拥有我们中国人所具有的成人智力和思维能力。一位到过美国并熟知美国人的人有天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正的。但我认为，可以公正地说，

美国是一个灵魂有待昭示的民族，他们是一帮智力还没有完全得到开发的孩子。

事实上，如果你们能记住美国人是一帮智力有待开发的孩子，你们就能够理解美国人民好的及坏的性格特征了。爱默生将美国称之为：“伟大的充满智慧的爱享乐的爱得无厌的美国。”所有的孩子，在他的智力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之前，永远是爱享乐的和贪得无厌的。所谓智慧，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讲，除了作为起码的常识、实际的智力——一个聪明的动物的智力之外，就什么也不存在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这种实际的智力是非常强的，是一种正常的、安全的但不可靠的智力。并且比因博学而产生的智慧更不可靠。也就是说，当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仅仅是些物质世界的简单的实体或东西时，如同伐树、屠宰、烧炒贝壳之类时，他们的智力还能够胜任；可当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非物质世界的错综复杂的事情时，比如像教育、宗教、文明和国际法等事情时，那么美国人的这点起码的、本来有用的常识——就像罗斯金说的，变成了应抛弃的、简单的、直观的和非常危险的无知和扯淡了。事实上，我想在此指出，何以美国人尽管综合了全世界各民族的睿智，而在与各种各样的骗子打交道时却要轻易地上当呢？其原因在于，普通美国人的智慧、甚至受过良好教育人的智慧只不过是起码的常识、是聪明动物的智慧而已。

此外顺便提一下，像所有的尤其是饮食很好的孩子一样，总起来讲美国人心地善良而且乐善好施。但是，美国人的这种乐善好施，就如同孩子们的所作所为，从没有公平、忠诚、大量和持续过，而他们却经常远远地表现为疯狂、放肆和不可靠。歌德的《威廉·梅斯特》中有活生生的例子，很能说明美国人所

固有的好心而不诚恳的特性。在这部著名的小说里，菲利克斯(Felix)是一位英雄的儿子，有一天早上他到他父亲那里去，哭得凄凄惨惨并报怨说，一位马弁粗暴地打了一匹他心爱的马。可是在同一天下午，他找到他父亲，就像逮住一只活鸽子，拧住他的脖子直到他窒息而死。正是向中国提供钱为中国病人建造医院的美国人，正是为流放的荷兰人的苦难而深感痛苦的美国人，在私刑拷打着黑人和绞杀着无辜的中国人。我敢说，如果人们能够记住美国人是一帮孩子——一帮没有教养而又早熟的、其灵魂与性情还有待教化的孩子，那么，人们就能马上理解，美国宗教社会与机构的单纯，美国内部政策的喧嚣、无聊和欺骗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笨拙、愚蠢和不可靠了。

当我谈起美国人民精神与特性上的弱点时，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下，人们从美国人民身上找到的这些缺点与错误，正是毫无教养的孩子所表现的缺点与错误。事实上，美国的一帮乌合之众随时做的，而且还在无休止地做下去的绞杀无辜中国人或私刑拷打黑人的暴行，无异于无教养的孩子所为，无异于长相漂亮、充满激情的孩子的冲动和莽撞的行动，无异于道德性格已变态、堕落和败坏的成人的不负责而又残酷的行动。换言之，美国人民的精神与性格上的缺点，正如我说的一样，仅仅是糟糕的教育导致的结果。

在此，我可以举出美国人巨大错误中的一个——残暴来说明。罗斯金说：“残暴的本质在于缺乏感情。十足的不可饶恕的残暴，只是由于肉体和精神缺乏教化与开发而产生的。如果肉体与灵魂可怕地无情，它便能干出任何形式的极端的兽行和罪恶。”美国人，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昭然若揭的残暴，就像罗斯金说的，只是由于其躯体和灵魂缺乏教化与开发产生

了冷漠、从而导致了十足而不可饶恕的残暴。而英国人充满市侩气的残暴与法国人的资产阶级本性，则和美国人不同，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在我的一本写于义和团动乱后的名为《总督衙门论文集》的书中，我举了一个真正与生俱来的充满市侩气的残暴例子。在这里我想有必要重提此例。

“去年夏天，当天津被联军攻占之后，一封告诉上海报纸此条消息的电报描述了北方事态的惨状：天津7月15日电——大街上几千具尸体在炎炎烈日下腐烂，城市的大部分还在燃烧，夜幕降临后，肆虐的火焰发出惨人的光芒，像幽灵之光似地照亮了周围的大地。接到这封电报后，当成千上万的腐尸还在眼前晃动，英国人及在其领导下的上海工部局便决定，打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和灯火，骑自行车举行火炬游行，以表达对北京事件的庆贺。”

这就是我称之为的与生俱来的残暴，存在于英国市侩者骨子里的残暴。此时此刻，在中国的英国报纸正把中国人的注意力引向义和团动荡时期德皇厚颜无耻的暴怒的话上来。诚然，这样做非常有用。可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些在上海自称为诺曼人后裔的英国人，在义和团动乱时期为反对我们中国人都干出了怎样的行径！德皇因他的感情冲动和激怒而说出的话，至少还向他毫不认识的中国人表示歉意。在上海的那些生活于中国人之间的英国人，却从没有对他们的这场丧心病狂而又愚蠢的残暴的一幕——一个具有无耻、卑劣或变态堕落道德之禀性的民族残暴的一幕，表示过任何歉意。

撇开我上面提到的残忍的英国人的暴行不谈，当人们听到某些人，尤其是英国人在论及英国人的暴行时，人们应当记住在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中一艘美国战舰的指挥官的行为。在战

时的一次战斗中，一艘美国舰船用榴弹致命地击中了一艘西班牙的舰船。当美国水兵看到这次打击如此成功时，由于激动而大声欢呼，可是这位指挥官却对他的士兵平静地说：“不要嚷，孩子们，可怜虫们已经死了。”

我在我的一本名为《总督衙门论文集》的书里曾说：“这就是人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众多情况中，还能证明美国人民心态正常的东西。”我现在做进一步的研究并指出，美国人民今天就其官能来说是正常的。在我看来，除中国人外，美国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真正文明之本的民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之本呢？

爱默生说过：“我的英国朋友问我，是否有真正的美国人；即具有美国思想的那些人？好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提问！我想到的既不是议会也不是什么国会，既不是总统们也不是内阁部长们，不是那些想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的人。我想到的是单纯的真正的思想，并确定地说：有。我谈起无政府和不抵抗理论。我说：我还的确没有在哪个国家看到一个人有足够的勇气起而捍卫这条真理。我也明白，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勇气能赢得我的敬仰。我能轻易地看到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它就像上帝存在一样无疑，一种枪不需要另一种枪来陪伴，即爱和正义的法则，唯有它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爱默生的这种美国思想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文明之本。

正如我说过的，中国人是一帮孩子。尽管我们是一帮孩子，我们却能够统治如此巨大的国家。因为我们拥有真正的文明之本。简而言之，我们有能力使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民生活在和平与秩序之中。不仅如此，由于我们拥有爱默生的那种思想，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宗教，就像我称之为的，一种良民之教，所

以我们能够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起来，并使另一个大陆上的大多数民众生活在和平与秩序之中。因为那个大陆上的美国人民也同我们中国人一样是一帮孩子，他们拥有爱默生式的美国思想，即文明的真正之本。

在文章的结尾我要说的是，在目前这场巨大的历史性的危机中，我想把所有善良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呼吁在一起，即把那些还信仰爱默生式的美国思想的人、那些在他们心中还拥有他们父辈留给他们的文明之真正根本的人、那些在我们两国中怀有最真诚最纯朴思想的人呼吁在一起。我希望拥有这种思想的人与我们联合起来并帮助我们，对我们的那些同胞即像爱默生说的脑子里含有欧带虫并企图把中国和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的人、我们两国中那些慕虚荣的、自私自利的、丧心病狂激动不已的人、那些叫嚷什么人们应对德国开战并参与现在欧洲发生的可怕的血腥大屠杀的人，说，就像那位美国指挥官对他的水兵所说的那样：“别叫嚷，孩子们。可怜虫——欧洲那帮可怜虫已经死啦。”



## 八、孔教研究之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出自于一个真正有教养人的经验之谈。它表明，要想成为真正有修养的人须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品格以及什么样的心态。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首先应对其研究的对象倾注全部的、无私的爱。而只有钟情于学，他才能明白其所学。现在人们正大肆谈论着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缺点，可就我根据孔子的经典来看，它还是有其优点的。在古代的教育体制下，某位学生如果能有幸成为一名真正的受过教育者，那么他一定是一名君子，是一名真正具有思想修养的人。而当人们谈及引进到中国的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时，我心中对此表示怀疑。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乾隆年间，预备出版带注解的、由许多鸿儒参加编纂的巨大典籍时，曾说：“外国人不应小瞧中国的博学之士——中国古代学馆的鸿儒们——他们自身已证明他们对文化拥有献身精神。”可是，新的体制培养出来的或钟情于“新体制”的有知识的人——像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荣膺过“状元”头衔的现任农贸部长张膏，他现在也是新体制的重要支持者——对文化却已完全丧失了热情，只是对铁道、采煤、探油、兑换业务，即只是对那些能带来现钞的东西怀有巨大兴趣。

中国古代的饱学之士，虽然难免有着自身的不足，但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具有一些高雅的情趣。他们厌恶大型的聚会——有茶、点心及饮料在一个偌大的厅堂里举行的大型聚会。人们从没有听说过古学馆的鸿儒们在掌声四起、彩旗飘扬、面向公众、人头攒动的聚会大厅里做报告。古学馆的鸿儒们只是从其志同道合的朋友中获得快乐；这些朋友很少是精心挑选的，而是从远方慕名而来拜访的朋友。古代学馆的儒生们仰慕孔子。他们学习研究孔子，力争理解并按照他的学说去做。但他们却并不想建立孔教会，并不会自己高呼并试图使别人也一道高呼“孔子！孔子！”在古学馆的儒生们看来，儒教是一种宗教，就像一位英国绅士在回答一位太太问他皈依何种宗教时说的“所有有理性的人的宗教”。“可是，请问，这样的宗教是什么呢？”那位太太又道，绅士回答说：“就是一种所有有理性的人对此达成默契、决不谈论的宗教。”

事实上，由于“新学”的引入，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在《礼记》中说：“我听说，来与学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但从未听说过，去与教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古学馆的学子们只希望去学习，并致力于不断使自己的学识与修养日渐深厚，臻于完美。而“新学”却希望去教导别人，只是致力于并渴望阐释所有的欲望，去宣布他们发现的“新学”、他们的体制、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哲学、心理学或宗教。如果古代学馆的儒生们谈论起“Erziehung”，他们用“学问”二字，意指学习与探求。可“新学”下的学生们却改变了“Erziehung”的表达，他们称之为“教育”，意指“教与育”。例如北京政府的教育机构现在就叫做“教育部”（教与育的机构），取代了学部（学习的机构）。

人们也许要问，一个名字能造成什么样的区别？其区别在于，古代学馆的儒生们只是为了自己增长才能而学习，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就着昏黄的油灯，三更灯火五更眠，学习和研究古代的美德与智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能学到真知识，并拓展心胸。为了达到华兹华斯在《远行》中所写的：“关于天、地、人”的境界。这是一位真正的博学之士应当了解和具备的知识。

可是“新学”下的学生却不效法此道，即不是三更灯火五更眠，就着油灯研习古往的智慧和美德，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涌向电灯明亮的孔教会大厅，慷慨激昂地向人们讲述怎样建立一个完美的儒家教育体制，或者找到灯光明亮的基督教青年会聚会大厅，去作报告，向人们讲授怎样使每个人在社会公德方面像作报告的人一样臻于完美！亨利·诺曼（Henry Norman）先生在他所写的关于“新的日本”一书的某章中，称日本是“一个学校中的民族（好学的民族）”。对于“新的中国”，我恐怕，人们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好学的民族。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于新的中国，只能说，这个民族建立了许多学校，建造了许多昂贵的校舍，但这只是为了别人受教育，而不是为了自己受教育。

英国诗人科伯（Cowper）在谈起他那个时代的某位布道士时，曾对主教充满激情地说过下列的话：

哦，你们头戴圣冕，  
保护教会！可你们却不把  
同样有力的双手放在那些  
既不能教又不愿学的人的头上：

现在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想成为改革派或是共和主义宗教

的布道士，并不需要有一个头戴圣冕的主教把双手放在他的头上，这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呢？这就要看你怎么看待了。不过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今日的世界上，改革派和共和主义宗教的布道士已变得良莠不齐了。好的，很好的；坏的，极坏的，还有那些不好不坏的，简直就像从北京大街上小贩那里买来的水果筐，没有头戴圣冕的好主教的概率是 10 : 1，甚至 100 : 1（即 100 个里面难见一个好的——译者），他们从事监察和领导工作——这些没有丝毫才干的人，除了肚子大和脸皮厚之外，往往是靠运气被人发现，得以出人头地。眼下，面对改革派和共和主义（即“新学”）宗教的那些胆大妄为、厚颜无耻的布道士，中国人尤为孤立无援，毫无办法。就我所知，贫穷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不易预见所有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圣经》上说：“如瞎子引导瘸子”，孟子以无可置辩的方式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中国现在毫无希望的局势，就教育而言，其原因在于今日那些新学的信徒们——那些现在已经是新学的教师或那些想成为教师的人——在此，借用英国诗人的话来说，他们之中绝大部分都是那些无能授徒、也无志于学的人。

那些作为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正朋友的外国人，和确实对中国的教育感兴趣的外国人应当思索一下，对中小学生或者说大学生们在精神、品格和情趣方面的陶冶，要远比他所学习的那些实用性知识更为重要。从本文开篇时我引论过的孔子《论语》一书中，你们能够发现一名儒生的真正精神，一名君子型儒生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被这样来描述：首先，他必须对其所学怀有无私的爱心，由此他从中找到真正的乐趣；其次，他

必须在与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交往中找到欢乐，而不是在有茶、有点心和饮料的大型聚会厅里找到快乐；再次，当人们不认识他或对他一无所知时，他不会报怨。如果那些中国和中国人的真正的外国朋友，铭记了孔子的这些话，那么当人们恳求他们在教育事业上给以赞助时，他们就能赞助那些适合于赞助的人，赞助那些拥有真正精神的博学之士。在这个新时代的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如此那般焕然一新的新学、新宪法、新帽子或者新靴子，而是一种新的精神——真正的精神，真正的君子之道。这正如古语中所说的：

“所谓道（精神），就是使万物充满生机的东西。”

## 九、孔教研究之二

有子（孔子的一名弟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

孔子终生强调教育教学和文化的重要性。因为孔子和培根的观点一样，培根说：“专业人员只能做一些局部工作或对此加以评断。但是总体规划和对事情的设想与领导，最好由智者去做。”按照孔子的学说，教育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和文化应为一个目的服务。一个好的学子学习并不仅仅是为了成为一个伟大的有知识的人，即使在奋发学习的过程中，伴随着他、慰藉和酬报他的欢乐与陶醉本身，也并不是主要目的。当有人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说“开卷有益”时，程灏——这位宋朝的大儒和严谨的孔子式的清教徒——回答说：没有方法和目的，只是为了从书中获得消遣的无计划的读书，无异于浪费时光，并且这种读书会玷污我们的灵魂。优秀的学子在研习典章过程中的唯一目的和目标应是：理解生活，探寻人生之道，由此学会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过真正的人的生活。

如果奉行孔子的教诲，像他教导的那样去进行自我修养，努力做一名好学生，那么就会在孔子弟子的言语中找到孔子学说中关于怎样生活、怎样真正地生活之真谛。要弄清我们应该怎样生活，首先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个明确的概念，即我

们为何而活？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教教义关于人类最主要的目标是这样表达的：“人类之根本目的，乃赞美上帝。”这样理解或许不错，但却是不确定的。在这点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孔子的学说非常清楚明白而不存在任何歧意。“孝弟者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人生之本为孝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孔子的学说与其它大的宗教思想体系或真正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佛教和基督教的宗旨之一，是教导人们怎样成为一个好人。而孔子的学说则更进一步，教导人们：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社会公民。佛教和基督教告诉人们，如果人们想成为一名好人，一名上帝之子，人们只需思索灵魂的状态及对上帝的义务，而不必思考现实世界。作为另一种学说的儒教认为，为了保持良好的心境，思考灵魂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还必须思考上帝把人类置于其间的人世，以根据上帝的意愿完成其功业。如果人们希望对上帝尽义务，那么同时也必须对人类尽义务，即孝悌之义务。事实上，本来意义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是告诉人们，当人们作为公民居于斯世时，就不能成为好人。因此要想成为好人就要下决心离开现实世界，不再做一个公民。换言之，本来意义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是一种为人们谋划怎样隐迹于山林荒野、以及为那些在北戴河避暑的小屋里，不干别事，只对其灵魂之状态和对上帝之义务进行思索的人设立的宗教。孔子学说的精义却与此大相径庭。如果人们乐意，可以称之为宗教，也可以称之为道德体系，它告诉人们作为公民应如何生活，即是为那些卡莱尔说的“要纳税，付租金和有烦恼”的人所设的宗教。

一言以蔽之，人们可以称这种孔教为一种良民宗教。可是人们要说，它根本不是一种宗教。是的，它也许不是一种宗教，

我承认，它不是那种戴着神圣光环的圣者的宗教。而是一种为那些纳税、付房租的平民百姓设立的宗教，因此它不是一种享乐的宗教。正因为它不是为那种狂热的圣徒而存在的，因此它也不是那些命运的宠儿的宗教，作为这种宗教的教徒，是不可能北戴河的避暑小屋安逸地度日的。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遵循孔教的教义准则去生活要比遵循佛教和基督教的教义要难得多。如果想成为一名好的僧侣或基督徒，只需剃度，穿上袈裟，住进寺院或到北戴河去，静思其灵魂状态和对上帝之义务就行了。可是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孔教的弟子，就不仅要思索其灵魂状态和对上帝的义务，还要考虑对于人类的义务。要确实履行其责任、善行和彬彬之礼，要像对待岳母似地对待共和国总统。简而言之，儒教——孔子的学说，就是孝悌之宗教，它不是一种享乐的宗教。此外我还想指出的是，尽管儒教——孔子的学说并非是一种灵光四射、令人狂热的宗教。但它却同佛教和基督教一样，在世界上取得了同样伟大和辉煌的成就。正如博学的中国学教授罗伯特·道格拉斯先生在伦敦大学所说的：“尽管儒教只是一种适合于平静而不是极富冒险之胡人精神的实用道德体系，但它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把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居民统一于泱泱大国、并使之生活在秩序与和平之中的强大力量。”

在今日中国，最令我惊奇的是，那些带着满脑子“新学”到中国去的人们，教育那些把良民宗教做为自己唯一宗教的中国百姓，怎样做一个良民，怎样在社会道德中完善自己；教育那些世界上历史文化最为悠久古老的中国百姓，怎样去治理自己的国家。对此，那位到埃及去为英国的政治家讲述应如何治理大英帝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不会反对的。但事实上人们不应



为此感到惊讶，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所谓“思想家”，厚颜无耻和粗俗不堪，像外国人一样享有特权。可对我来说，事情滑稽的一面是——或者说最可悲的一面——随便人们怎么叫法，即“新学”里向一个国家的人民所昭示的治国之术，早在罗马帝国之前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艺了。可是这些博学之士，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当中的精英，这些帝国中的精神贵族不仅提出了这种无聊的东西，而且还谨守着这种“新学”，并对之坚信不移。然而在我看来，只有1900年的义和团癫狂精神的扭曲、昏愤糊涂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些玩艺，都是些好看的装满新酒的老酒囊饭袋，就像今天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模仿欧洲人的穿着到处游荡的中国人一样。

严肃地说，在我看来，如果世界上还有令中国人民向其他民族学习的东西，那一定不是统治之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布丁的味道，只有吃了才知道。”除了古罗马，也许再加上今日的英国，从古至今，还有哪个民族在统治如此之大的国家方面取得了成功，在统治事务上取得了堪与中国人民媲美的成功呢？我所谓的统治，当然不是指什么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谈论政治、大声争吵之类，而指的是使整个国家处于和平与秩序之中。

中国人民在统治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其取得成就的秘密何在？其实这秘密并不深奥，而是包含在如下一句寻常的格言中：法人而不法法<sup>①</sup>。换言之，中国人民之所以在统治事务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因为她不是在宪法上费尽心力，而是找到了统治的根本，让中国人尽力使自己成为良民（孝弟者）。

<sup>①</sup> 有治人无治法。——原注

我们拥有的立法人，所有伟大的立法人不是倾力于整治法律、法规和宪法，而是依赖于他们所挑选的合适的人。中国的皇帝或君主的真正任务，在这里我想指出，并不是统治——不是忙于管理的细节，而是选拔合适的人材。首先，鼓励他们所选拔的人展示出其良好的精神与风范，并静以观之，看他们是否真正拥有良好的精神与风范。简而言之，中国统治者或君主的真正任务，是不仅要承担起培养国家公务人员的品格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培养整个民族品格的责任。事实上，中国官员的任务除了管理之外，主要是负责培养民族品格，以便使人民有一种自觉的精神而并不依赖于政府。歌德曾回答过什么是最好的统治形式，他说：“最好的统治形式，是使统治变得多余的形式。”

已故的麦嘉温博士在他关于中国人工商生活的概述中说：“人们所观察到的这个民族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们的组合能力，这也是文明人类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对他们来说，组织和联合行动非常容易。其原因是他们内在具有对于权威的尊崇和遵纪守法的本能。他们的温顺驯良并不是一个精神衰落的、被阉割者的驯良，而是源于自制的习惯，和长时间在地方、乡村或市政事务中保持自治形成的结果。对于国家，他们学会了自我依赖。若是把这个民族中最贫穷和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带到某个荒岛之上，他们会很快将自己组成一个政治实体，就像那些生活在理性民主教育的人们一样。”

中华民族治理国家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秘密，即在于“法人而不法法”的原则之中。这就是他们需要的并为之全心致力的原则，教化民众，使之孝弟，而不是为宪法而费尽心机。另一方面，如麦嘉温博士谈到的，他们发展孝弟之教并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秘密，又在于其内心对于权威的尊崇。这种基本准

则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基础，是古代知识的传授和宗教即中国的良民宗教的基础。由于内心蕴含着对权威的尊崇，我们中国人一直拥有麦嘉温博士所称的“理性民主”。至少从公元纪元的汉朝开始到民国之前始终如此，如果我们在内心没有对权威的尊崇，我们得到的就是众所周知的目前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共和政治下、人们应称之为“非理性民主”的东西。虽然中国的统治方式始终是君主政体，但我们却从没有出现过专制。可是人们现在一致地说，中国的统治，直到今日的共和时期一直是一种独裁统治。如果一个民族拥有理性民主的精神，就像中国人民一直拥有的，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存在。在中国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专制即秦始皇帝的暴政，他下令焚毁书籍，那时的中华民族被一种“非理性民主”精神所吞噬。事实上，这种“非理性民主”的结果——或许也是对它的治愈——乃是独裁。“非理性民主”越甚，独裁政治就愈加可怕。

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尽管从统治的形式上来说始终是君主统治。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民主的民族。我敢说，就我所知，中国人——我在这里指的是真正的中国人，而不是人们今天在中国的大街上或政府某些机构里看到的、在打扮上仿效欧洲人的那些人或乌合之众——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英国剑桥大学的罗斯·迪金森<sup>①</sup>教授，那本著名的《中国佬约翰来书》一书的编者，在他最后的一本游记中写到：“我以前从没有到过这样一个国度，这里的人

<sup>①</sup> 迪金森 (Lowes Dickinson, 1862 -1932): 英国学者。曾著《中国佬约翰来书》，批评西方近代文明，赞赏中国文化，一举成名。书中好像观点与辜鸿铭思想颇为相似。后为剑桥大学教授，曾来华游历。

民是如此的自尊自立和如此的热情。比如在美国，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向你保证，他和你一样和善，可事实上他们却很粗暴地对待你。而在中国却不同，因为你能感觉到他们对你都很和善。他们没有那种个人权力的自我意识，但却不像人们在印度到处可看到的那种爬在地上的卑躬曲膝。中国人是民主主义者，从他们怎样对待自己和怎样对待同胞中就能看到，他们已经实现了民主主义者期望西方国家所达到的水平。”正因为如此，我说，中国人民今天是世界上唯一民主的民族。真正的“理性”民主主义者和“非理性”民主主义者的区别，即在于此。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从没有想过和你不一样，而假民主主义者在其自我意识中认识到他们确实不如你，却又企图通过维护自我意识来表明，他们和你一样好。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不考虑自己的权力，而是考虑他的义务。假的民主主义者则坚持自己的权力，而不尽自己的义务。这就是理性民主与非理性民主的根本区别。

我想对那些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和那些对目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情怀有严肃关切的外国人说，中国的希望所在并不是袁世凯。中国的希望所在，也不是那些以舞会和茶会招待外国人的模仿欧洲的假洋人。我想告诉外国人的是，中国的希望，在于麦嘉温博士说的中国人内心那种对于权威的尊崇，在于良民宗教！尽管我们在最近的两年半中经历了急剧的动荡，有着一个除了搜刮钱财、挥霍、发布条令和不断许愿之外，其实什么也没做的政府，但是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里，和平与秩序仍然被人民遵循。仅此一点便令外国人大为惊异。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应该感谢的不是像许多外国人所想象的，是袁世凯的敏锐智慧或他的某位臣卒，而是中国的民众还没有丢

掉他们内心对于权威的尊崇和良民宗教。简而言之，中国今日的希望不是袁世凯，而是孔子的良民宗教。在本文的开头，我引用过孔子的一位弟子的话，你们可以从中找到这种良民宗教的简明解释，并可将其要点归纳如下：首先，和平、秩序与安宁乃至国家本身的存在，不是依赖于法律和宪法，而是仰赖于中国的每个臣民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过一种真正虔诚的生活，或时髦地说，一种道德的生活；其次，孝弟应作为道德生活或虔诚生活之本；再次，良民宗教的秘密是人们尽义务而不是争权利。人们不对权威表现出不信任和怀疑，而表现出对它的尊崇。孟子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良民宗教：“爱其亲，畏其上，世永昌”。

那些作为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正朋友的外国人，如果他们能够真正懂得孔子弟子的这段话，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诸事，而远胜于去读像白克好司和濮兰德所写的关于中国的那些幼稚的书。国家之兴衰并非像白、濮两先生的书中所显示的，最终取决于仆人、随从们好的或坏的品格，即那些为皇帝或皇后们擦靴、提包、撑伞的人的品格。那些力求理解孔子良民宗教的外国人将明白，中国的和平、安宁与秩序并不依赖于皇帝的仆人、皇后侍女的品格，而依赖于生活在这块国土之上的所有的人们，不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外国的，还是中国的，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过一种虔诚的生活。即，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尽其义务而不是坚持其权力，也就是尽其良民之义务。那些作为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正朋友的外国人明白这些后，就有助于阻止那些反对和破坏良民宗教的行径，像“不要脸”、放肆、粗野、卑鄙等等（少数那些乐意并能够与此作斗争的人现在正处在观望之中。因为就像我说过的，依靠这些所谓“新学、进步、

自由和共和主义”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就像外国人处在治外法权中一样，根本不受孔教的制约)，而不是忍受和鼓励此类行径。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些作为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正朋友的外国人，不仅将帮助在这块国土上重建和平与秩序，而且还能支持世界上真正的文明事业，支持真正的进步和真正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正如法国人茹伯所说的，它指的不是政治上的自由而是道德上的自由；不是自由的人，而是自由的灵魂。在中国语言里对“自由”的原本叫法也是指道德的自由和灵魂的自由。中国人要是说一个民族没有自由，就说在这个民族中无“道”。“道”这个字在孔子的学说中指的是本性的法则。而本性的法则又是“天命”的体现。因此，中国人所谓的自由是一种自由的灵魂——是实现人生本质的法则。因此这种自由是道德的自由。是服从“天命”。“我欢快地漫游，因为我在寻找您的旨义。”<sup>①</sup>（《旧约》）

<sup>①</sup> 参见附录1。——原注

## 十、孔教研究之三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sup>①</sup>）

在这里讲中国古代的舜帝的语句，人们也可以用来评论现代欧洲的两个伟大的智者——莎士比亚和歌德。莎士比亚智慧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所有的戏剧中都没有一个本质上完全坏的人。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可以看到，像理查德国王这样一个被他的臣民想象成恶鬼的驼子，并不是一个“花脸”恶棍，他甚至不是一个真正卑鄙的坏人，相反，却是一个有着勇敢的英雄般的灵魂，被其内心强烈而失去控制的报复情绪驱使，以致做出残忍可怕之举、最终为自己带来一个悲惨结局的人。事实上，莎士比亚所有悲剧作品中的悲剧，就如同人类的现实生活一样，并非是人性的恶所造成的悲惨结果；并非是本质的恶棍的悲剧。这种本质上的恶棍也只能存在于那些具有齷齪智慧的小人们的想象之中。这种悲剧是令人痛惜的悲剧，是善良勇敢的、具有英雄般高贵心灵的人们受其内心失控的情绪驱动而造成的令人同情的惨痛，即，他们是被其内心失控的情绪推上了悲剧的道路，导致了悲剧的结局。这就是莎士比亚智慧的伟大之处。

如果我们透过莎士比亚的智慧，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邪

---

<sup>①</sup> 这是一部以《中的学说》闻名于国外的书。——原注

恶，不过是由于人的情绪强烈失控发展而成的。从伟大的歌德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到，即使一个魔鬼也不是由火与硫磺构成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恶鬼，而只是一个否定的灵魂，它不断地否定一切，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没有全面完善发展的本性。歌德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我们所谓人性中的恶，不过是一种不完善的发展，一种畸形或变态——某种道德品质的缺失或不足，而不是什么绝对的恶。”由此可见，孔子在我们上面所引述的那段文字中的洞察，是多么的深刻和正确，也就是说，一种伟大智慧的真正特征，是能够在事物的本性中只见其善而不见其恶。

爱默生也说：“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智慧，是根据其希望的大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个人和许多民族中那称之为悲观主义的东西的流行，则是智慧不健全、欠缺或畸形变态的一种确切标志<sup>①</sup>。我想在这里指出，目前在欧洲思想界和文学中，悲观主义之所以流行，完全是现代教育——那种由国家鼓励和支持的、使每个人都受到教育的必然结果。因为这种教育更多地重视教育的数量而不是教育的质量，只重视质量不高的受教育者的数量，而不重视真正受过教育者的质量。简而言之，这种更多地重视数量而不重视质量的现代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肯定是一种不完善的半教育。这种不完善的半教育，必定使人的本性得不到完善的发展。歌德说，魔鬼，那无恶不作的幽灵的化身，不过是些本性发展不完善的东西。如此看来，目前欧洲现代半教育制度的一般产品——实际上乃是魔鬼的化身。魔鬼最

---

<sup>①</sup> 以上文字，辜鸿铭曾在《中庸》（1906年版）译著中作为注文，见其《中庸》译著第7—9页。以下文字，辜氏在该书中的附录A里曾出现过，只是略有变动。



显著的特性，正如我们从弥尔顿那里所得知的，其积极面表现为：高傲、狂妄、自负、野心勃勃、放肆、不服管制，根本不承认和敬畏道德法则或别的什么东西。所有这些特性你们都可以在不完善的现代教育体制的一般产品中找到，如果你碰巧遇上一个强悍的性情粗暴者的话。魔鬼本性中的消极面则表现为：卑鄙、无情、嫉妒、猜疑，以及对于人、人的本性和动机乃至通常一般事物的悲观主义。所有这些特性，你们同样可以在现代不完善的现代教育体制的一般产品中找到，如果你碰巧遇上一个性情软弱者的话。

当人们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今日世界的人类幸福和文明事业，实际上掌握在现代半教育制度的不幸产物、也就是那些具有我上述所说一切特征的人的手中——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今日欧美所谓受过教育的人和统治阶层中的绝大部分。如果人们始终记住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对今日世界为什么如此的混乱而感到惊奇了。就像今天我们在欧洲见到的、正在进行的“科学残杀”，那被称之为文明产物的战争一样。导致当今一切事务陷入巨大困境之中或缺乏道德社会秩序的真正道德原因，如果人们追本溯源，将发现它正是理智的退化、不完善和衰落的产物。这种理智的退化、不完善的衰落，又是现代由国家支持的然而却是错误的教育体制、或更确切地说不完美教育体制，即过分地重视教育数量而不求教育质量的必然结果。如果要重建世界上真正的道德社会秩序，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由国家支持的现代错误的教育体制。这场改革的第一步应是：严格控制受教育人的数量，提高受教育人的质量，同时节省对设立研究院和大学的投资。正如爱默生说的：“不要为了那些蠢材和不宜接受严肃高等教育的人进行投资，而应当把这些钱用于鼓励和资助少

数真正适宜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增益其所不能，使他们的教育从根本上达到完美的境界。一言以蔽之，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应采取像古代我们中国人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所采取的名曰“养士”和“造士”的那样一种国家教育体制。

正是由于担心对教育和自称受过教育的人之数量不受限制所产生的可怕后果，晚年的歌德倾向于认为马丁·路德对于欧洲文明倒退了两个世纪负有责任。因为路德把《圣经》译成了通俗的德国语言，为在真正受过教育的绅士中废弃拉丁文铺平了道路，并为那种不限数量、人人都能成为受教育者的随随便便的简易教育打开了方便之门。其结果，我们现在都已有目共睹了。

## 十一、孔教研究之四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罟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第七章）

本书作者在前一章里曾指出，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缺乏社会道德秩序，是由于人类智慧的缺欠和不健全造成的，并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话，说明伟大的完整而健全的智慧之真正特征。在本章里，他又引用了孔子的另一段话来说明，这些所谓的智者们在私人 and 公共事务中毫无教养、惊慌失措的举止，表现了他们这种不完善精神的自负与无用。他们是这样惊慌失措，就仿佛落入一个罗网、圈套或陷阱之中，人的这种失控的情绪有时会把他的生命或这个世界推向这样的混乱之中。

当某个人的事情陷入无序和混乱时，自然而然，他脑中或心中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从中解脱出来，摆脱困境，走出僵局；在摆脱困境、走出当下僵局的渴望和激动之中，人们往往被诱人去考虑这种、那种或某些聪明的逃避或诡计，尤其当他是一个聪明人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这种诡计非但不能将其从困境或僵局中解脱出来，反而只能将其带入更大的困境或僵局之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常常看到今天当某个民族或者世界事务陷入困境或僵局时，总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那些博学的、勤劳而难以理解的人出来提出他们的改革方案，提出

诸如立法机构、征税，采纳金本位制等聪明的计策；更有野心勃勃者，甚至提出教育、玄学和数学的方法，宪法的几何样式等等花招。最令人惊奇和不可思议的，还有那种以新式的算术法则教育人们怎样不施骗术就可以占其父母兄弟便宜的所谓政治经济学。但是，所有这些智者的无知，正是由于他们的聪明和博学所致；他们对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即，你若想要一个人在改革他陷入困局的事务中获得成功，就必须明确首先要告诉他如何改革其用以推行这种改革的手段——也就是他的人本身。如果那个人的自我状况，他的品德和行为、他的情感思想方式及其生活行为方式，均处于不需要改革的状态，那么他的事务也就不会陷入困局之中。但如果他的自我状况实在需要改良，那么他的事务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时候，很明显，你教他复杂的方法或任何处理有关其事务的办法，都将无济于事。事实上，只有当那个事务陷入困局的人调整好和改良好自身——他的自我——那个可怜的人才会处在适宜的状态之中，否则，不用说推行关于他事务的那些美妙聪明的改革计划，即便了解其处于困局的事务之真实确切的状态，以便能够运用改革计划产生任何好的效果也不可能。

换言之，在一个民族中，某人或众人推行任何关于其自身事务的改革计划之前，都必须首先着手改革其自我与自身。简而言之，道德改革必须置于所有其它的改革之前。

因此，无疑的，对于个人、民族乃至世界来说，当事务陷入僵局和困境之时，只有一条正确的摆脱之路，那条路是如此的简单，正如孔子所说的，自以为聪明的所谓智者竟然视而不见是多么的令人惊讶！事实上，那条路，用简明的话说就是：恢复你性情的平和状态、保持你判断的冷静公正；回复你真实的

自我，或用孔子的话说，致中和（找到你道德本性的中心线索和平衡状态）。

因此，道德改革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回复其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事务陷入僵局和困境之中时，一旦其恢复了性情的平和与判断的冷静——一旦回复到其真实的自我状态——那时也只有到那时，该人或民族才能了解到其事务的真实确切的状态。而只有了解到其事务所处的真实确切的状态，他或他们才知道采取与事态相吻合的行为路线以便使其回复正常——回复到其天然和谐的本然状态之中去。实际上，也就是去做人们称之为符合道义的事情。当一个人把握住了其真实的自我，使他能够看到并去做符合道义的事情，那么，不仅那个人和事物，而且整个的宇宙，那被同样的道德秩序统治，被同样的事物秩序和体系统治的宇宙，都将为之响应和顺从；并且关于和围绕着这样一个人的一切事情，也都会立刻再次回复到和谐与无限广阔的秩序中去。

## 十二、孔教研究之五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章）。

本书作者在上章中描述了那种伟大精神的特征，指出了那种半吊子智者（half intellect）的自负与无用，以及虚伪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的特征；在分析希伯莱主义一种类型的这一章，我又引述了孔子的另一段话，以此来指出虚伪的希伯莱主义的特点，即损害和摧残由于在道德方面与情感或宗教方面人类本性失去的平衡。世界宗教史以其禁欲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的宣言证明，孔子在这里所抓住的虚伪的希伯来主义或人性在道德、情感及宗教方面平衡的丧失是多么准确。

歌德说：“宗教的虔诚（Frommigkeit）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即通过最大程度的心宁、实现文明或人类完美之最高境界的手段。”歌德在这里所谈到的宗教虔诚，那种基督教和佛教所谆谆教诲的至德，也同样是日本武士道所主张的道德，即：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勇敢、面对痛苦或死亡毫无惧色。这些日本武士道所坚决的品德，也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的确，正如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基督教并不是一套僵死、整齐方正的行为规范的汇集，而是一种性

情，某种心灵的状态。”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是：基督教，佛教乃至武士道，都只是一种风纪训练，一种人类性情和精神的教育方法。这种风纪训练由某些品德的训练组成。在基督教和佛教中表现为虔诚，而在武士道中，则表现为自我牺牲和勇敢。这些品德的训练，正如歌德说的，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使个人或民族能够培养出其精神和性情完美状态的手段，藉此完美的精神和性情，从而达到人类完美的最高境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种最高境界也就是最为文明的境界。

然而，这种对品德的修炼过了头、或者说被以一种抵触和危害其最终目的的方式贯彻着。这样的话，此种训练不是在培养人完美的性情和精神状态，而是在摧残和损害它。这样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有益的而是有害的训练。举例来说，那种自我克制的训练，当其被滥用、就像古代的斯多葛派禁欲主义者那样被一种仇视和怀疑精神所左右；或者像早期基督徒和现代神圣同盟军被一种好斗的盛气凌人的思想所控制时，也是如此。从一种宇宙秩序和角度来评判，这已不再是一种德、而是一种恶——一种罪；因为它不是去增进、而是去损害性情和精神的和谐与美妙，并藉此严重地危害人类完善的事业和世上真正的文明。同样，那种日本武士道所主张的勇敢或面对痛苦与死亡无所畏惧的品德训练，当其在滥用或被一种仇视与怀疑精神中进行，就会变成狂热或道德疯狂，从而不再是一种德，而是一种罪、一种恶，这样一种训练也不再是真正的武士道训练<sup>①</sup>。

事实上，罗斯金说得非常正确，一个真正士兵的职责不是

---

<sup>①</sup> 上述文字亦可见之于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本（1906年版）第16—19页的夹注。下面的内容则可见之于该书后面的附录C，不过略有删节。

杀人而是被杀，但士兵却不能不负责任地放弃生命。他必须且只能是为一个目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即成为一个真正的士兵而去捐躯。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以致于富有道德的人去当兵？毛奇，那个最伟大的现代欧洲思想家，还有中国那个最伟大的战略家孙武子都一致认为，真正的战略和战术在于以尽可能少的杀伤赢得胜利。这种较少的杀伤不仅是对己方而言，也是对敌方而言。相反，通过使对方不必要的伤亡来获取胜利则是糟糕的战术和下下之策。我们现在明白了一个君子当兵打仗的真正目的。最伟大的战争艺术家告诉我们：在战役中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应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同理，战争的真正目的是缴械：解除夷人的武装，解除那些丧失理性的、暴虐的、荷枪实弹的危险疯子的武装，解除由诸如此类疯子所组成的、危害和破坏道德、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乃至全世界文明事业的民族的武装。一个真正的士兵的荣誉不在于杀敌，而在于他为解除危险的、荷枪实弹的疯子武装的过程中愿意去献身。正因为如此，一个真正的士兵去打仗、去从事解除危险疯子的武装行动时，他所具有的性情和精神状态不是愤恨、蔑视或狂喜，而是由于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产生的悲哀和无限的惋惜之情。当一个真正的士兵在试图解除危险疯子的武装过程中被打死时，他心中没有充满对敌人的怨恨，蔑视和复仇之念，而有的只是一种平静满意的神情，因为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做了他整个的天性（自我）所告之于他的正确的事情。所以，那种真正的武士道训练，靠的不是使人的身心对死亡的痛楚和畏惧丧失感觉，而靠的是调节那愤怒、憎恨和报复的本能冲动，使这些冲动的情欲受到遏制，让它们不能扰乱人的性情与精神状态之平静与平衡。



一名真正的士兵去参战并战死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性情和心灵状态，在戈登将军的生与死中能够见得最为分明。戈登将军的生与死是现代武士道最真实的典范。我说过武士道是一种教化人使其能够达到完美境界的精神、性情和心灵状态的风纪训练，在此我补充一点，一个真正的士兵活着的时候的生活，便是一种受约束的、特别是对他自己来说是一种受约束的风纪训练。而他在一场必要的战争中死去，则是为了他的国家和世界的一种风纪修炼。戈登将军在喀士穆面对死亡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性情和心灵状态，正如他在临终日记中所显露的，已接近于这个世上人类精神与性情训练所能达到的风纪至境，即歌德称之为圣哀之极的殉难风纪。卡莱尔说：“你能像古希腊人泽罗教导的那样，不惧苦难踏上人间大地，那还是微不足道的，当你受尽了它给你的苦难，甚至正是因为遭受了它的苦难，你还能够爱它，那才是至上之境。为此，需要一个比泽罗更加伟大的天使降临世间，现在，这样的伟大天使已被派来。”

我在上文中已经努力说明的那种道德，是一种作为道德教育和宗教教化的目标，不是这种、那种或任何其他特定品德的训练。道德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和造就某种性情、精神和心灵的状态。正如所有伟大的宗教体系一样，基督教的本质和力量，并不存在于任何特定的教条乃至金科玉律之中，也不存在于后来人们归纳成体系并名之为基督教的理论汇编、宗教戒律之中。基督教的本质与力量，存在于基督为之生为之死的那种完美的性情、精神和灵魂状态之中。在孟子时代的中国，有两个著名的贤人伯夷和叔齐，他们生活在乱世，处在以文明为借口而起的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环境，为了维护自己的节操，他们拒绝同流合污，宁愿饿死在荒凉的山脚之下。孟子在谈起这两个贤人时

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我曾说过，道德教育的目标，不是这种、那种或其他任何特定品德的实践，而是促进和造就某种性情、精神和心灵的状态。然而促进和造就完美性情、精神和心灵状态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将其置于世上那些伟大的创教者那样的宗教天才的影响之下，学习和理解他的生活、行为与诫条，乃至他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即他的性情、精神和心灵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道”——他的生存或生活方式。因此，我斗胆地指出，那种道德教育的目标，存在于《新约》里面的这样一句话中：“向我学习，因为我性情温和、内心谦恭，这样你就能发现灵魂的安宁。”或者像《论语》中所说的那句“夫子温、良、恭、俭、让”。当这样的句子被学者们恰当的理解和领会时，它对于其道德品格、性情、精神和灵魂状态的培养，将远远胜过东京和柏林最有造诣、最为博学的教授能够制定和希望制定的那套关于公德与私德之最精确刻板、整齐方正的规则。马太·阿诺德说：“想象那些以正确科学化的语言、或排除了旧式错误的新式花言巧语来表述的行为与道德劝诫准则，能够收到同我们已经长期习惯、情感与喜好已为之系统的旧式准则和劝诫所能收到的同样效果，那是一种错误。可迂腐的学究却总是这样想象。这类错误已是司空见惯。它只是表明我们之中还有多少人身充满迂腐之气。关于道德准则的正确科学化的表述，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来说，丝毫也没有取得过成效。指望一种新式的花言巧语的表述，能够像基督教（或中国的圣书）那旧式熟悉的表述那样吸引人心和激发想象，能拥有那些表述所具有的效果，除非当这种表述出自一个宗教天才之口，能够等同于旧式的表述时方才可能。可以断言，以一种新式的花言巧语的

表述来传达必要的东西是做不到的。奥古斯特·科母德极端的迂腐，正体现在他自以为能做到这一点的虚浮的想象之中。他的弟子们的迂腐，则取决于他们对其师虚浮想象的承袭程度。”

## 附录

给恩逵利尔 (Enquirer) 的答复<sup>①</sup>

致“京报”的一封信

贵报记者恩逵利尔——当他向你们写到我上篇《孔教研究》之二是一篇“拙劣之作”时，问道：“谁是 Sinensis？对此他知道些什么？”他以一种万事通的神情，而且令人遗憾地是以一种傲慢与无礼的语调，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对此一无所知，既不懂基督教也不懂儒教。因为每个研究过基督教与孔子学说或对此略知一二的人一定知道，“无礼与傲慢”是一种恶念。基督说过：“向我学习，因为我内心谦恭、性情温和。”孔子的弟子也说：“夫子温、良、恭、俭、让”。贵报记者引述某位现代评论家的话说：“在人们开始谈论孔夫子的时候，有一种十分不好的倾向，即沉溺于不确定的抽象概念之中。”然而我想说的是，在报纸的报道中也存在一个很糟糕的嗜好，那就是沉溺于讽刺之中。当我读完贵报记者的信函后，我第一次感情冲动，就是想写信问你们，这位记者是谁？他不负责任地说我对孔子的翻译简直是一种错误的翻译。因为我以为“傲慢、讽刺和无礼”是

<sup>①</sup> 这封信是因我的那篇《孔教研究》之二而写的。——原注

比不确定的抽象概念更不好的东西。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我自己，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原则，即从不对对我文章提出批评和攻击的人作出回答。可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却要采取一个例外的行动，背离我的原则。我之所以这样做，有着特殊的理由，因为我认为，对此作出解释是非常必要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我对孔子经典的翻译中对于文字的斟酌与著名的汉学家或汉学大师理雅各博士的译文完全不一致。西方应当极为感谢他，是他第一次为欧洲人完整地翻译了儒家的经典或中国神圣的典章，但同时我也必须指出，他应对西方世界，至少应对讲英语的人误解儒家经典负有主要责任。他对于孔子的品格和学说作了生硬的和完全错误的介绍，也正是由于他的影响，人们现在要想重新消除和改变这种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公正地说，像理雅各博士，还有马礼逊、雷慕沙和其他人，就是人们称之为严谨的并做了开拓性工作的学者，人们在其作品里能找到多少令人叹为观止之处呢？而另有些人像翟理斯博士，本身则是一种毫无严谨之心的学者。与此同时，人们会马上想到《圣经》上“不要自诩为大师”的话。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现在在外国人当中存在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失津于抽象的概念之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时所说的——被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显然，从词汇上来讲，汉语允许人们翻译的东西比任何别的语言的东西要少。否则，这种翻译不仅是一种错误的翻译，而且简直是一种胡译。每个汉字就如同化学中的一种元素，像氢和氧，处于游离状态是一种单独的物质，一旦和别的元素结合后，又完全变成了另外

一种物质。在这里，我们可以拿“明”和“白”这两个汉字来作为例子。它们一个指的是“亮”，另一个指的是“白色”，如果把这两个字放在一块使用，指的却不是“亮的白色”，而是“理解”。因此，当你们在维根—利兹饭店雇了一名翻译，他告诉你们说人力车夫不能“亮的白色”时，据此你们便可以肯定，他不是一名称职的翻译。再举一个远一点的例子，比如说天、地、人。翟理斯博士把古典“三字经”中的“三才者，天地人”翻译成：“三种强大的东西是天空、地球和人类。”尽管这种翻译有些意思，但却不是其真正的含义。倘若把它翻译成“上帝、自然和人生”，才完全真实地表达了汉语的意思。孔子的博学准则指出，就字面上可翻译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对上帝、自然和人生’应当有所了解或对此拥有正确的思想。”（再次引用华兹华斯的“远行”）

因此，我把“孝弟”译成“成为孝子和良民”。第二个字“弟”，只不过具有表面意思，指的是兄弟之弟，进而还有年幼年轻的意思。如果再进一步，作为修饰语，它指的是处于某位在年龄、地位或威望高者下面的年轻人，对上者谦恭或遵从法律。如果能对上者谦恭和遵从法律，他不是良民又是什么呢？

要想检查一种翻译是否对某个汉字做出了正确的理解，人们只需把对这个字的翻译运用在不同的地方，看看这样的翻译是否有意义即可。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弟”字译成“做一个良民”是否合适。以《论语》书中各处作一下检验。举第1章第6段为例，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更进一步的例子如第13章第20段，（子贡）曰：“敢问其次？”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事实上，如果必要的话，为了证明我

在这里的翻译并不错，我还可以引述孟子类似的话来消除疑虑。孟子所表达的孔子孝弟宗教的观念是：“爱其亲，畏其上，世永昌。”爱其亲为“孝”，即为“孝子”；畏其上为“弟”，即为良民。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贵报记者提出的反驳我观点的论据。贵报记者认为，基督教和佛教的目标就是教育人们“成为好人”。我承认，如果笼统抽象地说某位是好人，那么他也一定是一位良民。但我指出的不是不确定的抽象概念，而是准确的事实。对此，不妨拿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士两年前在宜昌的情况来加以说明。由于爆发革命，领事命令她离开港口，但她拒绝这样做。因此我感到，这是一个基督教所讲的好的妇女，但她却不是一个人所讲的良民或者说贤妇。事实上，如果对此还需要必要的证明，即我的言语并不是不准确，这样的事实也可证明：在基督教国家里存在两个彼此分离互不相干的机构，即教会和国家。教会旨在关心和指导人们成为好人；而国家旨在关心指导人们成为良民。换言之，因为宗教、像基督教并不能通过教会真正教育人们怎样成为良民，所以在基督教国家里，另一个与之完全分离的机构即国家，便出来负责使人们成为真正的良民。但在中国就像在古罗马一样，国家教会、教会国家不分，因为在中国的儒教中，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宗教或者说道德系统，随便人们怎样称呼，它既能教育人们成为好人也可教育人们成为良民。由此我认为，今日欧洲的问题就是要找到像我们中国儒教中所拥有的道德系统，用它来教育人们怎样成为良民。在这方面基督教本身面对野蛮也具有这样同样的力量和威力，以此来教育人们怎样成为好人。请允许我说，我和贵报记者 W. P. 托马斯 (Thomas) 先生在此观点完全一致。基督教

是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力量。用托马斯先生自己的话说，基督教是一种引导我们回归到上帝去的力量，而我说，基督教是一种唤醒我们的灵魂、神圣的本性及天性的一种力量。不仅如此，我还认为，那作用于基督教及佛教中的力量，同作用于儒教中的力量一样巨大或者说更加巨大。但接着我要指出这种力量，这种巨大的力量，这种作用于基督教的力量，正如马太·阿诺德说的，它是一种必须通过“基督柔和可亲的理性”控制与平衡的力量，是一种孔子称之为“礼”或者说高雅得体之举止规则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控制和平衡作用于基督的这种力量，那么这种辉煌伟大的力量就可马上把人们变成同样的善良、高贵并使之成为发狂的偏激之徒。当费思图斯 (Festus) 对包鲁斯 (Paulus) 说：“包鲁斯，你疯啦！这种伟大的艺术使你发狂了。”在此他误会了基督徒狂热的原因。过份的艺术并不能使人们疯狂，它只能使人变得愚蠢，就像人们在某些汉学家身上所看到的，他们不是卓有成效的学习汉语和儒术，而只是毫无意义的研究。那种让古罗马的保护神包鲁斯以疯狂的面目出现的真正原因，那种令他极其疯狂极端精神错乱的真正原因，就是作用于基督教中的、一种根本没有受到基督柔和之理性调节控制的力量。

1 简言之，在此我想指出的是，这一力量，这一巨大的力量，在基督教中产生了重大作用。它是这样一种力量，即，如果它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得到控制并达到平衡，将演变成狂热，成为毁坏良民意识的力量，且最终将损害基督教。这就像人们在欧洲的宗教战争及中国的太平天国之乱中所看到的一样。实际上，正如马太·阿诺德所说的，这种狂热，除了最纯粹的基督教之外，是一种与公民和社会精神完全敌对的东西。它仇视具有与



我们中国人的孝弟宗教相似宗教的古罗马人。人们这么仇视受过教育的古罗马人，以致塔希图斯 (Tacitus) 称之为 *exitiabilis superstitio* (致命的迷信)、基督徒称之为 *odio humani generis convicti* (被判决为仇视人类的人)。他们仇视虔诚而又爱好秩序的古罗马人，这正像马可·奥利留斯 (Marcus Aurelius) 一样追求一种纯洁高贵的灵魂本体。可是人类的这种狂热，就像包鲁图斯那第一批基督徒们的不纯粹的狂热——罗马皇帝用他所有的铁血雇佣军都没能消灭的狂热一样——在那时是一种必要的力量。为了消除人类众多的腐败之处，那自称是罗马帝国的文明社会，在欧洲古代异教界的最后时刻，这种力量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认为，今天欧美最伟大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道德体系来教育人们怎样成为良民。而且它还要拥有在基督教中起作用的同样力量，能使人类成为好人的力量。事实上，一个道德体系对于欧洲人可以成为一种宗教，就像儒教对于中国人是一种宗教或准宗教一样。可是人们知道，欧美没有完成此项任务，而且离完成这种伟大的任务还差得很远。奥古斯特·科母德的道德体系，约翰·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与伦理学体系中，都没有这种在基督教中起作用的力量，而且也不可能拥有，因此也绝对不会成为欧人之宗教，就像儒教成了中国人的宗教那样。产生这种道德体系的先兆和预示，在我看来，是德国人现在对极受欢迎的魏玛共和国的预言家、诗人歌德的作品与学说予以关注。在伟大的歌德的作品和学说中，欧洲人也许有一天会发现这种宗教。直到欧美拥有这种样式的自己的道德体系——就像我们中国人在儒教中所拥有的——之前，基督教都是唯一的、必不可少的力量，是唯一的协调社会的力量。我

常常令我的不熟悉的欧洲朋友处于惊诧和尴尬之中，我问他们：“如果你在欧美去掉基督教，在地球两大洲上的你们还剩下些什么？”我告诉他们：“在我看来，只能剩下无畏战舰、大炮、红裙子、汽车、飞船、维根—利兹饭店、电影演播、探戈舞及粗野的、装满喂得肥肥的猛兽的动物园！”

我对基督教的理解来自希伯莱文的圣经，是基督的基督教，而不是贵报记者所说的现代“美国式的基督教”。也不是那些像“恩逵利尔”这样的人的基督教，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狂妄、讽刺和无礼是一种丑恶的魔鬼。已故的主教杭舟（Moule Von Hangchow）说：“我们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的确是为了传布基督之音”。他在此所指的是不可言喻的基督温和之理性，而不是“新学”。希伯莱圣经的学说——也就是基督的学说和基督教，它不能也不会有损于中国人。也许在这个用无畏战舰、汽车、飞船等构成的“新学”的时代它甚至能做些好事。因为基督教用基督的预知之剑，在反对孔子学说时表现出无能为力。实际上，如果我们今日看到的作为共和国的中国将完全变成一个没有辫子的猛兽般的民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孔子和他的学说完全抛弃，然后我们也将真的需要基督教和这把宝剑——正如基督所说的，他来了，也把剑带到这个世界。

在结尾时我还要强调指出，我写“孔教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想告诉人们何为基督教，而是向作为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正朋友的外国人阐明：儒教都讲了些什么。我们——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在今日“新的”进步、自由与共和的时代，能够从孔子的理论中学到些什么。我看到那些真正为传播基督教付出过代价的人，并没有能力来向我们阐述清楚拥有圣经的基督教是什么，在中国这个新的共和国时代从基督教中给我们都

带来了些什么。鉴于此种原因，我说，基督教是一种教育人们思考其灵魂，并使其成为好人而不是良民的宗教。我再重申一遍，我写这些文章和这封信的目的，不是与人们争论什么是基督教。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有必要，我将写一本专门关于基督教的书，一本关于现代“美国式的基督教”的书。可是我并不愿意把该书命名为“基督之研究”，而愿像已故的 W. T. 斯特德先生所写的书那样命名。他将自己的书名之为：“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我将给我的这本书命名为：“如果基督来到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人们在这里将看到有教养的富裕商人的后裔和中国股票百万富翁的儿子，在他们玩乒乓球和支付节日餐费的同时，又通过橡胶股票来挣钱。这也是美国百万富翁所标榜的慈善活动的目的——事实上，富有之人“戴维兹 (Divites)”一边享受幸福的人生，一边关心着慈善事业。

本文已很长了，必须停笔。当此之时，在中国谈论宗教已很盛行，就像剪辫子、戴礼帽，和吸烟一样。

## 君子之道

给“京报”出版商的一封信

尊敬的先生！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阿弗里德·梭尔白斯（Alfred Sowerbys）先生为你们传教士和热心的读者发出的呼吁所写的回信。鉴于可怕的灾难性的变故——由一亿七千万人的激情挑起、并用科学的精巧的屠杀和毁灭性工具武装起来的战争——人们几乎失掉了勇气。此时，如果人们在心中自问：整个世界、文明和人类还有一线希望吗？梭尔白斯先生肯定地回答说：“有的。”对此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欧洲，基督教失败了吗？他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基督教教士应加倍努力，让基督的福音和意志控制和化解人类的激情和刚愎自用。而且这项工作离完结还远。”他还说：“不要鲁莽地遽下结论，静心观之，你们会看到主的力量。”

这一切诚然美妙至极，可是，它们都是飘忽不定的和虚幻的。我认为，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一些更为确实的东西。事实上，在今日欧洲，如果对基督教的失败或缺乏一种道德力

量需要证明的话，梭尔白斯先生的书信，便以其含糊其辞的文字提出了这个证明：“静心等待，你们会看到主的力量”。我想进一步说明，基督教的这种含糊不明、缺失和无用，正是导致今日欧洲可怕灾难的道德力量的根源。

基督说过：“爱你们的仇敌”，“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右脸，就把你的左脸也给他。”毋容置疑，上帝的这种温良宽容之性是非常崇高和美好的。然而这是有用和富于理性的吗？如果不是，其结果如何？其结果是，在现代欧洲，那些固执而又实际的人们以其现在完全发达的理解力和智力——和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人的十足的孩子气——就像马太·阿诺德说的，经历了一场心灵和幻想的人生。今日欧洲固执而又实际的人们走向两种极端，他们不是把基督的理性作为指明方向的道德力量，就是把这种理论弃若敝履，而只坚信纯粹的自然力量。那些嘴上宣誓相信基督之言的人将成为耶稣会会士；而那些完全不再相信道德力量的人将成为军国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就是成为我所说的猛兽。这种耶稣会教义即有组织的耶稣会教义，现在被称为政治和外交，它充满了貌似神圣的关于和平与文明的谎言。这种无政府主义即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军国主义，它充满对机枪的崇拜。这种耶稣会教义和无政府的军国主义，正是目前灾难性变故的真正原因。导致基督教道德力量的缺失和无用的直接因素，就是这种耶稣会教义和军国主义，它之所以欠缺和无用是因为其非理性和不实际。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如此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梭尔白斯在基督教中所见到的，人类希望的真正基础，用他含糊其辞的话来说“静心观之，

你们会看到君子风范”，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那么，人类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不！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在我看来，人类的真正希望并不是“静心以待，你们将看到主的力量。”人类希望的真正基础是孔子的君子之道。那么什么是孔子的君子之道呢？简而言之，孔子的君子之道，就是按公正行事。

基督教宣称：“爱你们的仇敌，不要互相争斗，走向战争。”可是基督教以此仅仅使人类成为了耶稣会信徒，且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导致了可怕的战争。相反，孔子则说：“如果必要，你们应当去参战，但你们必须以一种君子之风参战，并像一名君子那样去战——简而言之，按公正行事。”如果你们以一种君子身份参战，你们就必须为正义而战。那么什么是正义呢？我不能告诉你们。可我想在这里，给你们举一个人们怎样为一件不义之事而参战的例子：

在孔子的家乡鲁国，有一个国王准备发动一场反对国内诸侯的战争。孔子的两名在国王那里谋事的弟子拜访孔子时，向其讲述了此事。孔子说：“求！无乃尔是过与？”答曰：“否！夫子欲子，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作为一名君子，你们必须知道，战争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屠杀和破坏，而是解除武装。邦森（Bunsen）在他的回忆中说：“毛奇认为，对他来讲，康尼格拉茨战役并不是一场胜仗，而是一场败仗。他对战争的观点是，不是把敌人杀死，而是俘虏，杀死敌人，对他来说不算上功。他射杀只是为了活捉。而且每多杀一个人，胜利者的桂冠上就多掉下一朵鲜花。”

在对梭尔白斯先生回信的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人类文明的希望并不存在于静心以待主的力量中，而是存在于孔子的君子之道中，存在于处事公正的宗教之中。

## 在北京庆祝俾斯麦诞辰 100 周年 纪念会上的演讲

编者按：1915年4月1日在北京维根—利兹饭店里，旅华德国人举行了纪念俾斯麦诞辰100周年的小型纪念会。到会的客人中有辜鸿铭先生。他应东道主阿诺尔德（Arnold）博士的盛请，为德国统一的奠基人讲几句话——辜鸿铭先生用德语作了一篇演讲，阐明他这位居于博大精神高度的中国人对俾斯麦的看法。全文如下：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有幸参加这样的盛会对我已是殊荣，又安敢奢望尊贵的东道主先生的盛请之誉，在庆祝这位伟大的德国人诞辰时对其发表评论呢？我自知，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学者既无能力向你们讲述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崇高品格，更无力描绘他一生的活动对欧洲秩序的重建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可是，我将不再客套，按照尊敬的东道主的愿望，对俾斯麦发表点自己的看法。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我在德国作为一名年轻的留学生时，在柏林的大街上曾亲睹了这位伟大的德意志帝国的首相，之后，我就成了他的崇拜者。正如拉丁诗人说的：Virgilium Tantum vidi！



(我就这样看见维吉尔了!)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俾斯麦对我来说，他是纯粹的、地道的、真正的德意志精神的代表。然而什么是德意志精神呢？不久以后我将出版一本书，在该书中我试图描述一下中华民族的精神。今天，为了纪念这位伟人，我也将尝试向你们阐述一下我所理解的德意志精神。在俾斯麦所作的最伟大的演说，他毕生都一直在重复它，也是自从马丁·路德在魏玛皇家大厅里发表的世界历史性的演讲之后、欧洲人民所听到的最伟大的演讲中，他说：“除了上帝，我们德国人无所畏惧。”如果我试图找出一种贴切的表述来正确恰当地说明德意志精神，除了俾斯麦这句强有力的话，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表达了。

因此，德意志精神是一种畏惧上帝的精神，是一种除了上帝无所畏惧的精神。

然而，人们也许要问我：“上帝是什么？畏惧上帝指的是什么？”旧约中的希伯莱人称上帝为公正，上帝为法律。畏惧上帝就是担心不公正和不合法。在我们中国，上帝指的是秩序。宋代大哲学家朱熹说：“天治理仪”。因此，如果我们说，德国人民敬畏上帝，我们这样说指的是德意志人民是一个最担心不公正和不合法以及无秩序和无纪律的民族。换言之，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仇恨无秩序和无纪律的民族。俾斯麦的这句话所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德意志人民除了上帝无所畏惧。”

因此，在我看来，由于德国人民具有这种精神，所以为了维护欧洲国家的现代秩序和文化，他们所做的比欧洲任何别的民族都多。我只需提到的是，德意志民族是把重新建立纯洁和宝贵的基督教道德本质的改革带进欧洲的民族。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的秩序和文化经常受到一种失去控制的极端

主义的威胁。正是德意志民族把欧洲国家的秩序和文化从这种危险的威胁中挽救出来。换言之，在今日的欧洲，国家生活与家庭生活中所享有的道德与秩序，和其它的民族相比，欧洲各国人民更应该感谢德意志民族。

如上所述，德意志民族对创造和维持欧洲的道德和秩序比其它任何民族做的都多。因为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民族，是一个仇视所有非法、非道德和非秩序的民族。然而人们也许要问：德意志民族是以何种手段成功地做了这一切而使其在各民族中独树一帜的呢？现在许多人，甚至也包括一些德国人认为，德意志民族成功地做了这一切靠的是德国的武力，靠的是德国的军国主义。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德意志民族所做的这一切靠的并不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力量，并不是德国强大的武装，就我的能力判断，德意志民族并不是一个好斗好战的民族。我想说的是，德意志民族并不是为自己而爱好战争，就像英国人爱好“体育”一样。德意志民族只是在为了建立世界道德与秩序而没有别的手段时才参加战争。因为除了上帝他们无所畏惧。

我再说一遍，德意志民族成功地做了这一切并不是诉诸军国主义，并不是武力，并不是粗暴，并不是物质力量。那么，德意志民族运用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方法来达到创造和取得这一切的呢？我说，这种手段是：德意志的真诚、德意志的义务感、德意志的忠实和德意志的勇敢。正是因为如此，德意志民族才做出和取得了对世界的杰出贡献。

因此，如果我们想正确和准确地总结德意志之精神，我们不但要说，德意志民族是一个除了上帝无所畏惧的民族，而且我们还要补充说，德国人民是一个与生俱来带有这四种德意志

本质的民族：真诚、义务感、忠实和勇毅。我说，这就是德意志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我还认为，俾斯麦作为伟大的领袖是最纯正、真诚和名副其实的代表，是德意志精神的标志。因此，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名副其实的 and 真诚的德意志人而举行的诞辰庆祝会，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永志这四种德意志精神的本质：德意志之真诚，德意志之义务感，德意志之忠实和德意志之勇毅。勇毅者万岁！女士们先生们，请您把杯子举起来，为了纪念俾斯麦这位伟大的领袖，干杯！